

版權信息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 Class in England  
 Copyright © Wendy Joy Darby 200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erg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07—120號

書  名　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

作  者　【美】溫迪·J.達比

譯  者　張箭飛 趙紅英

責任編輯　馬愛新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1394-8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

目录

[北部郡縣陸地測量 4](#_Toc69122814)

[縮略語一覽 5](#_Toc69122815)

[致謝 6](#_Toc69122816)

[前言：進入權日1999 7](#_Toc69122817)

[導論 展望/再想象風景 9](#_Toc69122818)

[第一部分 再現性的風景 11](#_Toc69122819)

[一 批評視角：視景的階級化/分類 12](#_Toc69122820)

[二 文化風景 29](#_Toc69122821)

[三 民族風景 37](#_Toc69122822)

[第二部分 政治性的風景 48](#_Toc69122823)

[四 進入權政治 49](#_Toc69122824)

[五 進入湖區 64](#_Toc69122825)

[六 進入/可進入性：私有財產與國家公園 76](#_Toc69122826)

[第三部分 民族志的風景 85](#_Toc69122827)

[七 再地化/發現/引述景色 88](#_Toc69122828)

[八 特殊視角 102](#_Toc69122829)

[結論 展望/再想象共同體 111](#_Toc69122830)

[參考書目 113](#_Toc69122831)

[附錄 132](#_Toc69122832)

[譯后記 135](#_Toc69122833)

[注釋 138](#_Toc69122834)

致彭妮和安德魯

并紀念我的妹妹維羅妮卡

# 北部郡縣陸地測量

專員們認為一切

皆被命名，土地被標記狀如野獸

來證明自己的權益和種屬：

一個詞輕柔地踏在青苔的硬皮，

墨水頑皮地畫出大河小溪，形似藍色的樹；

我的標注聯結它們的堤岸，從河口到源頭

精美的襯線穿綴起每一道澗流。

拇指紋一般的等高線，一圈又一圈出自我的筆管；

地圖的模樣，好似鉤針編織的黑色披肩，

經緯線間的血色珠子，標劃出

窮人租借的公用地，他汗流浹背

壘砌堅固的界墻，圍起富人的田園。

沒有任何命名見證他的存在，我畫下

一個石冢紀念他的勞作。

邁克·諾斯，引自《新湖畔詩人》

# 縮略語一覽

#### 組織機構

BBC　英國廣播公司

BMC　英國登山委員會

CHA　合作假日協會（后更名為鄉村假日協會）

CC　鄉村委員會（1999年4月1日更名為鄉村署）

CLA　鄉村土地主協會

CPRE　英格蘭鄉村保存委員會（后更名為英格蘭鄉村保護委員會）

FLD　湖區之友協會

HF　假日聯盟

LDDS　湖區保護協會

LDNP　湖區國家公園

MEPS　曼徹斯特人行道保護協會

MTCP　城鄉規劃部

NT　國民托管組織

PDNT　峰區國家公園

RA　漫游者協會

SCR　謝菲爾德號角漫游者

TDA　瑟米爾保護協會

YMCA　基督教青年會

#### 風景區劃

AONB　自然風光絕美之地

NNR　國家自然保護區

SSSI　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 其他

LDNPP湖區國家公園規劃

# 致謝

這項研究緣起于本人一個持之以恒的興趣：了解風景如何充當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的寶庫。人們與自己的容身之地朝夕相處，并賦予它各種意義——這個認知得之于我的早期田野工作。當年，作為一個歷史風景名勝保護分子，我曾在湖區的哈索普山谷進行考察，親身經歷了風景的維護和恢復工作。我要感謝克里斯托弗·塔溫納，是他啟迪我把對風景的執著興趣與人類學結合起來。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的人類學系則提供了一種知識背景，受惠于這種背景，再加上安妮·博格、約翰娜·格勒里克和伊恩·斯科格德的支持和友誼，我的想法得到發展。這個項目得益于眾多專家和評論家的詳盡探討點評，及其認真仔細的閱讀，如瓊·文森特、簡·施奈德、文森特·克雷潘扎諾、杰拉德·克里德、內森·格羅斯，還有博格邀請的兩位匿名評審員。

這個項目得到了歐洲研究委員會（1995）和溫納·格倫基金會（1997—1998）的特別資助。維珍集團（Virgin Atlantic）資助了我最后一次的田野考察。早些時候，在皇家橡樹協會的資助下，我參加了阿丁漢姆暑期學校，由此獲得了實地觀察英國鄉村別墅的特別機會；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一份威廉·金尼旅行獎學金（1988）使我能夠多次訪問英國國家公園。這些參觀和旅行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研究。

在田野考察的過程中，我還得到許多人的具體幫助，我對他們心懷感激。索尼婭·安克斯、寶娜·戴伊和瑪麗恩·卡寧把她們的思想、感情和時間與我分享。索尼婭邀請我參加當地團體的徒步活動，由此我獲得了特別的洞見。田野考察乃是一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考察。研究的根據得之于我所到過的每個地方，卻又不受限于任何地方。就在我旅行考察期間，我痛苦地獲悉妹妹生命瀕危的消息。她是維系我與自己英國家族的最后一根紐帶。基于這個理由，我非常感激如下的人們，與我同行的徒步者，他們對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的熱情接待令我感銘不已。布賴恩·弗蘭克思、彼得和凱特·瓊斯、簡·斯威特和詹妮特·斯通、斯特拉·維爾弗德、彼得和艾琳·威萊特熱忱地邀請我到他們家。彼得和艾琳·威萊特、斯特拉·維爾弗德和彼得·瓊斯安排我參加他們當地團體的徒步活動，并向他們發送問卷調查；布賴恩·弗蘭克思援救了我，兩次！斯蒂芬·戈頓，這位多年的朋友，不管我什么時候訪問湖區，總是對我熱情有加。

彼得·瓊斯一直不斷向我提供我無法在紐約捕捉的細節信息，而馬爾科姆·皮特提供的信息我認為是非常難以獲取的。菲爾·瑞伊非常慷慨，主動地向我提供了他叔叔的日記副本，這本大約始于1922年的日記描述了一次徒步湖區的旅行。約翰·霍恩設法復印了他去世的母親1932年版的《開闊路》，它曾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陪伴她漫游。我要特別感謝科林·道爾，鄉村假日協會的會長，感謝他慷慨允許我接觸該協會存放在大曼徹斯特地區公共檔案室的文件；還要感謝伊恩·鮑羅丁（湖區之友協會的理事）和凱瑟琳·岡寧漢姆（漫游者協會發展部的助理），他們兩人都慷慨地抽出自己的時間幫助我推進了研究目標。徒步者們同意完成那份有點長度的問卷，對于他們這種慷慨精神我也心存感激。

我還要特別感謝寶娜·巴克斯特、雷切爾·拉布什、大衛·奧吉韋、布賴恩·彭斯和彭妮·辛阿諾戈魯，他們在紐約給我提供了切實的幫助。感謝大衛·林德諾斯，他向我提供了出色的地圖。考慮到該項目的歷史特性和視覺特性，如果沒有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和圖書館管理員的永遠熱情可靠的幫助，該項目不可能進行下去。

多年來耶尼·辛阿諾戈魯一直對我的各種努力不吝支持。沒有他，這本書無法完成，我對他表示衷心的感謝。最后，佩吉·弗林謝一直幫助我不斷完善我的考察工具。約在70年前，就是年輕的她，完成了一次絕壁攀登，登上了湖區的赫爾維林山。在過去的34年間，我一直與她徒步漫游紐約，她以自身為榜樣教我如何像面對絕壁一樣面對生活。

# 前言：進入權日1999

進入鄉村在英國是一件爭議頗為激烈的事務。在過去幾年里，這已由少數當地人的抗議發展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納入議會的辯論以及緊急立法的程序。在這個過程中，對立派系的立場得以鞏固。這些派系代表了城市和鄉村的基本差別，關注的焦點放在哪些人和哪些活動有權使用風景。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做的綜合的人類學分析，旨在探究當代進入鄉村問題背后錯綜的歷史內容；社會的、象征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立法的根源。這兩部分還展示了進入權問題如何與備受爭議的民族性和階級身份的形成神話、與有關地方（place）的文化建構問題糾結在一起。第一部分表明英國鄉村的形成如何與英國鄉村別墅以及無人風景息息相關，第二部分討論了重新入住無人風景區的斗爭。第三部分則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對于地方的體驗，以及“使地理經驗得以形成、交流得以進行的那些共享的象征手段”（巴索1996：109）。

進入英國風景區至少是一個雙重過程，首先是能夠抵達風景區，然后是能夠在風景中散步（徒步）。鄉村公共交通的縮減或取消必然形成某種限制，使得城市居民中的無車族無法徑直抵達風景區。鑒于英國少數族裔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政府的不作為（沒有拿出相應的政策扶持公共交通）尤其限制了他們進入風景區的權利。各類組織如紅繩（Red Rope）、社會主義徒步者和登山者呼吁政府改善公共交通，使得公眾能進入更多的風景區。草根機構如“大地第一！”（Earth First！）則開展了廣泛的反道路運動，挑戰高速公路的擴延。擴延高速公路使英國社會中已經享受特權的有車階層享受更多特權，隨高速公路而興起的住宅建設不斷蠶食著鄉村。有車階層的大多數在進入鄉村之后必然要求增加停車位，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公共徒步區，如湖區和峰區國家公園的難題。

漫游者協會（RA）率先努力爭取自由漫游的法定權力，這一努力在進入權日的活動中得到了部分表述，他們意欲在活動中強調當地的特殊情況。在組織全國范圍的行動時，RA利用了早期徒步者采用的傳統的群眾性抗議運動形式。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參加集會的是工人階級，屬于具有高度對抗性的集體侵入（trespesses）；而20世紀90年代的抗議集會相對而言沒有對抗性，規模小得多，參與者主要是中產階級，因而抗議也就屬于中產階級事件。早期的戰斗性已經轉入諸如“大地第一！”這類草根組織的表達，以及“還我街道”的運動。

1999年的進入權日抗議徒步集會尤其代表了進入風景區的一種空間和時間的連鎖性。這個抗議活動起始于白金漢郡的威多弗徒步集會，威多弗位于倫敦西北，距倫敦有一個小時火車路程。幾乎每個抗議者都是坐著分散而無名的私人汽車抵達抗議地點的。沿著田間的公共道路，這次徒步集會包括一次彼肯山集會，彼肯山是英國首相鄉村別墅契克斯莊園（Chequers Estate）的一部分（彼肯山在莊園的一端，而首相的鄉村別墅在莊園另一端）。該集會在強調當地問題的同時，打算將全國性的進入權議題擺到首相別墅的門前臺階，從實際和象征意義上都可這么講。早在19世紀20年代這一片被圈起之前，彼肯山曾是公用地。RA希望彼肯山的一部分開放給公眾，這樣人們能夠登上山頂俯瞰艾里斯伯里山谷的全景。此外，彼肯山是這個地區所剩無幾的白堊丘陵地帶之一，其他部分都已經過農田改良或退耕還為灌木叢林。

白金漢郡是通常被視為英國心臟的“家鄉郡”（Home Counties）之一。契克斯莊園，作為地址意義的中心與政治意義的中心，象征著黨派政治、政治代表、民主進程和國家的絕對權力：簡言之，是民族想象出來的集體性。1998年，300人參加了這個徒步抗議集會；而1997年，則有1200人參加。既然工黨承諾對進入法立案（盡管在1999年9月19日那天，尚不清楚會在哪一輪的議會會議上討論此案），RA成員可能感到大規模集會已不是迫切需要。這一天，還有其他的徒步抗議集會在同時舉行，因此人們不會像幾年前一樣從各地蜂擁而至。大約有60人在路上徒步抗議，開始的幾小時在瓢潑大雨中徒步。抗議集會在彼肯山公眾可進入的低坡地舉行。

這群徒步抗議者排成長長的一行，走在綠草茵茵的坡地上仰望著彼肯山。不遠處，警察從山腳到山頂成扇形散開，面對著抗議者。幾輛警車停在附近。BBC、天空新聞、英國衛星新聞在集會現場安置了攝像人員。集會演講者是舍伍德的工黨議員及現任英國下議院議長帕迪·蒂平、密爾頓凱恩斯西南地區的工黨議員菲莉斯·斯塔吉，和凱特·阿什布魯克——前RA會長，現任RA進入權委員會主席和當地區域人行道協會理事。

斯塔吉提到人人擁有進入鄉村的權利，這是祖先賦予他們的一種權利，并非只有那些在鄉村工作和居住的人才能擁有；應該對來自都市和城鎮的人們開放更多的鄉村地區使其得享休閑之樂，只要他們尊重這一個事實：這是當地人的工作之地；簡言之，鄉村不屬于哪一個個人或哪一個群體。蒂平，長期以來支持RA，滿懷熱情地宣稱“我們為進入鄉村已經戰斗了100多年，看起來這場斗爭就要取得勝利”。他向首相鄉村別墅的方向點頭示意，演講一開始，他說自己不能透露會議的實際結果，但又說前不久在準備女王的議會開幕演講時他曾在那里。他反復說“我們已經接近斗爭的尾聲”，提出在千禧年來臨之際，“山區、荒野和丘陵進入權將是給予這個國家進入新世紀的一份貴重禮物”。阿什布魯克強調說RA贊成進入鄉村，這并非意味著允許徒步者踐踏莊稼或穿越當地居民的花園，而是意味著公眾有享受抵達山丘和山峰，目睹壯麗的全景，以及單純地欣賞鄉村的寧靜的權利。

一個徒步者輕輕提醒說彼肯山不只是漫游者想要進入之地，因為，對當地德魯伊教和女巫會的一些成員而言，彼肯山乃是一個圣潔之地，力量所在。她特別提到了位于集會地下方的辛白林城堡，古老土堡和城廓。她抱怨說：“基督教有禮拜的場所，而其他非國教的宗教沒有受到認真對待。它們和‘新世紀’（New Age）游客一樣遭受誤解。”據估計英國有10萬人屬于將神圣寓于自然的群體（羅維爾1998：2），那么進入權問題就會引起更深刻的反響。

警察首先占據坡地的高處，監視著下方的集會。集會后，抗議者繼續攀爬陡峭的公共人行道，繞彼肯山的西側而行，最后進入附近的林地。警察一直護送著他們，直到所有的徒步者離開了環繞契克斯莊園的公共人行道。

私人土地擁有者的利益有違于RA的愿望和希望；然而，正是這一事實把他們帶入了共同的關系領域，特別是工黨政府通過由鄉村事務局（前鄉村委員會）發起的“鄉村進入權全國論壇”而開始的商議進程，本書第六章將會討論這一進程。原來的那種硬碰硬的沖突形式讓位給在約定俗成的關系體制中進行的爭論；法律層面的討論替代了集體侵入的行為。政治上的邊緣問題已經成為中心議題。隨風景而定的歷史、事件、觀點、體驗構成了社會地理學活生生的經驗。新的鄉村議案會構建什么樣的社會地理，如何滿足所有參與鄉村進入權辯論的人士，這一切，我們將拭目以待。

# 導論 展望/再想象風景

當教育科目日益增加，給已經負重的學生再增設一門新學科乍看上去似乎太強人所難。然而，你會發現人類學的真正作用是減輕而非加重學習壓力。在山區，我們看見負重者欣然地多扛著一個載物架，因為架子可以收納負載，平衡負重，便于搬運。兩者相權，載物架的重量就不算什么了。“人類與文明”的科學也是如此，該學科把普通教育中那些松散的科目整合為一個易于掌握的體系。

泰勒1891：V

人們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義的風景區休閑，以此建構自己的身份——這是人類學中很少涉獵的話題，即使這類活動在西歐、亞洲和美國等富裕國家許多個人的生活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總體而言，風景問題一直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赫斯科1995）。

本章將要探討的話題有：休閑與排斥如何相互關聯，構成以階級、年齡、性別或種族為基礎的社會與地理的現實？英格蘭的國家公園代表的是五十年的排斥還是包容？大風景區正在保存誰的觀念，又為誰而保存？自由漫游運動（freedom-to-roam）再次興起，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這些問題涉及到人類學和歷史學方面，面對它們，我需要采取跨學科的方式來探索歷史上的階級關系，追蹤作為文化產物的階級與民族身份透過風景及其進入權發揮作用的種種步驟。以英格蘭西北部高地的湖區（Lake District）與峰區（Peak District）的風景為例，我分析了進入風景區問題的政治性。我把相當廣闊的歷史演進和地區特性結合起來研究問題，這一工作對于正在莊嚴進行中的恢復人類學與歷史的學科邦交是一種促進（科恩[1980，1981]1987；賈哈1987，米切爾1997），同時也是一種新的視角，研究風景跳出了地理學和圖像學的范疇（格林1995）。

尾注作為附文貫穿全書。我認為尾注具有支撐全文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贊同這樣一種說法，“神圣見于細節，見于腳注”（查德威克1997：16）。一個已經被人視為自然而然的、有必要在此點明的細節（從尾注中也能發現）就是，在某種程度上風景一直是男性的領域。大多數地形學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軍事性的眼光。游覽歐洲大陸，欣賞沿途風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藝術市場由男性主宰，他們是風景畫派的資助人或是生產者；爭論風景的范疇及其對人類身心影響的美學家是男性；早期風景旅游的倡導者也是男性；有關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動的討論也反映出一種性別化了的風景象征主義；風景，無論是再現的還是實際的，都是身份的附屬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兒們是擁有土地并管理國家的男人的附屬物一樣。

安妮·華萊士用翔實的資料論證了徒步游覽風景在19世紀英國文學中的地位。然而，她的觀察中也不自覺地流露出性別區分的特征：

徒步者置身于農夫放棄的思維空間，以此達到維吉爾式的田園詩境界。這一結果，我稱之為“逍遙游”（peripatetic）。所謂逍遙游，就是漫無目的的云游，是一種陶冶心志的勞作，能通過回顧和表達過去的價值改造個體與他所在的社會。（華萊士1993：8，11）

本研究越過博雅之士的文學體系，從更單純的行走視角展現華萊士所說的19世紀的逍遙游，并引入性別問題加以討論。它描述了早期的文化精英如何利用描述性文本和圈地來占有風景，以及那些曾經被趕出風景區外的人如何通過自由漫游運動來收復失去的風景。

本研究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1—3章）通過追溯風景（作為將文化物質化的一個用語）的文學和藝術的根源，來探析關于民族的美學意義話語。研究集中在18世紀英國文化精英以圖繪的、印刷的和實際的無人風景組成的“想象的共同體”，并將這一現象置于英國民族主義的表述與實踐、如畫風景盛行的語境下來考量。以“想象的共同體”為基點，我把研究推向一系列“文雅社會”內的緊張關系，以及文雅社會與圈地運動的受害者之間的緊張關系。

第一部分的重中之重放在湖區的文化賦值（cultural valorization）上，也即湖區從空曠之地變為文化恒產的過程。我探討神話記憶如何替代了真實的記憶，并指出神話的創造者都是外來者。早在湖區成為人們的神往之地之前，那里不過是那些生于斯死于斯的婦女、兒童以及男人們的“地方”。從巨石與石頭點綴其間的山谷被清理成整潔的農田、石頭圍砌的地界等景象，可以推斷他們如何向土地討生活并與土地休戚與共。這一點，從當地人文景觀的一大特色——依山而筑、縱橫交錯的石墻亦能看出。

與這些實物地方標記呼應的則是為數眾多的命名。遠在19世紀測量局成立之前，各處的峭壁、巖石、峽谷、通道、小徑、小溪、瀑布、小湖、沼澤、碎石坡路、山脊和山腰已有名稱。當地人的勞作形塑了空間外觀，并且加以命名，是雙重地賦予它們意義，兩者合力早在這一帶成為“湖區”之前確定了它作為一個地方而存在。

第二部分（4—6章）繼續在政治經濟的范疇內探討風景的問題性。為拓寬話題，我引入了峰區的案例，因為在峰區，進入風景牽涉到的階級問題更要尖銳。湖區本來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構出的英國民族認同之地，后來卻成為參與者展示階級—文化差異的場所，這是一個反諷性的轉變。峰區和湖區的風景是民族情緒的共鳴板，反響著對于歷史的不同訴求——對諾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國的崇尚。

進入峰區風景區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偷獵行為，而湖區則以美學為重點，其差異的關鍵在于植被。峰區沼澤地的石南（Callunus vulgaris）是紅松雞（Lagopus lagopus scotius）最喜歡的棲息之地及主要食物來源。為了在狩獵季有松雞可獵，文化精英們就想保護松雞在高沼地的休養生息。這樣做直接挑戰了兩類人，一類是想保持原有的穿越高沼地權利的當地人，一類是來自周邊工業城市，希望在開闊的沼地自由漫游的徒步者。狩獵者視徒步者為完全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們干擾了鳥巢里棲息的鳥，因為他們就是偷獵者。

由于石南并非湖區的主要植被，那里也就沒有松雞休養生息的問題。它的問題是美學方面的。自18世紀以來就具有文學和視覺意義的湖區風景，到了19世紀則面臨著來自鐵路和采礦業的持久危害。由于文化精英發起了反入侵的抗議，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涉及的不僅是這些特別的風景區的保護問題，而且也觸及到所有風景區的保護問題，特別是那些逃過議會批準的圈地劫奪的公用地。

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在進入風景區方面合法的、準合法的和非法的行為，受到了立法的、法律的、超越法律的挑戰。所有的斗爭主要圍繞峰區和湖區展開，并最終促成了1945年后的相關立法。據此，從1951年到1957年，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高地建立了10個國家公園。這些公園有：湖區，峰區，達特穆爾，斯諾登尼亞（它們都在1951年列入規劃）；彭布羅克郡海岸，北約克高沼（1952）；埃克斯穆爾，約克郡山谷（1954）；諾桑伯蘭（1956）及布雷肯山（Brecon Beacons，1957）。這10個公園占去了英格蘭和威爾士9%的面積。這一部分還探討了20世紀90年代后再度興起的要求進入國家公園內和公園外地區的運動，以及環保術語如何用于空間爭奪的行為。

第三部分（7—8章）話題轉向人類學的層面，研究的依據來自對各類代表（如全國性徒步組織的代表）的訪談，以及與湖區、峰區和當地徒步俱樂部成員一起徒步的參與式觀察。從“行走”人類學角度考證社會關系如何空間化及空間關系如何社會化的問題，深入探討在社會分裂、全球經濟重構和歐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為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力量，形塑著個人身份與共同體意識。

當探討徒步者在一個高度層次化的社會（這個社會到處都有階級區分的標記，密集程度不遜于華茲華斯詩中爛漫山間的水仙）的文化性時，顯而易見，主要問題在于徒步群體是否在建構新的感受空間時跨越了階級差別。徒步所涉及到的性別意識也將納入討論。討論兼及少數民族的風景感知——他們是把英國風景當作非認同的風景來感知的。通過生活在該風景區的三位女性的觀點，我深入分析了她們對于地方，特別是湖區的依戀。這三人的生活深受風景的影響。每個人的觀點分別概括了本書的一個研究主題。

結論部分討論了湖區的北部山地風景是否仍是關于英國的另一詮釋或想象。位于英國東南部，以倫敦為中心的家鄉郡，被英國文學塑造成精華地帶，是“皇冠心臟”和“英國的腹地”，此說顯然是誤用轉喻的例子，它以“南方”代表整個國家或地區（科斯格羅夫，羅斯科和尼克羅福特1996；弗南德茲1988；威內爾1981；萊特1985）。結論部分還剖析了在社會分裂及經濟重建的影響之下，英國的某些地區更“英國”這種觀念是否通過徒步活動得以實現的問題。

# 第一部分 再現性的風景

風景的再現并非與政治沒有關聯，而是深度植于權力與知識的關系之中。第一部分從種種不同但又彼此關聯的視角呈現風景及風景的再現，揭示隱匿的政治及知識關系。多重視角的研究使沉默的風景意象發出聲音，使隱藏在關于風景及風景意象的知識和體驗之后的社會性基礎顯現出來——這種社會性基礎就是歷史上各種排斥與包容的觀點。一個中心議題是觀景者、景色以及風景的視覺再現和文字再現的社會文化定位。本部分每一章都會就一個制造和消費風景及其再現形式的社會，討論該社會所依賴的政治、經濟、歷史、情感或教育基礎，揭示表面上同在一地的人們如何以象征的方式棲居在不同地方。某種意義上，第一部分堪稱福柯式的風景考古學。

從這一視角考察，風景提供了一個切入文化問題的途徑：文化價值、文化延續、文化的價值范疇和無價值范疇，以及文化身份形成神話的建構。風景引起諸多思考：在個體被文化包容的同時，個體行動如何幫助形成文化；個人如何將自我視為某種特定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由農業革命或工業革命、帝國擴張、戰爭或戰爭后果這類社會或民族創傷引起的動蕩時期。從多種視角考察，風景成為探索包容或排斥標準的焦點——這些標準是由某一特定階級制訂并借由性別、美學經驗、共同體或階級欲望來傳達的。

第一部分探究風景意象的文化習俗和歷史背景，以18世紀的英國為例考證哪些個人和階級占有了哪些風景，犧牲了哪些人的利益。本部分涉及到如畫景色中的距離問題及其與社會距離之間的關系，勾勒出文化承載者的社會與文化權威性，以及依據其他實有的、文字的或圖繪的景觀來理解某一景色的先決條件。此外，還把英格蘭邊緣山區和不列顛政治建構過程中沖突與爭論發生之地共同納入關注范圍，以此展示風景表述和政治表述盤根錯節的關系。

## 一 批評視角：視景的階級化/分類

在歷史與政治，社會關系與文化感知的交合處發揮作用，風景必然成為……一個摧毀傳統的學科疆界的研究領域。

本德爾1993：3

引言

以下的論述冒犯了常規，但我認為值得冒這個險。我正在尋求多種文化語境中出現的程度不一的“無人風景”——這是我的理解。我得承認對于這個問題，我只能蜻蜓點水，不能縱深進入。因為一旦窮追不舍，我的討論就可能離題萬里。實際上，我已經扯得很遠了。盡管如此，我希望能夠抵達我的研究目標：對英國而言，探討富有文化價值的無人風景現象，探討無人風景作為身份形成之媒介如何以實有性和再現性方式得到傳播。隨著這一畫面的展開，另一幅與之相對立的畫面也展現出來。兩種現象映襯之下，進入風景區的政治性格外突出。

我進入風景的視角就是將風景視為“文化編碼的巨大網絡”（米切爾1994）。本章論及確立了西歐風景畫這一流派的兩部經典文本的趨同性影響。這兩部文本，其一是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De Architectura），寫于公元一世紀的建筑專論；其二是忒奧克利托（Theocritus，生于公元前310年）的《牧歌》（Idylls）。兩部著作在文藝復興時期獲得新生，以意大利文出版并被迅速翻譯成其他歐洲文字。

文化生產形塑現實，而非僅僅是模仿現實（巴恩斯和鄧肯1992）。根據這樣的認識，我按文化生產把風景分為四組對應的方面加以討論，它們涉及多種媒體。這四組關系是：（1）風景與早期劇場，（2）權力的印刷與印記，（3）17世紀風景畫與18世紀英國鄉村別墅，（4）18世紀舞臺布景與全景畫。我把這四組方面視為階級關系辯證過程中的重大時刻，各種文化產物就產生于這一過程，并將階級進一步神秘化。這些文化產物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在這里也無必要深入挖掘。我要做的就是在沒有造成太多曲解的前提下盡量簡化處理。在時間上離我的中心論點更近的媒介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的關注。我知道這樣的研究方式從學科“領地”而言，可能會使“獵場看守人”不滿。對這些人我會說，我對偷獵并不感興趣，只是想看看風景而已。

通過來回考察這四組對應關系，分析它們彼此聯系和相互影響，我發現在18世紀的英國，文化精英們共有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即圖繪的，印刷的和實有的“無人風景”。分析過程中，我采用了米切爾的觀念：風景并不僅僅是一個名詞而且是一個動詞；風景有為（landscape does），風景是“文化權力的工具”，是一種“社會和主體身份賴以形成”，階級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實踐（米切爾1994：1—2）。我還發現（這個發現將在下文詳加闡述），風景盤根錯節的聯系與影響構成了“復雜的文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地理空間和社會形態按高低有序的等級建構起來”，而“在其他領域發揮作用的各種層次的象征性等級制度不斷推進、強化或分解”這些架構（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2—3）。通過追蹤精英們的文化想象如何朝社會等級下方播散，歸化到“馬克思謂之的社會秘文（social hieroglyph），一種遮蔽了社會關系的符號”（米切爾1994：15）；我把討論導向一個更大的論題，即19世紀與20世紀初爭取賞景民主化的運動，這種運動的展開方式就是進入原本無人的風景區。我的擅闖領地便由此開始。

風景與早期劇場

傳統的藝術歷史范例表明，古典的與中世紀的風景再現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象征之風景”（landscape of symbols），而不是能夠傳達感官印象的“事實風景”（克拉克1949）。喚起我們感知的現代風景，即反映空間感與光之效果的風景，最先出現在15世紀的佛蘭德藝術和意大利藝術中。這一轉變的驅動因素是經驗主義的觀察、科學的好奇心及數學計算（克拉克1949；杰克遜1980；羅桑德1988）。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科學透視法的出現，使畫家能夠借助于數學上正確的形式來表述視景的高度和縱深。據說當時這種精確性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沒有發現。這一范例描繪了一種歐式的線性進步，認為新的觀察方式產生了“真實的”風景，這種看法所顯現的自滿與天真被指責為意識形態神秘化（巴萊爾1980；伯明翰1986；麥克威廉和波茨1983；米切爾1994）。因為，受制于人為因素，“新的觀察方式”遮蔽掉的東西可能如其顯示的東西一樣多。

幾何和數學成為“透視目光——觀察者總是從畫面之外或之上凝視”的科學根源（本德爾1993：10），而觀察者事實上是從一個審美意義的圖繪的角度進行凝視。受過教育的手和眼睛建構、接受、詮釋一番景色，而忙碌的底層勞動者也在建構、接受、詮釋另一番景色。經過社會與美學高低標準的過濾，透過表面意義和隱喻意義的“視角”，決定了哪些人能看到哪種景色。透視法與劇場在布景中相交，因為透視科學讓舞臺布景把新的空間幻覺表現出來。[[1]](#_1_125)盡管畫出來的風景傳達了縱深與距離的幻覺，但它遠遠不是現實的。作為一種藝術類別，風景是通過建筑討論進入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理論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劇場從幸存下來的維特魯威《建筑十書》手稿的整理版本中獲得靈感，使戲劇模式配合舞臺布景。[[2]](#_2_120)

《建筑十書》對建筑空間、風格、比例、結構、裝飾以及這些建筑范疇整合起來之后所能表達的意義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在論及劇場建筑的具體實踐時，維特魯威概述了三種戲劇模式：悲劇、喜劇和諷刺劇（維特魯威1960：150）。悲劇演出需要依托公共建筑的背景以反映公眾人物的英雄事跡；喜劇演出需要依托家庭住宅的背景以反映公民的私人活動；而諷刺劇（包含牧羊人與農民，仙女與森林之神的理想世界）的上演則應在有風景的舞臺上。人類宏偉行動的恰當背景不是風景，而是城市和市民。

在繪畫領域，風景畫被列為最低一等的畫類。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第一部論繪畫的專著并沒有討論風景（羅桑德1988）。然而，忒奧克利托的《牧歌》，這部長期給其他作者無限啟示的田園詩集中，風景卻是關鍵元素。維吉爾的《牧歌》（Ecologues，寫于公元前42—前37年）是對忒氏《牧歌》的擴寫，希臘原文變成拉丁語，飽含道德說教，西西里島變成想象的阿卡狄亞——世外桃源（羅桑德1988；肖特1991；泰勒1961）。1540年用意大利語發表的雅凱·薩納扎羅的《阿卡狄亞》（Arcadia）不僅使廣大的歐洲讀者了解到這種田園美學，而且推動了其圖繪性的表達。達芬奇、喬爾喬內、提香及其同道的作品使得風景畫開始發展（盡管沒有按照直線發展的方式），成為一種獨立的題材，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美學理念（卡弗利茲，戈溫格和羅桑德1988）。作為一種繪畫流派，風景畫經歷了巨大的轉變，起初，它以恢宏的景象激發觀看者宗教性或準宗教性的體驗，后來則轉化為更具世俗意味的古典化的田園牧歌。

在歐洲精英讀者中，風景作為劇場（landscape-as-theatre）的比喻甚為流行——16世紀、17世紀與土地相關的印刷品中，以“劇場”為題的文章頻繁出現，便是這一點的佐證。這些作品包括宇宙志、地理志、城市圖說以及土地使用手冊。說到土地使用手冊，忒奧克利托和維吉爾堪稱這一范疇的創始者（肖特1991）。同時，隨著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劇場風景的比喻成為常用詞，而劇場本身變得與其說是空間幻想和魔術奇觀，倒不如說是戲劇或心理的對抗（杰克遜1980）。舞臺上展現的人類激情興趣就是“人性詳盡而坦白的解剖”（赫西曼1977：15）的例證，其時，人類激情及興趣尚未被后來的資本主義馴服和壓制。

透視性凝視從多方面適應了商業資本主義對于秩序和法度的需要。其一，它涵蓋了更廣泛的內容，除了與土地相關的內容之外，包括從軟裝飾劇場到機械裝置劇場的全部領域。[[3]](#_3_115)其二，這種新的風景視角具有實用性，可以用于制圖學和土地勘測——在這兩個領域，光的藝術效果以及線性透視和空氣透視的作用已經引起關注。威尼斯共和國制圖方式記錄了從航海經濟向土地資本化的發展，是這種資本主義藝術形式的生動例證（科斯格羅夫1988）。

透視性凝視按兩種不同模式運作。一種是再現性的，允許在單一平面上如實地表現立體物，使觀眾能夠真實地體驗空間。第二種是政治性的，歐洲通過掌握所有實際的和象征性的測量結果而實現了領土擴張。盡管“自然風景的不規則性使其喪失了作為理想舞臺的資格”（羅桑德1988：23），不能成為古典和文藝復興時期戲劇重大事件的舞臺，但自然風景的確在后來“一次次三角測量、一場場戰爭、一個個條約”（安德森1991：173）的政治和經濟世界中發揮了作用。

空間與權力概念相互聯系。無論是將其作為話語形式、現實的再現，還是實存的現實來審視，風景和領土都浸透于權力與知識關系之中（B.安德森1991；巴恩斯和鄧肯1992；鮑恩1981；達里恩—史密斯、岡勒和拉塔爾1996；福柯1980；哈里1988；帕姆特1994）。文藝復興早期的空間感是通過透視法來表達的。通過這一方式，人們對風景完成了視覺意義的占有。同時，對領土政治意義的占有也開始了——那是一種空前的行為（沃夫1982）。通過一系列的分類、列舉、歸類、標記，采集整理知識，將其轉化為控制技術（科恩1996），并收集人工制品、古代文物和藝術品；通過這種研究程序，歐洲把那些難以駕馭但很快就要被征服的大陸強行納入一種知識秩序（科斯格羅夫1988；霍奇恩1964；托馬斯1983）。

這些過程將中立性質的地理領土轉變成文化定義的風景，生成并歸化了它們和居住者的身份（達里恩—史密斯等，1996；史密斯1985）。印刷資本主義是傳播那些文化風景的主要方式。貿易和商業總是緊跟地理測量的進展，當新的領土得到測量和理性的、科學的、經濟意義的描述，相關風景的雕版印刷品作為布景重新來到舞臺上。

權力的印刷與印記

在一個存在各種層級的社會里，一種共同語言對于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至關重要（B.安德森1991）。印刷出來的方言文字就是一種共享的符號，一種新式的“圣餐餅”，不是被身體而是被心靈吸收。印刷資本主義含有重要的圖繪性成分。印刷出來的圖畫，其“語言”更為民主，更容易被粗通文字的階層迅速接受（P.安德森1991；阿瑟頓1974；紐曼1987）。如果把風景話語視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語言的非任意性符號（nonarbitrary sign，米切爾1994），那么地形圖解就是其最純粹的表達方式。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初期的風景描述大多呈現為展示或支持神圣秩序的彩色全景畫（panoramas）。文藝復興鼎盛期的風景畫筆觸更為精細，描繪田園風光。在歐洲探險和殖民擴張時期，風景畫依然展示或支持神圣秩序（某些情況下，就是新教秩序），但反映的則是商業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利益，這種風景畫融入了“印刷文字的黑白形式或鐵版雕刻”（杰克遜1980：72）。

17世紀和18世紀初期英國地形學研究尤其活躍。對此，早已確立的經驗性觀察方式作用甚大，那些在國內外測量和描畫土地的職業制圖員居功至偉，他們的贊助人古董商們也功不可沒（史密斯1985）。越來越多的讀者讀到了這些發現和探險的圖解性敘述，面面俱到的凝視囊括了“世界”風景的全景。出版的版畫集、插圖本、雜志和報紙文章體現出風景的文化商品化，有關的風景描述和圖像激發并滿足了公眾的興趣。例如，1773年至1775年間《紳士雜志》（Gentleman’s Magazin）刊登了庫克船長航海太平洋的航線圖。人們對國內風景的興趣不亞于對奇異風景的興趣。英國的郡縣圖解集數量遠遠超過了它的歐洲對應物（哈里斯和杰克遜—斯特普斯1984）。

“印記”（imprint）一詞有多層含義。它可以指印在書本卷首插畫上出版者的名字和地址（插畫一般對著書名頁），[[4]](#_4_115)也指一座房屋在土地上的實物標記，某一特定階層持久的文化符號，或一種永恒的“印象”——也是書本和印刷世界詞匯的一部分。所有這些含義匯聚在一種印刷出來的意象之中。這些反映了權力印記的印刷品，也就是鳥瞰圖（bird’s-eye view），是透視性凝視的象征。盡管在歐洲其他國也可以發現它的蹤影，但在此討論的鳥瞰圖主要與英國風景相關。的確，在英語用法里，“鳥瞰圖”是“風景”的一個定義（《牛津字典》1971）。

1708年在倫敦出版的對開本大小的《英國新劇場》（Nouveau theatre de la Grande Bretagne，基普和尼弗），可稱為最全面的英國郡縣圖解。開章第一篇描述了林林總總的鄉村別墅，是用法語寫的。這樣一來，就拉開了文化精英與印刷圖像的距離——這本圖解是為文化精英們量身定造；而圖像的語言形式更為民主，易于理解。達官貴人預付訂金以確保他們的鄉村別墅能夠入選，被描畫出來或雕版印刷出來。80幅的對開圖畫（45×30cm）下面附有英語說明，寫出業主冗長的頭銜和等級。[[5]](#_5_107)（出版者是否意識到如果不用明白易懂的語言點出入選者在文化等級中的位置，那他入選在《英國新劇場》里就沒有什么意義？）

顯而易見，這些宮殿和鄉村別墅的鳥瞰圖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人如其屋，居住在鄉間的精英們也主宰著當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見圖1和圖2）。

當波弗特公爵在巴德明頓正門后的沙龍用餐時，他正處在條條林蔭大道的匯聚點上，這些林蔭大道伸向周邊的鄉村。這象征著當地所有的權力和影響之路都要向他匯聚——他不僅是一個大地主和古老世家的繼承人，而且是威爾士的郡長和議長（吉魯阿爾1980：145）。

翻看第一版《新劇場》里一幅又一幅圖畫，看著一個又一個別墅的景色：儼然而立的樹木、修剪齊整的灌木，對稱擺放的胸像及一排排雕像，你會忽然覺得它們像沉默的觀眾，等待著空曠的巴洛克式花園里空蕩蕩的舞臺被激活。畫面上偶爾會出現一群男人在玩滾球，一兩個人在寬敞的路上踱步，騎馬的隨從緊跟著奇異的馬車，馬和獵犬跑過遠處的田野。但大多時候，這些風景里空無一人（見圖3—6）。

即使在以農耕為背景的繪畫中，人煙也很稀少。鮮有耕作者出現，即便有，即便在收獲季節，有大量農活需要勞動者來完成，也只見寥寥幾個男女在廣闊無垠的田野上收割，好像永遠也干不完手上的活計。[[6]](#_6_101)無論是收割，耙草，還是裝運，他們實際上和比喻意義上都是外圍的點綴——身處畫面的遠處，秩序井然的莊園的邊緣，在堪為國家堡壘的地產的外沿（見圖7，圖8）。這種鄉村繪畫忽略了構成風景基礎的人類勞動，留下太多需要解釋的空白，而這一解釋與最終人們進入風景相關。

《新劇場》可以作為一本政治的而不只是美學的文本來閱讀。能得到這種鳥瞰圖的人不是訂戶或購買者，就是接受贈書的贊助團體的成員。他們很清楚收割是非常艱巨的農活。繪畫表現了收割時節，但勞動者缺席，這一現象并非只是藝術的疏漏。整個策劃取材意在地形描摹。[[7]](#_7_99)一些學者把勞動者的缺席歸結于擁有地產的精英對于偏愛之風景的懷舊（普林斯1988；巴萊爾1980），而另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缺席是對集體行動的害怕，或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功能表現（伯明翰1986）。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有這樣一種看法：含有劇場隱喻的印刷品既是一種內部流行的風景理念表達，負載了一個統治階級的社會印記，它們也是向外傳播那種理念的方式。此外，我們認為，勞動和勞動者的缺席現象說明了上流社會與底層人民之間的不和諧：一邊是井然有序的別墅花園里放射狀分布的大量雕像和胸像，一邊是零星散布在田野四處彎腰干活的少數農業勞動者。一方是另一方的反襯。從下面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詭態（grotesque）就是“以排他的方式，從位于高處、內部和中心的視角指認誰是邊緣人、底層和外來者”（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22—23）。巴赫金對于高低范疇的探究有重要啟發性：

大眾狂歡中的人類身體與凝固為古典雕像的人類身體大相徑庭……他注意到兩種身體圖像象征著兩種完全對立的存在狀態。首先，古典雕像過去總是放置在柱基上，意味著它是高高在上的、靜止的、不朽的。柱基或底座這一基本事實標志著古典雕像具有完全不同的身體概念，與多樣豐富的、總是構成喧鬧群體一部分的詭態身體（grotesque body）概念完全相異。對比之下，古典雕像是超驗個人主義的光輝中心。“座基上”的雕像凌駕于觀賞者和公眾之上，使他們被動生出仰慕之心……詭態身體則突出了交換過程中活動的、分裂的、多重自我的歡樂主體，不可能脫離其社會背景或生態體系，而古典身體總是與它們保持距離。

（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21—22）

巧隱于別墅中的超驗個人主義，部分依靠農業基礎而生，即使它同時也依靠貶抑“流汗的粗人”（希爾1992：129）。在描繪權威和社會等級的印刷品中，賦予了這種貶義更多象征價值，而且強化了印刷品意欲建立的身份意識。有意義的是，支撐鄉村、別墅和別墅生活方式的財富的真正來源不再完全由農業勞動提供，還由包括貿易、商業甚至工業在內的其他產業提供。在此探討的印刷品劇場也幫助模糊了這些生錢之道的社會關系，使財富隱匿在土地的修辭里。

印刷品里的“鄉村”有兩層含義：國家的疆土和生產農產品的土地。鳥瞰圖的劇場橫跨了這些相聯接的權力領域——在此，財富、疆域、社會精英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權力的雙重印記：鄉村別墅作為國家疆土的本地化的形式被反復呈現，而作為物質文化的《劇場》則是展現“鄉村”成員類別之間以及內部社會身份的手段。在文化意象的交互強化的過程中，國家與以政治和經濟方式代表國家的人們通過土地得以再現。

后來《新劇場》的開本縮小（從原來的45×30cm變成23×36cm），但新的版本參差繁雜，容量不斷增加[[8]](#_8_99)，從1708年的一卷本變成1715年的五卷本，18世紀20年代又推出新版本。此書的走俏說明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中期越來越多的鄉紳擁有土地和鄉村別墅，也顯示了深諳建筑之道對于鄉紳的重要性。別墅印刷品在贊助人圈內傳播，使得入選《新劇場》的達人和別墅進一步增加[[9]](#_9_95)。文化資本和風景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商業財富本身不能成為文化資本，但卻提供了獲取文化資本的方式。隨著商業精英購買貴族頭銜，財產取代了血統而成為國家文化的領導力量，此時英國鄉村別墅的風景也就成為這些權力具體化的表現（奧維格1993）。

銀行家亨利·霍爾二世（Henry Hoare II，1705—1785）就資助了貴族們18世紀早期風景再造的狂熱（伍德布里奇1989）。《新劇場》所描摹的中軸布局的巴洛克式花園和林地被開闊的偽自然主義的林園（parkland）所取代。大量放貸和從事奴隸貿易給霍爾帶來滾滾錢財，使他能夠投資建造自己位于威爾特郡的斯托爾德莊園的主要景觀。現在被稱為英國國民托管組織（National Trust）“皇冠上的珠寶”的斯托爾海德，按照羅馬風格重建，是阿卡狄亞的華美翻版（見圖9，圖10）。霍爾成功地將奴隸財產轉換成莊園地位，把物質形式賦予“心靈鑄造的鐐銬”（布萊克1794，阿伯拉姆1986）中新的一環，遂使建立在國外的奴役或國內的貧窮之上的社會關系隱匿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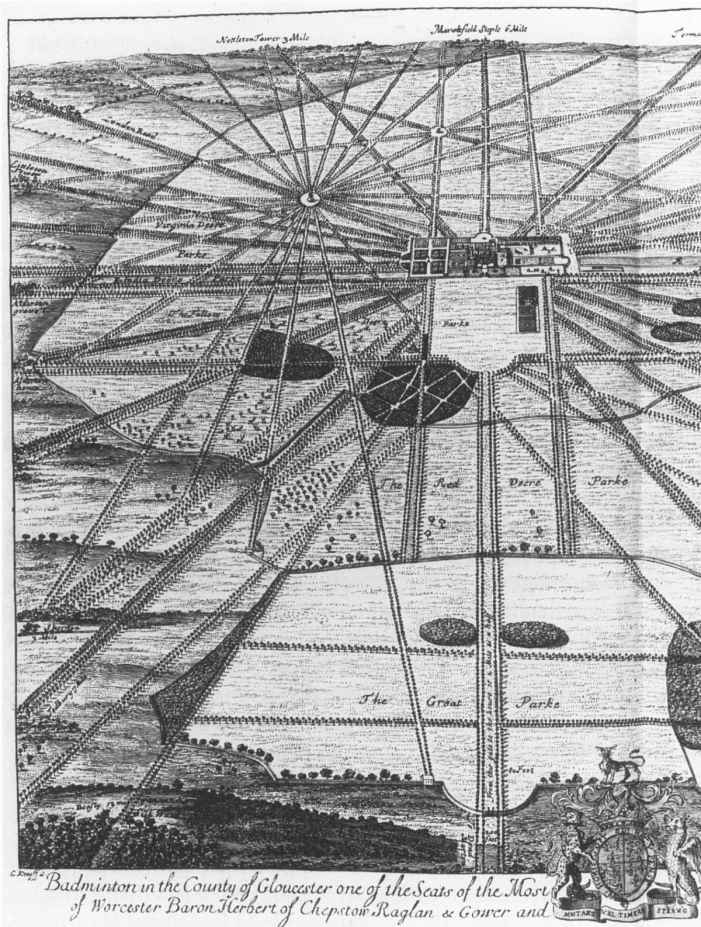


圖1 圖版12《大不列顛新劇場》，“波弗特公爵的別墅之一，格洛斯特郡的巴德明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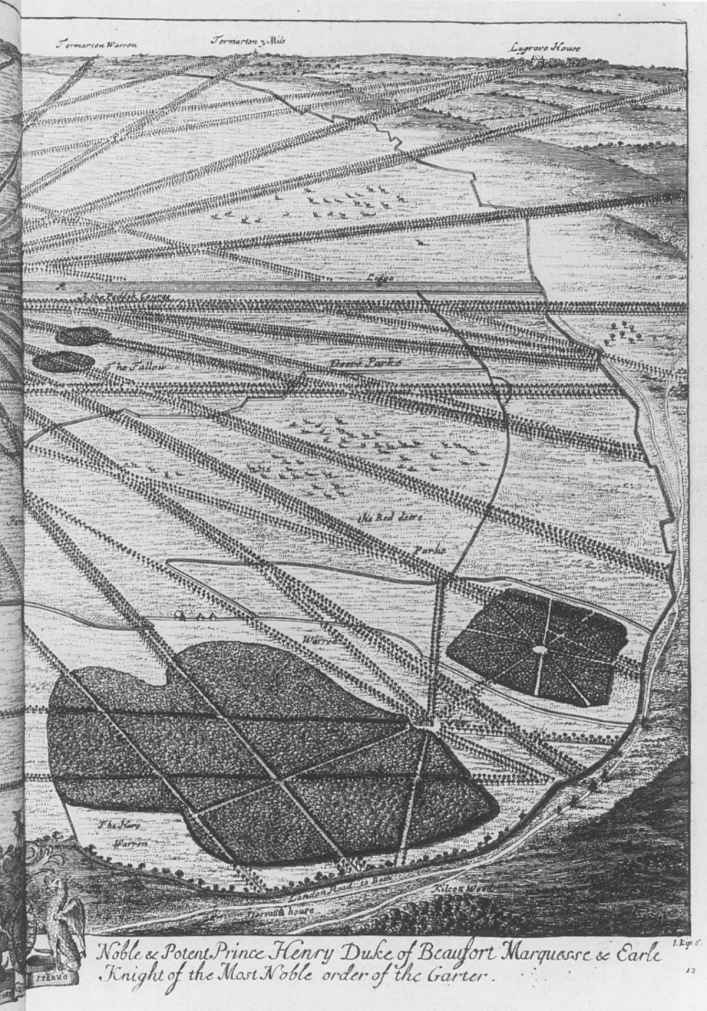


圖2 圖版12《大不列顛新劇場》，“波弗特公爵的別墅之一，格洛斯特郡的巴德明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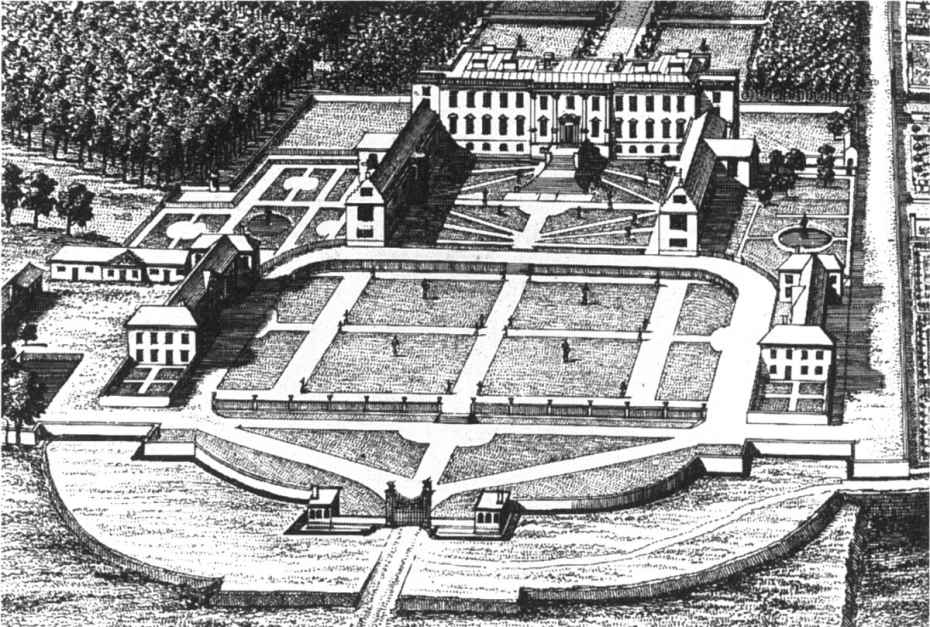


圖3 圖版41（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威斯特摩蘭郡的勞瑟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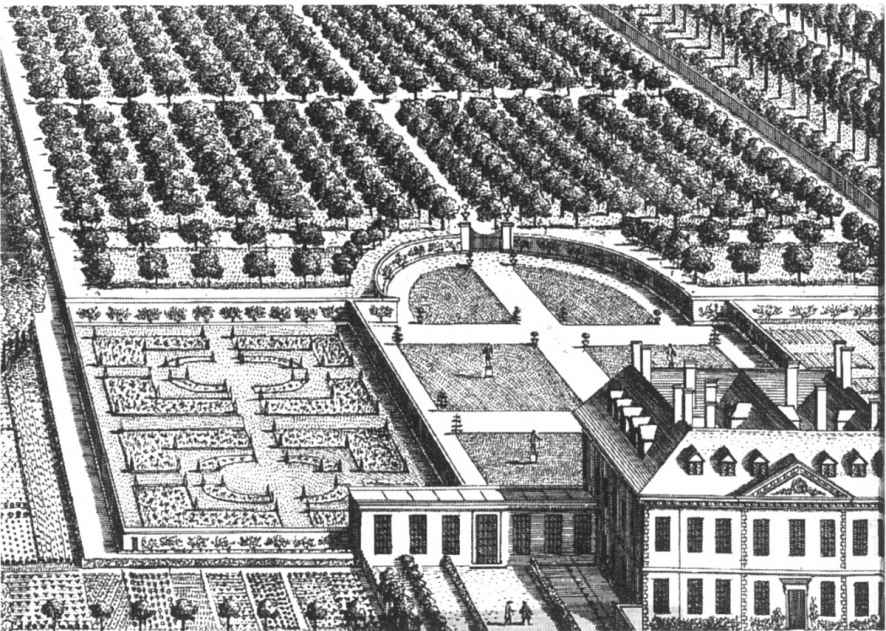


圖4 圖版58（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劍橋郡……哈特利·圣喬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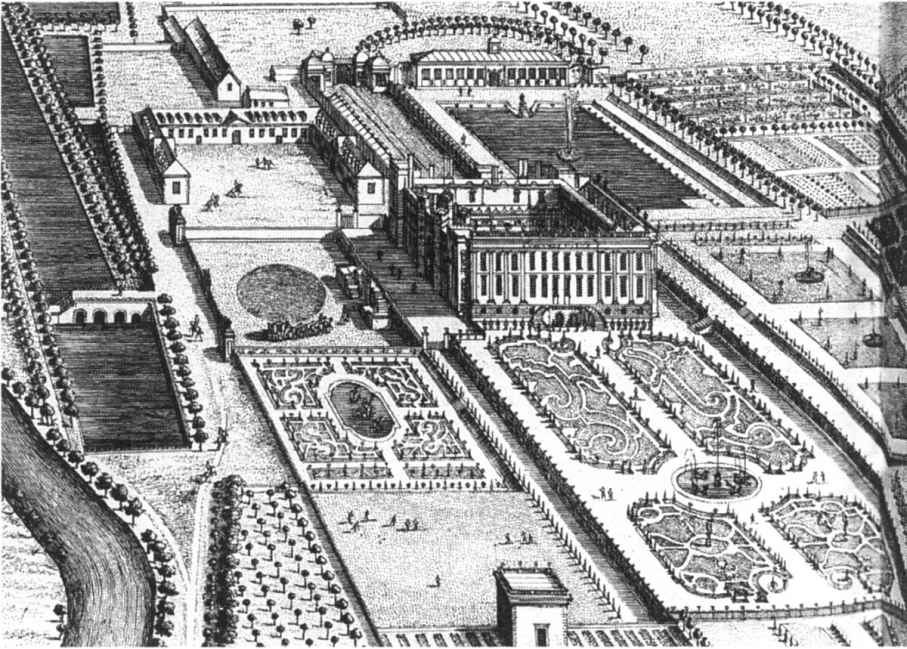


圖5 圖版17（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德文郡威廉公爵和伯爵……查茲沃思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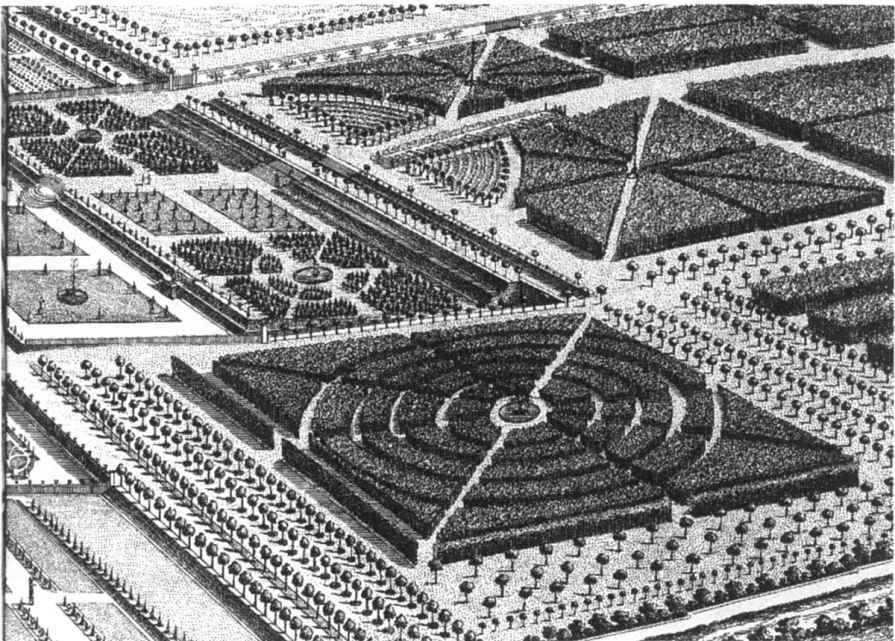


圖6 圖版17（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德文郡威廉公爵和伯爵……查茲沃思別墅……”



圖7 圖版78（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約克郡西區的維克斯里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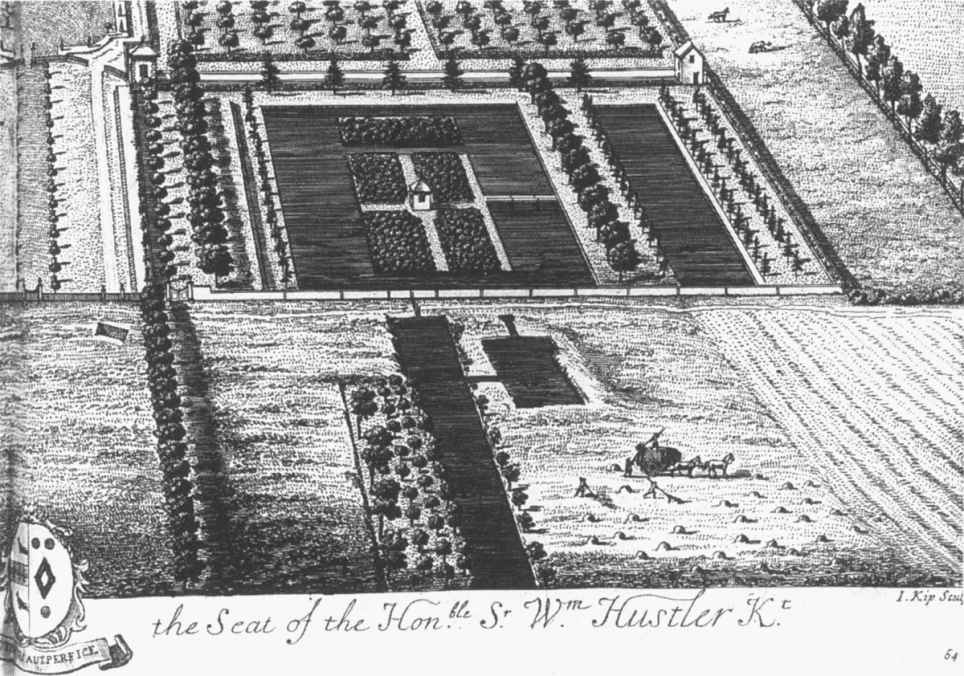


圖8 圖版64（局部），《大不列顛新劇場》，“克利夫蘭的阿克蘭穆別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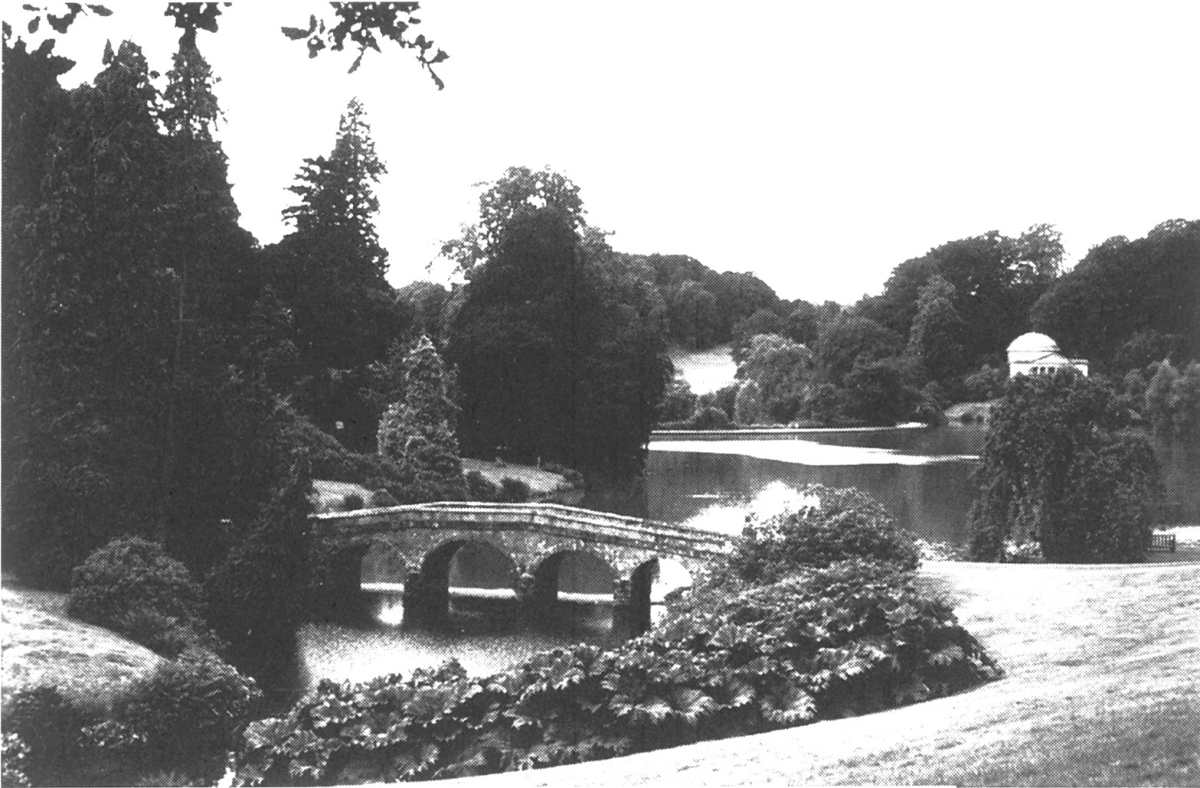


圖9 斯托爾海德：小橋湖泊與萬神殿。（作者攝影）



圖10 斯托爾海德：萬神殿（1753—1754），建筑師亨利·弗里特克羅夫特。（作者攝影）

英國鄉村別墅的布局不再遵守僵硬的中軸對稱風格——當時人把這種風格與法國強硬的君主絕對主義的政治體制聯系起來。而用于建筑物本身的審美原則，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直線性理性主義的縮影”（斯通和斯通1986：239）。說到重構地面和建筑時，我們又會遇到同樣的兩部經典，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和維吉爾對忒奧克利托的《牧歌》的翻譯。帕拉第奧·安德烈亞（1508—1580）就是根據《建筑十書》嚴格對稱的美學原則設計了本尼圖地區的維琴察和周邊的建筑。帕拉第奧主義，其風格源于帕拉第奧設計的建筑及發表的文章，由伊尼格·瓊斯（Inigo Jones，1573—1652）在17世紀初介紹到英國，但是新帕拉第奧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的復興要到100年后才羽翼豐滿，以柯倫·坎貝爾著述的《不列顛的維特魯威》（Vitruvius Britannicus）三卷本（1715，1717，1725年出版）為標志。伊尼格·瓊斯的古典主義建筑的雕版畫逐漸被其他圖籍補充完善，其中包括坎貝爾及其他新古典主義建筑師為英國貴族們重建鄉村別墅和住宅使用的建筑風格。

從意大利鄉村到英國鄉村

古典教育形成的文化感知和價值觀，最終在具體的風景中得以體現。越來越多的英國精英男士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正規教育，因而接觸了更多的古典建筑美學、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當時認為這類知識對于培養文化趣味和氣質是必要的，是一個紳士應具備的比血統更重要的標志（基諾爾德1980；斯通和斯通1986）。古典文學和建筑研究成為“進場時額外而昂貴的智力裝備”（安德魯斯1989：3），推動以新的眼光欣賞風景。同時，也使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感受到古典文學所描畫的那種城市與鄉村的對立關系。要么把農業生產艱巨的現實轉換成理想的田園風光（如維吉爾的《牧歌集》），要么賦予鄉村世界的勞作一種道德純正性（如維吉爾的《農事詩》），古典作品提升了鄉村生活的層次（邁爾斯1980，威廉斯1973）。

教育和旅行一起強化了18世紀牛津和劍橋精英們按照繪畫和文學標準智化風景的方式。半義務性質的意大利修業旅行（Grand Tour），使得英國年輕的鑒賞家們，或所謂的業余愛好者（dilettanti），不僅能購買到一些古董（有時是贗品），而且還能收集大量的17世紀末期的風景畫，這些風景畫通常描摹了以古典神話形象、洞穴、神廟和建筑廢墟為背景的理想的、古典的意大利鄉村景色（見彩圖1，2）。1734年，業余愛好者協會在倫敦成立，這是修業旅行歸來者的聚餐俱樂部（卡斯特1898），年輕的貴族和有錢有勢的男子形成了具有政治文化影響的團體，他們的妻女們在宮廷或其他地方服務[[10]](#_10_93)，使得彼此的關系進一步加強。

修業旅行并非是幾個月的浮光掠影式的旅行，而是要花上兩年，三年或更多年的時間，這期間年輕的英國貴族與他們的游伴一起接受美學教育。甚至連約翰遜博士這類人也因為沒有能力做修業旅行而自認低人一等（塔什基恩，塔什基恩和恩萊特1990）。特別是在意大利，業余愛好者以近乎放縱的熱情收集藝術品[[11]](#_11_89)，他們與其他鑒賞家不斷收集的古董和繪畫使得倫敦藝術市場空前活躍[[12]](#_12_87)。

為了與他們所了解的阿卡狄亞美學吻合，人們改建英國鄉村別墅的巴洛克置景。這種美學引導他們獲取無與倫比的收藏——克勞德、普桑、杜蓋等人的古典田園繪畫作品，從中得到的教育又強化了阿卡狄亞美學[[13]](#_13_85)。在古典田園文學（也就是忒奧克利托的《牧歌》，經由維吉爾的《牧歌集》，還有薩納扎羅的《阿卡狄亞》）及其圖繪的熏陶之下，人們重新布置英國鄉村別墅的景觀。其結果就是田園風格的如畫林園環繞著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

當英國貴族和上層鄉紳住宅的環境經改造符合古典風景畫那種營造出的自然性特質時，現實與再現之間的區分也就模糊不清了：

至高的“現實主義”得以實現……當藝術的能指（signifier）是與周圍鄉村毫無區別的風景花園時……當風景和自然與某一實體環境融為一體時，這種環境并未停止負載與自然有關的價值意義和規范意義。相反，這些意義變得更加自然，因為它們看起來不再源于某一主體、某一作家或藝術家創造的藝術景色，而是來自客觀的現實本身。

（奧維格1993：319）

風景可以具有權力劇場的功用，這一點在基普和尼弗的不斷演進的雕版畫中尤為突出。改造過的風景，比起過去，其劇場權力不是更小，而是更自然，進一步使實際的權力關系神秘化了。

透過闊大的鄉村別墅的窗子所看到的景色，現在反映了室內懸掛的繪畫作品。意大利田園繪畫與依其風格而建的英國鄉村別墅風景，雙方構成密切的互文關系——這些莊園本身被視為“某種意義上我們國家最古老最偉大的藝術長廊”（布蘭登1935：6）。反過來，奈杰爾·格雷斯里爵士在峰區擁有一座豪宅——德萊克露維大宅，1793年他委托保羅·桑德比（Paul Sandby）在其中一間屋子的墻壁上繪制再現峰區風景的全景畫。除了一面有觀景窗的墻外，整個房間就是一幅呈現了窗外風景的全景畫，墻壁前面幾英寸處設了柵欄，還留有敞開的邊門（見彩圖3）。這是奧維格謂之的“至高的現實主義”的另一極致。這一現象也反映了如畫風景美學和全景畫的普及。

然而，無論是在現實中，文學或是藝術中，別墅景色或前景只能通過繼續壓制或掩飾農耕場所的人類勞動才能得以保持，而擁有土地的精英們就是從這些勞動者那里劫奪了大量財富。至此，在早期鳥瞰圖里被藝術地刪除的人實際上成為被清除的人。具有審美愉悅的田園風光是這樣創造出來的：把農業過程、農業勞動者，甚至整個村莊從視線里清除出去，留下無人的、如畫的風景，使特權觀賞者能夠觀賞純粹的畫面。

議會通過的圈地運動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的加速，與這種美學清場緊密結合。這意味著圈地運動的影響深遠而廣泛，導致倫理秩序與視覺世界的重塑[[14]](#_14_81)。的確，由于農業不再是唯一的財富之源，美學清場才成為可能。正是早期道德世界的崩塌，才使得從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到約翰·克萊爾（Clare）的詩歌充滿抗議之聲，這些詩歌表達了“一群人的悲哀和憤怒，對這些人而言，鉛灰色的現在與金色的過去不僅是歷史的或神話的經驗，而且是個人的經驗”（布朗洛1983：4）。

針對無人風景的抗議詩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其代表作為《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詩中這樣寫道：

……富裕而傲慢的人

占據著許多窮人曾生存的空間；

他的湖泊、他的林園無限擴展，

土地便這樣，遭受了奢侈的背叛；

自然曾展現過的質樸的魅力

正在衰減，壯麗的景觀出現；

景色令人震撼，宮殿使人驚嘆；

在微笑的土地上，饑荒肆虐

悲傷的農民帶領他卑微的隊伍；

當他沉沒，沒有一只援手施救，

鄉村一片繁榮——一座花園，一個墳墓……

（戈德史密斯[1773]；艾布拉姆斯1968）

當馬爾薩斯正在論述人口過剩的恐懼時，英國的鄉村人口卻在減少，布萊克的《經驗之歌》就取材于這個現實。

當“被剝奪的戲劇成為財產的劇場”（博蘭德1995），文化精英們的視線又越過他們的林園勝境，投向已擴大的、籬笆圍護的、改良了的農田風景[[15]](#_15_81)。當英國別墅風景再造正在展開，普通人的權利喪失殆盡；議會通過的圈地法案使村莊的公共場地被圈了起來（伯斯弗德1961；巴特林1979；岡勒1912；明蓋伊1976）。權力運作顯然有所轉移，鄉村別墅景觀設計得蜿蜒曲折，而圈地后擴大的新農田卻顯得整齊劃一，猶如土地測量員的直尺畫出來一般。農業改良的景觀給鄉村別墅的居住者提供娛樂之地，因為農業改良的活動——那被認為“值得英國貴族追求”的事情（楊格1971；轉引自斯通和斯通1986：302），促使精英們更多地介入莊園經營，結果延長了他們在鄉村居留的時間。[[16]](#_16_81)

18世紀英國劇場布景和全景畫，觀眾的教育

風景進入娛樂領域的另一種方式是劇場。沃土植被再現或詮釋了繪畫作品，而繪畫本身又是想象性地重現詩歌中的過去風景，在這些微妙作用之下，寫實性的含義已然消失；但18世紀末期的倫敦劇場需要更寫實的風景再現。從這層含義而言，寫實意味著準確地再現豪華別墅的風景，以及出現在《銅版雜志》（The Copper Plate Magazine）和《鑒賞家博物館》（The Virtuosis Museum）之類插圖出版物中的特殊地標的特征。這些雜志供稿人既是劇場布景畫師又是雕版畫家（帕里斯1973）。正是這些劇場布景畫師在19世紀中葉告別了劇場而去繪制全景畫（海德1988）。

在進一步探討前，我們有必要再討論一下伊尼格·瓊斯。他不僅將古典建筑介紹到英國，還為詹姆斯一世和查爾斯一世的宮廷假面舞會充當舞臺設計師，在英國舞臺上展現了維特魯威推崇的景色。其時，英國劇場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對稱拘謹風格的一統天下（100年后基普和尼弗的《新劇場》中的花園和場地正是其寫照），瓊斯設計的鄉村牧歌布景“更自然，更有英國情調，背景幕上是寧靜的麥田”（羅森弗爾德1972：171）。[[17]](#_17_75)正如他對于古典建筑的引進一樣，瓊斯的布景革新要到18世紀才得到推廣，在居瑞巷劇場和考文特花園皇家劇場，在復辟時期查理二世準許經營的專業劇場或劇團采用。

同時，風景布景在英國啞劇中也贏得一席之地，英國啞劇保留了早期慶典和演出的即興喜劇藝術元素。由于它的狂歡性，啞劇成為允許逾越社會秩序的場所。在這里，風景布景構成了鄉巴佬嚴懲貴族們的故事背景（羅森弗爾德1972），象征性地顛倒了基普的鳥瞰圖所描摹的農業工人和古典雕像之間的關系。到了18世紀中期，英國啞劇中的風景傳統已經確立。對地形學和歷史的準確性的要求（這一要求正好與英國早期浪漫主義運動同步）導致更寫實的風景再現，包括舞臺上燃燒的麥田（不再寧靜？），同時地形細節不夠準確就會招來批評（貝克西德爾1993；芬克爾1996；羅森弗爾德1972）。啞劇既包容了戶外集市的狂歡世界，又包含了室內的劇場世界。矛盾的是，劇場是封閉的聚會場所，而風景在劇場中卻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喬治王朝時代的劇場地位一般比較低，令人生疑且不穩定，倫敦的合法演員則自如地穿梭在特許劇場與放肆的狂歡和集市之間（布魯爾1997；拉塞爾1995；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像大衛·加利克這樣的大牌演員使表演成為值得尊敬的職業，因此劇場對于培養文雅的公眾輿論，甚至文雅公眾本身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化語義觀取決于話語場所間的這種置換（displacement），每種場所都有自己的法令和協議，用于社會身份的編碼。此外，

……最有意義的置換類別是跨越了語義材料的不同疆界的那種，跨越的幅度顯得很大，甚至成為驚人之躍，躍過社會意義上不平等的話語領域……身體和話語法則是通過合度的舉止、習慣和態度的形塑來規范的，而“合度”（appropriateness）對于每個社會領域而言都是一種關鍵的規范性因素。

（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198—199）

說到粗野的舉止，劇場里觀眾與露天市場拉長脖子傻看的看客半斤對八兩，他們的社會領域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太大差別。觀眾必須被教得文明，他們得克制自己不要把劇場看成一個政治舞臺，“包廂、正廳后排及最高樓座這些社會編碼的等級”（拉塞爾1995：16）有時嘈雜喧鬧，有時騷動不安地演出。教化的過程要求觀眾從巴赫金所描述“多樣豐富的、總是構成喧鬧群體一部分”的“詭態身體”（斯塔里布萊斯和懷特1986：21—22）變成古典雕像似的靜止。觀眾得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并愿意呆在那兒，靜止而沉默，而不是表演期間到處走動，交談、斗毆，或者跑去和演員說話。巴赫金式的雕像也在舞臺上出現，因為在18世紀末期，特許劇場也使用啞劇的技巧表達情感：以“醒目的姿勢”（就是具有“視覺設計的可讀的外形”）來“凝固特別有意義或情感共鳴的瞬間”（貝克西德爾1993：176）。

對于那些有品味的人而言，劇場成為風景寫實主義的場所。那類寫實主義的主要來源是當時十分流行的描述太平洋發現之旅的插圖（米切爾1994；羅森弗爾德1972；史密斯1985），以及正在英國興起的如畫風景旅游（貝克西德爾1993）。畫家從中收集素材并給予表現，例如風景藝術家菲利普·雅克·德·盧泰爾堡（1740—1812）。他是美術學院及后來的皇家學院中一位受人尊重的會員，1772年受演員兼經理大衛·加利克委任，擔任居瑞巷劇場一場啞劇的舞臺及布景的唯一的設計師。

劇作家與舞臺設計師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系是“一個自伊尼格·瓊斯以來還未被接納的過程”。通過與劇作家合作，盧泰爾堡最終成為“英國有史以來最有影響的舞臺設計師”（喬皮恩1973：n.p.）。盧泰爾堡繪制的布景，無論是浪漫情調的還是如畫風格的——奇崛的群山和奔涌的急流（見彩圖4），地形特征突出的場所、暴風雨中的大海和天空、沐浴在光中的全景景觀，都由于與17世紀意大利新古典主義繪畫相似而受到評論家的好評（芬克爾1996）。他在居瑞巷劇場及皇家劇場備受歡迎的多幅風景畫被其他地方劇場爭相模仿（羅森弗爾德1972），從而使文化精英的風景趣味得以傳播，影響到廣大的公眾[[18]](#_18_7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盧泰爾堡的布景里，一些為他所激賞的風景特性正是加利克的朋友，《荒村》的作者戈德史密斯所抨擊的。

為了追求風景的寫實性和如畫性，盧泰爾堡1778年游歷了德比郡的峰區，為來年的居瑞巷劇場的啞劇《德比郡的奇觀》作些實地研究。奇觀包括德文郡公爵的鄉村別墅查茲沃思莊園，它具有宏偉的規則花園和廣闊的林園[[19]](#_19_74)。除此之外奇觀就幾乎全是地理風貌，是霍克斯沃思《航海記》（Voyages，1773）[[20]](#_20_72)插圖所描畫的各種海外奇觀的國內版。正如伯納德·史密斯所寫：“此時此地，在劇場及繪畫中，奇異風景及民族的再現是自然主義的預兆”（史密斯1985：117）。《德比郡的奇觀》是第一部

在英國舞臺上專門把風景作為戲劇表現形式的啞劇，情節發展只是多種景色變換的鋪墊……布景設置……之所以變得特別有趣，在于不再遵循傳統處理方式把舞臺側面與上緣布景分開，而是將兩者連為一體，形成彎曲的、橢圓形的連貫曲線。

（喬皮恩1973：n.p.）

盧泰爾堡布景的寫實主義與其舞臺上“連貫的曲線”的結合最終導致了一種完全無需演員的自然主義。

從1782年到1793年間，盧泰爾堡偶爾展示他的eidophusikon，一種專門表現無人風景的微型劇場，布景效果就等于表演（芬克爾1996；喬皮恩1973）。這預示了具有透視感的廣角全景畫以及后來的活動全景畫的出現。后者作為活動背景又被用于啞劇。1789年羅伯特·巴克爾（Robert Barker）繪制的愛丁堡及其周邊景物的360度全景畫（他稱之為“自然的一瞥”）在倫敦展出。全景畫所顯示的觀景方式具有文藝復興透視繪畫的特征，被視為“沿著透視法繪畫的傳統……引領到一個逼真的新時代”（威爾科克斯1988：25）。1799年在巴黎，美國的羅伯特·富爾頓（Robert Fulton）展出了一幅“準確逼真，沒有一個演員在場打擾的宏大的環形新世界全景畫”（杰克遜1980：77），獲得了巨大成功。

從盧泰爾堡的“彎曲的、橢圓形的連貫曲線”到觀眾看不見一個人的那種四面環繞的、反轉的全景監獄[[21]](#_21_73)，透視性凝視得以完全實現。其結果是沒有演員的劇場，展示的是無人的風景。后來，路易·達蓋爾，巴黎歌劇院和通俗劇場的風景畫家，達蓋爾銀版照相法的發明者，繼續繪制微型立體布景（dioramas），其視角小于360度。像盧泰爾堡的微型劇場一樣，達蓋爾的立體布景強調了光的效果。這些畫具有令人驚嘆的寫實主義特色，一位當時觀者寫到，“人們試圖離開小房間到那野外漫游，登向山的頂峰”（引自紐赫爾1946：16）。一些全景畫中散見的幾個人物向觀眾表明，人們的確有可能登上山頂觀賞無人風景（見圖11，圖12）。風景已經從背景移到了前景，這一變化過程中風景起的作用是極具戲劇性的。

作為一種娛樂方式，最初，全景畫和立體布景要么在獨立的圓形大廳展出，要么在特許劇場啞劇中以卷軸畫的形式展現，主要觀眾是貴族和中產階級。到了19世紀，劇場布景畫家離開啞劇舞臺，轉而為集市上的巡回演出繪制全景畫，廣大的公眾也就有機會接觸全景畫和立體布景了。由于布景畫家的參與，全景畫和立體布景得以推廣到首都之外的城市，出現在當地專門為此修建的圓形大廳，那里面為不同階層的觀眾提供不同設施。作為再現的方式，它們極大程度地影響了傳統畫室的繪畫，以至當時批評家認為全景畫家是對學院派的威脅：

全景畫如此流行，是對精英畫家的威脅，是對他們藝術技藝的盜用，這一現象會愈演愈烈，因為全景畫家很快將侵入學院派們衛護的專屬領地——那些多少稱得上是歷史畫的作品，諸如戰役畫、戰爭畫的領地。

（引自科芒1993：60）

基普和尼弗所描畫的風景中，建筑和造型植物看起來像沉默的觀眾等待著演員的出場。全景畫就是演員，沉默地等待著觀眾。鳥瞰圖實際上（或完全）是無人的。它們只是為社會上一部分精英制作的、有關精英們的文化產品，這些精英依賴與大眾之間的多種距離，如空間、語言、舉止等等。最早的全景畫幾乎（或完全）也是無人的（后來的全景畫通常描畫戰役場景和人煙稠密的都市景觀）。這類全景畫是面向盡可能多的觀眾的文化產物，反諷的是，至少在初期，這類畫給人一種孤寂的印象。的確，為了保證這一效果，有時會限制觀眾的數量。全景畫在“更低的階層”大受歡迎，《圖說倫敦新聞》將這一現象稱為“全景熱”（panoramania，海德1988：11）。

全景畫賦予景色及賞景行為文化價值，并將這種價值廣泛傳播。在19世紀，英國有幾百萬人蜂擁而至，觀賞全景畫，借此而游覽了密西西比河、穿越了歐洲、做了極地探險、丈量了勃朗峰（海德1988；夏馬1996；維爾科克斯1988）。維爾科克斯稱“全景畫的成功不在于創作了偉大傳世的藝術作品，而在于培養了藝術的新受眾，傳達了藝術表現極限的新理念”（維爾科克斯1988：42）。我會將這一觀點更推進一步。正35如風景作為劇場這一隱喻在歐洲受過教育的人群中流行開來，推動了商業資本主義的透視性凝視；全方位的鳥瞰視景廣泛流行，潛移默化地促使人們從假想旅游轉向實地旅游。



圖11 約翰·諾克斯，1810，“洛蒙德湖西南景”，油畫，62.2×157.5cm。

這種旅游蘊含著大量商機。歐洲旅游在早期只限于貴族及牛津劍橋的精英，他們乘著私人馬車，悠閑自得地漫游，遙無歸期，部分依靠揣著政治性的或社交性的介紹信而暢行無阻。從18世紀后期開始，國內旅行成為中產階級的時尚。因道路改善和鐵路發展，旅行變得更舒適、更快捷。持續近一個世紀的英法之間的敵意的終結意味著，由全景畫而了解國外鄉野風景和都市風景的新興中產階級，可以通過托馬斯·庫克及類似企業家的安排游歷歐洲大陸。至于“更低的階層”，他們可以步行或者乘坐便宜的火車在國內的無人風景中短途旅行。全面開發國內無人風景區旅游要到20世紀才開始，本書將在后面章節探討這個問題。

同時，在風景（特別是無人風景）被文化價值浸透的過程中，全景畫的功用不亞于意大利風景畫對鄉紳的功用。如同意大利風景畫一樣，全景畫成為一種媒介，不露痕跡地傳播了特別的理念。全景畫吸引了大量觀眾，讓觀景成為具有文化價值的美學體驗。全景畫和立體布景反映了把人排除在風景之外的模式的轉型，既有間接的——在觀看再現的風景時，也有直接的——在推動旅游時。



圖12 約翰·諾克斯，1810，“本洛蒙德山西南景”，油畫，62.2×157.5cm。

文化模仿

無論是17世紀古典風景繪畫，還是18世紀早期布局嚴謹的風景黑白鳥瞰圖，或是18世紀后期以湖泊、洞穴、希臘廟宇等為背景，展現如畫的緩坡林園的繪畫，風景儼然成為一座實有的或抽象的寶庫，蘊藏著縱橫交錯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根植于一個更大的先前存在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這種體系好像在不斷地回溯到某種社會穩定時期——時間上和地點上定位于各種往昔黃金時代（巴萊爾1980；吉魯阿爾1980，帕里斯1973；佩恩1994；斯圖亞特1979；威廉斯1973）。潛在的權力話語由“風景”、“自然”、“文化”及“民族”聚合而成。通過對其進行符號學研究并對風景等詞語的多層含義進行語源學考證，我們發現人與風景之間存在著富有象征意義的意識形態和戀物化的認同（奧維格1993）。同樣的研究也表明土地修辭學能夠負載政治性的絕望和憤怒（帕姆特1994）。

那種戀物化的認同、無人風景及其在18世紀英國的流行程度，這一切通過研究其文化模仿模式可見端倪。從17世紀末期到整個18世紀，這一階段目睹了當時人稱之為“中等類別”（middling sort）的崛起：商人、工匠、（也許最重要的是）新近迅速壯大的專業人士。中等類別對社會高層人士進行文化模仿而紳士化，這一現象對于以下論點很重要：一個由或多或少無人風景建構的、想象的共同體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等級。在本章的討論中，下面這段引文可以表明英國貴族資產階級——而不是恩格斯稱之為的資產階級貴族，成為文化模仿的結果。

中等類別的崛起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對上層階級的態度。他們不怨恨貴族，而是急于模仿，立志模擬紳士的教育、風度、舉止而紳士化。他們把孩子送到寄宿學校學習社會禮儀，他們讓妻子不再工作而只呆在客廳喝喝茶，他們資助劇場、音樂廳、印刷所、流通圖書館，他們讀報紙、雜志和小說……他們的態度形成一種膠合劑，將一個國家半數的上層人士或更多的人膠合在一起，在紳士文化中趨于同質而未傷及精英的霸權……無論這是如何做到的，英國土地精英最大的優勢，就是成功地使低于他們的人從心理上一起選擇進入紳士的地位等級制中。

（斯通和斯通1986：291—293）

貴族繼續受到尊重（韋爾斯1935：13—15），從而形成了社會關系中的“膠合”部分，也就是是眾所周知的“勢利”（snobbery）。我已經講過程度不一的無人風景如何形成一種特定的美學，不僅在文化精英中流行，而且在“中等類別”所接受的劇場布景及全景畫中再現出來。第四章和第五章分析了這種美學發展到19世紀則成為階級劃分的道德手段，而“低等階級”也對這種劃分做出反應。

為了弄清楚無人風景是如何向更大的讀者群呈現，我們將對五個18世紀的英國出版物進行評論。它們是插圖豐富的《銅版雜志》（Copper Plate Magazine），桑德比出版的畫集《鑒賞家博物館》（The Virtuosis Museum），插圖較少的《大不列顛珍品》（Britannica Curiosa），[[22]](#_22_73)始于1732年，停刊于1784年的《倫敦雜志》（The London Magazine），還有《紳士雜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始于1731年，停刊于19世紀20年代中期，在倫敦發行。[[23]](#_23_73)

18世紀整個70年代，《倫敦雜志》的插圖只是因為幾乎沒有才顯眼。從70年代開始，一系列插頁和折頁風景插圖開始出現，大多數插圖畫的是別墅以及它們的遠景。另一系列蘇格蘭鄉村的雕版插圖在1777年至1778年間刊載，表明如畫風景旅游業開始盛行。兩個系列都配有文字說明。同樣，早期的《紳士雜志》也少有插圖，只是偶爾刊登一兩幅木刻插圖。到18世紀50年代中期，它開始刊登一系列英國道路地圖，配有時尚花園插畫，“許多插圖是可從雜志里拿出來放進‘光學機器’”（《紳士雜志》1821，5：vii）里細細觀賞的。

一系列銅版插圖（有些是巨大的折頁畫）出現在《紳士雜志》里，引起人們對英國地形的極大興趣，這是始于1787年，延續到19世紀20年代。的確，1821年列出的累計超過兩千幅的插圖索引中，地形插圖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也是最有趣的。極易讓人想起早期南海旅行插圖的是洞穴、巖石、自然形成的巖石拱門、矗立的石頭和圓石結構、山區和山谷、奔流、瀑布，還有彎曲多節的“古”樹（通常是橡樹）。荒涼的廢墟成為完成早期浪漫畫的最后一筆。至于國外風光，如山丘、海灣、瀑流、巨洞、火山、洞穴、陸岬、弓形巖石和群山都是畫面內容。

《鑒賞家博物館》是一本精選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風光雕版畫集，完全沒有文字。它的沉默表明存在著一個賞景者共同體，對于風景的認識，他們已有共同話語——這種話語也許就是通過他們自己的風景體驗而形成的。出現在一幅山景圖中的速寫者印證了這一點。屈指可數的城鎮風景畫取材主要限于英格蘭。只有一幅畫與畫集整體風格不太協調，畫的是帶廊柱的帕拉第奧式別墅，也即菲福伯爵別墅。對廢墟、巖石高地及孤寂山丘的浪漫趣味顯而易見，浪漫趣味也反映在慣用的人物描畫上——帶著孩子或沒帶孩子的坐姿的婦女，握著長長的拐杖的男人，或騎在馬上的男人，指向中景或更遠處。這些人物形體細微，需要仔細尋覓。然而，一頁一頁翻看下去，讀者就開始猜測他們會被放在什么位置，三個主要人物類型中，哪一個會揚起手臂指路。

這些插圖強化了程度不一的無人風景狀況。重復出現的人群體態和姿勢反映了其不自然的特性：他們的位置只是（并總是）與畫家的繪畫傳統保持一致。舞臺形大拱框定的景色使人聯想起舞臺布景世界。其他類型的人也許會在風景中出現，但只是為否則就空無一人的凱爾特邊區（蘇格蘭北部高地，愛爾蘭山區）增加一點當地色彩，這些地方像南太平洋一樣有自己的奇異之處。因此身著蘇格蘭格子呢褶裙的男子和穿著長袍的女子在某個荒涼的蘇格蘭城堡前伴著風笛起舞；住在用木竿支撐的簡陋茅屋的人們在附近小溪釣魚；或愛爾蘭婦女坐在老式的只有一塊擱板的木軸木輪驢車上。這些人以及乞丐、磨刀工、抱著一捆捆引火柴的婦女是英國國內的邊緣人，作為本國原始象征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們與自然而不是文明聯系得更為緊密。他們是早期基普的英國大莊園鳥瞰圖中邊緣性裝飾性圖案的如畫性改寫。

而《銅版雜志》和《大不列顛珍品》則借助插圖和文字，敘述統一的民族歷史以教育讀者。參照古典文化的框架，精英文化在別墅和實有或再現的風景中得以呈現。通過這類出版物，更多的公眾了解到《新劇場》所描畫的那個世界的基礎。雜志等描繪或描寫出來的風景幾乎都是無人的。當的確出現人物時，他們或者是休閑族，或是為休閑族服務的人員。偶爾出現的奇異的鄉下人可能會被置于將視線引向大的遠景的位置。農業勞作很少得到再現，盡管它在畫中一些風景的創造中起了重要作用。

《銅版雜志》的最初版式是分成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包括肖像畫及英國杰出詩人、戲劇家、哲學家、政治家的簡要傳記。第二部分是古典神話和歷史場景的雕版畫。這一部分主要是取材于奧維德的《變形記》和荷馬的《奧德賽》的插圖譯本，其他風景插圖則取材于開創時期和神話時期的英國歷史，涉及到諸如克努特王和亞瑟王這類人物。第三部分是貴族和紳士的鄉村別墅雕版畫，又是以英國為主。

大多數插圖是遠景透視圖，不過比起基普和尼弗的鳥瞰圖來，視角不再那般高高在上。多數情況下，如畫的林園替代了緊鄰鄉村別墅的巴洛克式布局。在巨大的鄉村背景中也少有農業勞動。“盎斯魯上校的鄉間小屋”（Colonel Onslow’s Lodge）之類擠走了以前出現在《新劇場》里的莊園。似乎是，盎斯魯們現在不再熱衷于宏大場面了。

幾年后，《銅版雜志》的文字量減少。它的新版式是含兩幅版畫的月刊，售價一個先令，這是當時倫敦劇場最高的樓座價格（拉塞爾1995），這樣更多的公眾就能讀到。從北方城市、城鎮、橋梁、運河、英國第一家絲綢廠以及經歷過“改良”[[24]](#_24_71)的農用土地這類景象里，可以看見工業革命以及使它成為可能的農業基礎已經出現。非農業的風光和非別墅的風景插圖幾乎全部是以凱爾特邊區為背景的。受人喜歡的或重視的風景是無人風景，這些風景吸引了游客的注意力，因為：

險峻而美妙，林木、巖石和無數瀑布的變換……爭相夸耀著各種景致，標志著自然物的崇高。

（《銅版雜志》1794—17962：31銅版畫LXI，n.p.的文字說明）

風景畫題材在擴大，出版方式的改變意在讓更多公眾閱讀，但模仿精英文化仍占顯著地位。出版物包含別墅游覽指南，羅列了其中收藏的油畫、素描、印刷及古典畫。《大不列顛珍品》也著手糾正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即英國富裕的年輕人更了解荷蘭和意大利的風景而非英國風景。它的八開本袖珍版本充當了英國風景和豪華別墅的導游手冊。

藝術收藏品的描述很簡練。下面這段對諾福克的霍克漢姆豪宅的油畫描述就是一例：

提香：《維納斯》，色彩已經變得斑駁，不柔和、不協調。魯本斯：《逃往埃及》，一幅好畫，但形體不悅目，特別是瑪麗的形體，她是一座雌性山峰。畫面顯得冷漠。

（《大不列顛珍品》1777，4：248）

結語

盡管18世紀文化氛圍的主流仍然是高雅藝術為商業藝術而悲哀，高雅文化卻受到了商業化的雙重推動。由商業獲得的資本可用于投資模仿鄉村生活，又將這種趣味變成商品。資產階級貴族欲望的商品化引起的矛盾在200年后仍然突出。品味（乃至英國風格本身）的一個準繩就是風景，這種觀點已經變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很難剝離出來看。最近的一幅英國城際鐵路的海報倒是無意但卻嫻熟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同時傳達了“風景意味著分離和觀察的理念”（威廉斯1973：120）。

該海報上是一片耕耘過的田野，低低的地平線，畫面一邊是灌木樹籬，康斯特布爾[[25]](#_25_69)景色的天空盡頭則是一棵樹。如同從鄉村別墅看出去的景色，畫面也是窗框式結構，沒有農業機器或工人破壞這幅構圖的寧靜。所配文字（直觀而又有寓意地）地橫亙在畫面下方，強調這風景的優越。

英國風景藝術。私有美景。在一等車廂，你可以沉思、工作、吃飯、喝咖啡或只是享受這個事實：你擁有最佳的座位，欣賞著世界上最好的展出——英國鄉村。

但是該畫面絕對不是私有的，二等車廂的平民也一樣可以觀看。[[26]](#_26_69)構圖中永恒的寧靜也與城際鐵路高速而不間斷地展現的瞬間畫面——現代的快速全景畫或西洋景并不協調。但是這個信息的要旨就是這個“景色”表達了一個特定等級的品味，這種品味本身（景色和等級）蘊涵著英國特征。

無人風景是一個嚴格的等級秩序的產物，它把權力關系神秘化了。其鏡像意象是狂歡的、集市的城市世界，一個具有顛覆等級秩序的強大潛力的世界，一個充滿了俗人、劣跡斑斑的近距離的世界，看熱鬧者的天堂。伸長脖子傻看完全不同于凝視遠景。本章后面部分探討了常常是居于城市的“低等”階級的努力，他們闖入“上層”階級的現實畫面和風景所代表的美學化世界，汗流浹背的俗人挑戰了不讓他們進入高處風景的傳統。在他們邁向無人的高處的路上，是城市居民穿越鄉村中景時曾遭遇的、現在繼續面臨的矛盾關系。

## 二 文化風景

《季節：夏天，黎明》

……晨曦飛速涌來，

掀開所有的草地美景。

露水滴落的巖石，薄霧籠罩的山頂，

眼見它們挺起，隨黎明而熠熠。

詹姆斯·湯普森（1727）

《村莊，卷一》

……我描繪著茅屋，

正如真相將會描繪它，游吟詩人卻不……

富足在微笑——啊！她為少數人微笑——

而那些品嘗不到的人，注視著她的存儲，

如同挖掘金礦的奴隸；

被財富環繞，卻顯得更加貧苦。

或許你認為他們的報酬就是健康，

勞作的公正果實，在錢財中凋落？

那么，走吧！看看他們日出而起，

在漫長的白天里辛苦勞作；

看看他們頂著天狼星下的酷熱，

膝蓋發抖，太陽穴跳動；

看看他們，靠著大鐮刀，望著

做完的苦活，還要做下去的苦活：

看看他們，日曬雨淋，輪番挨過，

積攢下一身的疼痛，年老又體弱

……承認吧，勞作是你的奴隸的不幸，

可能正如你的巨富是你的不幸。

喬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83）

引言

前一章顯示了英國有產者和政治貴族們在國內重新設計鄉村別墅的周邊環境時，如何將自己的意大利旅行經歷轉換成實有風景，參照的是克勞德和普桑的意大利古典風景繪畫風格。就此而言，那些重新建構的田園風景實際上就是如畫風景。的確，如畫（picturesque）一詞被理解為任何適合繪畫的主題。

本章要做的首先是挑戰把我們現在所稱的湖區看成單一區域的觀念。在此基礎上，本章將追隨山巒如何被賦值這一美學討論，并概述文化精英感知的英格蘭北部山區如何從空蕩蕩的空間轉向富有文化價值的區域。本章將這一變化納入英國民族主義和如畫風景美學的雙重社會范圍探討，描述湖區風景是通過什么文化鏡片被觀賞，而被看到的風景又是如何以不同的媒介傳播給實際前往的和坐以神游的游客。

變換的背景

地方無疑與個人經歷密切聯系，因此風景可以被認為是“心靈的杰作……由記憶層與巖石層合力建構”（夏馬1996：7）。相反，空間是無命名、無歷史、無敘述的，至少主流文化是這么想，這么看的——主流文化就是通過命名、制圖、測量和居住這類權力施為，跨越地理和階級的距離，將空間殖民化。

在討論這種從空間到地方的變化的歷史特性之前，我想避免將我們現在所稱為“湖區”這個地理概念表述為靜止的或是單一的。自相矛盾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既屬于英國中西部又屬于英格蘭西北部”（菲西安—亞當1991：13—18）。[[27]](#_27_65)菲西安—亞當卓越地援用運動觀點，繪制了這個地區在不同時間的空間波動圖，即該地區在北部與西部來回移動（擴張和縮減）的狀況。作為布里甘特人領地的一部分，該地區最初是“面向東南隔奔寧山脈與約克郡布里甘特人領地的腹地相望”。這樣它就被定位在古英國的中西部。作為軍事化的羅馬人區域，“當地社會布局具有朝北性”，沿哈德良長城[[28]](#_28_65)建造要塞，最終把它定位在幾個世紀后被稱為英格蘭西北部的地區。羅馬人離開后，乃至整個11世紀，該地區“并沒有融入剛剛形成的英格蘭版圖”，而“回歸到它過去的位置，再次成為不列顛中西部的一部分”。

挪威維京人、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低地人入侵和定居，使這個地區與其他地區形成一系列的附庸關系。在11世紀，該地區才更正式地歸入蘇格蘭王朝，而“可能在法國諾曼人到來之前還是由蘇格蘭統轄”。整個這一時期，它一直屬于（古）不列顛的中西部，更應該被看作是“愛爾蘭海域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的一個行省，而非完整的‘英國’大陸的一部分”。

直到12世紀末期，“該地區才實際上不再代表……蘇格蘭南端……[而成為]明白無誤的英格蘭西北角”。然而，好幾個世紀，該地區一直是真正的戰亂區，是英格蘭試圖征服蘇格蘭的跳板，也是蘇格蘭襲擊和劫掠的目標。到了17和18世紀，由于煤礦業的影響，面向威爾士、蘇格蘭低地的發貨港口和面向美國航運港口的發展，該地區才“又面向西部，又恢復了早已經失去的大不列顛中西部的地位，當然已經換成大西洋經濟背景了”。

知識、美學與趣味

就地質方面而言，英格蘭的山區外圍可以看作是始于康沃爾，穿過威爾士，直達不列顛西北部的凱爾特邊區的一部分。就語言學而言，該地區語言的凱爾特性早已經在“殺手”語言——英語的影響下喪失了（菲西安—亞當1991）。在整個18世紀，受過牛津劍橋教育的文化精英卷入美學討論，從而將英格蘭北部山區那公認空間轉變成了湖區。他們把這個地區安全地納入英格蘭民族特征，這樣的定位是“對歐洲大陸修業旅行的美學霸權的嚴重挑戰”（安德魯斯1989：153）。

除了羅馬鄉村理想化的田園風景之外，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脈的風景也給一些做過歐洲修業旅行的英國年輕人深刻印象。以前被視為“駝背”的“贅生物”和“一個破碎世界的巨大廢墟”的山區，現在引發了情感和想象的回應。（人們的）趣味發生改變——對藝術與自然的不規律性的欣賞挑戰了崇尚規整與比例的古典價值。[[29]](#_29_65)這種轉變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此前半個世紀對神學、哲學、地質學和天文學原理的重新思索是一種必要的前期準備，為這種對于荒野的、崎嶇原生態自然（查爾頓1984；霍斯1982；尼科爾森1959；夏馬1996）的新審美反應做了鋪墊。自然成為戰場——在此，經驗主義的觀察對宗教舊原則以及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科學發出挑戰。

從排斥到賦值是一個大的跳躍。從英國人對歐洲修業旅行評論中摘出的四段簡潔的引文，可以看出那逐漸合攏的鴻溝。典型的陳述是“自然已把大地的垃圾掃到阿爾卑斯山”，和“我會很喜歡阿爾卑斯山，如果沒有那些山的話”（伊夫林1646，斯彭斯1730；轉引自查爾斯1984：42）。但有的修業旅行者認為他們已經“步入實際上就是——毀滅的邊沿……這種感覺在我身上產生了……一種愉快的恐懼，一種恐懼的愉悅，我感到非常高興，同時又感到顫抖”。這些旅行者發現阿爾卑斯山蘊含著“宏偉的粗獷，（充滿著）輝煌的荒涼景色”（丹尼斯1688，格雷1739；轉引自夏馬1996：449）。

1739年，畢業于伊頓公學的兩個朋友一起出發參加歐洲修業旅行：一個是托馬斯·格雷，后來成為重要詩人；一個是霍勒斯·沃波爾，輝格黨首相的兒子。[[30]](#_30_65)盡管他們在山區風景的賦值方面起了先鋒作用，但其狂想通常依托于他們所熟悉的早期遠足詩歌和美學作品的背景（尼科爾森1959）。像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樣，他們屬于鑒賞家之類，把上個世紀薩爾瓦托·羅薩繪制的那些荒涼崎嶇的山區風景上升到讓人膜拜的地位，畫上景色使修業旅行者回憶起他們自己經由阿爾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旅行時所感受到的“崇高的恐懼”，將羅薩與“歹徒不時會竄出來襲擊倒霉的游客的荒涼的山區景色”聯想起來——這是一種近視性聯想，要算是一種發明，因為“這類景色只是薩爾瓦托畫作中的小部分，像任何希望被認真看待的巴洛克藝術家的（畫作）一樣，他作品的大部分是歷史畫、宗教畫、古典主義繪畫和肖像畫”（夏馬1996：454）。

這類新發現的欣賞不僅限于山區。風景的方方面面在這個世紀的美學爭論中得以抬升。鑒賞家和道德哲學家設法處理三個問題：感知的對象對心靈之影響的本質（即這些對象引發的感情），這些影響的原因，以及因果關系。道德哲學和美學的界限模糊了。風景是一個承載了太多政治意義的范疇，以至于風景美學可被視為是政治話語的一種模式（伯明翰1994）。那些參與討論的人運用風景美學作為“社會和諧排序的范式……[該范式允許]如畫風景的繪畫表現嚴肅的道德政治內容”（羅森塔爾1993：14—15）。

“如畫風景”一詞被賦予的含義隨著美學越來越理論化和體系化而發生改變。它得到定冠詞修飾，成為專有名詞“如畫風景”（the Picturesque），與“秀美”（the Beautiful）和“崇高”（the Sublime）一起成為人們加以爭辯（參見艾迪生1712；沙夫茨伯里1723；哈欽森1725；休謨1751；賀加斯1753；伯克1757；吉爾平1791；普萊斯1794；奈特1805），后來加以說明的特定的美學概念（曼瓦林1925；于塞1927；希普爾1957；尼科爾森1959；芒克1960；伯明翰1986；安德魯斯1989；海明威1992）。

當爭論平息下來時，我們今天看到的山區出現在那些用新眼光觀賞的人們面前。他們不再把山區視為地球表面的“瘤子”和“麻坑”，而是地球上最宏偉、最壯觀的物體。

（尼科爾森1959：29）

應用于風景的美學認為，那些被開墾的、平滑的、安靜的、和諧多樣的漸進是“秀美的”。它們是有邊界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風景。那些荒野的、崎嶇的、超越人們想象的、廣闊無垠的風景是“崇高的”，因為其無限性使人們生發出充滿敬畏的情感和永恒的觀念。簡言之，有規律的自然是秀美的，野性的自然是崇高的。如畫風景在兩種風景范疇中都存在，能夠使“想象力形成通過眼睛感覺的習慣”（于塞1927；轉引自芒克1960：204）。這三個范疇相互關聯，其間的區別依據不同的理論家而異。置于美學的范疇之內，風景成為具有文化價值的商品，由藝術、詩歌、文學和國內旅游大量提供（對國外山區風景的鑒賞移置到本土時，國內旅游隨之而興）。

大體而言，地質底層結構實際上是基礎性和決定性的因素，決定了某個地方可以是秀美的還是崇高的。因此，高地凱爾特邊區風光是如畫的或崇高的，因為它位于古生代或前寒武紀時期的火成巖或變質巖之上。相反，低地起伏的景致是秀美的，因為位于中生代巖或新生代巖的底層之上（阿普爾頓1986；斯莫爾1990；特魯曼1971）。這兩種地質范疇（在此作了必要的簡化）的不同年齡，以及風化對它們的影響，不可避免地導致兩種不同的地貌特征，而這又支撐了不同的定居模式及生態。風景美學的轉向改變了人們的風景感知：英格蘭北部的坎伯蘭郡和威斯特摩蘭郡由荒涼的文化空漠轉型為人們渴求的富有文化底蘊的地方。在此，“文化空漠”和“文化底蘊”完成了這樣的變化：

文化……一種自鳴得意于對希臘和拉丁一知半解的文化……并非產生于智識性的好奇；對它的重視要么出于完全的虛榮和無知；要么把它當作是社會和階級區別的方式。像一個徽章或頭銜一樣，文化將擁有它的人和沒有它的人區別開來。

（阿諾德[1869]1994：29—30）

從空間到地方

兩種現象的演進完成了北方郡縣的轉型：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如畫風景美學的普及——它使得本國、本地和凱爾特的價值得以抬升。在這兩個領域的持續互動下，“湖區”應勢而生，成為話語與隱喻（盡管不完全是隱喻）匯聚的新場所。在此，構成浪漫主義的“情感的、玄奧的、田園的、原始的和主觀的元素”（紐曼1987：120）扎下根來。這兩個領域不應該被視為只是一堆“與地方、時代及習慣的基質分離的階級觀念和理想”（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1986：82），而應該被視為社會空間，記錄著湖區由什么人，在什么地點，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被書寫、繪圖、素描、繪畫出來。

某種程度上處于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如畫風景美學的普及之間，并支持這兩者的，就是古物研究。[[31]](#_31_61)盡管威廉·卡姆登的《大不列顛志》（1586）直到1695年才由拉丁語翻譯成英語，埃德蒙·吉布森擴充的、加了評注的版本幫助促成了1710年至1720年間一些考古類書籍的出版。這些出版物主要涉及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北部和西部高地發現的英國或羅馬—英國的人造物，而在18世紀20年代初期，威廉·斯圖克利就在威爾特郡（位于西南部）對巨石陣（Stonehenge）、埃夫伯里和希爾伯里山進行過勘測（皮格特1976）。卡姆登/吉布森的《大不列顛志》由理查德·高夫做了修訂，其1789年的版本增加了兩百多幅英格蘭西北部的羅馬碑銘和雕像插圖。在這本英國歷史的特別表述中，英格蘭高地的面貌顯得比以前突出。

有古物癖的鄉村紳士、牧師和醫生仍然關注與以前同樣那些荒涼的、通常是無人居住的風景；而現在，由于廣泛傳播的雜志文章、指南和印刷品，那些風景翻新為如畫風景。限于一定階層但又廣泛分布的古董家群體的關注點，因此也就微妙地，或不那么微妙地，從對景中之物的近視性考慮轉向風景本身。《大不列顛志》投稿者的微觀世界標畫出古物研究、如畫風景和政治的三角關系。古物研究和如畫風景運動之間的聯系可以由這一事實表明：托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如畫風景旅游普及指南的作者，負責《大不列顛志》1789年版本里這兩個地區的內容。

古物研究與政治的關系，表現為蘇格蘭的雅各賓派威脅，體現在羅伯特·梅爾維爾將軍本人身上。當英格蘭對蘇格蘭開仗期間，他正在羅馬軍事要塞的廢墟上收集情報，這也構成了他為1789年版《大不列顛志》蘇格蘭章節投稿的部分內容（皮格特1976）。如畫風景與政治的聯系也通過梅爾維爾得以反映，在卡洛登戰役后他鼓勵和幫助了威廉·羅伊將軍1747—1755年的高地勘測。勘測過程中，年輕的保羅·桑德比作為制圖員初試鋒芒（夏馬1996）。[[32]](#_32_59)桑德比后來為《銅版雜志》撰稿，并出版了《鑒賞家博物館》（1778—1781），一本關于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如畫風景的集子。

正是羅伊將軍在1793年發表了這一時期“有關不列顛北部羅馬軍事要塞最出色的研究”文章（皮格特1976：121）。將軍事性的、政治性的、藝術性的和崇古主義的視角合并起來，主流文化對于民族建構實施權力（也就是說以英格蘭在蘇格蘭的軍事存在確保“英國性”）這一行為，在殖民化空間的再現技術中進一步表達出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再現很大程度上重述了羅馬對那同一空間的殖民。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包括法國革命期間和拿破侖戰爭期間，英格蘭與法國之間充滿公開的敵意，這種敵對關系具有周期性發作的特點。在這樣背景下，英國人出國休閑旅游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可能性或可取性大打折扣。同樣，國內的遠距離旅行也頗為不易或多有限制。但是若有可能，他們會到英格蘭群山起伏的北部鄉村以及北威爾士旅行，這也是英國旅行者能感受到阿爾卑斯山式的震顫（frisson）的最近距離（見圖13）。1756年，藝術促進協會設立特別獎鼓勵人們繪制新的、更精確的英格蘭和威爾士郡縣地圖”（科利1992：93）。

不僅僅地圖需要重新繪制，在1750年至1790年間，旨在改善英國道路體系的收費公路法案幾乎增加到五倍，“景色的欣賞……對自然中崇高的感知成正比增加”（于塞1927；轉引自皮格特1976：122）。[[33]](#_33_59)實地觀賞新地圖標出的風景需要合適的運輸工具。由于18世紀前期種馬的進口以及更早期的“阿拉伯”母馬的進口，馬種得到改良，變得更強壯，跑得更快了[[34]](#_34_57)。鋼彈簧馬車的新技術使定期發車的車行能夠提供更快捷、更頻繁和更舒適的旅行方式。

修業旅行已經使得外國風景喚起了觀景者的情感，然而國外旅行受阻。于是，“國內”山區、羅馬—英國的遺物和中世紀的廢墟代替了外國風景和古典遺址。對古物的嗜好已經微妙地被導引到如畫風景方面。同時，如畫風景美學又使游客的觀景目光重新包括了對古代文物的凝視——雖然，這種凝視更有浪漫主義的特點，而非經驗主義的或歷史意義的精確的觀察。新地圖和新感知產生了對英國的重新想象及

一種新文學——該文學與改善的公路和運輸密切聯系，概括起來講，就是與旅行有關，旅行往往就是尋求如畫風景，而如畫風景的基本構成就是廢墟和歷史遺跡。蘇格蘭很快被包括其中；格雷早在1765年就在……高地體驗過狂喜，馬丁·馬丁在《西部島嶼描述》中標注的島嶼之路，已由托馬斯·彭南特向急于體驗這種新感受的公眾公布。彭南特不僅前往旅行，還撰文記敘了他的游歷，包括家鄉威爾士之行、1769年的蘇格蘭之行，以及1774年《赫布里底群島的旅行》。此書不僅在國內立即獲得成功，在國外也是如此——例如，在德國浪漫主義的推動下，僅五年后，埃伯林的譯本即得以出版。

（皮格特1976：147—148）

景色與觀景

古物研究專家威廉·斯圖克利，在1725年的寫作中，把湖區綿延起伏的群山比作劇場布景的屏風，認為一個畫家不用“到意大利去尋求多姿多彩和宏偉的景色”（皮格特1976：122）。早期鑒賞家觀看和欣賞湖區的方式深受17世紀意大利風景繪畫范式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持續于整個18世紀。

在大約1753年寫給利特爾頓勛爵的一封信中，來自坎伯蘭郡的劍橋牧師約翰·布朗聲明自己不能勝任傳達“完美”的德文湖和湖區全景這一任務。他給自己開脫，說因為這樣做要求“集克勞德、薩爾瓦托和普桑的能力于一身”（轉引自比克奈爾和沃夫1982：15）。近15年后，他的信仍然被認為是湖區景色的最有說服力的說明，并以單行本形式發表。甚至到了18世紀末，游客還是以意大利情結來欣賞湖區的。例如，一個去過湖區的游客在1792年給即將前往湖區者描述他穿越德文特山地的感受時寫道：“你會看到，并有點感覺到是在阿爾卑斯山，以為你已經像漢尼拔[[35]](#_35_55)一樣完成壯舉。一定盡可能上午9點以后就出發。”（轉引自安德魯斯1989：154）

古典教育，猶如繪畫知識一樣，使得游客把風景與文學聯想起來，將當地人變成了藝術裝飾。“看到坎伯蘭郡的牧羊人趕著羊群攀爬山地的第一眼，越是接近文學原型，就越令人激動：維吉爾的《牧歌》突然閃現在游客和牧羊人之間的空間”（安德魯斯1989：3）。那些參加過歐洲修業旅行的人在自己的故土尋求意大利風景畫的本國版本，因此，像德比的托馬斯·史密斯（1716年去世）這樣的藝術家跑到湖區尋找使他回憶起意大利繪畫的景色。如果沒有能找到，他們也會略使巧計，重新安排各種（風景）要素以滿足要求。實際上，在蘇格蘭平定下來之后，穿格子呢短裙的高地襲擊者（讓人聯想到羅薩的《匪徒》）使湖區雕版畫更具如畫風景特點，如T.阿羅姆的《霍尼斯特峭壁》。自從意大利藝術家的作品通過版畫和文字評述為廣大觀眾所知悉以來，一個接受這種風格的市場應運而生，受眾范圍遠遠超過那些直接觀賞繪畫的人們。



圖13 阿莫斯和哈麗雅特·格林，1804，《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景色：從魔鬼橋的旅館看萊德爾瀑布》，石墨淡墨，32.1×41.6cm。

到18世紀40年代末期，英格蘭和威爾士山區和高沼地風景雕版畫市場已經勢頭良好。但是湖區景色要等到1752—1753年和1758年威廉·貝勒的系列畫，及1761年托馬斯·史密斯的三幅風景畫出版后才進入市場（托馬斯和沃夫1986）。把供求問題帶入另一層面，我們來比較一下托馬斯·史密斯的早期繪畫和他后期的一幅雕版畫。這兩幅畫描繪的都是德文特湖的景色，是以仰視角畫出來的。畫面上，在兩個面對觀眾的紳士的注視下，一群勞動者（正在砍鋸著新放倒的木材）被醒目地置放在前景的中間部分。在后來的雕版畫中，勞動者消失了，一棵恰好具有如畫性的枯萎“古”樹取代了林地，由于視角升高，兩位紳士觀者的尺寸大大縮小，他們背向觀眾，靜靜地注視著眼前的景色。這種重新布局反映了如畫風景運動的普及和市場對這類雕版畫的需求。

早期到湖區的精英游客是“參加實驗的典型的紳士或淑女，他們對一些新的、往往令人生畏的視覺經驗作出有所控制的美學反應”（安德魯斯1989：67）。如果說下層人士占據了顛倒混亂的狂歡世界，那么那些進行如畫風景實踐的人們就占據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有時會前后顛倒的世界。要看見想看的風景，觀賞者就得轉身背對風景。把一個橢圓形或圓形的琥珀色或涂銀的凸鏡（被稱為克勞德鏡子[[36]](#_36_55)）舉在略高于肩的高度，就可以看到一幅框入鏡內、縮小和反轉的風景畫[[37]](#_37_55)，只有前部的景色細節清晰。慢慢移動鏡子，就能發現“完美的”如畫風景。這種對意大利17世紀風景畫的仿效，隨后可以勾勒或涂畫出來。

不同色調的透明鏡子允許以另外的方式操縱所看的景色。透過灰色的或藍色的鏡子觀看，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景致變成月下景色；透過黃色的鏡子觀看，明亮的陽光變成曙色（當然比一大早起床，跑到觀景點看太陽升起要省勁得多！），而霜色的鏡子產生的是幾近雪景的景色（安德魯斯1989）。這種對季節或白天效果的即時操縱讓人聯想起盧泰爾堡的微型劇場，其中光線、天氣和季節的效果不僅具有戲劇效果，而且就是無人風景的看點。

盧泰爾堡是18世紀末三位擅長描畫威爾士和英格蘭山區景色的最著名的畫家之一，另外兩位是他的朋友托馬斯·庚斯博羅和德比的約瑟夫·賴特。盧泰爾堡幾年前在為居瑞巷劇場上演的啞劇《德比郡的奇觀》做地貌草圖時參觀過德比郡。1783年再次造訪該郡時，他游覽了湖區。接下來的四年里，他以湖區—德比郡旅行為素材繪制了17幅風景畫，在皇家藝術院展出（霍斯1982；喬皮恩1973）。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山區景色，探索了不同類型、差別令人驚異的透視圖景，許多人在藝術院展覽上觀賞了它們。

透視性凝視的精華是全景畫。現存的湖區全景畫中，最早、最大的一幅在18世紀70年代制作，最初或許用于裝飾環形房間[[38]](#_38_52)。其他的全景畫在19世紀30年代出現，要么尺幅太小，要么只是180度的半全景，（霍斯1982；托馬森和沃夫1986）。為了獲得適當的風景寫生地點，沒有山地徒步經驗的藝術家開始身體力行攀爬頂峰，有時遭遇到災難性的結果。[[39]](#_39_50)對湖區的描寫顯示了古代遺址與如畫風景之間的聯系。威廉·哈欽森（1732—1814）的《湖區遠足……1773—1774年》重點在考古學方面。不過，他遵從正在形成的慣例，引用普桑、羅薩和克勞德來描述風景。哈欽森將克勞德與托馬斯·史密斯歸為同類，這樣，也就“歸化了”外國藝術家。

第一本將湖區視為如畫山間風景的真正意義的指南，是耶穌會牧師托馬斯·韋斯特（1720—1779）的《湖區指南》（1778）。該書不斷再版長達50年之久，經過多次修改和擴充，直到被威廉·華茲華斯的《湖景描述》（A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ry of Lakes，1822）所替代。威廉·吉爾平（1724—1804）的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部分地區的游記系列，對普及如畫風景美學起了重要作用。[[40]](#_40_50)作品面向牛津劍橋精英以外的公眾，為此，吉爾平把涉及到的許多拉丁術語翻譯成英語。有點像早期人們把性格的形成歸功于山區的影響，吉爾平這樣描寫湖區（1786）：“這個國家最偉大的樸素之地，其節制與節儉，乃是當地居民遵從的必然性。”（吉爾平；轉引自沃森1970：47）

隨著贊美如畫風景的作品出現，順理成章地，偽德魯伊特教（pseudodruid）和古典風格的神廟開始出現在湖區狂熱者們的莊園里，特別在有湖中小島的莊園（見彩圖3中當地的和以前的樣式）。這些建筑反映了對德魯伊特教和凱爾特文物及文學的興趣，以及對古典廢墟襯托的意大利風景的興趣。多蘿茜·華茲華斯就“痛苦地看到大地上最令人愉悅的地方遭受人類摧殘”（華茲華斯1802；轉引自比克奈爾和沃夫1982：27）。她痛苦地看到湖區風景被強加了一些非自然、非民族的東西——她的痛苦表露了一種完全不同于哈欽森的觀點，與她兄弟對湖區本地建筑風格統一性的關注如出一轍。

到1780—1790年代，如畫風景通過湖區指南、雕版風景畫集及彩色蝕刻畫、地圖和勘測報告得以普及，一些勘測報告中包括成套的雕版風景畫。在指南手冊的指導下，如畫風景的鑒賞家沿著圍繞群山和湖泊的環形路游覽，路上有一個個觀景站或最佳觀景點。[[41]](#_41_50)這些地點的風景據說特別容易激發游客的想象和情感，有助于他們作畫和擺姿勢。

因此這個地區的布爾喬亞化就開始了。更好的道路和更舒適的旅行意味著，夏日里“各種形狀和型號的四輪大馬車沿著湖岸喀嚓喀嚓地前行，掙扎著穿過陡峭的山路，時不時地在路邊停下，游客跳下馬車，飛快地勾畫出一個不知所措的牧羊人”（安德魯斯1989：153）。湖上也變得擁擠起來，船只來來回回裝載乘客，有時出一定的價錢還可以發射大炮，這樣，當回蕩在群山之間的炮聲停歇下來之后，游客就能在極度寂靜中聽到遠處的瀑布聲。馬車租金、船只租金、住房和食物費用、按天或按周聘請向導，這一切都對當地的經濟開始產生影響。物價上漲，人們譴責旅游業腐蝕了當地人：

給他們帶來了對快樂和滿足的胃口（而對什么是快樂和滿足他們又一無所知），刺激他們對家鄉的不滿，使他們粗魯而勤勞的舉止感染上了懶散和對不誠實手段的渴望。

（普倫普特1799；轉引自安德魯斯1989：171）

參觀（visit）是一個及物動詞：這就是問題所在。那些尋求如畫風景的參觀者與被參觀者形成碰撞，后者只想過平靜的日常生活，不想作為風景中的如畫性物體而存在：

在早期的湖區版畫中，經常看到人物僅僅被視為景色的一部分。高地的劫掠者在德文特湖邊點起篝火，匪徒或強盜在柯克斯敦聚集，模模糊糊的、裹著褶裥短衣的人物，猶如霧靄般憂郁，在莫勒柯姆灣的沙灘上踟躕沉思。這種風景成為有人的風景，但……不……不是在農場和酒館隨處碰到的那些壯實的、精明的、獨立的山民。這類人與游客看到的景致并不搭調。

（尼科爾森1955：93）

關于在湖區進行的休閑徒步旅行（大約250英里）的記錄，已知最早發表的是約瑟夫·布德沃斯的《湖區漫游兩星期》（A Fortnight’s Ramble in the Lakes，1792）。[[42]](#_42_44)更值得注意的一次徒步旅行是由詹姆斯·普倫普特完成的。他是一位劍橋牧師，在1799年從劍橋到蘇格蘭高地，然后經由湖區返回，全程1174又四分之一英里，這個確切的數字得之于普倫普特所攜帶的計距器。他實際上帶了很多東西：一副克勞德彩色玻璃鏡、素描便箋簿、水彩顏料和畫筆、望遠鏡、氣壓計、地圖及一套指南（安德魯斯1989）。普倫普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徒步者，此前他曾徒步到過約克郡、湖區，又取道北威爾士回到劍橋。

年輕的威廉·威爾伯福斯就讀劍橋。在1779年那個漫長的暑假，他到湖區徒步游歷。在一篇日記中，他寫道：“湖區使得其余的英格蘭鄉村顯得平淡、平靜，富有田園情調，與壯觀、美麗和崇高的湖區形成巨大反差。”（威爾伯福斯[1799]1983：18）其他記載表明他用過克勞德玻璃鏡觀景，他覺得發現的巖石嶙峋的風景優于薩爾瓦托·羅薩畫的那些。在1818年10月1日的一封信中，威爾伯福斯提到湖區是“地上的天堂”（威爾伯福斯[1799]1983：20）。

不同的議題/性別

大型動物的狩獵及馴服，與控制英國荒野山區風景的方式頗多相似之處。游客“‘捕獲’荒野風景，將其當成圖畫一樣的戰利品‘釘牢’，以便出售或鑲上畫框，掛在客廳墻上”（安德魯斯1989：67）。威廉·吉爾平，如畫風景旅行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也對這兩類活動做了類比研究：

我們是否假定獵手追蹤小動物的快樂超過了一個有品味的人追求自然之美的快樂呢？去探索自然的隱秘之處，突然瞥見自然的驚鴻一閃，追尋她至隱藏的迷宮……

（威廉·吉爾平1792；轉引自安德魯斯1989：68）

安德魯斯沒有承認男性追蹤、抓獲、揭開和洞穿女性的自然是一種潛藏的性意象（可參考圖13）。這個意象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在一個世紀后，愛德華·懷伯爾關于他自己及其他英國人十年間游歷阿爾卑斯山的經歷的敘述（懷伯爾1871）。在那部作品中，我們獲知山脈“露出”“玉肩”，卻又再次“羞怯地”蒙上面紗；“一次次拒絕刺激了重新努力”，懷伯爾和朋友們一旦自信能成功，就發動了進一步的“進攻”；面對“還是處女的”山峰，這些男人“攻擊”并最終“征服”了山頂。（后面的章節將涉及工人階級徒步運動的早期與民族志的現在，會重新拾起性別化的視角以及風景體驗這一線索。）

結語

18世紀的英格蘭，經驗主義的觀察為地質學和天文學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導致了對時間和自然的重新評價。剔除早期的神學基礎后，美學爭論引起對自然的新審視。隨著趣味的相應轉變，過去令人害怕并予以回避的山區風景變成了極具美學價值的勝景。“空間”被轉換成“地方”，就像我們在湖區看到的情況。借助于多種媒介，特別是印刷品的再現方式，加之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給“國內”山區風景注入新意義，湖區成為早期風景旅游場所。

在18世紀初，“風景的階級視角蘊含了由社會，并最終由經濟所決定的價值觀，畫出來的意象使這些價值觀得到文化的表達”（伯明翰1986：3）。該世紀最后十年間，風景作為文化的表達，無論是通過再現還是旅游，已經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以及模仿他們的人中間廣為流傳。如畫風景運動可以被視為具有民主特性，因為其價值觀定位在當地、本土和基礎更為廣泛的風景接觸上。與此看法相悖的是風景的政治化——通過議會的圈地法案，伴隨著對被剝奪者的無情。

中產階級的文化模仿行為取決于休閑活動的盈利性商業化。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矛盾。正是剛被奪走土地的人們才使得休閑成為可能，要么生產利潤好使他人有錢休閑，要么生產休閑活動所需的裝備。旅游指南、風景描寫占突出地位的小說、風景詩集、個人版畫、版畫集、版畫、畫冊借閱圖書館、繪畫學校、繪畫指導書、運輸、安頓游客的小酒店，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一張努力與期望的文化格柵，將冒雨速寫、才氣平平的如畫風景游客與學院派大規模的繪畫展聯系起來。甚至那些不能直接實地賞景的人們也通過閱讀如畫風景和觀看版畫集介入努力與期望的文化格柵。

因此，文化風景按阿諾德的觀點得以建構，用以區分階級，反映了文化資本的缺乏或存在。通過文化模仿，如畫風景旅游得到文字和實踐的普及，最后成為諷刺的對象。詹姆斯·普倫普特牧師利用自己千辛萬苦獲得的對如畫風景游和游客的了解創作了他的喜劇歌劇《游湖者》（The Lakers，1798）。諷刺如畫風景旅游的頂峰之作是托馬斯·羅蘭森的《句法博士尋找如畫風景》（Dr.Syntax In Serach of the Picturesque，1812），一系列插圖由威廉·庫姆寫的打油詩串聯起來，庫姆是個以賺錢為目的的劣等藝術家，常常為了逃債而匿名寫作。用句法博士的話來說：

我會讀也會寫，素描和繪畫，也能涂幾筆，

如此這般，創造了一枚真正的新幣；

這里散文一番，那里詩歌一把，

再給它處處來個風景如畫……

每隔一頁就是一幅畫稿，

精致的景色配上水綠才妙……

我承認它只不過是垃圾，

但它能夠提供現鈔。

## 三 民族風景

《倫敦》

我徘徊在每一條富人專用的街上，

不遠處流動著屬于他們的泰晤士河。

我看到每一張迎面而來的臉龐，

寫著虛弱，刻著憂傷。

在每一個人的每一聲哭泣，

每一陣嬰兒的驚恐啼號，

每一種嗓音、每一條禁令中，

我聽到靈魂的鐐銬在錚錚作響。

掃煙囪孩子的哭喊，

震撼著每一座熏黑的教堂，

不幸士兵的仰天長嘆，

如鮮血沿著宮墻流淌。

然而最令我夜不能寐的，

是大街上年輕妓女的咒詛，

那罵聲凝固了嬰兒的啼哭，

一如瘟神，把新房變成靈堂。[[43]](#_43_44)

威廉·布萊克1794

《序曲：第七章，倫敦住所——巴塞羅繆集市》

一旦我們祈求繆斯的幫助

她將接納我們，乘她的羽翼御風而行，

飛過擁擠和危險的人群，

放到在馬戲團的主持臺——多么震驚

耳朵和眼睛！什么樣的混亂和噪音

野蠻人和怪物——群魔亂舞

多么恐怖，色彩、動作、形狀、視覺和聲音！

……人群

招徠了……

惡形、怪狀、尖鳴……

所有的荒唐，所有的乖謬與反常

所有的畸形，所有人類的狂妄之想；

他的乏味、瘋癲、技藝表演

所有的混亂無章，造就了

怪物議會。帳篷和貨攤

這一切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工廠，

正在吐出、接受，四面八方，

男人、女人、三歲的孩子、懷中的乳嬰。

哦，令人茫然的混亂！真實的體現

那偉大城市的本來面相。

威廉·華茲華斯1805

引言

我曾經將我的研究方式描述為“拋出去的連接線，從民族建設的社會政治領域收回”，我所說的“民族建設”意指大不列顛的政治性虛構。在此我還要加一點，就是針對這樣的建構，“英格蘭”這一特殊意象被編織，這個意象直到今天都對立于理性的、政治經濟的建構。

這一章要進入19世紀。此時，工業革命和英國浪漫主義運動興起。本章試圖討論一系列相關領域的緊張關系。鑒于它們對英國山區的賦值造成的影響，本章會涉及生發于文雅社會之內，存在于倫敦意象與反意象之間、農業/工業革命與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之間、英格蘭與大不列顛之間的一些緊張、分離及歧義關系。為此，我們將前一章探討過的湖區置于造就了漫游湖區時尚的倫敦社會背景之內進行分析，也就是將問題置于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民族主義重構的框架之內。

文化理念的產生與消費是動態的。供求關系是敞開的，可以隨時調整。抵制會在別樣的層面創造出自己的需求，造就新的供應途徑。

如同所有藝術，如同語言，文學是集體的活動，完全被社會力量所限定，某一時間在某一特定共同體里需要說什么和可以說什么——這也許是人類學家而非心理學家的領域。

（巴特勒1982：9）

同樣，風景的賦值和消費也是動態的、集體的活動，一種“地理與等級坐標交集而成的排他性網絡”的活動（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1986：108）。

位于前景的風景提供了另一通道，進入交互作用的緊張關系領域——也即社會力量內部和之間，這些社會力量圍繞著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和集中化民族國家的產生。如畫風景美學是文化束中的一枝。前一章節抽出這一枝進行了仔細考證。本章將重新編織，并厘清如畫風景美學如何具有特定時間內不平等性的意識形態，存在于并貫穿于風景之中。這種美學充當了階級形成的方式，以

產生于并潛在地重塑人們的體驗以及由體驗獲得認識的方式。這是意識形態的歷史動力，我們必須盡力發掘。因此，我們就得把意識形態置于文化架構之內，特別是置于文化矛盾的架構之內。

（西德爾1986：154）

本章標題“民族風景”蘊涵之意是：哪些人參與無人風景的欣賞而被認為值得列入民族之內。

基于倫敦的文化及其傳播

查理二世（1660—1685）荒淫無度的宮廷，光彩奪目而又咄咄逼人。其后則是威廉和瑪麗（1688—1702）、安妮（1702—1714）及早期喬治家族（1714—1727；1727—1760）的宮廷，頗有居家之風但卻乏味，高雅文化和精美藝術的欣賞活動漸與宮廷圈子脫離。一份近期的簡明研究報告顯示出，怎樣的機制與實踐使得高雅文化不再是“皇家政治的侍女”而“成為商業的合伙人”（布魯爾1997：3）[[44]](#_44_42)。經濟擴張給藝術創作帶來了新動力，培養了一批具有求知欲的新觀眾（索爾肯1992）。社會雅致化與藝術的培養密切配合[[45]](#_45_42)。

置于政治經濟理論架構內考量，一個英格蘭意象正在形成。面對歐洲大陸而突顯的英國例外論被表達為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基于商業的繁榮、自耕農—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法律保障的農業（亞當·斯密[1776]1985）。有用的藝術（商業、制造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借助科學技術的改革和發明，帶來“普遍的富裕，惠及到人民中的最低階層”（亞當·斯密[1776]1985：33）[[46]](#_46_40)。但是國力的加強取決于社會的穩定及勞動分工，而保護政治自由和商業利益增長的旗幟飄揚在少數人而不是許多人的上空：

……如果[這面]旗幟的一面繡著“商業”的徽章，另一面就是“文明”。這面旗幟的面料是自由，如果我們仔細查看其針法，自由其實就是法律。“市場”是營造出來的，一些人必須自由地限制其他人，包括幾乎所有的婦女，以此建構進步。

（科里根和賽耶1985：105）

華茲華斯的“怪物議會”——人群，被激情支配的亂民，顛覆了市民/文明（civil/ized）社會，哪怕只是短期地，也威脅著穩定。在啟蒙主義的進化模式中，理性的個人是由駕馭激情定義的。激情是非個人的群體的特征，是巴赫金稱之為“詭態身體”的特質。正是“養成的品味消滅了激情……[而且]改善了我們的情感”（休謨[1741—1742]1985：6）。養成的品味也支持著一種共生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社會雅致化的獲得與實施需要并產生了有用的藝術所提供的物品[[47]](#_47_40)。社會雅致化和商業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由要求合作和理性互動的市場來鑄造。

基于倫敦的文化擺脫了宮廷并按照城市的商業生活來運作，是英格蘭作為城市現代化的中心及“普遍富裕”（羅賓斯1988）制造者形象的縮影。但是18世紀倫敦的黑暗面形成了一個令人頭疼的反意象。這頭野獸的下腹部容納了布萊克筆下令人難忘且有著難忘標記的臉龐，是長滿膿瘡的貧民窟和妓院，擠滿了貧困潦倒、體弱多病、流離失所的人們、從正在進行的一系列昂貴戰爭[[48]](#_48_40)中退役的士兵和水手（許多人是截肢者）、孤兒和成千上萬“隱身”的黑人：總之，到處都是被盯上的獵物和出自底層階級本身的猛獸。倫敦上層生活與下層生活同時并存，這種近鄰關系使得任何一方不可能忽視另一階層的生活。

這一時期也見證了有修養的都市男女的崛起，一類富有想象和情感的男女，其社交風度的優雅可由有見地的談話、穿著和其他外在符號表現出來。在《旁觀者》、《閑談者》及《衛報》登載的文章中，約瑟夫·艾迪生和理查德·斯蒂爾引領風騷，提供了起教育作用的美學，該美學正是迅速擴展的“文雅社會”那部分人群所需要的[[49]](#_49_40)。第一章研究的風景插圖刊物和雜志，第二章探討的與湖區相關的旅游指南和版畫集，這些都是印刷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服務的一部分——服務于持續再造出來的、不斷擴張的休閑需要。如畫風景美學不僅是“想象”、“情感”和“趣味”交匯點，而且成為三者實踐的焦點。

18世紀末期，文化和休閑的縱情消費及商品化的藍圖已經勾畫出來。社會身份的這種自我塑造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排他的過程。而基于倫敦的“文化”：

其最好的政治渴求的確是進步的，但在其方式、道德及想象性作品，乃至形體、儀態和品趣中，暗藏一種……構成其歷史存在的精英主義，在其主體性身份上銘刻了所有可以顯示自身是一個不同的、杰出的、高貴的階層的標記。

（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1986：202）

這樣的一個階層居住在一個獨一無二的城市。英格蘭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居住在倫敦。18世紀的不列顛人中，每6人當中會有一個一生中的某些時候在倫敦工作。使所有其他英國城市和不列顛首府相形見絀，世紀中期，倫敦擁有近75萬居民，是西歐最大的城市（布魯爾1997）。

廣為人們接觸的倫敦文化生活已經確立。藝術、音樂、戲劇和出版一片繁榮景象，體現在首都的博物館、音樂廳、大型劇場、圖書館、咖啡屋、版畫與書店、文學社團、畫室與客廳。高雅之士內部互通的交際圈進行著文雅的談話、文學批評、舞蹈、繪畫及音樂表演，從而形成了范圍廣延的共同體，深度地介入文化資本的生產和消費。報紙、期刊和雜志成為日常的結締組織，雖然可能存在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差異。

到18世紀末期，這類都市精英公開的統一化和正在統一化的文化敘事，借助市場力量在倫敦之外的地方得到復制，市場力量刺激了分化差異，凝結了身份認同，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左右逢源并在全國范圍內發揮作用，文雅社會的社會關系集合已經形成。盡管存在著地區的種種排他主義，文化共有的實踐有助于各地城鎮以及鄉紳階層組建自己的社會關系與規則。這一切的完成得益于眾多業已存在的非正規組織的網絡，包括知識分子和宗教協會組織，也得益于新的集會場所——這些場所也起到替代地方排他主義的作用（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1986）。俱樂部、會所、聚會屋、讀書會和辯論會雖然源起于城市，卻在鄉村漸成氣候（莫里斯1990），甚至小城鎮“也能舉行精心策劃的舞會、聚會、音樂會、演講及紙牌晚會”（坎寧安1980：17）。總之，我們看到了簡·奧斯丁小說中的場景。

文化的標志（書籍、期刊、版畫、游記、舞蹈指南、繪畫、音樂、看戲、參加舞會和業余劇團）與適應于不同季節、地點和場合的時尚消費，推進了對這一特定的文化敘事工程的模仿復制，同時也創造著這一工程。通過強調個人自己的想象力和美學體驗，如畫風景的實踐橫越這文化束之中的多個范疇[[50]](#_50_40)。在這一過程中，如畫風景美學幫助培養熟人之間以及更廣范圍的文化公眾之間共有的身份和情感。

風景成為認同形成的場所，依據人們如何閱讀、游覽、體驗、實地觀景或欣賞印刷畫冊、談論及繪畫風景而形成認同。既然物品是文化意義的載體，“誰擁有這些物品”就成為物品文化意義的一部分。品味與休閑行為的表達幫助人們把自己和他人定位在相應的社會階層（布迪厄1984；米切爾1994）。最終，畫境游無論是徒步還是乘坐馬車，都是銜接主體與客體的重復性和表演性行為，同時將如畫風景轉化為“物品”[[51]](#_51_40)。

被不同的群體以不同的方式應用，如畫風景美學輕易地借用了這一社會網絡，并使之強化。如畫風景替代了理想化的古典主義傳統，激發出對現實性或再現性風景更廣泛的美學思考。對于有些人而言，如畫風景美學美化了外省身份，使其得到認可，通過抬升他們生活其間的風景，把外省人與中心連接起來。如畫風景美學也有助于神話鄉村，使吉普賽人成為“一種有趣的地方色彩，而非居無定所者對現狀的威脅”。如畫風景的實踐“為在變動的鄉村生活中失去根基并繼續失去根基的鄉紳”提供了“維持功能”（安德魯斯1989：252 n.3；摩根1983）。面對英格蘭城市化過程中舊身份的喪失，如畫風景幫助塑造新的身份。

無論在倫敦還是在外省，在觀看歌劇、戲劇和音樂會時，在參觀休閑花園時，在參加俱樂部、舞會和集會時，都存在著一種雙重的緊張局面。內在的緊張生發于文雅社會成員的自律要求。觀眾被教育成為沉默安靜的觀看者，而舞臺上，瞬間定格的姿態用來傳達情感。舞臺下，觀劇指南要求觀眾能夠“聽見不快之事面無慍色……（而且）聽見愉快之事不動聲色”。進入文雅社會的成員要努力做到“既不太前衛，亦不太保守，更不太隨和；要謹慎明智，淡定自若”（布魯爾1997：111）。繪畫、舞蹈和音樂教師指導男女新晉會員控制激情以確保在社交場合取得成功。暫時逆轉一下這種效仿，巴赫金的古典雕像會走下鄉村別墅的基座，與中產階級融合，卻不會被允許盡情撒歡。

外在的緊張則源于對物欲橫流的現實的批評。貪財、貪欲、欲望和虛榮對商業有利，卻對靈魂有礙。奴隸貿易和奢侈之間的關系被大力渲染，部分批評出自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騷塞、華茲華斯[[52]](#_52_40)。自我推銷的惟利主義信念導致對窮人的壓迫，加劇了非洲奴隸貿易的殘酷性（鮑姆1994；埃弗雷特1994；格茲納1995）[[53]](#_53_40)。傳統形式或俗成的英格蘭“靈魂”，正在犧牲給自我利益和利潤。與城市及文化敘事相聯系的文雅社會受到垢病，說它錯在把技巧詭計當作美學優雅的基礎。這個社會缺乏道德準繩，成為眾矢之的。結果，另一種依據自發的感情和感傷主義的敘事得以發展。但是，得到強化的感性可能傾向于鼓勵慈善行為，也可能痛苦地逃避人類遭受的苦難（埃弗雷特1994）。無論是哪一種方式，對感性和情感的強調幫助培養了一種美學，感應“粗獷、野性而真實的自然崇拜……將國家的邊緣地區（蘇格蘭高地和威爾士山丘）當作審美的中心”（布魯爾1997：118）。這種崇拜就是對如畫風景的追求。

“不列顛”和“英格蘭”問題

這一時期是身份認同建構的漩渦時期。文雅社會形成中同質化的過程伴隨著不無問題的不列顛的發展而進行。但就在此時，圍繞兩種過去的英格蘭定性——盎格魯—撒克遜和諾曼的，雙方的社會政治繼承人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加上在大不列顛的組成部分中間文化民族主義剛剛崛起。此時正值英法之間為殖民地而爭奪和大動干戈之際。

由于認為法國品味支撐著倫敦文化，所以圍繞何為真正的英格蘭的諸多爭論中，有一個矛頭就指向文雅社會。當文雅社會的文化敘事在全國范圍內被復制時，它可能導致“沿文化界線形成內在的社會分離感”（紐曼1987：99）。在諾曼統治下，傳統的英國自由喪失，這段歷史成為反對中央集權、要求政治改革的英格蘭激進愛國主義的注腳（巴特勒1988；埃文斯1995）。到了世紀末，由于法國革命恐怖統治的影響，這種大唱反調的愛國主義也就崩潰了。面對共同的敵人法國，大范圍的反法情緒，“不列顛”感和“不列顛人”感卻應時而生。民族具象化的象征就是大不列顛。但是，即使這種身份認同也不是沒有問題的。涉及到她所承載的政治信息，大不列顛可能代表反諾曼的英格蘭或是反法國的英國（阿瑟頓1974）[[54]](#_54_40)。

圍繞法國性所進行的歷史探討和當代爭論都是沿著反映兩種社會道德世界的階級分界進行的。統治階級因其高盧化而道德腐化（國外旅行、典雅的品味以及倫敦文化的裝飾）。諾曼前的英國身份的恢復及純正英國原則的確立取決于鄉村美德的重新提倡、野性自然的賦值，以及對所有外國東西的排斥（紐曼1987）。恢復這個往日曾有的英國，與政治經濟構造的英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一個正在政治經濟方面奮進的英國，當地或本土共同體的價值可比不上國外貿易伙伴及殖民擴張的利益。由于正在與法國交戰，國外旅游受到限制，倫敦社會轉向凱爾特邊界山區，抬升了那里的價值，使遠離都市的湖區成為時尚之地。18世紀期間，對某些人而言，文雅社會打造為時尚的地方已經成為文雅社會所缺乏的美德之寶庫。

大不列顛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這一至關緊要的政治身份在18世紀形成。蘇格蘭、英格蘭、威爾士的政治聯盟始于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1603年登基成為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1707年的《聯合法案》制造出一個定義模糊且引發憤怒的聯盟。蘇格蘭人和蘇格蘭、英格蘭人和英格蘭讓位于不列顛人和大不列顛[[55]](#_55_40)，人們為之憤怒不已。盡管不列顛是一種疊加在舊有身份之上的身份，但它并沒有取代舊有身份（卡納戴恩1995；科利1992；羅賓斯1988）。像所有身份一樣，它是依據某些條件，通過與一個社會或疆域上的他者——也就是與天主教法國比照而建構起來的（薩林1989）。

英國和法國之間存在著深深的反感，幾近痼疾的仇恨，這種敵意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愈演愈烈。略去雅各賓派/羅馬天主教對新教英格蘭的威脅不講，我們足有理由認為所謂詹姆斯一世的登基給蘇格蘭和英格蘭帶來和平的看法與將近150年的事實不符。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中期，從盎格魯與法國之間的多次戰爭中我們都能聽到一個聲音低低地說，“法國資助了詹姆斯黨人的入侵”，而“1715年和1745年心懷怨恨的詹姆斯黨人的軍隊從蘇格蘭向英格蘭進軍，說明過去的邊界間的敵意仍然在繼續”（科利1992：4，13）。至于愛爾蘭，那兒的詹姆斯黨人一直站在法國軍隊一邊抗擊英國。18世紀80年代，愛爾蘭在倫敦議會發出了抗議之聲，最終爆發為1798年的起義，這次起義得到法國艦隊的援助，顯然對于解除盎格魯與法國間的敵意毫無作用[[56]](#_56_40)。當新教與天主教的對抗消弭的一些時刻，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英格蘭人的國內分裂得到彌合，不列顛人這一觀念和經驗得到加強（科利1992）。

然而，不列顛身份建構這一觀念強調的是彌合國內分裂的紐帶，而非“使他們分離的信仰”（布魯爾1992：5）。國內分裂是通過文化民族主義表達的，但是新教本身也包含了分裂主義的斷層線。需要質疑的是單一實體的新教英國與天主教法國及其在愛爾蘭之影響的對抗。應該承認的是國內存在著種種異端或非國教宗派：如長老會教、公理會、浸禮會、貴格會、唯一神教派、衛理公會派、不信奉英國國教派及激進的憲章派。關于這個主題將在側重中部地區研究的第五章繼續論及。

英格蘭的兩種版本

英國有兩種版本這一事實早已經提及。需要追問的是：是否有過一個統一的英國身份？起初，在都鐸王朝創建時期，當“系統地挖掘盎格魯—撒克遜的證據——他們的教堂、語言及法律條款”發軔之際（菲西安—亞當1991：2），“英國人更可能與自己的區域和地方產生認同，而不是與整個國家本身產生認同”（埃文斯1995：232）。種族史和制度史的意義舉足輕重。“亨吉斯特—霍薩[[57]](#_57_40)的種族神秘性”（羅溫薩1991：208）將身份植根于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和民主體制之內。

這種神秘性支持了不列顛身份，也支持了英格蘭身份的一種版本。[[58]](#_58_40)它們都是與同樣的他者相抵觸的，盡管他者的建構有所區別。以盎格魯—撒克遜的“英國”視角，他者就是諾曼領主及其當代的不列顛繼承者。站在不列顛的角度，他者是有領土擴張野心、驕傲自負、道德淪喪的當代法國。

盎格魯—撒克遜原始的民主制（連同凱爾特人、德魯伊特教僧侶和游吟詩人——這些人被再現為當時在南太平洋上遇到的那些“高貴的野蠻人”的本國變種），與諾曼領主當代繼承人展開競爭。當時國內的社會分野要求用階級區分的眼光重新審視過去：

一方面，種族譜系的神話正被盡情發揮，這個神話追尋“真正的”英國共同體……上溯到卑微的撒克遜時代……年復一年，從迷宮一般的學術性和偽學術性研究中拼湊出一個“真正的”英國或不列顛種族共同體概念，它擁有共同的過去，共同的道德、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構成，這一版本與撒克遜祖先理想的道德接榫，迎合了強烈的情感訴求……其政治含義……即憑著天生的道德優越性、大不列顛島嶼歷史領先權以及“這些人”對日爾曼制度的繼承，他們應該享有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大的權利，而不是壓迫者（“高盧人”、諾曼人、法國人）施舍的那一點點權利。

（紐曼1987：117）

同時，另一個完全不同版本的英格蘭正在形成，由進步的話語和政治經濟理論精心構造。這個版本的英格蘭是一個進步的、“改善的”、城市化的、制造業的、工業化的英格蘭，可與大不列顛互相置換——現在仍是如此。這對聯體雙胞胎從未分離過（卡納戴恩1995；格蘭特和斯特林格1995；羅溫薩1991）。吊詭的是，啟蒙運動的進步主義卻把進步的對立面鮮明引入知識分子視線：未改善的、落后的、離奇的——這些都是所有古董家、民俗學者、如畫風景追隨者備感興趣的東西。啟蒙運動所信奉的進化模式也許是思想的決定性模式，但是任何模式由實體與虛體構成，二者相互依存。就風景和農業實踐而論，在啟蒙計劃看來需要予以改進和現代化的東西，正是另一種人眼里的共同體的堡壘和活文化的寶庫。中心移向北部山區——英格蘭湖區，標志著對進步的英格蘭的另一層反抗產生了，美學和情感聯合確定了本地風景的連續性和傳統。具有家長作風和仁慈之心的土地主精神和道德價值觀，與進步的、倡導改良的土地主和農民形成對比。圈地運動與驅逐行為打破了農業共同體歷史悠久的互惠關系。當然，這種互惠的紐帶以前已被破壞過許多次，也許在16世紀全國范圍的圈地運動中，這種破壞格外顯著。

啟蒙運動的現代化規劃關系到凱爾特邊區風景/土地使用，對此的一種有趣解讀用到亞瑟·楊格的《1776、1777和1778年愛爾蘭紀行》（1780）和塞繆爾·約翰遜的《蘇格蘭的西部島嶼紀行》（1775），揭露了政治經濟缺乏時間性，威脅本土文化：

對楊格而言，愛爾蘭是新未來的顯現之地。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愛爾蘭是一個尚能瞥見過去的輪廓的地方；透過現代人眼中所見的表象，依然能感受到隱匿于風景里的歷史傳統和情感。這類表象堪稱一個民族不斷增生的年鑒，負載許多世紀以來人類持續在場的種種印記……當口傳和書寫的傳統遭到強制性的遏止時，民族的風景就變得非常重要，成為另一個選擇，它不像歷史記錄那么容易被毀棄。農業改革會抹去鄉村的表象特征，造出一種經濟和政治的白板，從而威脅到文化記憶的留存。

（特林佩納1997：52—53）

鄉村傳統主義的世界觀源自如畫風景運動和古物研究的互動[[59]](#_59_40)。原本屬于文化精英的興趣移向范圍更廣的社會階層。風景中古舊或衰老的成分（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建筑物），田間頹塌的紀念碑、珍奇之物如古樹或“靈石”，以及言語、穿著和舉止的傳統，逐漸加入這種世界觀的生成[[60]](#_60_40)。地方生活和本地特色的重要性開始突顯，與日益恃強自重的城市中心相對。風景的遺跡“成為本土文化的幸存碎片，其復原是國家和地區的驕傲”（布魯爾1997：582）。英國鄉村成為永恒穩定性的所在地，準備經受，或實際上正在經受隨社會關系轉型而來的迅猛的變化（伯明翰1986；紐比1987）。

這種新創的傳統主義世界觀為文化民族主義提供了原材料，推動了對英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和蘇格蘭歷史（神話的或真實的）、民間信仰（如有關“小矮人”的信仰）及其實踐（如收割儀式）的收集和評價。這些歷史、信仰和實踐植根于對地方、對棲居于風景之中的神奇前輩的依戀，實際上是對神奇性的依戀——而神奇性早在宗教改革時期就已被妖魔化，又遭到啟蒙運動的否定（施奈德1991）。[[61]](#_61_40)文化民族主義與進步和改良的修辭背道而馳，但是畫境游允許市場把抵抗地區的風景也收并進來。到這些風景區游覽促使人們關注到這樣一種陳述的非英國背景：對“品味純粹的人”來說，湖區是“一種國家財產”（華茲華斯[1835]1984：133）。如此便有助于闡釋文化民族主義通過風景發揮作用這個觀點，也框定出如畫風景美學的作用范圍。

文化民族主義

大不列顛政體形成之際，國內文化民族主義也在形成，產生了近來稱之為“‘四個民族’的文學歷史”（皮托克1994：2）。鑒于“強制性的‘英國人’版本在那時得到如此專注的發展”（盧卡斯1990：40），當時出現的愛爾蘭、威爾士和蘇格蘭身份認同就是抵抗不列顛國家的主動形式。然而，它們也被中心產生出來的一個必需的邊緣性他者所顛覆（布萊頓1995；埃文斯1995）。透過如畫風景運動的棱鏡，可以觀察到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這些文化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互聯系。

不列顛未經改良的凱爾特邊界山區恰好為如畫風景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微縮版的阿爾卑斯山風景。[[62]](#_62_40)如畫風景美學強調個人的情感發展。衰敗和貧窮的意象對于美學很重要，但只能作為邊緣性的裝飾圖案。情感的發展是其重點，然而對于所見所聞（人類的痛苦），人們無需介入：

畢竟，如畫風景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觀景者或讀者并不是從道德、社會或政治上介入看到或讀到的東西。尋求如畫風景僅僅是尋求美學體驗……威廉·吉爾平強烈反對將他稱之為“忙于各種營生的農民”引進如畫風景的繪畫。如果出現了乞丐和老年人，應該按照審美的需要把他們融入景色，這樣觀眾就能沉入令人愉悅的憂郁之中。

（盧卡斯1990：92）

政治意義的不列顛身份的興起使文化身份范疇（威爾士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的倡導者不再要求政治主權。政治主權現在已經歸并到民族國家之中了。[[63]](#_63_40)新教、貿易危機、國防都成功地在所有社會階層推進了不列顛的身份認同，盡管這些階層之間或之中存在紛爭（科利1992；羅賓斯1988）。[[64]](#_64_40)然而，正當對一個更包容的政體的訴求把“更廣大的社會與管理精英，包括大量的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信奉新教的盎格魯—愛爾蘭土地主和商人”（埃文斯1995：223）匯聚在一起時，歷史更為久遠的那些王國的種族特性也在得到探究和證明（紐曼1987；羅賓斯1988）。[[65]](#_65_40)

在幾個世紀的英國化的沖擊下，威爾士經歷了文化衰落和自信喪失的過程。獨特的威爾士生活方式逐漸消失，其法律制度受到壓制，威爾士語不再是官方語言，早在13世紀就幾近滅絕的游吟詩人制度命懸一線（赫克特1975；羅賓斯1988）。威爾士的再發明始于18世紀，到了19世紀則已碩果累累。這一再發明部分依賴于仿造和新創的威爾士事物，真正的凱爾特本土特色巧妙地糅了進去（摩根1983）。如畫風景美學與古董癖的結合造就了贗品大行其道的氛圍。追尋如畫風景、古董癖及邊緣性文化的再發明是交互作用、相互強化的文化實踐。

混亂無處不在。什么是凱爾特，什么是撒克遜，定義不清。18世紀20年代，在埃夫伯里和索爾伯里發掘出來史前巨石陣，點燃了威爾士人和游客把德魯伊特教和凱爾特浪漫化的想象之火。到18世紀50年代中期，詩人托馬斯·格雷寫詩對荒野的自然和遙遠的歷史做出新的回應。格雷翻譯了據說是“前文明的北方”（盧卡斯1990：50）的斯堪的納維亞和威爾士詩歌，他的翻譯被引用來推進“去中心化的”（decentrist）文化民族主義。格雷轉向古代北方文學研究，標志著換個方向追蹤英國詩歌的源頭，“這個連綿不斷的文學傳統的源頭不是（像過去和現在習慣的那樣）上溯到諾曼—普羅旺斯—拉丁文學的傳統，而是上溯到威爾士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承”（巴特勒1988：43）。18世紀凱爾特戲劇就借鑒了他新翻譯的古斯堪的納維亞語作品《埃達》，劇中有一些德魯伊特教式的場景。格雷最受歡迎的詩歌《游吟詩人》以愛德華一世統治時期被英國驅逐的最后一個威爾士游吟詩人為題。其重要性在于，從歷史角度而言，政治主權和文化主權在威爾士游吟詩人身上得以體現。該詩歌激發了許多繪畫的創作，最終又轉過來幫助了威爾士神話的建構。[[66]](#_66_40)

18世紀末期，前往人煙稀少、農業蕭索的威爾士山區的畫境游成為時尚。山區雖然崎嶇難行但還不至于危不可攀。落后的農業勞動和“原始的”民居成為可接受的美學意象，表現衰落，證明了時間的流逝。由于貧窮而保留下來的服裝搖身一變成為民族服裝。游吟詩人的佚詩變成“德魯伊特教的”遺物，通過某種方式，威爾士語也與希伯來語有了關聯，風景傳奇被潤色或發明出來，既是為了吸引游客也是為了“促使威爾士人明白應該珍惜他們的風景”（摩根1983：86）。[[67]](#_67_40)這些舉措收效頗佳，這一點可從19世紀威爾士國歌第二段得到證明。內容（譯文）如下：

古老的威爾士山區，游吟詩人的天堂

每面懸崖和每道山谷，在我眼里都那么美麗

洋溢著愛國的感情，充滿了神奇的魅力

是她的河流和小溪的旋律

（摩根1983：87）

游吟詩人的“……如此深植于風景之中的頌歌”（特林佩納1997：3—4）激情澎湃，將風景與自發的文化民族主義聯系起來。說到文化守護者這一角色，新發現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被當作蓋爾語游吟詩人的同類（史密斯1985）。匯集、闡釋、發布或偽造游吟詩人傳統，對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建構非常重要（皮格特1976；皮托克1994；夏馬1996；特林佩納1997）。例如，詹姆斯·麥克弗森杜撰的原住民文學對于凱爾特蘇格蘭的形成至關重要，據說那是彈奏豎琴的游吟詩人莪相的作品。[[68]](#_68_40)然而，蘇格蘭身份，初始是一種西部高地身份，其實是“對愛爾蘭文化的背叛”，而非對英格蘭的背叛，因為歷史上正是愛爾蘭游吟詩人文化形塑并主宰了赫布里底群島。至于愛爾蘭，“甚至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格蘭的統治下，凱爾特愛爾蘭仍然固守自身作為文化意義上的一個歷史性民族的意象”（特里弗—羅珀1983）。這一意象部分是豎琴師和游吟詩積極參與的結果，從兩方面意義來說，游吟詩都承載了民族的“負擔”（burden）。[[69]](#_69_40)

如果游吟詩承載了“民族”，那么，“民族”又承載什么？根據標準詞典（《韋氏新學院詞典》）：

NATION：中世紀英語為nacioun，源自中世紀法語nation→拉丁語nation-natio，意指出生、種族、民族；源自naci的過去分詞natus，意指出生。

Native（本土）和nature（自然）詞根來自拉丁語natus-nasci，與nation意義相關：

NATIVE（本土的）：中世紀英語為natif，源自中世紀法語→拉丁語nativus→natus，nasci的過去分詞，意指出生。

NATURE（自然）：中世紀英語，源自中世紀法語→拉丁語natura→nasci的過去分詞natus，意指出生。

當風景與民族、本土、自然相聯系，這個詞也就具有了“隱喻的、意識形態的效力”，這種效力是由于“一個民族文化的本質或性格與其棲居地區的本質或性格之間，發展出了一種更恒久的維系”（奧維格1993：310—312）。表達這種更永恒的維系的方式之一就是本土語言或母語——這與natus-nasci的內涵呼應。涉及到18世紀凱爾特邊界，這種風景/語言的聯系對于游吟詩民族主義至關重要。到了18世紀末期，風景是“自然的書寫，人置身其中最大程度地體驗自己在此地此時，而且成為……轉向主觀時間意識的一個關鍵概念”（索爾維森1965：14）。

風景與語言的聯系通過地名的記憶和隔絕狀態得以保持。在整個18世紀，古老的語言，就英格蘭而言是古老的方言，仍然在偏遠的地區使用著（羅賓斯1988）。風景和語言時而合并成為圖像性的表達，例如，1659年出版的詹姆斯·豪維爾詞典的標題頁中，威爾士語被描繪為“神圣而野性的林間少女武士”（摩根1983：48）。但是，由于廢棄、禁止使用民族語（蓋爾語、威爾士語），英語長驅直入，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民族語終于衰落了。[[70]](#_70_40)

對地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致使記憶發生位移，這一情形就發生在蘇格蘭高地。通過規范地圖的命名就能掩埋過去，例如，1824—1836年間英國地形測量局對愛爾蘭進行地形測量時，就換掉了原有的蓋爾語地名。相反，地形測量局的勘測者為威爾士語地名的正確拼法而大費周章（哈里和沃爾特斯1982；轉引自羅賓斯1988）。當地的地名（包括那些英格蘭邊緣地區的地名）經常受到忽略或混淆（威爾伯福斯1779）。[[71]](#_71_40)個別情形下，會發生相反的涂改，例如詹姆斯黨人動亂期間深入蘇格蘭高地的軍用道路上的部分里程碑就被移走。軍用道路上這種逆涂改情況在愛爾蘭也很普遍，不過通常地圖的社會行為和權力更持久（哈里1992；皮克爾斯1992）。

風景中表示時間流逝的元素對如畫風景非常重要。廢墟和青苔或者常春藤覆蓋的建筑是令人憂郁的光陰似箭的提示。山區講述了一個（新近發現的）久遠的地質年表，對比之下，人類的生命周期就顯得微不足道。黎明和日落（即使透過一片玻璃看過去，它們也顯得如此絢麗）包含了個人能夠測量得出來的時間流逝，而任何一處廢墟、任何一座爬滿青苔的橋梁、任何一個風燭殘年的人、任何一條山脈都會激發人們的想象和感受。往日浮現，追憶過去，這就需要特定的、高度本地化的廢墟、橋梁、人物和山脈。注意力轉向仔細觀察風景（默多克1986），視覺藝術里的這一轉向與描寫特定地方的詩歌同步發生。這類詩歌是個人的地名記憶，是對個人內心疏離或異化的認知，詩人試圖通過確定自己在風景中的位置尋求庇護。定位的特性使人對暫時性的感受更加痛切，而這種定位記憶的痛切感說明記憶戰勝了時間。

英國浪漫主義運動和湖畔詩人

英國浪漫主義運動這個詞語在19世紀中期用來回指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的英國詩人。一個經典而一致的英國浪漫主義的形成是20世紀40年代的產物。不同時期的浪漫主義推出了各自界定的湖畔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騷塞，還有布萊克、拜倫、濟慈和雪萊。他們都是英國民族主義美學的倡導者，該美學由早期的詩人發展而來，如湯姆遜、申斯通和考珀。在20世紀最后的一二十年，人們對英國浪漫主義，尤其是其代表人物華茲華斯，進行了批判性的再審視（艾厄斯等1981；巴特勒1982，1988；路易1989；麥克甘1983），揭示出把素材與社會和經濟背景割裂開來的詩學位移（poetic displacement）和理想化的意識形態。

英國浪漫主義這一術語也用來指涉更寬泛的作品，涵蓋了18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的詩歌，其時地方主義備受推崇；18世紀90年代到1815年，地方風景依舊引領風騷，但是后革命的宗教正統已然侵入；1815年到1825年，當時的主調是削弱地方主義和民主主義。在這個更寬泛的時間范圍，英國浪漫主義“傾向于反對不列顛中央國家及其體制”，關注“階級、社會變化、自然宗教、地區和民族的驕傲以及世界革命”（巴特勒1988：37—41）。浪漫主義不是“一場單純的知識運動，而是對各種社會壓力……的綜合回應”（巴特勒1982：184），發軔于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艾厄斯等1981），其結果是

一種浪漫的情感結構得以產生：提倡自然、反對工業，提倡詩歌、反對貿易；人類與共同體隔絕進入文化理念之中，反對時代現實的社會壓力。我們可以確切地從布萊克、華茲華斯及雪萊的詩歌中聽見其反響。

（威廉斯1973：79）

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出版業規模的擴大以及隨著收費公路發展而改善的印刷品流通，這一切為地方上的中產階層以及鄉村紳士接觸到英國浪漫主義詩學和政治提供了保證。到18世紀末期，由于前半個世紀的本土鄉村或田園詩歌的影響，有閱讀和寫作能力的公眾對自然的欣賞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湖區作為穩定性的一種有力的文化象征更容易被人們接受。

詩歌，特別是游吟詩的反對聲音所顯示出來的重要性表達了一種深化中的意識，即詩人應該對其共同體并為其共同體說話。然而，基于倫敦的文化敘事在各個地方被模仿，本土/民族/自然（native/nation/nature）的共同體在圈地運動與城市化的雙重影響下已經分崩離析。到18世紀中期，英國詩人和作家正在經歷他們所描寫的文化的深刻危機。沮喪、瘋癲和自殺成為藝術—知識分子團體的標志（巴特勒1988；盧卡斯1990；紐曼1987），而在該世紀的后期詩歌繼續演繹著英國風景的賦值和仇外的雙重主題。

面對人與地方的分離，風景回應了對可以感受到的連續性的需求。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表現為一批據說是中世紀的詩歌和散文，頌揚了英國地方特色。但總的來說，詩人

從詹姆斯·湯姆遜（1700—1748），到托馬斯·格雷（1716—1771），再到威廉·布萊克（1752—1827）和威廉·華茲華斯（1775—1850），他們用弘揚地方主義的象征語言取代了“宮廷”或“倫敦”或德萊頓、蒲伯、斯威夫特和蓋伊的貴族話語……他們表達并進一步確立了足能代表一些紳士以及許多“中等類別”，特別是18世紀倫敦及各地的工商業界人士的態度。

（巴特勒1988：41）

湯姆遜的鄉村詩歌堪稱上述更寬泛時間范圍內的英國浪漫主義第一階段的生動范例。他的詩歌描寫了具有普遍意義的鄉村生活，有感于天下皆同的季節而發，表達了人皆有之的情緒。早期的湖區旅游者借用古典作家來提升他們所看到的景色。從18世紀40年代開始，由于湯姆遜的《四季》廣為傳播，本土文學在提供情感聯想方面變得日益重要。

與游吟詩不同的是，這類田園詩所描寫的鄉村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其實是偽造出來的。基于同樣的原因，詩中城市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也同樣與事實不符（盧卡斯1990；塞爾斯1983；威廉斯1973）。到18世紀末期，如畫風景美學推動了尋找如下地區的風景：

（在這些地區）尚無當代工業化、圈地運動和地產開發的痕跡，而且各種形式的田園牧歌情調都未被注意到，海峽對岸令人恐懼的“平均主義”影響無法波及……如畫風景旅游者愿意千里跋涉尋找一個“勞煩之中被人遺忘的世界”。

（安德魯斯1989：66）

鄉村或田園詩歌和雕版風景畫確認了如畫風景美學，而如畫風景又影響了湖畔詩人的早期作品。在被稱為“國內人類學”（貝維爾1989）的詩歌中，華茲華斯使我們看見湖區到處都是邊緣化的人們：瘸腿的士兵、瞎眼的乞丐、隱居者、瘋癲的婦女、吉普賽人、流浪漢，換言之，到處都是被早期農業和工業革命拋棄的流離失所的苦命人。[[72]](#_72_40)也許毫不奇怪的是，這些邊緣人構成特定種類人群的一部分，他們正在被中央政府規劃為后來頒布的《濟貧法》的基礎。華茲華斯

開始為那些聲音遭到拒聽的人奮筆疾呼。這類人不再被當作（通常從遠處）觀望沉思的對象——湯姆遜的抽象沉思就采取了這種拉開距離的技巧。他們變為主體：在說話，在體驗。不過后來，華茲華斯開始隱退，從他的詩歌語言和實際行為都可看出這一點。

（盧卡斯1990：6）

說到隱退，就來到了華茲華斯特指的隱退之地，他滿懷深情屢屢重返的“有限的處所”，詩人在那里探求對地方和安身之處的深度熟悉（克羅伯1975）。這就是為什么

布萊克的英格蘭圖景是解放的，具有悲劇性的真實，[而]華茲華斯的則越來越虛假。從位于湖區遠離城市的“自在”之地，或“棲居地”，他擺出為人類說話的姿態，特別是為英國人和英格蘭說話的姿態。這是田園詩終極的、極端保守的野心。

（盧卡斯1990：117）

正如前一章所講，比湖畔詩人大肆贊美湖區要早近半個世紀之前，湖區價值已被抬升。不過，始于如畫風景的美學有待于湖畔詩人賦予更多的民族情感。風景區居民是對其他人而言已逝的英格蘭美德的活榜樣：樸素、克制、節儉而獨立（埃弗雷特1994）。詩人筆下居住在一個山區共和國的政治家—農民及其家庭尤其如此（華茲華斯1835）。

對那個“山區共和國”中農業勞工的狀況進行問卷調查，結果卻是另一種故事（皇家委員會1834）。山中風景區獨立世外，成為道德和政治避難之地，這并非一種新觀點。18世紀的作家也是復興了一種早期的自我賦值的文學，如阿爾卑斯山民曾被描寫成具有“簡樸的健壯和自然的美德”的人物，并進一步被塑造成“大自然的原始民主主義者”（夏馬1996：479—480）。與連貫的過去這一意象相沖突的是毀滅的機制：農業、商業和工業領域的巨大變化急劇地改變了人與地方（波拉尼1944）。

借由繪畫、詩歌和小說藝術形式，英國浪漫主義者完成了對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的凱爾特邊區的凝視與整合。這種凝視在更接近家園的地方發揮作用，在湖區銘刻下英格蘭的一個特定圖景，使之成為一個想象性或不那么想象性的過去的存儲之地。這個過去保留著倫敦貿易/金融中心已經愉快地在中部地區出賣掉的核心價值。湖區被塑造成一個圖標、一扇窗戶，人們借此可以感知到一個更大的現實或真理，不管是上帝的還是英格蘭的——不過兩者并無必要彼此相異。這種上帝、英格蘭和湖區的混合也許在安·麥克貝思（1875—1948）的兩幅巨大的刺繡畫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她當時居住在湖區中部山地高處的佩特山谷。麥克貝思以當地人為模特，將哈索普山谷當作基督降生布道的場地。繡在好牧人基督肖像下面的是布萊克《耶路撒冷》一詩的樂譜，所配的詩句為：“在古代是否那些腳步/踏上英格蘭山區茵茵綠草？”

經由湖畔詩人及其圈內人的詩歌，特別是華茲華斯的《湖區指南》，湖區風景為更多的讀者所知。[[73]](#_73_40)湖區風景也在賞畫者中廣為流傳，在19世紀頭二十年內，職業水彩畫家開始對湖區趨之若鶩，他們的作品大量進入市場（比爾德1980；比克奈爾1987；比克奈爾和沃夫1982、1983；賴恩1986；塔特·加勒里1996）。英國民族身份的一個版本受到支持，它依據（真實或神話般的）過去，而抵制人們眼中共同體毀滅的現狀。湖區是可資聯想的風景，不是借用過來的和理想化的、意大利式南方大別墅的古典風景，也不是像丘園（Kew）、查爾斯·漢密爾頓位于薩里郡科巴姆的佩因斯希爾莊園（Painshill）那樣點綴著中國寶塔、橋梁或土耳其帳篷的“東方式”奇異風景。[[74]](#_74_40)毫無疑問，湖區與中部地區制造業中心已被毀損的風景形成最鮮明的對照。

19世紀初期，湖區人氣的增長以及相對臨近中部制造業中心的地理位置，把新的富人帶到湖區，不只是游客，還有全年或夏季的住客。氣派的別墅在中心地帶和偏僻的地方豎起，在這兩種地方可以盡覽湖光山色。[[75]](#_75_40)在《湖區指南》中，華茲華斯抱怨工業家粗制濫造的豪宅，顏色俗氣、位置扎眼，只是為了搶占風景，不像當地的古舊民居那樣隱入風景，不露痕跡。他還反對將鐵路修到湖區的提議，因為鐵路會招來大量一日游的旅客和工人階級。

民族風景與精英判斷珠聯璧合……華茲華斯這個看法令人難以忘懷。他將湖區稱為“一種國家財產，在這里每個具有感受眼光的人都有權利和興趣”，但是這種眼光只能逐漸形成，在趣味得以培養的環境之中形成。早先華茲華斯尋求為游客（當時也就是幾個紳士）保護湖區，現在卻要保護它們免受游客的入侵（他把游客到處亂竄的行為比作“孩子割開他的小鼓以了解聲音從何而來”）。

（羅溫薩1991：219）

在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帶來的英格蘭空間重構的影響下，湖區一直是沒有得到利用的空間或作用消極的空間，在下面的章節中被當作是未曾得到考證的資本主義動態的表現。一種新型的、史無前例的價值觀匯聚到這一空間，其價值由于知識分子和藝術精英的闡發而不斷升值，就因為它不同于資本的新集中（在城市）。盡管一種趨同的英國民族身份說法圍繞湖區展開，將其作為“一種國家財產”，但吊詭的是，競爭隨介入風景而起，引起了階級的文化分化。

結語

本章開篇引詩——布萊克和華茲華斯各自的倫敦之詩表達了這一時期以城市為中心的緊張和焦慮，與英國山區，特別是湖區的賦值形成絕對反差。華茲華斯站在一個低矮但還是拉開距離的“主持臺”上，審視倫敦的圣巴塞羅繆集市的“本土文化”。《序曲》第二章以赫爾維林的峰頂開篇，從這個超拔的高度，詩人向下凝視位于低低山谷的一個鄉村集市，富有感情地思索著聚集在那兒的人們的自然共同體。吊詭的是，在此高度并非分離，因為在此存在著人與地方的恰當關系，我們應該記得民族、本土、自然系出同根。

J.M.W.透納1798年的一幅展出畫《科尼斯頓丘原的早晨》里，詩歌、繪畫、民族、自然和湖區風景融為一體，按照傳統的垂直版式制作——使人聯想到祭壇畫，該畫配有彌爾頓的詩行：

……霧氣與水汽呀，汝等方升騰

自山中或湖泊，朦朦朧，混濁濁

直到太陽將你的柔裙染成金，

要為禮敬這世界偉大的作者而興。

（彌爾頓《失樂園》第五章，第185—188行）

而四處環繞著商業制造出來的霧靄與蒸汽，制造業城市及其居民只能對這種景色起污染作用。想到鐵路必然會把“一撥撥愚蠢的現代游客”帶進湖區，約翰·羅斯金（全國知名的藝術批評家和工人教育的領軍人物）也認識到“工程師和承包商必須維持生存”，但是，他祈求他們也許可以生存得“更有用和更有尊嚴，遠非在赫爾維林山下維持老巴塞羅繆集市運轉”（羅斯金1876：4—6）。

在倫敦、中部地區制造業城市及帝國的貿易中心，巴赫金式的多重詭態的身體隨處可見。文雅社會只得前往高地尋求避難。湖區已經成為英格蘭的象征，從其19世紀初期在國外“被發現”這一事實可以略見一斑。下面的論點涉及塔斯馬尼亞，但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風景中也可看到湖區：

紐敦周邊的景色是我在地球這一邊看到的最美麗的景色——很像坎伯蘭郡湖泊：寬廣蜿蜒的德文特湖水在崇高而如畫的山巒間流著……似乎回到地球正常的那一邊。

（梅瑞狄斯1852；轉引自史密斯1985：291）

湖區作為文化范例的進一步證據是：湖區的如畫風景美學被用來描述錫蘭（斯里蘭卡）中部山區的一個山谷城市康堤（Kandy）的風景。1795年被英國武力占領之后，根據1802年和1815年的英國條約，錫蘭被吞并。盡管植被不同，兩處風景“讀”起來是一樣的，查爾斯·哈密爾頓·史密斯陸軍中校就是這么看的（見彩圖5和6）。

康堤的坡向和地形[使得]它可能被創造成家鄉風景的復制品……康堤被設計成工業革命前的英格蘭的浪漫意象。英國湖區的風景模式強加給山區和康堤湖泊，以再造一個地方，在此英國淑女和紳士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擺脫熱帶地區和當地文化，象征性地回到故園。

（鄧肯1989：192）

圍著新近命名的維多利亞湖修起散步場所、馬車道以及騎馬小路，效仿湖區建起觀景點以便欣賞如畫風景，清除叢林中有礙視域之物以便使人一下縱覽城鎮、湖泊及群山的景色。結果是

在康堤，無論是否愿意，你的心靈都會被帶回到英格蘭的湖區。你會發現一種安寧靜謐之美，擺脫了壓力和競爭……大自然與其領主之間普遍的和睦，令人想起格拉斯米爾、溫德米爾湖、德文特湖流域以及這些地區的靈魂——騷塞、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其他坎伯蘭郡的不朽人物。

（赫斯特1890；轉引自鄧肯1989：194）

同時，文雅社會創造了一種新的人群。這個人群“無所不在，出現在藝術和其他記載中……他們不是倫敦街上那類陌生人，更不是具有威脅性的暴民，而是一屋子彼此相識或似曾相識的熟人，在舞會或宴會上碰面”（巴特勒1982：25）。他們幾乎算得上充溢著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誠如簡·奧斯丁引導我們了解的那類人群。布萊克的“心靈鑄造的鎖鏈”不是哪一個階層的專有領域，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沒有哪個階層可以自動擺脫“已被法律、習俗和偏見造就的心靈”（巴特勒1988：57）的奴役。經由如畫風景美學和早期英國浪漫主義，湖區被改造成時尚之地。有一段時間，湖區成為一個階級逃避另一個階級的隱退之地。美學的、認知的和道德的標準掩飾了階級間的對抗，正如風景的代表性掩蓋了政治代表性的爭議（赫爾辛格1994）。如果湖區的的確確如華茲華斯所聲稱的是“一種國家財產”，那么誰是欣賞風景的恰當人選，誰又值得納入國家之內？

# 第二部分 政治性的風景

第一部分提出了哪些人值得納入民族范圍，尤其（但并非僅僅）在涉及充滿民族意義的風景時。第二部分則考證作為個體、階級的一部分、民族的一部分的人們如何體驗并挑戰關于排斥和接納的標準，關注社會演員的能動性以及政治代表權與風景進入權之間的緊密聯系，觀察開闊的風景如何成為抗議和爭辯的場所（關鍵性神話圍繞這些場所得以演進），以及（在某些情形下）他者性質如何得到視覺再現。

過去150年的風景保護和公共路權立法史以及進入風景和道路的努力，與更深層的農業資本主義歷史密切關聯。通過觀察物質基礎之上的權力關系，特別是植根于土地的歸屬神話，這一部分分析了階級與民族認同、宗教與休閑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與鄉村的對抗關系。空間組織被視為階級關系的反映。激進分子和憲章派、非國教徒、土地主、偷獵者、改革家和工人階級漫游者，都是出現在第二部分的社會演員。他們在特定時刻及特定運動中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采取的行動，無論是政治行動、社會改革還是保護和進入（風景）的行動，都是歷史、事件和情感，構成了一個本應客觀的立法史的多樣性背景。

## 四 進入權政治

英國民族的格言就是“排他”。我們的幸福和驕傲就維系于茲。

威廉·哈茲利特

《鄉村游吟詩人》

曾有曲徑通向自然幽處，

曾有小路旋入每道山谷——

圈地來了，界樁隔斷通途；

每個暴君釘下標牌：私人領地

暗示他人不得擅自進入……

約翰·克萊爾

《地上天堂》

忘記六個郡濃煙滾滾，

忘記蒸汽噴涌，活塞擊打，

忘記丑陋的小鎮不斷擴大……

威廉·莫里斯

《國民托管組織1903—1904年度報告》

以謝菲爾德的一個勞動婦女為例，可以看出居住在大城鎮的人們如何珍惜自然之美。在寄出一張小額郵政匯票時，她說起在謝菲爾德一家工廠工作了30年后，她最大的快樂就是到高沼地度假，因為她在那兒感到心曠神怡。她希望有一天能去更遠的地方，諸如烏斯湖和德文特湖（它們都在湖區）。

引自馬希1982：58—59

……浪漫主義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也在同時進行，但路徑全然分離。威廉·布萊克之后，沒有一個人同時了解這兩種抵牾的文化，也沒有一個天才能在這兩種傳統之間做互相解釋。只有一個頭腦糊涂的歐文斯先生主動揭示了“新的道德世界”，而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則躲進他們自己去魅化的堡壘里。因此這些年時時出現的似乎不是革命的挑戰而是抵制運動，參與其中的浪漫主義者和激進的手藝人都反對貪婪之人（Acquisitive Man）的宣告。當兩種傳統未能對接時，某些東西就會失去。失去多少我們不能確定，因為在那些失去某些東西的人之中就有我們。

E.P.湯普森1966：832

引言

如同其他物質結構一樣，風景也是在意識形態的語境中被創造，被毀滅。因此，恢復與特定地方相關的意識形態的歷史，是理解風景的基礎。事件與觀念之間的關系的確可以得到透徹的研究，從而使風景像物質結構一樣清晰可見。本章將討論從18世紀末到二戰爆發這一期間英格蘭風景（特別是峰區）進入權如何根植于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第五章將重拾與湖區相關的線索。每一章的討論都有連接線引向民族建設的社會政治領域并收回，同時考證了工業化時期的各種緊張關系——它們與當時各種關于民族“過去是”，“已經是”，“應該是”什么樣的爭議交響在一起。這一資料還將引入制造業城鎮人口重新移入鄉村的話題。

這兩章的重點是通過考證歷史上階級與民族身份相互作用背景之下的本地特殊性，闡述進入敞地的政治。盡管在湖區和峰區，對自然的社會性使用情形有異，但一個地區發生的事情對另一個地區的發展卻會產生直接和間接的相互影響：每個地區的事件引發形成有關進入權的輿論氛圍，具有強烈的政治寓意。

靜止和運動之間的多級互相作用糾結在一起，構成了進入風景的政治。靜止和運動兼具表面的和比喻性的意義，成為波動模式的兩極，波動在社會和地理的層面上、在分散的和總體的時間框架中進行。根據任何一組給定的特殊性，國家可通過法律隱晦或公開地支持或反對靜止和運動。在日常生活中，根據某時某地的社會的、地理的和歷史的迫切性，人們采取或不采取行動，國家干預或缺少干預，都能引起進入權斗爭中的立場轉換。

進入和穿越英國風景區的行動只是考察那種斗爭的一種方式。透過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觀察到更大范圍的支配、兼并、競爭的問題。不管什么時候圈地的柵欄被拆毀，從城市周圍的公用地傳來挑戰政府當局的聲音，工人階級游客在湖邊享用瓶裝啤酒，德比郡松雞棲息的沼澤地受到無業游民的侵擾——這就是各類被剝奪者采取的行動。這一切都打上了階級差別的印記，表明誰是“文明人”，誰不是“文明人”；誰有“文化”，誰沒有“文化”。排他的地理正好位于社會地位和地理空間的交叉點上。

不同版本英格蘭的爭議滲入了公用地風景享用方面的文化差異。實際上，公用地進入權成為兩種英格蘭的主要差別。一種版本是發展中的政治經濟建構，等同于不列顛；另一版本是諾曼征服前神話一般的盎格魯—撒克遜英格蘭。公用地的古老性不僅標志著早期不列顛的一種前莊園制，而且證明和聯接了馮·毛雷爾、亨利·梅因爵士、西博姆等人提出的理論：“現存的公用地權利是一種集體擁有土地體制的遺留……盛行于早期的共同體，其存在可追溯至歐洲大部分地區”（埃弗斯利1910：5）。這種證明和聯系又轉過來支持了法律論戰及議會保護少數幸存公用地的決策。[[76]](#_76_40)

表面上看，論戰所涉及的要害問題是定位于風景之中的美學民族主義，它后來或許成了一種關于鄉村的世俗宗教，恰當地托名于國民托管組織。在更深的層面，政治、宗教和休閑互相關聯，構成不僅僅是進入風景之爭的要素。1832年、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四項改革法案強化這種“不僅僅是風景”的主題，這些修改法案擴大了選舉權，給天主教和不信國教的新教徒帶來政治的解放。

下面6個選擇性的而非詳盡的列表，構成了一個參照點，由此將本章及接下來的兩章的各類線索串聯起來。它們顯示了（1）路權立法；（2）早期的人行道保護協會和徒步漫游組織；（3）與保護和進入風景相關的組織；（4）1837—1925年與公用地、荒地、開闊風景及其圈地與反圈地相關的議案和法案；（5）與進入山區和鄉村相關的法案、法令和議會委員會報告；（6）與國家公園、鄉村進入權和管理相關的法令、議會委員會和委員會報告。

#### 1.路權立法

1815　關閉不必要道路的法案

1833　公共人行道特別委員會（記錄休閑空間缺乏的現狀）

1834　酗酒特別委員會（酗酒與1833年委員會之間的關系）

1835　通用公路法案（有效廢除了1815年法案）

1933　路權法案（新法案剔除了“無限使用”的標準，確定以20年的連續使用為標準，簡化了人行道的“證明”）

1990　路權法案，由根茲伯羅和霍恩堡的下院議員愛德華·雷提交（涉及農場主承擔的人行道和支路的義務）

#### 2.早期的人行道和徒步機構

1824　約克古人行道保護協會

1826　曼徹斯特古人行道保護協會

1856　凱西克地區人行道保護協會（湖區）

1856　伯恩利人行道委員會

1866　普雷斯頓人行道協會

1866　卡爾·希爾道路保護委員會（納爾遜，蘭開夏郡）

1866　班克托普人行道協會（布萊克本）

1876　海菲爾德和金德斯考特古人行道協會（峰區）

1880　曼徹斯特青年基督教協會漫游俱樂部

1884　森林漫游者俱樂部（倫敦）

1890年代　利物浦鄉下人

1894　布萊克本地區古人行道協會

1894　峰區和北部鄉村人行道保護協會

1894　中部地區漫游者協會

1897　合作假日協會

1900　謝菲爾德號角漫游者

#### 3.保護與進入風景的組織

1865　公用地、敞地與人行道保護協會

1883　湖區保護協會

1884　全國人行道保護協會（1899年與公用地、敞地及人行道維護協會合并）

1895　全國名勝古跡托管組織（1907年成為法定團體）

1905　漫游俱樂部聯盟（倫敦）

1922　曼徹斯特地區漫游俱樂部聯盟

1926　謝菲爾德地區漫游俱樂部聯盟

1926　英格蘭鄉村保存委員會（1969年更名為英格蘭鄉村保護委員會）

1930　青年旅社協會

1931　全國漫游俱樂部聯盟委員會

1934　湖區之友

1935　漫游者協會

#### 4.公用地：圈地與保護

1837　圈地法案—公共休閑地規定，由米德爾塞克斯郡下院議員約瑟夫·休姆提交

1845　圈地總法案（圈地方案的監督由議會委員會移交給獨立專員負責的當地咨詢機構，他們有權但不是必須在公用地或荒地已被圈封的地方留出休閑用地）

1865，1871，1876，及1880—1890期間的每一年，都有廢除《默頓法案》的議案或修訂議案提出（被否決）

1887　瑟米爾法案（為專責委員會開了先例，準許其對風景保護議題舉行聽證會，這就意味著各方有關人士，而非僅僅只是受到影響的土地主，都可以提交證據）

1887　謄本保有法（Copyhold Act，由上議院提交，該法案使新的荒地或公用地謄本保有的許可權從教區委員會移交給土地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后來更名為農業部）

1893　公用地修訂法案（要求農業部審查許可任何依據默頓法案實行的圈地行為，指明農業部要確定這類圈地有益于公眾）

1894　謄本保有法（進一步加強了承租人對經登記的土地上公用地的權利）

1925　財產法（使位于城區的公用地成為公眾領地）

#### 5.進入山區和鄉村

1882　空地法案，梅德斯通的下院議員約翰·盧伯克提交

1884，1888，1892　山區進入權（蘇格蘭）提案，南阿伯丁下院議員詹姆斯·布賴斯提交（被否決）

1900，1906，1908　山區進入權（蘇格蘭）提案，英維尼斯自治市下院議員安南·布賴斯提交（被否決）

1908　山區進入權（英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提案，埃蘭德、西里德因的下院議員查爾斯·特里維廉提交（被否決）

1920—1930　五個山區進入權議案，多位下院議員提交（被否決）

1931　山區進入權提案，東米德爾斯的下院議員艾倫·威爾金森提交（被否決，威爾金森后來擔任賈羅的下院議員，領導了賈羅的請愿游行）

1937　山區進入權提案，東伍爾弗漢普頓的下院議員杰弗里·曼德提交（被否決）

1938　山區進入權提案，西普利的下院議員克里奇·瓊斯提交（被否決）

1939　山區進入權法案（從未實施）

1949　國家公園與鄉村進入權法案

1983　擴大鄉村進入權法案，班伯里的下院議員托尼·鮑德里提交（被否決，1975—1985年間每年提交而均未通過的進入權議案之一）

1994　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第70、71條

1996　鄉村進入權提案，舍伍德的下院議員帕迪·蒂平提交（被否決）

1999　議會開幕典禮上的女王演講提出一項允許漫游者在空曠鄉村漫游的動議，要建立兩個新的國家公園，引入更多的野生動物保護措施

#### 6.國家公園

1929　政府成立國家公園委員會

1931　艾迪生委員會《國家公園委員會報告》

1935　CPRE成立國家公園的常務委員會

1942　斯科特委員報告《鄉村地區的土地使用》

1945　道爾委員報告《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

1945　工黨政府成立了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委員會，亞瑟·霍布豪斯爵士任主席

1947　霍布豪斯委員會《（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委員會報告》

1947　霍布豪斯委員會，進入權小組委員會報告《人行道與鄉村進入權》

1947　霍布豪斯委員會，野生動物特別保護委員會報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自然保護》

1947　城鄉規劃法案

1949　國家公園和鄉村進入權法案

1951　湖區、峰區、達特穆爾和斯諾登尼亞國家公園選定

1952　彭布羅克郡海岸、北約克高沼國家公園選定

1954　埃克斯穆爾、約克郡溪谷國家公園選定

1956　諾森伯蘭郡國家公園選定

1957　布雷肯山國家公園選定

1968　鄉村法案

1974　桑福德委員會報告《國家公園政策掠覽》

1981　野生動物和鄉村法案

1991　鄉村管護計劃

非道德/道德經濟

《默頓法案》（1235）和《威斯敏斯特第二法案》（1285）確認圈用莊園荒地的權利神圣不可侵犯。它們規定圈地的莊園主必須預留足夠的公用地和荒地，允許他人進入，確保自由佃農的進入權。如果幾個莊園相互接壤，那么所有莊園的自由佃農進入權都應予以保護。法律沒有規定保護農奴（或后來的copyhold tenant，謄本佃農）及非謄本佃農使用公用地或荒地的權利。圈用公用地和荒地，取締了人們采集木柴的權利、割草的權利、放牧權或捕魚權。所有這些權利曾為農業勞工及其家庭在不穩定的季節性營生中提供了一點點生存安全感。

（莊園主）對這些法律章程做出了更寬松的解讀，由此推進的圈地運動在15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達到高峰。羊毛價格不斷上升，加快了圈用荒地的速度，大量可耕地被改成有利可圖的牧場。16世紀中期，由于谷物價格的上漲和羊毛價格的下降，圈地勢頭銳減。16世紀末期人口增長及羊毛價格回升再一次推動了圈地運動的發展。顧忌到暴動和武裝叛亂的政治壓力，在1517、1548、1566、1607、1630、1632和1635年都先后設立過皇家咨詢調查委員會，來確定耕地改成牧場的數量。皇家頒布公告反對圈地，議會則立法反對耕地改成牧場，甚至限定了每人可以擁有的羊只數量（康托爾1987；塔特和特納1978；沃狄1983）。但是圈地運動仍然勢不可擋，使得許多人流離失所，少數人暴富。

對穿越英國風景區運動的控制，其背后的深層根源來自于規約地域上和社會上流動性的價值觀。[[77]](#_77_40)與地方認同是這種價值觀的中心內容，其核心理念則是洛克關于私有財產起源的勞動理論。土地主階級的道德經濟與高度發展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密切關聯，后者的需求迫使無地者為工資而干活，帶來了社會與家庭關系的深刻變化（羅斯伯里1991；威廉斯1973）。與這種深刻的非道德/道德經濟形成反差的是一種原始共產主義，其理想最初由14世紀農民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表達出來，后來則表現在17世紀政治激進分子如掘地派和平等派身上（希爾1992；威廉斯1973）。[[78]](#_78_40)

穩定性與禁止流動不是絕對的。在創造雇傭勞動制度的同時，早期農業資本主義還建立了游民和被剝奪者的范疇。吊詭的是，對流動的控制推動了流動性。為了減少濟貧稅的負擔，一個教區會把圈地受害者驅逐到別的教區，這時，最無助的受害者也就被迫接受了流動的生活方式。在英格蘭，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里，可以看見到處都有緩慢流動的人們，來自蘇格蘭高地、英格蘭北部和威爾士的牛群供養了中部和南部的城鎮。幾百年來，趕牧人驅趕著哞哞叫喚的牛群沿著綠色通道走著，要到19世紀，鐵路上的冷藏貨車才把冰凍的動物尸體運往市場。由于趕牧人具有實際經驗，他們的證詞有時會被用于路權的爭論之中。補鍋匠、吉普賽人和游商行販也一年一度地緩慢穿越鄉村，而成群結隊的采果人從威爾士北部徒步走到英格蘭的西南地區和東南地區采摘。

在農業科學的影響下，新一輪的農業剝奪在18世紀初期開始逐漸產生。隨著議會圈地法案的頒布開始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和價值重估——這一法案影響近乎21%的英格蘭土地面積，造成悲慘的局面。四分之三的圈地法案都集中在兩個時期通過，即1760年代—1770年代和1790年代—1800年代（特納1980）。由于圈地，所有的租約被宣告無效，農業土地租金普遍上漲了兩倍，這一現象既反映出對生產力提高的預期，也說明了收入從佃農轉向土地主。

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沒有被剝奪的人們也遭受了空間錯位。清空村莊和圈用田野抹去了曾是地方標記的縱橫交錯的傳統人行道。圈地也意味著敞地的損失，人們通常在敞地趕集、聆聽布道、參加政治集會或舉行運動賽事。這些活動并非各不相干，一場足球比賽有時就是聚集足夠的人手去搗毀新的圈地柵欄的前奏。作為回應，一些協會成立起來，如抵制共和派及平等派、保護自由與財產協會（巴克西德爾1993），這個名稱蘊含了早些時代的焦慮。

異見者類別與異見的威脅

統一的不列顛的表象被源于非道德/道德經濟行為的緊張關系擾亂，不列顛凱爾特邊區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異見者反奴隸制的演講和抗議國內工資奴隸制的呼聲，以及激進派與憲章派的在野黨活動都產生影響。異見者另類的道德和知識文化，也即與激進主張密切相連的文化進一步擾亂了完美的不列顛感覺。

18世紀70年代出現的激進派的表達瞄準了“舊的腐敗”：互相勾結的貴族、土地主、國教教會和對議會的聯合控制。改革憲法的激進要求體現在1838年5月出版的《人民憲章》一文里。《人民憲章》主張所有成年男性擁有選舉權、保護投票、廢除議會議員財產條件、設立平等的選區、議會每年改選一次（D.湯普森1984）。

憲章運動的社會原因源于對政治的不滿。憲章運動不僅表達了郁郁不平的社會群體的憤怒和失望，也傳達了“另外一種道路的實際希望和實現它的可信方式”（斯蒂德曼·瓊斯1983：96）。這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組織，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的條件靈活變通，依據各種利益訴求相機而動。工業革命前的工匠群體（如手搖紡織機織工）或工廠的雇傭工人的加入，使得憲章運動內部形成了地區差異。例如在中部地區憲章運動格外強勢，但是該地區形形色色的特殊主義也導致激進的交鋒時而高漲，時而低落（加狄恩1986）。

從18世紀末期開始，工業資本主義吸引了大量來自英國鄉村的移民，他們滿懷希望或絕望地涌進新的城鎮成為工廠或紡織廠工人，進入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從事服務，或使失業大軍膨脹、不可受雇者或罪犯構成的下層階級數量激增。同時，倫敦人口在1821年至1841年間增長了20%，伯明翰、利茲、曼徹斯特及謝菲爾德的人口增長超過了40%，布拉德福則增長了65%（威廉斯1973：152）。無論他們的社會經濟歸宿如何，19世紀初期生活在工業城鎮的多數人都思念鄉村生活。英國的國內移民率才是城市迅速擴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于增長的或穩定的出生率。由于生活環境不衛生和擁擠不堪，兒童死亡率很高（伯內特1979；卡特和劉易斯1990）。[[79]](#_79_40)

與有產者密切相關的倫敦文化在外省傳播。然而，還存在著與此對立的另一種社會文化生活，各類派別的非國教徒通過這種生活獲得成功。在中部和北部的制造業城市，唯一神教派和貴格派信徒不僅成為社會、商業和科學界的精英，而且也深度參與了當地盛行的激進行為。“浸淫于‘理性主義，宗教狂’、功利主義和激進主義組合成的一種相干模式”（皮爾1971：54），長老會教徒、貴格派教徒、公理會教徒、衛理公會教徒、浸禮會教徒、唯一神教徒、福音會者及其他非國教派群體共同建構了一種他者文化。通過他們的大學、科學和文學團體、學術聚會和非正式聚餐、激進通訊協會、技工學校和激進的報社，還有商業網絡如貴格派銀行家、鐵器制造商和瓷器制造商網絡，這種文化得以表達出來。然而，正如約西安·韋奇伍德悲嘆的那樣，令人痛苦的是商業成功往往取決于“倫敦”文化品味是否接受（楊格1995）。

人道主義的改革運動、反奴隸制的立場、“對自由事業與被壓迫的種族予以同情”（皮爾1971：76），是異見文化的情感結構的標志。它不是一種意義單一的文化，而是存在著地域性、政治訴求和宗教訴求特殊性差異的文化。它不僅限于外省，也可以在“內部”運作：托馬斯·霍奇金，蓋伊醫院的一個貴格派內科醫生，是1843年成立倫敦民族志協會的核心人物。該協會大部分文物收藏家和語言研究者是非國教徒（特別是貴格派教徒），雖然協會里的自然科學家沒有正規的宗教信仰傾向（范庫倫1982）。

各地的文化表達參差多樣，無論是激進派的還是異見者的，最終還是被首都的觀點所壓倒。鐵路交通使激進派演講者可以與議會保持聯絡，更快捷地奔走各地，卻也使外省對倫敦的挑戰更容易被顛覆。1831年在約克成立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代表了省級科學文化壓倒和反對都會及古老大學文化的呼聲”（魯德維克1985：30）。非國教信徒踴躍參加各省區城市舉行的協會年會，但這些會議最終充斥著劍橋和倫敦演講者——他們乘坐火車就能輕易抵達外地演講。

這種立足外省的異見文化的一個政治性表現，就是全面普選聯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由貴格派谷物商、鐵路系統推進者、慈善家兼廢奴主義者約瑟夫·斯特基于1842年在伯明翰創建。該聯盟得到了各類非國教神職人員的支持，在諸如伯明翰、諾丁漢、萊斯特和德比這樣的城市里表現得最為踴躍，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就擔任過名譽秘書。斯賓塞論社會進化的文章刊登在愛德華·梅爾的《非國教徒》（The Noncomformist）上，這是伯明翰的一家報紙，同時登載聯盟的文章，旨在調解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關系。

“社會學之父”斯賓塞，出生在一個衛理公會的家庭。在他身上體現了對排斥非國教徒的體系的排斥。他“對諸如大學、教堂、傳統和當地共同體這類社會創造的古老東西幾無感情，而它們卻是大多數19世紀英國工業主義批評者的情感支撐”（皮爾1971：212）。斯賓塞為工業主義的勃勃生機和改革創新歡欣鼓舞——它們給許多非國教徒提供了科學與商業解放的渠道。同時他也痛斥工業主義給“金融奸計”及“投機和貪婪”（斯賓塞1855：9—10），特別是給土地主階層可乘之機。

斯賓塞厭惡地主階級中的某些成分，但他的自傳卻充分表明他熱愛土地主所擁有的和控制的東西，熱愛英國倫敦周圍諸郡的農田或人煙較少的高地。周日在泰晤士山谷或肯特郡長時間漫游，在德比郡周邊徒步，或在朋友的鄉村別墅如約翰·拉伯克爵士和霍頓爵士的別墅里漫步，是工作后的短暫休息。雖然他抱怨潮濕的房間、沉悶的安息日及“凱爾特人的懶惰”（斯賓塞1904第二卷：94），在蘇格蘭高地、湖區和威爾士的假日漫游卻滿足了他對山區景色的向往。這些地區深深影響了他的風景趣味，甚至在“山脈和湖泊壯麗景色”環繞著的阿爾卑斯山，他也發現“瑞士……要比蘇格蘭遜色得多”（斯賓塞1904第一卷：498—499）。1862年的一次假日他在蘇格蘭高地獨自漫游時迷路了，由此他哀嘆地圖的質量，感受到“導游手冊編輯者和出版商所要承擔的重大責任”（斯賓塞1904第二卷：90—91）。

有關階級協調的文章是斯賓塞介入全面普選聯盟的橋梁。“階級”作為一個指涉社會階層的詞，在18世紀40年代首次出現（皮爾1971）。18世紀90年代用得更為普遍，到19世紀30—40年代則被廣泛使用。無論它的含義如何被接納、爭論、利用或建構，顯而易見，“階級”一詞轉向普遍應用，是與“社會”[[80]](#_80_38)所負載的國家責任之義得到不斷強化的過程同時發生。也許，社會學領域的出現及其規律、規則和體系方法不僅有助于把社會“客體化”，也有助于把一種階級體制“客體化”。無論如何，社會分層與工業主義之間的政治—道德關系被一些學者視為

肇始于外省中產階級，特別是非國教徒的社會經驗，他們把自己與擁有土地的紳士和貴族對立比照。階級意味著流動性，地域上和社會上的流動性，反對等級、秩序和產業象征的穩定性；階級更多指涉的是職業或角色而非地位；一個人憑借行動而非血統獲得自身的階級屬性。

（皮爾1971：60）

按這種理想化的階級觀，階級遂以“橫向的政治團結替代了服從、忠誠和庇護制的聯盟……階級之間因縱向的對抗而彼此分離”（皮爾1971：62）。這些階層并沒有擺脫分歧。甚至憲章運動內部也是“充滿裂隙”、一片混亂（斯特德曼·瓊斯1997：171）。

總體而言，服從、忠誠和庇護制仍是有權支配本地民兵的太平紳士（Justices of Peace）管理本地社會日常運作的方式。顛覆這種方式就意味著“創造一種連結各個地方的全民性政治，挑戰這些本地政治組織”（索撒爾1996：178）。在這種政治空間化中，特別有意思的是菲爾格思·奧康納的行程。1838年和1839年間，奧康納頻繁出現在倫敦、中部地區、北方和蘇格蘭高地的城鎮，多達147次。在1839年的圣神降臨周（Whit Week），他先在約克郡的皮普·格林的一個群眾集會（號稱有50萬與會者）上演講，后來在伯明翰激進派組織的第二個會議上發言，又在奧海姆[[81]](#_81_38)附近的科薩爾高沼地舉行的第三個群眾集會上露面。這些會議的廣告敦促“離集會場所只有一天步行距離或20英里之內的所有男女老少”都參加會議。廣告的“口號”是“到沼地去！到沼地去！！到沼地去！！！”（索撒爾1996：81）。

做工的窮人在高度地方化的社會里顯得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集的人數以千計或數以萬計，他們就形成了“具有道德力量的龐大群體……能夠經過培訓去達成現實的目的”（奧康納1839；轉引自索撒爾1996：180—181）。在發表于《北極星》的演講中，奧康納把這些會議比作鏈條之環。通過在各地的演講，“這些環節環環相扣。倫敦、紐卡斯爾、卡萊爾、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現在被鑄成一體”（《北極星》1838；轉引自索撒爾1996：81）。奧康納打造的巨鏈塑造了一場社會運動，抵制并挑戰了當權者認定的總體計劃——“鑄造不列顛”。

排他的地理

正如空間在鄉村被侵占一樣，時間在新興的、過度擁擠的、陰暗的、不衛生的制造業城鎮也被盜用。人們白天行走的范圍縮小到工廠哨聲或鈴聲已圈定或正在圈定的半徑范圍。想想看一周工作70小時或更長時間，城內又無露天的休閑空間（貝利1978；布萊克塞爾1982；赫恩1978；里德和威爾斯1990；沃爾文1978）；在這種情形下，鄰近鄉村依然保存的任何公用地使用權或古老道路通行權，就成為重要的實有性資源或象征性資源。1833年，議會公共步行道特別委員會得出結論說，露天空間的缺乏導致“低等階層[追求]低級的、傷風敗俗的娛樂”（坎寧安1980：92）。改革者將進入休閑風景區與社會改革聯系在一起。[[82]](#_82_38)

關閉人行道、圈用公用地和荒地、兼并或圈用曠野致使公眾缺乏露天空間。在城鎮，專為上流社會使用的娛樂花園占用了以前的敞地。1834年，埃德溫·查德威克在議會酗酒特別委員會上的演講中提到：

在鄉村，以及在一些城鎮的郊區，我聽到人們強烈抗議終止公眾使用人行道和古道的權利。大規模任意圈用從前的公用活動場地的結果，就是把勞動階層驅趕到酒吧。

（查德威克1834；轉引自坎寧安1980：81）

1837年，激進的改革家約瑟夫·休姆提議：

在所有圈地議案中，應該規定留出足夠的公共空間，用于周邊居民的鍛煉和休閑；假如委員會[圈地]議案里沒有這條強制性規定，他們需要專門向議會呈交報告說明其不遵守議會條款的理由。

（漢薩德1837：c.162）

羅伯特·皮爾爵士將休姆議案中的“工業城鎮的周邊居民”擴展到城鎮和鄉村的所有人口，即“那些愿意從事運動和高強度鍛煉的人，盡管他們沒有[休閑空間]的法律所有權，但他們擁有進入那里的道德權利”（漢薩德1837：c.162）。皮爾建議中央政府和地區當局提供等量的資金確保在圈用的地區留出公共空間（漢薩德1837：c.163—164）。

還有一些更激進的土地改革方案。菲爾格思·奧康納于1845年組建的憲章土地公司就打算

把足夠的空間歸還給人民，使他們享有選舉權。該公司很快就有7萬名支持者，擁有60個分部，持有9萬英鎊的股份。到1847年，在諸如名為“憲章村”和“奧康納村”的定居點，經過投票選舉出600個農民……在議會對其活動做過調查之后，1851年該公司被清算，資產被出售。

（里德1991：19）

土地憲章派（Land Chartism），繼承了掘地派和平等派的衣缽，強烈要求給所有勞動者分配小塊土地，種植糧食作物——其實就是改頭換面的公用地（馬希1982；威廉斯1973）。當然，這個提議忽視了這一點：使貧窮的勞動者成為自給自足者，也就等于資助了低勞酬制度。1842年“貧窮勞動者（小土地分配）特別委員會”所擔心的，卻是給勞動者分配土地可能成為“忽略他平常的有償勞動的誘因”（里德1991：19）。

進入公用地充滿了政治含義。處境悲慘的工廠工人以及與他們同樣悲慘的農業勞工（盡管二者結構不同）聯合成一種影響巨大的力量。激進的請愿示威和威脅性的游行，其目標就是獲得對于民眾立憲權和權利憲章的支持。這些示威不過是對一個保守政府的抵制的最新表現，這種抵制可以上溯到英國歷史上13世紀的農民叛亂。[[83]](#_83_38)進入公共空間（通常是城市周圍的公用地）的爭議在1795年后達到高潮。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工在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時，又被當地的規定和內部規章排除在可供他們發泄政治怨氣的公共空間之外，警察和國民軍強化了有關的司法規定。對農業勞工而言，壓制性的懲罰體現在工作和住房方面。給他們居住的宿舍盡管擁擠，但只有受雇之后才可以得到。

工人階級的男女激進分子和憲章運動者，深受托馬斯·潘恩的共和主義影響，汲取了法國革命的教訓，聚集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空間。他們在開闊的高沼地和公用地舉行大型集會，抗議政府的政策或抗議引進替代手工的機器，這類集會具有集市和狂歡節的特性。在群眾集會上，抗議者舉著旗幟，戴著紅色貝雷帽或“自由之帽”。這些旗幟和帽子通常由婦女制作，她們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婦女在集會上發表演講，沖在鼓動宣傳隊的最前沿——這種行動被視為逾越了常規的性別角色；當丈夫們被監禁或押送到囚犯殖民地時，她們還得承受厄運的重壓。此外，她們還得確保自己丈夫的悲慘境況引起報界的持續關注，因此推動了激進事業在全國的開展（施瓦茨克夫1991）。

在高沼地和公用地舉行的大型集會引起對中部地區密謀叛亂的恐懼，而那里的軍事操練活動加劇了這種恐懼——就在同樣的高沼地和公用地里，公民們模仿著法國大革命的公民—士兵（citoyens-soldats）進行夜間操練，為他們希望擁有的“拿起武器”的權利而做準備[[84]](#_84_38)（愛浦斯坦1994；埃文斯1995；加德恩1986）。軍事慶典具有一種壯觀性，本來是為吸引中產階級以外的志愿者的，這些可以看作是憲章派對于軍事慶典的挪用和逆用。類似的顛倒秩序和等級的狂歡伴隨著激進的煽動家的法庭辯護（愛浦斯坦1994），猶如大型戶外集會一樣，這類狂歡是戲劇化的、表演式的政治話語。它們是對政府權威的挑釁，帶有武裝叛亂的可能性，而且愈演愈烈，最終在1819年8月發展到一個高潮，即激進派在曼徹斯特的圣·彼得廣場的大型戶外集會（愛浦斯坦1991；加德恩1986；霍恩1980；湯普森1966）。[[85]](#_85_38)

6千到1萬名群眾手無寸鐵，舉著橫幅，旗桿頂上掛著紅色貝雷帽，手拿月桂枝，在樂隊的帶領下井然有序地進入曼徹斯特城，行進到集會場所。在這個時代，“表演、展示和觀看是社會機制必不可少的部分”（羅素1995：17），在圣·彼得廣場舉行的憲章派集會上，盛會式的表演具有一種悖逆性的文化政治意義。這層意義并未被集會的地方色彩所遮蓋。群眾集會最終演變成一次騷亂，因為按照地方法官的命令，騎兵舉著馬刀殺過擁擠的人群去逮捕講臺上的演講者。9名男子和2名女子被殺死，上百人受傷，這就是著名的彼得盧大屠殺（Peterloo Massacre）。

一個月后，大約3萬人聚集在利茲城外的亨斯萊特高沼地抗議彼得盧大屠殺[[86]](#_86_38)。他們舉著橫幅，其中一幅畫著一個戴鎖鏈的男子，“被兩個重擔（國債和稅收）壓彎了腰。畫的上端寫著‘生來自由的英國人’，下端寫著‘不列顛人永遠不要做奴隸’”（賴特1970；轉引自埃文斯1995：231）。

為紀念彼得盧大屠殺而設計的徽章顯示了貧窮勞動者充當“工資奴隸”的狀況，顛覆了約瑟夫·威基伍德制作的英國反奴隸制的官方徽章（鮑姆1994）。后者畫面上一個強壯的奴隸單膝跪地，手腕腳踝都銬著鎖鏈，身上只有一塊布圍系在腰間，雙手緊握，哀求地舉起，頭向后斜仰，眼睛向上望著一個看不見的他者。在他的下面是一行帶狀的銘文：“難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嗎？”

彼得盧徽章邊緣是一圈骷髏和交叉白骨，中間有三個人物。一個是跪著的男子，衣衫襤褸，雙臂前伸，手掌向上，頭向后斜仰，嘴大張著，面帶恐懼。他正仰視著一個戴劊子手面罩的穿制服的士兵，后者雙膝前曲，舉著滴血的屠刀正要砍下來。這兩個人的身后是一具工人尸體。徽章一邊的銘文寫著：“難道我不是人，不是你的兄弟嗎？”另一邊則回答：“不！你是一個窮織工！”[[87]](#_87_37)織工們見證了種種推進工業資本主義的野蠻措施：

1812年2月27日，喬治·戈登·拜倫勛爵在上議院對同仁做了第一次發言。當時拜倫尚未成名，他充滿激情地講述了居住在他新門寓所附近的紡織工人“空前的慘狀”，是他親眼看到的。他的講話被用來支持否決對“搗毀機器者”——即那些破壞新安裝的紡織機械的人動用死刑的議案，但否決沒有成功。

（尼科爾森1991：22，著重號為后加）

隨著彼得盧大屠殺以及其他暴動和騷亂的發生，政府采取措施暫時中止了人身保護令，限制自由集會。這些措施的動因是害怕訓練有素的暴民采取革命行為。在這個全國性的危機時期，這種政治戲劇很快得到舞臺上的再現，并反映在時代背景氣氛中——政治戲劇就依托于此上演。當彼得盧大屠殺上演時，埃德蒙·基恩[[88]](#_88_39)正在居瑞巷皇家劇院出演《加勒比首領》的主角。盡管這部戲劇的背景發生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講述的是一個前奴隸受強烈的復仇心驅使的故事，卻同時反映了加勒比種植園暴動以及北方工業地區騷亂（鮑姆1994；巴克西德爾1993；拉塞爾1995）。

改革或革命得到舞臺上的表現時，既顯露出對無政府主義暴徒的恐懼，也顯示了對“人民”的自豪。探究一下諾曼征服前的神話，可以發現“人民[被]表現為能夠記住自己古老權利的人”，在他們的身上蘊藏著自然的感知力（巴克西德爾1993：223）。當憲章派激辯出版自由時，通俗的和無許可證的劇院受到憲章派支持，成為表達社會緊張局面的另一個場所。激進文化的表演性方面，比如審判場景，再現在為募集基金而上演的戲劇中，比如憲章派的“民主戲劇《威廉·退爾》”（湯普森1984：118）。在劇院里，在激進分子用來抗議的圖像里，在文學精英們的心里，種族和階級正被聯結起來。牙買加暴動促使騷塞（湖畔詩人之一）寫道：“上帝保佑我們本國窮人的悲慘狀況不會在將來某一天……在這個國家引起可怕的后果！”（轉引自鮑姆1994：167）

在社會混亂的大背景下，改革或革命成為英格蘭壓倒一切的議題。印刷資本主義激發出一種全國想象來支持國家向土地主階級“闡述”自身，同樣，它也為激進派和激進化的報界提供了可能。不斷增長的識字率和主流報刊日趨擴大的自由度幫助形成了早期的勞工協會或工會，入會的成員是“紡織廠地位卑微的白人奴隸”（雪萊；轉引自鮑姆1994：140）和同樣卑微的農業勞動者。

有關奴隸解放的爭辯加劇了危機。1807年議會通過了廢奴法案，但英屬西印度群島的奴隸解放卻要等到1833年。猶如反對奴隸“貿易”一樣強烈，拜倫這樣的公眾人物抨擊廢奴主義者沒有為生活在痛苦中的英國農業勞動者和窮工人說話，而華茲華斯則寫道：“盡管不存在戴鐐銬的奴隸”，英國的工場和農田“在屈辱的苦役下呻吟著”（《人性》1829；轉引自鮑姆1994：71）。

農業界的不滿表現為工團主義、縱火犯罪和殘害家畜，與工業界的工聯主義和激進的革命威脅聯合起來（阿徹1990；佩恩1993；明蓋伊1989；霍布斯鮑姆和魯德1969）。中產階級也看到了政治和憲政改革的需要（赫爾辛格1994；霍恩1980；斯特德曼·瓊斯1983；D.湯普森1984；E.P.湯普森1966）。要求改革的游行之頻繁和波及范圍之廣泛，顯示了危機的嚴重性和幾近革命的不滿之深度和廣度。游行規模也很龐大：1831年秋和1832年春在伯明翰和倫敦舉行的游行分別有上十萬人參加。不管福音衛理教派是否顛覆或轉移了這次革命性的沖動（奧爾森1990），到1831年末，

不列顛處于革命一觸即發的狀態，一旦開始，（如果我們考慮合作和工聯理論的同步發展）其迅速激進化的態勢就很可能預告了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

（E.P.湯普森1966：817）

1832年的改革法案讓年資產征稅估值超過10英鎊的中產階級成員擁有選舉權，因而化解了革命的趨勢。盡管議員席位從人口稀少的選區再分配給新興的工業城市，新增了80萬個選舉人，但還是不夠。擴大選舉權，以此打破土地主對政府政策的政治操控的斗爭還是失敗了。

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共有的激進主義在第一個改革法案的問題上分裂。它通過財產界定使原則問題政治化，階級差別強化了：

比英國歷史上此前或此后的任何時期更明顯，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突出，參與國家的政治體制的資格完全依據于是否擁有產業以及是否擁有固定收入。

（D.湯普森1984：5）

1832年之前“人民”還是一個包羅所有人的術語，1832年之后“人民”成為“勞工階層”的同義詞（加德恩1986；斯特德曼·瓊斯1983）。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開始類聚。在貧窮勞工分化的過程中，1834年的濟貧法意義同樣重要，該法案“使他們不屬于救濟對象，并區別于貧民”（波拉尼1944：166）。反濟貧法的暴亂在19世紀40年代此起彼伏，部分由于“愛爾蘭聯盟和憲章派的公開關系”，憲章派的集會上更是充斥了革命的語言（D.湯普森1984：323）。

公用地上的群眾示威、革命象征符號的出現、向議會提交請愿書的龐大的游行隊伍，所有這一切于1848年4月在泰晤士河南的克寧頓公用地舉行的憲章派集會上得到集中體現。憲章派中主張“武力”斗爭的人將這次集會視為一次武裝暴動的聚焦點。如此預想的集會引起了巨大的恐慌，維多利亞女王轉移到了更安全的懷特島，同時威靈頓公爵指揮精兵強將集結倫敦。

把這次集會視為英國卷進橫掃歐洲的革命狂熱之中的重要時刻——這一預想實際上失敗了。大約只有2萬憲章運動成員參加了集會，當局不準他們進入倫敦市區。費格斯·奧康納和其他憲章運動的領袖向下議院遞交了請愿書（據稱有525萬人簽名），但是在奧康納發表演講之前，一個委員會以偽造簽名為由否決了請愿書。改革和革命都沒有實現。那些希望有威脅作用的示威者自己也遭到威脅。排他性的政治程序依然如故，各類憲章運動者被限制在自己的社會和政治位置上。

鄉村神話

從19世紀20年代起，中產階級“視寧靜的農田為民族身份的代名詞”（海明威1992：298）的觀點開始出現，這一觀點是對日益洶涌的分裂潛流和范圍深廣的社會動蕩的各種表現的反撥。風景再現轉向東南地區良田平闊村舍儼然的低地風景。低地風景與如畫風景或山區和廢墟構成的浪漫高地風景形成鮮明的對照，這里尚在鄉村黃金時代：各種社會秩序和諧共存，人們怡然自得。鄉村英格蘭的神話在于一種雙重感：鄉村是和諧之地，英格蘭依然是一個鄉村之國——蒼翠愉悅之地。

大量的油畫和文學作品表現了這種神話般的記憶，兜售給貴族精英和活躍在新興的城市制造業、貿易和商店行業中的“中產階層”。懷舊之情對非城市化過去的記憶進行過濾，留下一種與農業勞動者嚴酷的現實嚴重不符的神話。在神話制造的過程中，農業資本主義的非道德/道德經濟的深層的政治特性被遺忘或者遮蔽掉了，而城市化也被完全過濾掉了。19世紀20年代由倫敦藝匠合作與經濟協會提供給“貴族和紳士”的商品目錄中有“透明風景百葉窗”，這無意中倒成了鄉村神話的表記（湯普森1966：789）。

吊詭的是，鄉村的神話/鄉村人的神話正在為城市中產階級建構出來，而中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如果不是全部）不是在鄉村長大，就是在離鄉村只有一步之遙的小城鎮成長。神話制造和遺忘是自我強化性的。神話記憶延伸到何種深度的一個標志是“和藹的貴族與愉快的農民密切交往”的語言，《帕碼街公報》[[89]](#_89_38)就用這種語言來報道19世紀60年代的休閑活動。這一現象被解釋為

是中產階級趨合有教養的鄉紳價值觀的一種嘗試，而這一嘗試本身就是一種深深棄絕城市的工業文明、希望逃回到更為單純的恩庇社會的癥狀。

（坎寧安1980：120）

“歡樂英格蘭”的運動和娛樂方式日漸復蘇，欣欣向榮，如射箭比賽、豐收晚宴（后被國教教會改造成宗教性的豐收節日）、五月節及燈心草節[[90]](#_90_38)。這些又被小說和油畫進一步再現或誤傳（mis/represent）出來，廣為傳播。在這些作品里，具有地方特色的鄉村風景和與風景相關的活動烙上了天真、安全和寧靜的印記——這些風景和活動被定位于過去，象征著“失落的身份、失落的關系和失落的確定性”（威廉斯1973：139）。在現實世界，古老的路權、新興制造業城鎮及其周邊鄉村的開放空間和許多殘留的公用地正在失落。

東南地區作為英格蘭之象征正被建構出來，用于緩解維多利亞社會的焦慮，與此同時，進入休閑公共空間的需求集中在西北部高地和倫敦周邊幾處殘留的公用地。風景保護者所作所為本質上是反城市的，考慮到工業和制造業城市的現狀，他們的立場顯得既非缺乏根據，也非荒誕不經（洛厄1989）。鑒于20世紀號稱世界強國的英國失去了帝國和地位，全國陷入近乎致命的懷舊之中，這種反城市化、反現代化的英國幻想更加普遍（霍西金斯1955；豪金斯1986；麥特李斯1993；米勒1995a；維納1981）。

鄉村因其明顯的生態重要性受到關注，它開始被視為一種市容（urban amenity），其動態發展可見于許多地方和不同時期（欽和克里德1997）。此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19世紀末期的英格蘭，開發城市周邊的莊園公用地的時機已經成熟。因為可以論證說沒有人還在公用地放牧或拾柴，這就使人認為開發公用地順理成章，不會導致困境。于是，根據750年前的《默頓法案》，莊園主們通過頒發新的謄本地產保有權，侵犯了公眾進入公用地的世襲權利。這些公用地要么高價賣給開發商，要么通過非法操縱，由莊園不動產法庭直接判給貴族，用于農業或房屋開發。很自然，站在城市居民的角度來看，開發公用地使他們陷入困境，失去了相對來說距離他們較近的休閑空間。

開發公用地引起的沖突加劇了早已存在的私有財產與國家資產及需求之間的緊張局勢。1887年提交給上議院（而不是眾議院）的《謄本保有法》，要求不經土地委員會（農業部的前身）同意，不得頒發新的謄本地產保有權。而另一份提交給上議院的議案后來成為《公用地修訂法案》（1893）要求農業部“必須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圈地有利于公眾”，這等于取消了《默頓法案》（埃弗斯利1910：211），確認公眾利益優先于公用地私有化所帶來的利潤。

當涉及到古代文物時，私有產權與國家利益也會發生碰撞。這些文物不再只具有古董的價值，而已成為如畫風景中的構成元素，為風景增添些許古意。現在，根據約翰·盧伯克（1834—1913）的提議，這些文物要被正式列入國家財產之內。盧伯克，自由黨議員，其家族中不乏知識分子、銀行家和土地貴族（庫克里克1991；斯托京1987；范庫倫1982）。盧伯克在1849年當選為英國科學研究所成員，1855年當選為地質學會會員，1856年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864年他榮任民族志學會主席，1871—1873年擔任人類學研究所的首任主席。

盧伯克因提倡給學童和工人進行科學教育而聞名全國。他還主張縮短工時，讓“新興的有閑的、剛獲得選舉權的工匠和中下層階級”（庫克里克1991：108）享有法定休假日。1900年被封為貴族時，“他選擇了埃夫伯里爵士的名銜。埃夫伯里是一個史前廢墟，盧伯克研究過那里的巨石陣，后來他又買下這片廢墟以免它會遭到新建筑的破壞（斯托京1987：151）。[[91]](#_91_38)盧伯克支持的《古代遺跡保護法案》（1882）確立了第一份官方列表，列出受保護的英國考古遺址。不出所料，該法案由于侵犯了所有權而受到猛烈抨擊。

1882年，盧伯克把羅斯金帶到埃夫伯里。他的日記有這條記載：“羅斯金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地方，他完全被迷住了”（引自哈欽森1914第一卷：188）。實際上，18世紀20年代出土的文物如埃夫伯里和索爾伯里山的巨石圈已燃起了人們對考古的浪漫熱情。第一部《古代遺跡法案》啟動了一個進程：創造出頗有爭議的風景區考古場所——因為一旦這些地方為了“國家”而被保護起來，公眾就會想去參觀這些地方！[[92]](#_92_38)

定位峰區

峰區北部是粗砂巖的高沼地，南部是石灰巖的高地丘巒山谷（牧場）。石炭紀石灰巖和磨石粗砂巖系的砂巖和頁巖（大約2億年前，上古生代晚期）的褶皺、斷層及隆起運動，造就出縱貫南北的背斜（褶皺）地貌。上億年的侵蝕和風化產生了一片平坦的高原，稱為峰區高地。最著名的山峰之一金德斯考特屬于殘留的前白堊（紀）表層，是峰區最高峰，它的峰頂曾經一度被掩埋，后來又在5千萬年前顯現出來。粗砂巖褶皺久經侵蝕切割，形成一片高原，有些地方是懸崖絕壁，在此可以縱覽全景（斯莫爾1990；特魯曼1971）。這些覽勝地點的進入權問題就成為爭議的焦點。

位于奔寧高地南端，湖區南面約90英里處，約200平方英里的峰區，它的周邊是一些數得上名的制造業城鎮。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爾德、巴恩斯利、謝菲爾德、切斯特菲爾德、德比、斯托克、里克、麥克爾斯菲爾德、斯托克波特、曼徹斯特、奧海姆以及羅奇代爾，這些城鎮緊緊環繞著峰區。離它們稍遠的則是另一個城鎮圈：考文垂、伯明翰、伍爾弗漢普頓、利物浦、普雷斯頓、布拉德福、唐克斯特、諾丁漢和萊斯特。

在許多這樣的城鎮中，“教堂和國家的傳統權威是弱小的”（湯普森1984：6）。這些城鎮是憲章派群眾示威之地，是因《濟貧法》和工業改革而起的騷亂之地，是鄉鎮政府和市政府改革實施之地，也是抵制對工會的鎮壓的中心。要考察進入峰區的斗爭，可以通過文化和政治的聯合方式，把斗爭置于各種對抗性的社會關系之中進行研究。

市場經濟飛速而無序的成長“破壞了許多生命”，對社會制度造成“致命的傷害”（波拉尼1994：82，157）。但是相對而言，峰區本身尚未被市場經濟帶來的英格蘭空間重構所波及。只有5%—10%的公用地和荒地以及10%—25%（有些地區不到10%）的可耕地受到《議會圈地法案》的影響（特納1980）。因此，當周邊制造業城鎮的環境變得越來越糟糕時，峰區廣闊無垠的石南高沼地卻是風景這邊獨好。

毫不奇怪，峰區成為斗爭的場所。為了爭取進入空曠風景區的權利而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擁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區當作是年年獵殺松雞的獵區，而附近城鎮的工人階級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寧靜，視它是一個徒步、爬山、觀景的地方。高沼地作為公民權的象征引起斗爭。介入斗爭的勞工雖然是制造業的動力，卻沒有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投票權。

徒步鄉村

《議會圈地法案》使得騎馬道和人行道數量減少，而1815年的《停用非必需道路法案》規定，只要兩個治安法官一致同意并經過下一次地方法庭季審確認就可以關閉道路。由于鄉村的治安法官是從地主階級中產生或由他們支持，因此關閉道路并非難事。針對關閉道路的法律訴訟卻阻力重重，代價昂貴，過程漫長。

早期的人行道保護協會數量眾多，許多協會都具有很強的地方色彩。一些協會總是采取行動，通常是直接的行動；另一些協會呼吁適當的法律保護，多年不輟；還有一些協會則是曇花一現，只是針對某一特別的圈地或人行道關閉行為展開行動，隨后就銷聲匿跡了。有些協會超越本地局限對外合作，其創建者及成員通常來自專業階層和改革家團體，這類協會包括創建于1865年的“倫敦地區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護協會”（公用地協會）以及創建于1884年的“全國人行道保護協會”。公用地協會的會長由喬治·肖·勒菲弗（即后來的埃弗斯利勛爵）擔任，他是自由黨的大牌律師，1868年至1895年間的每屆自由黨政府的成員。

最早組建的地區協會之一是曼徹斯特保護古人行道協會（通常稱為曼徹斯特人行道保護協會，或MFPS）。1826年協會的成立得力于拉爾夫·萊特事件的推動，萊特是一位地區法官和地主，居住在距曼徹斯特七英里外的一個小村莊弗里克斯頓。萊特讓兩個地區法官同事簽署了命令，禁止人行道穿越他那片不大的土地。未等地方法庭確認，他就讓人犁耕播種了那條公用通道。人行道兩旁的柵欄已經被拆走，以使萊特的私人領地更有林園氣象。從他的宅邸就可以看見經過人行道的當地人（泰勒1997；李1976）。

附近的一群農民向地方法庭提出訴訟，卻敗訴了。他們求助于曼徹斯特非國教激進分子協會，由此成立了MFPS。在隨后的兩年，協會耗資甚巨，四處游說，案子終于從地方法庭移交到英國高等法院，最終勝訴。[[93]](#_93_38)又花了7年時間，議會才通過《通用公路法案》（1835），實際等于廢除了《停用非必需道路法案》。MFPS代表了一種新型的以城鎮為本的激進自由主義，挑戰了土地為本的寡頭政治。它的成員中有1817年倫敦毛毯工人游行的支持者，也有反對1819年彼得盧大屠殺的《抗議宣言》的署名者（泰勒1997）。

19世紀初期，農業風景和公用地緊鄰工業城鎮而存在。但是隨著城鎮的擴張，那些人們便于使用的敞地和人行道卻消失了。[[94]](#_94_38)實際上，人們也沒有很多休閑散步時間。直到19世紀60年代，人們周六下午還要照常工作。只有到了星期天，工人們才有時間走出城鎮，走進附近開闊的農田。如在曼徹斯特，人們很快發現自己置身于

……離[城鎮]不遠的草地、農田和公園。這兒有許多令人愉悅的步道，徒步者可以環繞城鎮走一圈。從交易所出發，半徑不會超過兩英里，沿途鮮有在公共馬車道或大街上常常會遭遇到的那種噪音、嘈雜的人群和塵埃。

（李1976：4；轉引自普倫蒂斯1851）

鄉村人口的減少促進了工業資本主義。鐵路不斷延伸，車站以及車站周圍的大棚、岔道和貨運編組站侵占了大量土地。鄉村的原住民無處容身，只能涌進城市的貧民窟，而貧民窟的住房又不時遭到拆除，這樣一來突然加大了人口密度，進一步惡化了貧民窟的狀況。在改革者能夠推動議會制定相關法規之前，（窮人）是沒有“拆遷安置”的權利的（卡特和劉易斯1990；迪奧斯和李德爾1986）。不僅是一些城市房屋13被拆除；像伯明翰等城鎮周邊的許多敞地本來已安排用來分給工人，這些地方現在又蓋滿火車站、貨場和為蒸汽發動機提供燃料的煤堆——就是這些設施保障了火車在城市和郊區運行。通過鐵路網，工業資本主義進入風景區。鐵路把郊區空間與貧民窟連接起來，把貧民窟與度假目的地連接起來。

宗教與休閑

與貧窮工人相關，產生了一種把宗教與休閑連接起來的社會政治。出售杜松子酒和啤酒（另類的“資本主義精神”[[95]](#_95_37)）的酒店和啤酒屋是工人階級消遣活動的主要場所。為了使工人擺脫酗酒造成的精神或身體疾患（擾亂工廠紀律是重要后果之一），教會開始介入。于是，宗教活動成為休閑方式。禮拜，很快又加上依托教會的各類俱樂部、協會和戶外活動，如曼徹斯特圣神降臨周徒步，[[96]](#_96_37)這些活動開始填占人們的業余時間。1840年，“有4萬名學童[乘著火車]離開曼徹斯特，就是為了避開當地舉行的各種圣神降臨周比賽”（沃爾文1978：21）。通過圣神降臨周的徒步活動

北方大城市的自助運動將其成員的文化和精神視野延伸到了湖區。從19世紀30年代起，科尼斯頓每年都舉行圣神降臨周徒步活動。徒步活動在1894年停辦了，這是巧合，不過與瑟米爾事件有些象征性的關聯。[[97]](#_97_37)

（默多克1984：155）

權威的空間化影響了人們對于自然的感知。此時，紡織廠和工廠的廠主、教堂和慈善機構都試圖用有益的休閑活動取代罪惡的娛樂。通過引導許多工人階級的孩子參加旨在禁酒的遠足活動，培養了他們對于自然的體驗。[[98]](#_98_37)許多遠足遠至英國的邊陲海邊，那里的無人風景不屬于任何人，也無法屬于任何人，在那里，人們對于風景的凝視去掉了占有的色彩。[[99]](#_99_37)純潔的大自然被當成城市罪惡、道德淪喪的解毒劑。這些專為工人舉行的遠足活動，其中蘊涵的價值后來得到更加明確的肯定——到了19世紀晚期，假日徒步機構公然把道德與體力活動聯系起來。

從前“相攜出游（walking out）”的求愛行為總是傳達出性信息。現在，鄉村徒步與發展友情和了解自然歷史聯在一起。這種徒步可能培養出兩種接近自然和上帝的方式：虔敬的羅斯金門徒方式或是理性的達爾文派科學家的方式。休閑徒步在中部各個城鎮的工人階級中流行起來，當地的周報開辟專欄描述附近及更遠的徒步路線（泰勒1997）。然而，周日漫游如同其他休閑活動一樣面臨教會和非國教禮拜堂的非難。[[100]](#_100_37)

徒步活動是被用來攻擊私有財產的特權，還是被鼓吹成一種重鑄“工人間”兄弟情誼的手段，還是被當成開展道德教育、傳播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向往的媒介，這要看是誰在組織休閑徒步活動了。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聲稱徒步這樣的休閑活動具有“調和階級的功能”（坎寧安1980：11）。盡管“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社會紐帶可能經常超越經濟沖突和地位差異”（泰勒1997：55，著重號為后加），不過，認為這功能并不只是美好幻想似乎未免有些幼稚。

以階級為基礎的景色和觀景政治久已圍繞著地主精英們的鄉村別墅進行。如畫風景旅游業已經將觀景政治推廣到中產階級。湖區漫游路徑是根據水彩畫、版畫、油畫、詩歌、地圖和導游手冊定位的。（見第三章。）這些仍然是觀景的方式和了解風景的工具。當中產階級游客享受著新旅館、向導、馬車和藝術品商店的服務時，湖區被敷上了薄薄一層的經濟發展的表象。但是一切就此打住。

19世紀休閑性享受風景，特別是休閑徒步，意義則是不同的，因為它對景區施與了積極的干預，確立了這樣的一種觀點：風景中蘊含著互相抵觸的價值體系。隨著19世紀的推進，事情變得清楚起來，這種抵牾其實源于私有財產的本質與人們期望的權利之間的沖突——人們認為所有公民有權進入本國山區和公用地（希爾1980；里德1991；埃弗斯利1910）。

松雞、偷獵者和徒步者

休閑活動不是中立的行為，而可能威脅到統治階級的精英。最終，精英階級會通過發起、支持或壓制休閑活動表達自己的權力和控制。狩獵和偷獵，一枚硬幣的兩面，代表著合法和不合法，典型地反映出圍繞鄉村展開的權利之爭。狩獵法[[101]](#_101_37)侵犯了鄉紳農場主、中產階級地主、土地承租人、農業工人這類人的利益。它們生動而鮮明地說明了統治階級土地為本的權力結構。精英通過庇護制和世襲制把持上議院，并占據了很多下議院席位。

正如弗里克斯頓沖突事件顯示的那樣，關閉人行道能夠限制勞動階層一度擁有的相對自由的通行權。但無法采用同樣方式控制的是捕獵，獵區保護與狩獵兩種力量互相較勁，各個階層為此陷入沖突之中，這后來稱為“18世紀中期以來農村所經歷的最持久、最野蠻、最激烈的沖突”（阿徹1989：52）。[[102]](#_102_37)并非所有的休閑徒步都是清白的。徒步也許就是借機偷獵——部分是為了體育鍛煉，部分是因生活所迫（偷獵經常是能讓飯桌擺上肉食的唯一手段）。偷獵總是一樁徹頭徹尾的罪行。

寧靜與豐裕的鄉村神話遠遠不是現實。在鄉村的一次徒步可能被視為可疑的活動。[[103]](#_103_37)由于引進了趕獵方式（battue）[[104]](#_104_37)，有權人更加賣力地保留野生動物以便到了狩獵季可以把更多的獵物驅入囊中，使獵手展示他們的射殺技藝（坎寧安1980）。盡管大眾認為野生動物是上帝賜予的公用地的一部分，誰有本事逮住它都可以拿走，但是晚上偷獵一旦被抓，是會被判監禁、強制入伍或流放海外的。根據1803年的《埃倫伯勒法案》，守林人有權處死拒捕的偷獵者（阿徹1989；海伊1975）。工人階級要求保留穿越公用地和私人土地的權利，他們的行為不管是合法的還是超越法律的，都挑戰了土地為本的權力體制的根基。

在峰區，手持武器的守林人和偷獵幫的暴力沖突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期。19世紀60年代的棉花災荒驅使許多紡織工人跑到田野里偷獵，而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期間的捕魚權斗爭“在……湖區和其他地方也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阿徹1989：60—61）。農業勞工和農民的日常活動被守林人密切監控，因為偷獵不僅是地區性問題：還有一個廣及全國的野味黑市。

無論是去徒步還是偷獵，工人階級很容易借助鐵路網進入鄉村。這時，中部地區的鐵路已經發展到交錯密布的程度，大大壓縮了空間。鐵路始于19世紀30年代，最初是一種運輸貨物的手段，但很快就擴展了自己的業務，包括運送游客到游覽勝地，有些城鎮只是在鐵路延伸到那里之后才成為游覽勝地的。19世紀40年代鐵路向北延伸到湖區和蘇格蘭。地處國家南端的康沃爾則成為英格蘭最后一個開通鐵路的郡，1859年鐵路才延伸到那里（羅賓斯1988）。[[105]](#_105_37)

再來說說峰區。在19世紀，進入峰區沼地是受禁止的，為防止工人階級徒步者和偷獵者侵擾當地的松雞。憲章派則呼吁恢復前諾曼時代的權利，如平民狩獵的權利。法律上有爭議的圈用公用地做法被認為是對這些權利的根本侵犯。一條古老的公用道路將位于海菲爾德山谷的海菲爾德村與伍德蘭德山谷連在一起。這條路穿越威廉峽谷、金德斯考特高原——直到1836年還未圈用的荒地，最終與謝菲爾德—曼徹斯特公路匯合。道路本身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有段路要經過德文郡公爵的松雞沼地。1876年，公爵關閉了公共通道，因為它妨礙了射獵松雞。自弗里克斯頓人行道關閉事件之后，人們已經積累了50年的經驗，曼徹斯特人行道保護協會（MFPS）與剛成立的海菲爾德和金德斯考特古人行道協會聯合起來，向公爵關閉公共通道的行為發起挑戰。盡管汲取了從前的經驗，他們還是花了20年的時間進行法律上的討價還價，最終在1896年贏回了通行權。

此時，峰區和北部鄉村人行道保護協會已經成立。它不僅支持開放金德斯考特風景區的倡議，而且回應了范圍更廣的一個難題——即公眾被排除在公用高沼地之外，而（有權之人）卻在那里蓄養私人狩獵用的松雞（李和豪弗1994）。峰區與北部鄉村協會的主要目標是：

（1）保護、維持和捍衛公眾使用和享用公路、人行道、騎馬專用道、支路和岔道、敞地、荒野和路邊斜坡的權利，以及在北部和中部鄉村，特別是峰區的公用地休閑的權利；

（2）防止濫用這類權利，特別防止侵犯和毀壞莊稼與田產以及擅入獵區干擾狩獵。

（李和豪弗1994：7）

為了這些富有價值的目標，協會爭取著，抗議著，步步為營。在數個號角漫游者俱樂部的聲援下，協會的斗爭頗有技巧。第一個站出來的是謝菲爾德號角漫游者俱樂部（SCR），1900年由G.B.沃德創建，他因領導周日漫游[[106]](#_106_37)被衛理公會教會學校開除，失去了職務。沃德在當地的社會主義報紙《號角》上刊登廣告招攬“徒步者同道”，得到異常熱烈的回應，于是他就創辦了非宗教的周日漫游俱樂部。[[107]](#_107_37)沃德的目的是重建

人們之間置身于自然事物之中那種同道之誼，[這一目標]很快就與強大的利益集團發生沖突，土地利益的既得者緊緊抓住他們享有的狩獵和射殺獵物的特權——這些特權自諾曼征服以來延展甚廣。

（希爾1980：32，著重號為后加）

以前是徹頭徹尾的有組織偷獵問題，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期間，當局則借環境保護之名把工人階級徒步者趕出沼地。據說徒步者破壞了石南荒原，干擾了松雞的孵蛋和筑巢，這樣一來使可供獵射的松雞數目就減少了。[[108]](#_108_37)

在金德斯考特的部分松雞沼地實行了一種許可制，允許人們進入這個最高峰。1922年冬天先后有兩個漫游者遇難，于是就連這種有限的進入也被取消了。獵場看守人中途攔截并驅趕那些前來登高縱覽峰區全景的人們。到20世紀20年代，漫游者被拍了下來，他們的照片刊登在地區報紙上，附有說明：誰若能提供照片中人的名字、地址和職業，就可以獲得5英鎊的獎賞。當局給那些身份得到確認的漫游者發去傳票，禁止他們再走進金德斯考特（希爾1980；泰勒1997）。因此，金德斯考特成為更大風景區進入權運動的實驗場。

整個20世紀20年代，以謝菲爾德—曼徹斯特為大本營的漫游俱樂部聯合行動，要求開放金德斯考特。1928年，社會主義者領導的謝菲爾德地區漫游者聯合會在沼地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示威，支持一個關于進入山區的提案，那是一系列遭到否決的同類普通議員提案中最新的一個。約有3千人參加，這一示威活動年年舉行，一直延續到1939年（泰勒1997）。游客要想縱覽金德斯考特全景，只能非法侵入。事態發展到在將近七十年后仍被稱為“公眾非法侵入”的程度。1932年4月，英國工人體育聯合會（共青團一個分支）中的幾百個成員，公然闖進金德斯考特（泰勒1997；希爾1980；羅斯曼1982）。曼徹斯特漫游者俱樂部聯盟不想攪進這種“極左”行動，拒絕采取非法侵入的方式。

非法侵入者在海菲爾德村聚會，該村位于貫穿海菲爾德和伍德蘭德山谷的通道起點——就是那條1876年遭到德文郡公爵關閉，后來經過MFPS苦斗20年才爭取到重新開通的通道。有點像19世紀初期向激進性集會宣讀《騷亂法案》，教區執事給聚會的人念誦了禁止在海菲爾德休閑場地舉行集會的相關規定。人群散去，但又在海菲爾德通往伍德蘭德山谷的小道重新聚集起來。在攀登金德斯考特峰時，漫游者迎面遇上獵場看守人和作為后援的鄉村警察（泰勒1997；希爾1980；羅斯曼1982）。

非法侵入者的領袖有6名被捕，被指控舉行騷亂性集會。對他們的審判很快轉成誣告，說這次非法侵入是猶太人領導的共產黨的陰謀，因為受審的6人中有3個是猶太人，他們身上攜帶著英國共產黨的報紙。最后，5人被判以監禁。全國的報紙連篇累牘報道這次審判，促使進入風景區問題成為持久的政治性議程。同年，峰區的群眾示威繼續進行著，更多拿著棍棒的獵場看守人、帶著阿爾薩斯犬的騎警和步警，遇到的是更大規模的漫游者隊伍（希爾1980；羅斯曼1982）。

這類事件背后除了階級驅動的殘忍因素之外，還因為私有財產利益攸關，松雞不過是轉移公眾視線、誤導輿論的“紅鯡魚”[[109]](#_109_37)。1934年在為英格蘭鄉村保護委員會謝菲爾德分會準備的一份報告中，報告人詳盡地描述了拒絕開放的峰區松雞沼地的業主。17個私人業主中，有7個貴族，2個軍官，8個工業資本家（希爾1980：35）。非法侵入意味著逾越了社會和空間界限。就路權而言，1933年《路權法案》輕易就被土地主的一則告示弄成一紙空文，

告示大致內容是說他無意提供路權，允許公眾進入只是賜予公眾的恩惠；[因而]只要在20年的使用期得到確立之前貼出告示……任何業主都有可能阻止某條人行道成為公用道路[[110]](#_110_37)。

（泰勒1997：255—256）

結語

將進入風景問題置于多重背景考量，由此導向風景建構里的更大議題：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很顯然，分析風景其實是從根本上研究社會、政治和經濟歷史的一種方法。國家之大業乃是制造和展現一個統一的不列顛，而在統一表象背后隱藏著眾多對抗的身份認同。與“鑄造不列顛”相對立的是憲章派群眾戶外集會，后者“鑄造了”從愛丁堡到倫敦的勞動階級長鏈。那些也被排斥在充分的國家政治生活外的非國教徒則是這種社會運動的后援。

宗教、休閑以及軍事性質的禁酒運動既分別又聯合地傳播了中產階級價值觀。旨在禁酒的遠足活動以及由非國教會發起的工人階級徒步或漫游俱樂部，把許多工人重新引到他們或其父輩被迫離開的那片土地。工廠紀律約束了工人的活動范圍和時間，使得開闊的風景區和散步的人行道格外珍貴。在這種情形下，各種地方化的人行道保護協會和全國性的保護公用地組織紛紛成立。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另一股促進漫游俱樂部運動的力量。

早期沒有特別針對峰區風景保護的法律條款。峰區成為工人階級采取直接行動爭取漫游自由的場所。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湖區是議會行動的目標，議會要求保護湖區風景——那里沒有松雞麋聚的石南高沼地。湖區由于路程和它所引起的藝術和文學聯想而遠離工業化的中部。與湖區相關的“最高級”的休閑活動或是一人孤身漫步山間，或是知道如何欣賞風景的游客的覽勝之行，與“低級的”和“不得體的”休閑活動有霄壤之別——被剝奪了美學資本，牛飲啤酒的工人從中部那些制造業城鎮搭乘火車，跑到湖區做一次當天返回的遠足。

一個主要屬于中產階級的神話，一片鄉村低地和沃野的“小英格蘭”的神話，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深入人心（塞繆爾1989；米勒1995a）；此時，一個工人階級的神話也漸成氣候：工人在未開墾的高地結下不解之緣。工人階級前往曠野風景區

不是為了用詩人之眼夢幻般地凝視自然，而是為了遠離工廠的敵對關系，在山區和溪谷中重獲友情。

（希爾1980：15）

工廠所奉行的時間—空間紀律是漫游自由的對立面。漫游活動家視漫游的自由是某種程度上的基本公民權，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權利的再確認：“通行無阻地”進入敞地。這里的分析無意貶低制造業嚴峻的現實，也無意貶低離開吵鬧、骯臟的時空管制而逃向沼澤和山地的快樂，只有風聲的寂靜世界和一起漫游的友誼。這里只是意在捕捉到一種同樣回顧過去、蘊涵著懷舊情調的框架性神話，說明在什么背景下諾曼征服歷史深處的東西有時仍然會復活。

休閑或遠足徒步逐漸發展成兩種截然不同、具有階級取向的休閑實踐，引發了具有階級取向的保護運動。不準工人進入松雞沼地——這一現實特別推動了保護古老的通行權及公用地使用權運動，而改革家和學術精英們則把關注點放在湖區，他們把湖區當作陶冶精神之地。因而促成了全國范圍內的風景保護運動，這正是下一章將要探討的內容。

## 五 進入湖區

……不列顛身份的景色本質……具有深刻的英國特征。沒有哪個地方像英國，風景就是遺產；也沒有哪個地方這個詞不僅指涉景色和景觀類型（genre de vue），而且具有本質性的民族美德的意義。

（羅溫薩1994：20）

引言

在湖畔詩人，特別是華茲華斯的影響下，一種新型的、前所未有的價值理念與湖區聯系在一起，并伴隨著18世紀畫境游的盛行不斷增值。知識分子精英之所以看重湖區的美學價值，是因為湖區不同于而且遠離新興的城市密集化。基于這些原因，湖區受到大力保護，不讓它受到工業的入侵和工人階級的干擾。華茲華斯宣稱湖區是“一種國家財產”，這一說法說明當時風雷激蕩的現狀，一邊是風景、國家和公民，另一邊是私有財產——針對雙邊關系的理解造成了爭議的渦流。休閑和階級的爭論歸并到這樣一個議題：風景是否具有國家的維度？這一維度在議會政治中得到表達，引起辯論，最終促使第一次立法：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頒布了山區進入權法案。

定位

湖區位于英格蘭西北高地，是一片大致呈環形的穹隆地區，直徑30多英里，其中有180座山峰。880平方英里的湖區國家公園實際上與地理意義的湖區一樣大小。這個中央穹隆的結構演變是一個褶皺、隆起和侵蝕的過程。火山活動（在5億年前的奧陶紀時期），冰川作用（2.5億年前的更新世時期），地面隆起（大約3500萬年前的第三紀中期）及風化產生了一種別致的景貌：荒蕪裸露的懸崖峭壁、圓形山谷（山壁陡峭的碗狀巖石盆地，由冰川運動沖刷而成）、險峻的刀嶺（陡峭的巖石山脊，往往環繞一個山谷或在兩個山谷之間形成絕頂）、冰斗湖（經常但不全是見于谷底，湖水即使在夏天也是冰冷刺骨），深不見底的馬蹄形山谷（斯蒂芬森1990；特魯曼1971）。湖區裸露在外的最古老的巖石是奧陶紀時期的斯基多板巖（Skiddaw Slates）。在急流飛瀑的沖刷下，山脊和山谷呈輻射狀散開，猶如車輪的輪輻。

不同于峰區，湖區是酸性的高地沼澤和石南荒原，沒有被用來大規模繁育松雞。湖區國家公園跨了幾個古老的郡縣：坎伯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和北蘭開夏郡。1974年當地政府改組，又增加了一個新郡——坎布里亞郡，湖區國家公園現在就在新郡里面。

土豆和煤

在湖區，隨著中產階級旅游業的發展而興建了旅館、公寓、周末休養所和鄉村住宅。對當地的文學藝術圈人士而言，這些入侵使人心煩，還不至于煩不堪言。但隨著鐵路的延伸，人們從中部城鎮可以輕易抵達湖區，于是平衡被打破。華茲華斯對此表達了道德上的憤怒，但作用甚微，因為鐵路在經濟擴張中起著重要作用（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沃爾文1978）。赫伯特·斯賓塞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的文章結集重印，以“鐵路道德與鐵路政治”為題，用“所有權契約的誤釋”來陳述他對契約法的看法（斯賓塞1855），鐵路公司正是按照這種契約運作的。在此，有必要充分引用斯賓塞關于鐵路股東、議會議員和土地主之間的聯動關系的描述，因為湖區抗議鐵路擴張的行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莊園主一度是鐵路公司的最大障礙，但近些年卻成為主要推動者。起初，利物浦—曼徹斯特鐵路因地產主的抗議而擱淺，后來第二次提案卻獲得通過，也是因為它明令鐵路遠離所有豪宅并避開獵物保留地。一個貴族委員會壓根兒不看任何論據，就否決了倫敦—伯明翰公司的項目。見勢不妙，公司不得不安撫對手，將地產的估值從25萬英鎊提高到75萬英鎊……然而自那以后，政策發生顯著變化……當知道鐵路公司通常會支付“土地和賠償”費用，每英里4千英鎊到8千英鎊……當……優先股及其類似股份被準許用來收買反對方時，當鐵路拉動地產迅速升值成為不爭的事實時，毫不奇怪，鄉紳會成為鐵路的積極支持者，盡管他們曾經是這些項目計劃不共戴天的仇敵……[而且]在1845年，有157個議員的名字出現在新[鐵路]公司的登記簿上，各人所持的財產份額，最高的有29.1萬英鎊之多。

（斯賓塞1855：12—14）

不像華茲華斯，政治經濟學家哈麗特·馬蒂諾（1802—1876）對于鐵路把工人帶到山區鄉村的運輸潛力熱情有加。正像華茲華斯一家一樣，她也居住在湖區，而且“宣講”湖區清新的空氣和開闊天地能使所有禁錮在嘈雜骯臟的工廠和城鎮的人們都受益。她也將鐵路當作把新觀念帶進她認為是落后的湖區社會的一種方式。在湖區，一些有名望的自耕農對農業科學幾無認識，也無多少技術。貧窮悲慘之處不亞于遙遠的城鎮中看到的情況。

馬蒂諾是一位頗受歡迎的作家，[[111]](#_111_37)她用淺易的文字寫了一本湖區指南（1855）。指南提供了平價酒館和住所的信息，還附有全景圖插頁，標出山峰和山脊名稱。正文前后的襯頁刊有湖區周邊豪華旅館的廣告，列舉了最近入住的那些名聲顯赫的歐洲貴族，還刊登了吸引中產階級的旅館廣告。[[112]](#_112_37)

在山地和環湖徒步成為方興未艾的中產階級時尚時，關于公用道路和人行道權利的爭論應運而生。這場爭論導致凱西克地區保護協會于1856年創立。抗議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多達500人參加了某次抗議活動，而另一次抗議活動則有2千人參加（《曼徹斯特衛報》1887；轉引自希爾1981：41）。即使記憶有些出入（《曼徹斯特衛報》刊登的信是在回憶1857年發生的抗議事件），但顯而易見，的確有許多徒步者（無論是來自湖區內還是湖區外）參加了抗議關閉人行道的集會。[[113]](#_113_37)

19世紀70年代，當進一步把鐵路延伸進湖區的議案提出后，人們害怕鐵路除了可能增加一些工業家的消夏住宅外，還會使中部城鎮的工人潮水般涌向湖區——畢竟火車旅行既便宜又快捷。法國農民曾被比喻成麻袋里的土豆（馬克思[1852]1972：123—124）。來湖區一日游的英國工業無產者被告誡省下錢來就在自個兒家附近度假，不要外出旅行去受那個罪：“猶如煤塊一樣從麻袋里”被傾倒在凱西克和溫德米爾，被鐵路“卸煤一般從一站卸到另一站”（羅斯金1876：5—8）。

他們被想象成無生命的物體，當然與那些受過教育獨自登山漫游的人有云泥之別。預料中的愚蠢游客反襯出“英格蘭……邊界地區的農民……在他們身上力量和美德依然存在，代表了遭受機械和商業敗壞之前的英格蘭的身體和靈魂”（羅斯金1876：5）。公正地說，這種責難針對的是勢頭迅猛的大眾旅游業。25年前，一次只能運送幾千人到湖區某個小鎮做便宜的遠足，現在一放假，數以萬計的游客蜂擁而至（沃爾文1978）。

更使湖區保護者怒不可遏的是開礦和采石這類大煞風景的破壞活動和威脅。在早期的導游指南里，原始工業的煤礦和采石場要么被視而不見，要么被當作如畫風景的構成元素。對于四處鋪開的鐵路工程來說，開礦和采石是補償工程造價的必要手段，這規模就大不相同了。對鐵路和煤礦利益的抵制在道德美學層面和經濟層面進行。由于對這類工程的抗議開始采取有組織的形式，華茲華斯的早期論點被用于環境之戰。鐵路反對者一度被指控鼓吹“一種自己的‘美學圈地議案’，該議案為了……那些有品味的人的利益，將給崎嶇壯觀的斯基多板巖圈上柵欄”（《威斯特摩蘭公報》1876；轉引自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208）。

建造水庫可以緩解工業城市供水短缺問題，但對湖區則構成另一個可怕的威脅。瑟米爾湖（常在湖畔派詩歌中出現）被曼徹斯特公司選做水庫壩址。該項目在議會提出，反對者在1877年聯合起來組建了瑟米爾保護協會（TDA）。由當地名人發起，如羅伯特·薩默維爾（湖區的一個出版家）、約翰·哈沃德（格拉斯米爾的一個地主）和卡里斯勒主教，協會得到了學術界、土地貴族的支持，還贏得了聞名全國的公眾人物如羅斯金和卡萊爾以及公用地協會的擁護。

在第二次宣讀提案時，科克茅斯（華茲華斯湖區出生地）的議員艾薩克·弗萊徹發言表示支持，反諷的是，他提出該項目能保護瑟米爾風景區。[[114]](#_114_37)他說該公司獲取瑟米爾蓄水區域這

1萬或1.2萬英畝坎伯蘭最美麗的部分，[將會保護該地區]免受那些審美紳士們的入侵，他們跑到那里瀏覽風景，在美麗的湖畔建造哥特式別墅。

（弗萊徹1878；轉引自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211）

迫于水庫反對者的壓力，特別是自由黨議員威廉·愛德華·福斯特的壓力（他在1870年提交的《基本教育法案》對于義務教育制度至關重要），保護這片風景區成為公眾或全國范圍的呼聲。結果，議會專門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而非通常意義的特別委員會，對瑟米爾工程進行調查。所有的利益方都需提出證據，而不僅僅是那些直接受影響的有產者（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水庫反對者失敗，瑟米爾湖被排干、擴大，改建成水庫。

漫游瑟米爾的人備受阻撓，公司禁止庫區的雇員和租戶“給游客提供隔夜住宿，提供點心和飲料”（希爾1980：39）。審美紳士不得進入瑟米爾，直到1989年（沒錯，是1989年，而不是1889），公眾與瑟米爾景區緣慳一面。直到1989年現代的水處理設施才允許開辟湖邊人行道以供公眾使用（威爾士1989）。但是，曼徹斯特水務公司的針葉樹人工造林計劃（當然對湖區風景又是一種威脅）已經營造出了大片陰郁的樹林，缺乏林下植被，毫無吸引力。

1879年瑟米爾法案的爭論中專責委員會的地位，也為后來其他議題的辯論開了先例。圍繞瑟米爾一案進行的斗爭也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專為保護瑟米爾成立的委員會不足以阻止私人利益集團在議會獲勝。保衛具有民族重要價值的財產需要全民族的聲音。1883年年初，修建穿越德文特湖南面霍尼斯特隘口的鐵路干線的動議就召喚出了全民族的聲音。按計劃，這條鐵路將成為當地采石業的專用線，但也會帶來另一種可能：游客藉此可以走進本來與世隔絕的山地深處。

反對者在全國性和地方性報紙上發表看法，認為這一計劃是對“民族神殿一次不必要的毀滅”。為此組織了全國性的請愿活動，呼吁保護這一地區的風景，請愿者把它描述成“在大城市時代自然本身的英國大學”（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214—215）。提案人撤回了他們的動議。1883年夏季又有一條提案被提了出來：建造一條通到伊納達爾湖源頭的鐵路。在第二次宣讀時勉強得到通過，遞交給委員會，由于瑟米爾的先例，這一提案也循例遞交給一個特別委員會，就在這個時候，鐵路提案人將它撤回了。文化精英們通過他們的修辭手段——即把伊納達爾湖的文學和繪畫關聯提升到民族性價值的高度，而大獲成功，保住了湖區這片風景；此時，當地的企業家卻在力陳湖區的商業前景。[[115]](#_115_37)

當地名人的核心團體開會商議了好一陣，最后在1883年組建了湖區保護協會（LDDS）。這一組織堪稱政治詩學或詩歌政治的范例，成員主要由全國性的華茲華斯學會會員組成。這將近六百人大都居住在湖區之外的地區，來自法律、政治和學術圈，由此可見這片原本蠻荒之地的風景區的民族性和典雅化特性（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116]](#_116_37)

社會改革家、學會人物和風景保護者所屬的團體互動呼應，形成保護湖區的合力。有一些人非常激進，挑戰私有財產和土地主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洛厄1989，塞繆爾1994）。激進派的思想領袖是哈德維克·羅恩斯利、約翰·羅斯金、奧克塔維亞·希爾和羅伯特·亨特爾。卡農·羅恩斯利，克羅斯維特的牧師，是LDDS在當地的組織者之一。遷居湖區之前，他在布里斯托爾和倫敦的貧民窟任教區牧師，在那兒經由奧克塔維亞·希爾的導師約翰·羅斯金引見他認識了希爾。此時的希爾正熱衷于住房改革和英國軍校學員運動，她也是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護協會（公用地協會）的重要成員，她曾引導協會為保留瑟米爾風景而辯護，但未能成功。

羅伯特·亨特爾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一起為保衛公用地而工作，與政治經濟學家亨利·福賽特一道為政府改革而努力，福賽特也是公用地協會成員。亨特爾曾經策劃過各種措施（前一章已經討論）防止新的謄本地產的產生——根據謄本地產保有權，土地主可以將莊園的公用地劃為己有，用于發展房地產。當時，LDDS正在抵抗鐵路的入侵，而羅恩斯利正領導著協會的一個分部，努力使進入權問題成為協會常規議程的一部分；亨特爾領導的公用地協會則試圖爭取（公眾）進入倫敦伊平森林的權利。1895年，亨特爾、羅恩斯利和希爾創建全國歷史古跡和自然美景托管協會（國民托管組織）。

（風景）保護哲學的內在沖突很快凸顯出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游客涌入儼然已成文化價值之象征的湖區，通向湖區和環湖的道路已經不堪重負。那些曾經支持LDDS的土地主把便道給封閉了。過去是保護湖區免受諸如開礦、鐵路或水庫的外來威脅，現在則要保護湖區免受那些對湖區“愛得要死”的游客、別墅建造者和隨之而來的服務業的侵擾。這種狀況持續到現在，湖區依然無法擺脫它早就陷于其中的現代困境。重要的是

就是在湖區出現了最早的論戰，挑戰有產者隨心所欲開發自己的土地的權利……湖區不僅成為重要的旅游中心，也成為新觀念的溫床——孕育人、地產、道德和環境之間的合度關系。

（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219）

國家的維度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國家公園的概念得以形成。然而，誰構成“國家”？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擴大了選舉權，選民幾乎翻番。城鎮和大城市的許多工人獲得了選舉權，然而農業勞動者和礦工仍然被排除在外，直到1884年第三次改革法案增加了200萬鄉村選民。到那時為止，甚至在那個時候，具有國家意義的風景觀還在矛盾中蹣跚：進入風景區還是階級區分的方式。

在前幾章我們已經探討了英國鄉村別墅里豐富的藝術收藏品如何幫助改造大莊園的風景，莊園本身成為藝術品，一個（自然）風景的國家畫廊。到19世紀30年代，公眾開始討論起藝術品。藝術品是否最好收藏在英國鄉村別墅里，成為統治這個國家的精英們的鎮宅之寶？這些藝術品是否應該列入國家收藏，以使人人有權接近和欣賞？博物館是否應該只為“安靜、嚴肅而孤獨的觀眾”服務（赫爾辛格1994：128）？——聽起來使人想到那些精英，他們漫游湖區，獨享美景。

1860年，羅斯金向議會的國家博物館委員會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建議另建一種博物館系統，專門為工人階級服務，博物館只配備起碼的管理人員，以使工人能自由自在地帶著妻兒前往“他們的”博物館。[[117]](#_117_37)博物館給工人階級展出有價值的作品，至于最珍貴的藝術品（國家珍寶）則不要拿出來。這樣，“階級差別將制度化，成為一種滿足全體國民有差別的觀賞需要的恰當方式”（赫爾辛格1994：129—130）。全民性的觀看不會產生全民性的觀賞者。觀賞者因階級、性別和宗教的不同而類聚或群分，美學民族主義賴以汲取的資源就是英國鄉村別墅的居住者。介入審美生活并非與工人階級無緣（遠不是這樣），但是要在恰當的空間進行。

羅斯金強烈譴責品味受質疑的大眾來到湖區，他的根據也是分寸的問題：知道自己屬于什么地方，不要到處跑來跑去的。當談到湖區問題，羅斯金氣勢咄咄地質問支持擴延鐵路的改革者：

你們為工人酗酒的費用大驚失色，除了震驚，你們就不能教教他們從一年的工資中存下足夠的錢，去租輛馬車游玩一天，帶上太太和小寶寶，駕車20英里，就到了令人愉快的野外，隨心停車，在青苔如茵的堤岸上打開野餐籃子？如果他們覺得此處無景可賞，那么到了別的地方他們也找不到可賞之景；你們鐵路公司能為他們做的就是在格拉斯米爾周邊開設酒館和九柱游戲場，而他們很快就會給這些地方留下一堆垃圾，岸邊到處是破碎的姜汁啤酒瓶。他們的心靈并沒有因面對湖區美景冥思而有所改善，這跟到黑澤[[118]](#_118_37)沒有什么兩樣。

（羅斯金1876：5—6）

最好讓工人去欣賞他們熟悉的家門口的風景，而不是旅行到遠方——那里的風景他們既不認識又不能融入（風景猶如博物館，是有階級定位的）。在此，羅斯金只是重申了華茲華斯早期反對鐵路入侵湖區的論點。引起爭議的不是參與觀賞國家珍藏的行為——不管觀賞的是物品還是風景，而是階級的資格。為工人階級進入博物館或湖區的精華部分提供方便就是縱容“非分之事”（道格拉斯1966）。

初看起來絕對矛盾的是，風景是“在羅斯金想象中，讓所有國民可以融為一體的唯一一種觀賞空間”，因為它而且只有它“為所有英國國民提供了共同的美學基礎”（赫爾辛格1994：139）。然而（一個巨大的“然而”），共同基礎的前提是已經教育工人階級不去觸摸而是凝視風景。教育眼睛去正確觀看的過程是通過繪畫實踐獲得的，這樣工人階級就會成為透視性凝視的積極實踐者。赤裸裸的階級區分既非在英國外省博物館和國家博物館發起，也非在觀賞自然風景的方式中付諸實施。因為在英國這樣著名的由階級結構組成的社會，幾乎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湖區風景的保護遵循華茲華斯的理念，即風景是“一種國家財產”。但是，隨著土地市場的日趨擴大，當土地被拿來出售時，人們意識到土地是和擁有捐贈藝術品而使之成為無價之寶的國家美術館不一樣的，尚無法定機構能保證土地永久撤出流通領域。盡管國民托管組織在1895年成立，直到1907年議會才立案承認它是一個法定機構，有權永遠持有土地。在今天看來，國民托管組織可以說是推進了羅斯金的目標：形成正確的賞景方式并幫助形成民族美學，這種美學“把英國風景定位為民族性賞景的定義性空間”（赫爾辛格1994：126）。

在英國鄉間進行的大規模的風景再造運動，迫使農業工人流離失所，這一切加劇了業已存在的階級對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保護大莊園和居住在莊園之內的那些終生租戶，國民托管組織現在可以被描述成一個給潦倒的鄉紳們提供救濟的龐大體系。自成立以來，托管組織表現的主流文化被貪婪消費，這是一種抹去了其產生條件的文化。意義和實際體驗脫鉤，而“在此過程中，一系列源自‘我們的’傳統的共同設想和選擇……出現，盡管存在差別”（羅斯伯里1989：45）。僅僅在不久前，青年國民托管劇院在托管組織擁有的地產里上演戲劇，演示了另一半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一出名為《鮮花與奴隸》，描寫了憲章運動人士和他們住在別墅里的工廠老板們（特納1996）。

1870年，在他的劍橋任職演講里，羅斯金將英國風景視為對美好往昔那種本地的、神圣的、慢節奏的沉積的紀念。面對那些將成為帝國總督的受過教育的精英，他如是描述風景：

只能被高雅之士欣賞；而且只有通過音樂、文學和繪畫才能欣賞……一個孩子，出生于有教養的種族，對美具有內在的直覺，而這種直覺源于他出生前幾百年間反復實踐的藝術。

（羅斯金1870；轉引自赫爾辛格1994：139）

實際上，是前一個多世紀的如畫風景美學實踐創造出了羅斯金摯愛的湖區。

同時，羅斯金還將英國的民族風景擴展到未來和異國海岸。他敦促國家“開拓殖民地，能有多快就多快，能有多遠就多遠……抓住每一片她能踏足其上的碩果累累的荒野”（羅斯金1870；轉引自赫爾辛格1994：139）。“碩果累累的荒野”這一表達立即使我們想到土地改良和科學耕種的說辭——其前提就是將原住民驅逐出去和消滅一種生活方式。至于“抓住……荒野”則是以透視性凝視的政治模式說話。

英國風景和異國風景之間這種話語關聯表達了大英帝國意義層面的英國民族主義，也為英國的風景作為民族性賞景的定義性空間這種理念增加了另一維度。下一章我們將討論湖區與康堤風景的意義關聯，以及如何在塔斯馬尼亞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看到湖區和英國其他地方。這些表面和象征的觀景方式體現出政治性和再現性的透視視角的整合，以及英格蘭如何依偎在大英帝國的懷抱。

階級與休閑

非國教派、早期社會主義和工人的教育運動為工人階級徒步運動提供了“刺激和指南”（泰勒1997：85）。漫游俱樂部因其領導者的宗教背景、政治思想、階級成分以及其服務對象而各有差別。[[119]](#_119_37)不是所有的俱樂部都對路權或敞地進入權看法相同。蘇格蘭凱恩戈姆山俱樂部（Cairngorms Club），1889年成立，旨在鼓勵stavaiging（隨意漫游）；而蘇格蘭登山俱樂部，1890年創建，特別撇清自己不介入路權問題。與之對照的是，19世紀90年代組建的利物浦鄉下人（The Liverpool Hobnailers），成員是一幫“固執的漫游者，專門到不準進入的地區散步”（希爾1980：25）。在一個自我完善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休閑漫游與博物學的熱情合二為一。因此漫游具有了教育色彩，而經營漫游則納入了宗教因素。[[120]](#_120_35)

合作假日協會（CHA）由非國教派牧師托馬斯·亞瑟·倫納德（1864—1948）創建。國教會中沒有與之等同的組織，盡管博物學俱樂部的運作始于英國國教會，也經常組織下午或全天漫游。從協會以前未被細察的檔案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主要是工人階級的運動”（CHA，1898年10月8日紀要）如何幫助漫游者觀賞風景。

蘭開夏郡的科恩公理會教長T.A.倫納德，為他的教區組織了一個大眾化的周六下午漫游俱樂部。[[121]](#_121_35)在倫納德的布道里，假日期間“魔鬼的影響不容小覷”（倫納德1891，斯匹克1993：3），他發覺談論“路邊的花朵和華茲華斯”以及自然的“神圣的純潔”是一劑解毒良藥（倫納德，n.d.c.1910）。在1891年6月，他帶領30個男性教區居民在湖區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山地徒步，每個人花費21先令。1893年，268個男女工人前往湖區與倫納德共享一個徒步假日。后來，人數猛增：1894年有673人，1895年有1064人。1894年，倫納德離開教堂，專職管理CHA。該協會在1897年成為一個法定機構。

1897年，它便宜的徒步假日活動一個星期的費用是30先令，而周末只要13先令。根據它1897年2月27日紀要的記載，此時CHA的“女管理人的周工資是25先令，外加三等車廂的火車票錢（也許是從她們家到CHA的票錢）和洗衣津貼”。同一天的內勤委員會紀要則顯示出“女管理人可以讓她的任何一個仆人參加漫游……但要考慮該仆人的品行”。仆人們都是女性。兩年后，內勤委員會紀要稱呼女仆是“助手”。需要指出的是，男性游客被要求幫忙做些廚房體力活和雜務。

CHA假日活動晚上會安排講座和幻燈片放映。1895年成立的演講者委員會對于演講做了規定：

具有隨意的特點……演講的紳士就自然科學、歷史和文學進行即席演講，使用當地的實例；……在戶外談話中，每個演講者需要介紹值得讀的書，最好是“國民家庭閱讀聯合會”（NHRU）通識導讀課指定的好書，而且要求NHRU執行委員會在《通識課程雜志》上專辟兩頁用以刊登1）假日協會通知；2）假日演講談話涉及到的科學和文學問題的答案；3）演講筆記；4）文學作品推薦……作為回報，[協會]保證追加500個成員加入閱讀聯合會，或向其支付同等數目的費用。

（1899年3月24日CHA紀要，116—117）

CHA還與倫敦技術學院達成協議，廣告宣傳彼此的假日項目。[[122]](#_122_35)CHA假日活動包括由約翰·布朗·佩頓（1830—1911）指導下的早禱，佩頓是國民家庭閱讀聯合會[[123]](#_123_35)的非國教派教育家。某位馬蒂諾博士與他一起工作，確保活動的適當性（1897年10月23日CHA紀要）。這人很可能是哈麗特·馬蒂諾的兄弟，唯一神教派教長詹姆斯·馬蒂諾（1805—1900）。哈麗特是工人階級到湖區度假[[124]](#_124_35)的堅定支持者。晨禱由假日團隊的當地秘書朗讀，但這種職責“并非強制性的，如果秘書不愿意自己履行這個職責，他得盡量找個人代替”。團隊秘書通常是男性。

根據1899年3月24日CHA紀要的記載，湖區保護協會的科倫·羅恩斯利（后來成為CHA的理事）就他們在惠特比的房子寫了一首十四行詩。盡管這首詩沒有在紀要中全文保存下來，但結尾詩行在其他地方發表過。第三章討論過的游吟民族主義涉及一種假想的、前都市時代的人與地方和諧，而這首維多利亞時代的游吟民族主義詩歌充滿了工人與他們在生活中的地方和諧相處的神奇幻象：

勞動的世界——勝過凱德蒙[[125]](#_125_35)之華章

高貴的音樂在我們英格蘭流淌。

在這兒，山坡上的希爾達教堂，

上帝的豎琴又開始奏響

愛情之樂，同情之音。

但見工人們來到，接二連三

離去時精神滿滿，帶走音樂的甜蜜希望

人類兄弟情誼的時光，一曲悠揚。

（羅恩斯利1897；轉引自斯匹克1993：39）

通過與羅恩斯利這樣人士的聯系，CHA加大了風景保護的努力。例如，1898年執行委員會決定協會要簽署一份抗議，阻止建造通往威爾士的貝德格勒特的輕軌鐵路，并決定就此事“倡議協會成員與各自選區的議員聯系”（CHA，1898年2月19日紀要）。所謂成員即指每一個參加CHA假日的人。

假日吸引的人數太多，因此協會決定“成員們組成分隊參加活動，每隊由自己的負責人維持秩序”。每星期的活動人數限于50人的建議并未得到執行（CHA，1897年10月23日紀要）。許多婦女要求參加CHA假日，協會決定“女性的比例不得超過總人數的2/3，而且為了減少男性成員的登記障礙，……對遲預訂者收取的費用從2先令6便士減少到1先令（1897年1月4日和5日紀要）。沒有證據顯示為什么認為男性會在最后一刻才預定假日活動，而女性總是提前預定——難道因為婦女外出度假要看月經周期，較少隨意預訂？或許因為婦女更難立刻抽身離開工作？

CHA“新鮮空氣基金”對前往格拉斯哥、布拉德福、謝菲爾德、利物浦、利茲和曼徹斯特徒步者每人支付7英鎊，前往諾丁漢和奧海姆每人支付4英鎊（CHA，1895年12月30日紀要）。CHA自己的窮人假日項目（享受“休息和自由”而非遠足的假日）有時只讓女性參加。這類資助性質的假日項目一直持續到二戰時期，有關報告表明女性構成了游客中的大多數。[[126]](#_126_35)

CHA假日徒步項目非常成功，漫游俱樂部的數量增加很快，特別是在中部地區。為了與俱樂部保持聯系，協會出版了一份小開本的月刊《同志之誼》。月刊包含短篇文章、書評、回憶、協會“鄉親”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聲明、各中心的照片和免費假日項目一覽表、協會官員的主要文章及俱樂部新聞。[[127]](#_127_35)

盡管參加CHA的假日項目和加入當地CHA俱樂部的女性數目龐大，但描述徒步活動的方式和語氣卻明顯是男性的。而且那是一個自我意識不那么強烈的世界，下面關于徒步的段落可以看上去完全沒有任何性別含義：

……真正熱愛大自然的人是從來無法“抵達”的人。隨著越來越親近，他的驚嘆變成歡樂，歡樂又轉成愛戀。他……感覺越來越有在家的感覺，然而他的追求受到許多無以名狀的非智性因素的制約……在吹拂他臉頰上的柔風之后……深深隱藏在……他所攀登的山肩之下的，是許許多多深不可測的問題……然而人……繼續沿著“那迷宮一樣的真理之幽徑”追尋下去，認為[這樣做]就會有一天能了解自己。

（《同志之誼》17卷，1914年3月，“芝麻開門”，4：52）

性別問題在《同志之誼》的刊頭以不同方式再現。起初，刊頭是一條狹窄水平帶，由重疊的人字形標志分成三塊。最大的中間那塊畫了一個年輕男士，背著帆布背包，一只手拿著手杖，面對著手拿一小枝橡樹葉的年輕女子。男士的視線越過女子，女子則直視著我們。他們的右臂伸向對方，兩手緊握成兄弟般“同志”的姿勢。他們身后矗立著一棵樹，幾乎填滿畫面，兩邊各有遠山、懸崖和大海。左右的兩塊中各有一棵小橡樹苗，其中一棵的根部由書本支撐著，另一棵則環繞著鮮花，花叢中是一個帆布背包，帶扣上印有首字母CHA。設計沒有署名。

到了1924年，刊頭放大，畫面也變了。兩個年輕男士和一個年輕女子坐在青草茂盛的小山上俯瞰大海，一本書放在女子身旁。另一個女子披著一件斗篷，站在這群人后面，也在眺望著大海。唯一可見的鞋子是步行鞋而不是靴子。在小山丘上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樹。背景的一邊是群山，另一邊是海崖和海灘。在下方，像是給他們休息的地方襯底，是刊物標題《同志之誼》，兩側畫著帆布背包和敞開的書本。[[128]](#_128_35)

到了1932年，全幅的封面替代了窄幅的刊頭。前景是一棵巨大的橡樹，枝干延伸到海島之外，中景的一側是一個衰敗的城堡，另一側是有著尖塔教堂的村莊。群山構成背景。群鳥從城堡的要塞和村莊飛起，圍繞著橡樹飛翔。樹的上方是弧形的《同志之誼》字樣，而樹中飄出一個束帶，上面寫著“合作假日協會雜志”，這些在橡樹中部形成了一個心形圖案，其中穿插著CHA幾個字母。CHA組織的要旨就是融合同志之誼和國家之愛。

在英國歷史上橡樹一直具有象征意義（托馬斯1983）。前前后后，國王和叛亂者都挪用過橡樹的象征，表達不同的政治觀點。至于海洋，它在刊頭所占空間不斷擴大。在1911年版式中它處于次要位置，而在1932年版式中則占據了主要位置，意義顯然非常重要，這表達了與CHA政治觀念不相符的島國褊狹狀態。CHA是國際聯盟的一個成員機構，它從自己下轄的各個分支機構收集簽名，提交給1932年2月的日內瓦裁軍會議（《同志之誼》23卷，1931年12月，“世界裁軍”，2：5）。它長期通過內刊宣傳自己的理念：“CHA的部分工作就是幫助推進國際運動”，為了這個目的，協會呼吁人們學習法語或德語以便在出國旅行時能夠與“同伴”交流（《同志之誼》5卷，1911年9月，“CHA”，1：3）。到1913年，CHA已經有42個假日中心，其中5個在愛爾蘭，5個在歐洲大陸（泰勒1997）。

一戰期間，《同志之誼》似乎幸運地擺脫了過激好戰的愛國主義的影響，即使它呼吁自己的成員機構接納比利時難民。[[129]](#_129_35)雜志刊登了在部隊服役的CHA成員的信件，可想而知，也包括對他們在國外行軍時所見風景的描述。駐扎在印度的阿爾伯特王子團的一個列兵H.H.格蘭杰在寫于1914節禮日[[130]](#_130_35)的一封信中證實了華茲華斯的觀點，即湖區能以某種方式被眼睛領悟，那是雄偉的阿爾卑斯山所不能的。列兵格蘭杰的信（部分）這樣寫道：

我們三個……攀上了印度南部最高峰，尼爾格里的多達貝塔山。山峰海拔高達九千英尺……盡管多達貝塔非常高，視野開闊，景色壯麗，但我仍然認為它遠遠不及我們那些低矮得多的山巒氣勢奪人。這座山呈大約海拔兩千英尺高的階地逐級抬升，階地之間彼此掩映，使你無法盡情欣賞到山的主峰和它的氣勢。

（《同志之誼》14卷，1915年10月，“書信”，1：14）

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對湖區神話般的想象，部分來自早期山地徒步和攀巖的同好們。他們在寫到這些野外活動時，都把自己當成中心人物——盡管世世代代的牧羊人和當地人早已徒步過山地，攀登過巖石。的確，休閑活動歷史是基于“新生事物由上層社會發起而逐漸傳播到下層社會這一假設”來書寫的（坎寧安1980：10）。早些時候，人們把湖區如畫風景與阿爾卑斯山聯系起來，后來又通過地貌特征的比照來確認二者的聯系——比如萊斯利·史蒂芬斯就求證于冬天或早春的湖區景色，因為這時湖區冰雪覆蓋，幾近阿爾卑斯的情狀。[[131]](#_131_35)自19世紀中期以來，頗有難度的攀巖運動已經流行開來，但到了19世紀80年代初，

湖區的巖崖和主峰前的拱壁被大多數專業攀巖者系統性地突擊。阿爾卑斯山區幾乎所有的高峰全被征服，這就意味著登山同好者越來越轉向攀巖運動，與單純而簡單的登山活動截然不同。

（里福布爾1977：249）

這樣，登山家開發出湖區一些著名的巖峰。攀巖者拍攝的照片被制成明信片和幻燈，當作攀巖書籍的插圖，從而使湖區更加出名（克雷格1992；里福布爾1977；米爾納1986）。

在帝國和開發時期，湖區的攀登活動滿足了“竭盡體力極限的欲望……這[給人以]征服的快樂，而不會給被征服的對象帶來不幸”（米爾納1986：109；轉引自科盧克1900）。由于越來越多的人想登山，于是一個新的登山俱樂部在1898年成立，和阿爾卑斯俱樂部一樣，這個登山俱樂部也只接受有專業和大學背景的會員。1907年，英國湖區山地和攀巖俱樂部成立，會員資格放寬，接受工人階級入會，他們可以騎自行車從附近城鎮趕到湖區參加活動。與阿爾卑斯俱樂部不同的是，這個俱樂部接納“女士”，她們不僅具備入會資格而且還有優惠折扣。

在一次關于湖區山地徒步和攀巖的講解中，階級問題跳了出來——講解是1984年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舉辦的專題討論會的一部分。這個討論會與題為“發現湖區”（默多克1984）的展覽合辦，期間正在醞釀湖區國家公園入選世界遺產的事宜（提名后來遭到否決）。[[132]](#_132_35)正如講解中的例子所顯示那樣，階級、自上而下傳播、命名和言論壓制交織在一起。

沃特·帕里·哈思科特·史密斯開始他的一系列精彩的登山活動。他當時21歲，偶然地選擇了沃斯代爾黑德（Wasdale Head）作為劍橋的兩個閱讀小組的登山基地。他本人原是伊頓公學的學生，就讀于劍橋，后來當了律師，他的背景與阿爾卑斯俱樂部其他人一樣……

1888年，塞西爾·斯林思比，一個約克郡商人和阿爾卑斯俱樂部會員……告誡其他的會員“不要在我們自己的山地被外來者打敗……在我們征服海外時，不要忽略湖區”。

另一個先驅是諾曼·科里教授，一名出色的科學家……1892年他領隊第一次攀登斯可斐峰（Scafell）的莫斯峽谷。

伯肯黑德的律師戈弗雷·索里是第一個從更險峻更裸露的路線登山的人，1892年他登上了大蓋布爾鷹巢山脊。

1890年，一顆新星升起，也許是最偉大的一顆，歐文·格里恩·瓊斯，威爾士人，但出生在倫敦。一名年僅23歲的教師……（著重號為后加）

1914年，湖區在英國登山地區中首屈一指，此時一個曼徹斯特的年輕人首次登上了斯可斐峰的中心拱壁石柱。此后20年中這都是本國難度最大的攀登。

（米爾納1986：106—112）

在一一列舉出來的登山精英的名字、教育背景和職業之后，出現了一個曼徹斯特的年輕人，他的成就人所共知，但本人的名字卻隱而不彰。實際上，他就是西格弗里德·W.黑爾福德，1915年12月在戰壕中陣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國家戰斗過的工人階級要求進入鄉村。[[133]](#_133_35)便宜的火車票價和自行車俱樂部的增加，使得成群的年輕工人和中產階級人士出發來到開闊的鄉村。人們對無年長婦女陪伴的少女的活動和衣著態度不再那么嚴厲，這也促進了外出漫游。然而，一些婦女仍然感覺裙子下面還要穿上長及膝蓋的短褲太礙事：行走路上，當最后一所村莊拋在身后時，她們脫下裙子塞進帆布背包里。來自北部工業地區的工人曾接受過峰區登山訓練，他們可以在周末騎著分期付款購買的摩托車，花費不多而又快捷地抵達湖區。[[134]](#_134_35)在那兒他們開辟了新的登山路線，使這項運動顯示出激進的工人階級色彩，特別是在他們穿著襪子或赤腳登山時（庫克1974；希爾1980；泰勒1997）。

登山者的鞋子千奇百怪，從昂貴的登山靴到“國產的”仿版，釘有平頭釘的靴子。登山靴的鞋緣釘著軟鐵釘，要在阿爾卑斯山區加穆尼克斯谷等地方買，而便宜的膠底鞋（橡膠鞋底的帆布鞋）每個人都能買得起：

在斯可斐峰……我們發現橡膠底鞋子真不錯——沒有一次滑跤。我們常常看到巖石上有平頭釘靴子的劃痕，有半碼長，而穿橡膠鞋卻從來不滑腳。

（史密斯c.1922n.p.）[[135]](#_135_35)

但是對山地的體驗也取決于食物和住宿。在斯可斐峰進行了一天艱苦的攀登后，

我們餓得要死，渴得要命，洗漱過后，坐在吸煙室里喝著特別為我們準備好的茶。喝完茶，晚飯已經備好，我們，沒有什么好扭捏的，像狼一樣走進餐室撲過去！我們大吃大喝，風卷殘云。

（史密斯c.1922n.p.）

人們可以用最少的錢到湖區這樣旅行一次：

在度過了兩三天最美妙的日子后，周五我們不得不離開格拉斯米爾。我們花錢不多，卻得到了古迪橋旅舍的波維克太太的悉心照顧，每晚僅需6先令，包括晚餐、床鋪和早餐。還有人說湖區價格太貴！實際上，這是各地的通常價格。

（史密斯c.1922n.p.）

按照這樣的開銷，15英鎊可以在湖區過上一個月。而在阿爾卑斯山，光一個月的向導費就是這個數的10倍。

湖區正成為休閑的好去處，不同階級的人會在此相逢或者至少在這兒打個照面。1910年和1914年的弗內斯鐵路海報廣告聲稱：

游覽優待票和周末票全年有售，包括夏季從倫敦和其他主要外省車站發車的便宜的旅行車票。若需要帶插圖的導游手冊、旅游項目指南等，可向鐵路管理者申請。

（湖濱鐵路學會）

湖區的介紹向遠足者呈現了文學家和油畫大師所贊頌的如畫風景。有些海報描述了“英國湖岸”和“英國湖泊”沐浴在月光下的美景。另一些則展示了別墅以及周圍如畫風景的小插圖，這些是羅姆尼、羅斯金、騷塞和華茲華斯居住過的地方（每個人的名字都出現在對應的插圖上）。

空間進入權的斗爭與政治進入權的斗爭交織在一起。1918年初（戰爭結束前幾個月）通過的第四次改革議案，某種程度上接近了認可婦女選舉權的要求，婦女在戰爭中證明了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136]](#_136_35)政治進入權的斗爭多少算是取得了勝利，工人階級選民要求空間進入權的斗爭可以更加堅定地插入政治舞臺。

條條路徑交集：道路進入權、敞地進入權和風景維護

如果一條人行道要被視為法定公用道路，它就得從一處居民點通向另一處居民點，1900年公用地協會以薩里郡的里士滿山為例質疑了這種觀點。協會已經在那兒介入哈姆和彼得沙姆公用地的保護，這項計劃

與保護運動密切聯系，要保護里士滿山下一帶泰晤士河和山谷的秀美全景免遭建筑的毀損——這兒是倫敦附近所能發現的最美風景之一，是藝術家經常光顧的地方，是詩人垂青的主題。

（埃弗斯利1910：232）

這一個案說明通向山峰或觀景點的道路也可以被視為公眾有權通過的道路。

為了進一步保護“里士滿山的中遠景”，敞地協會、郡議會和地方當局一起集資買下了依據普通法而被圈起來的公用地。1902年的《里士滿山、彼得沙姆和哈姆法案》是第一個“體現出地方當局為保護風景而購買地產的原則”的法案（埃弗斯利1910：236）。身帶汗味的俗人，連同那些淡定而有審美情趣的精英，都獲得了選擇某個觀景點欣賞風景的權利。

早期大多數人行道保護協會的目的是維護或重新開放當地古老道路的通行權。敞地進入權的推動則是19世紀末期的一個發展。為了更成功地爭取公眾進入沼澤地和公用地的權利，各類漫游俱樂部在20世紀初期開始結成聯盟。因此，以倫敦為大本營的漫游俱樂部聯盟（FRC），公用地協會的一個分支，與布里斯托爾、加迪夫、達令敦和紐卡斯爾的俱樂部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這些聯盟活動，1926年，謝菲爾德地區二十個左右的工人階級漫游俱樂部完成了結盟的進程。在那時，還有38個漫游俱樂部結為曼徹斯特聯盟（霍特1995）。1931年，11個地區聯合會組成了國家漫游者聯盟委員會。

敞地進入權和政治進入權的要求相互交織，彼此呼應。徒步俱樂部形成了更成熟的政治策略，利用議會政治達到目標。因此，1922年成立的漫游俱樂部曼徹斯特地區聯盟通過這樣的問題來考察那年的大選候選人：“如果你當選，你愿意與我們合作提交公眾自由進入沼澤和山區的議案嗎？”（希爾1980：57）

在工業界動蕩不寧的時期，英國農業也遭遇到世界競爭的影響。當經濟和社會危機持續不減時，土地使用規劃者意識到休閑性進入權必須納入正發生在鄉村里的經濟和策略變化中（羅杰斯1989；泰勒1997）。饑餓、無家可歸和失業現象在北部地區比南部地區更嚴重，而政府位于南部地區，看起來對這一切漠不關心。窮困潦倒的流浪、饑餓游行、無家可歸和大量的失業與上層階級理想化的“徒步旅行”同時并存（萊特1985）。與那種“徒步旅行”聯系在一起的是孤獨的長途漫步者（他通常受過大學教育），要么是牛津劍橋的閱讀小組成員，要么是萊斯利·史蒂芬斯那樣的周日徒步者。換言之，“徒步旅行”顯然大都是有南部郡縣的傾向。

1926年大罷工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社會影響分布并不均勻，這意味著英國東南部在經濟上相對而言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繁榮起來。郊區住宅區，或人們所說的“帶狀開發”（建筑沿著主干道延伸）得到國家電力網、鐵路網和汽車的支撐。當中產階級移居郊區時，更富裕的階層則進入鄉村。

混凝土路面又沒有樹籬的主干道、沿線密布的大型廣告牌、加油站、高聳的電線鐵塔、頭頂上交織的電話線和電線，支持了一片片蠶食著郊區的“平房皮垢”，而道路、小汽車和公共汽車為城市下層階級的短途旅行提供便利，使他們能夠更快地到達更遠的地方野餐，丟下垃圾（班斯1994；瓊斯1990；杰弗里1983；羅溫薩1980；紐比1987）。[[137]](#_137_35)英格蘭的“丑陋化”再次促使擁有土地的上層階級出來保護風景。郊區居民可未必喜歡一些農業活動——就是這些農業活動造就了他們如此樂于侵擾的風景（米勒1955a）。

進入權開始裹上了美學修辭外衣。風景保護的推動獲得了組織形式，1926年成立了英格蘭鄉村保存委員會（CPRE），下轄40個分支機構，代表了各類與土地相關的利益集團。[[138]](#_138_35)其支持者是“一群積極撰文保衛鄉村的知識分子”（瓊斯1990：251），他們充當事實上的游說團。在風景保護曲折的進程中，有一個預示了后來遺產業興起的曖昧情況，那就是旅游業支持保護，因為永恒的英國風景是新近汽車化的旅游業的賣點，特別是吸引國外游客。

那些保護目標中隱含著具有反諷意味的雙重困境，即一旦什么地方被認為是特別的、值得保護的，它就會成為越來越多人興趣的焦點。對鄉村而言，普通人對它的興趣在當時被視為一個問題。喬治·麥考利·特里維廉（1876—1962），英國歷史學家，其可讀性極強的著作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暢銷書，他也處于這種雙重困境之中。他的歷史改良觀——人類有力量使歷史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前進、進步和改善的過程，忽略了社會黑暗面。人們會將他關于心靈普遍進化的理念歸因于他與達爾文和赫胥黎兩人的關系。然而，去掉他的歷史觀陽光一面，則是他針對城市英國以及它入侵鄉村之進程的文化悲觀主義。在貶低城市、頌揚鄉村時，他幫助孕育了他所譴責的行動（卡納戴恩1992；科里尼1992）。

最新出版的特里維廉傳記（卡納戴恩1992）展示了知識圈、政治圈和社團圈之間的交互關系。從這種聯系里可以瞥見他們與風景美學、土地使用規劃、風景維護和進入權之間的關聯。特里維廉的父親喬治·奧特·特里維廉有位密友詹姆斯·布萊斯，是許多蘇格蘭山區進入議案的支持者（見第四章一覽表5）。老特里維廉和布萊斯兩個人都發現了長途徒步對精神的慰藉作用，這正是小特里維廉身體力行的。

早在劍橋求學期間，特里維廉就參加了復活節假期閱讀小組到湖區波羅戴爾山谷的斯特勒的旅行。從1898年開始，特里維廉和一群朋友在湖區集合舉行他們自己的圣神降臨周徒步，這項活動持續了近20年，只偶有幾次中斷。特里維廉是華茲華斯的崇拜者，1912年積極參與國民托管組織事務，特別支持它在湖區的所作所為。他直言批評那些在湖區修路和豎電線塔的提議，認為那兒的“德國”針葉樹人造林會成為“違反自然的地方法則的罪行”（轉引自卡納戴恩1992：156）。許多年里，特里維廉自己購買湖區土地，然后捐贈給托管組織。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許多大貴族的莊園被分割，四分之一的英格蘭被推向市場”（卡納戴恩1992：151）。國民托管組織的工作當然變得特別緊迫起來，特里維廉成為籌資買地活動的領軍人物，促使那些政治上有影響力的朋友如斯坦利·鮑德溫和拉姆奇·麥克唐納以及其他貴族和知識分子精英一起行動。部分由于他的努力，托管組織在湖區擁有的土地在20世紀20年代增加了近1萬英畝。

特里維廉1926年被選進國民托管組織理事會，任職于地產委員會（1928—1949年任主席）和執行委員會（1929—1946年任副主席）。作為1941年地產委員會主席，特里維廉在接收兄弟查爾斯·特里維廉爵士捐贈時處于一個奇特的地位，后者捐贈了沃林頓宅邸，家族的17世紀諾森伯蘭別墅及其占地1萬3千英畝的莊園（威廉斯·艾里斯1947）。查爾斯·特里維廉在1945年后擔任過最初兩屆工黨政府的教育部長，長期積極從事議會的風景保護項目和進入權活動（見第四章一覽表5）。大蕭條時期，他把沃林頓的附屬建筑改建成宿舍提供給諾森伯蘭徒步旅行者聯盟，后來又把這些宿舍捐贈給青年旅社協會（泰勒1997），他的兄弟喬治是該協會第一任會長。

由于特里維廉在國民托管組織擔任過各種官職，他的意見得以進入CPRE（英格蘭鄉村保存委員會）。迫于CPRE的壓力，政府在1929年成立了國家公園委員會，考慮是否建立一個或多個國家公園和在什么地方建的問題。相關考慮在《艾迪生委員會報告》中有所體現（見一覽表6），委員會建議實現兩級體制：地區性保護區允許休閑性進入，而國家保護區成為科學目的的自然保護和觀察活動的專門區域（迪特1996；霍特1995；泰勒1997）。[[139]](#_139_35)

在當時席卷英國的關于混亂和變化的一般性討論中，規劃者和風景維護者之間的辯論被解讀成“特別的、風景化的英國公民權版本”（麥特李斯1995：93）。華茲華斯曾將湖區描述為“一種國家財產……每個有感受的眼光和欣賞的心靈的人有權亦有興趣擁有”。羅斯金的目標就是培養這種眼光和心靈。針對英國丑陋化，城市和鄉村規劃發展了浪漫主義的思想（迪特1996），強調大自然非物質性價值的重要性，強化品味和法定的美學。當然，

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勢力不可小覷的“環境游說團”已經出現，致力于保護鄉村免受城市無序擴張和城市方式的威脅……提倡鄉村的精神愉悅，保護鄉村免受大量游客的“瘋狂涌入”，非常明顯，這是一種兩難局面……為了“國家”，鄉村需要保護，但是要遠離“公眾”。

（紐比1987：176，著重號為原文）

《艾迪生委員會報告》提名把湖區規劃成國家保護區，結果1932年形成了一個坎伯蘭區域規劃機制。官方承認湖區是一個跨越了坎伯蘭、威斯特摩蘭、蘭開夏各郡行政界限的整體，要求“湖泊地區”成立單獨的規劃機構。湖區之友（FLD）很快成立，以便取得這片風景保護和維護的發言權。華茲華斯學會里的牛津劍橋成員曾經是19世紀80年代創立湖區保護協會的后援（見155頁）。現在，在喬治·特里維廉幫助下，劍橋成立了湖區之友分部。

1934年6月17日湖區之友成立大會上拍攝的一幅主要組織者和支持者照片中，前排有T.A.倫納德（CHA及1913年成立的分支——假日聯盟的創立者）和查爾斯·特里維廉爵士，后排有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土建設計和城市規劃教授，后來封為爵士。這群人站在凱西克的菲茨公園入口處的最高臺階上。懷特黑文的羅蘭·泰勒（當地漫游者協會活動的領導者）站在略靠一邊的地方，比那些風景保護界的國家級和地區級名人低一個臺階。泰勒不同于其他男士（除了那些穿牧師服的人外），既沒有穿三件套西裝也沒有打領帶，他的襯衣領口敞開，翻在一件看起來像是休閑西服的上衣領子外面。他與這些名人群體拉開距離，由此可見他們的階級關系。[[140]](#_140_35)

1935年，在地理學家沃恩·科尼什（他曾從華茲華斯那里和自己的美國及南非國家公園之行中大受啟發）的影響下（迪特1996），CPRE成立了國家公園常務委員會。該委員會代表來自漫游聯盟、野營、自行車和摩托車俱樂部及其他各類科學團體。常務委員會贊成艾迪生委員會關于兩級體制的設想，但由于大蕭條的阻礙，中央政府沒有落實任何一項建議。

漫游聯盟就此議題產生分歧：是全力投入國家公園和人行道保護，還是呼吁向公眾開放山區、沼澤地、公用地和私人未開發的土地。1935年，國家漫游者俱樂部聯盟變身為漫游者協會（RA），全力支持推進國家公園計劃。其他支持國家公園的機構有CHA、假日同盟和自行車旅游俱樂部。曼徹斯特聯盟致力于進入敞地，拒絕使自己成為新協會的分支。公用地協會和CPRE主張通過協商討論進入權問題，而國民托管組織的主要使命是保護風景，而不是推進公眾的進入權（洛厄1989）。然而，那個公眾卻不容忽略。

工人階級的徒步旅行和漫游已經從普及達到狂熱的程度。20世紀30年代初期，據估計“定期徒步鄉村的人有50萬。僅在德比郡峰區，一個夏季周末徒步人數就達到1萬”（洛厄1989：122）。有些實際集合到一起徒步的團隊規模驚人：200人、300人、700人、800人甚至1600人！（泰勒1997）下面這個普通的例子取自湖區（按今天的標準人數也夠龐大的了）：

我們……在卡特貝爾斯開始登山，徑直順著山脊攀爬，越過梅頓沼地、內洛沼地和伊爾峭壁，抵達戴爾海德山峰并在那里吃午飯。休息時看到我們的第一批“團隊”，他們正在攀登羅賓森山，在天際線的映襯下，看起來就像許多根火柴。這個團隊大約，我估計，有60到70人。

（史密斯c.1922n.p.）

自行車、汽車和協商而來的便宜火車票，是漫游俱樂部逃離城市的工具；縮短了的工作周和到教堂做禮拜的次數減少，這一切使人們能夠在周末外出放松。一首漫游者之歌反映了這種感覺：

我是一個漫游者，一個來自曼徹斯特的漫游者

艱難跋涉在沼澤，我獲得我全部的快樂

我也許是工資奴隸，在周一；

但我是一個自由人，在周七……[[141]](#_141_35)

當然，出去漫游的還有失業者。對他們而言，這一點與19世紀極為相似，走出城鎮的唯一成本就是靴子磨損或騎車到沼澤地所耗費的體力。[[142]](#_142_35)

E.V.盧卡斯的《開闊路：給旅行者的一本小書》在1899年初版，到1932年已經再版40個版次。[[143]](#_143_35)這本袖珍詩歌選集將文學與風景匹配起來，用的是一個年輕的徒步旅行者的視角，與畫室的風景視角截然相反。這些詩歌是散發出懷舊氣息的“鄉村”文學奇葩的一部分。193217年，鄉村作家S.P.B.梅斯應英國廣播公司的要求進行了穿越英國1萬5千英里的旅行。他的徒步經歷構成了一系列BBC談話節目，旨在激發“聽眾的欲望：探索并重新發現自己的島嶼”（轉引自泰勒1997：231）。梅斯顯然叩動了人們的心弦。1932年，當他組織一次半夜火車遠足，前往蘇塞克斯的占克頓伯里圈[[144]](#_144_35)觀看日出時，有1萬6千人前往！不幸的是，太陽被云層遮蓋了（洛厄森1980）。

想想看大批游客圍著某個風景點散步的情景，發現漫游者（ramblers）、徒步者（hikers）和遠足者（trippers）之間有些矛盾摩擦或許也就不足為奇。從漫游者、登山者和高尚的風景維護者角度來看，遠足者都是些隨地亂扔東西、聽收音機、吵吵鬧鬧的城市人，而漫游者（根據一份RA的文章）將徒步者視為“小鎮人”，對于他們應該很了解的鄉村知之甚少（霍特1995）。

工人階級徒步者在鄉村很容易受到生理和語言的騷擾（霍特1995），并在文學作品中受到嘲弄。瑪麗·巴茨的《給徒步者的警告》（1932）嚴厲斥責來自中部地區的工人徒步者土腔土調、語言“粗俗”、鞋子不得體，認為他們沒有能力欣賞真正的英格蘭，因為他們的欣賞不具備“[巴茨]自己的綠色世界那種深度的真實性”（萊特1985：121—122）。巴茨認為徒步的狂熱（她沒有使用“漫游”一詞）并不意味著回歸自然，而是表達了一種自然崇拜，為之陶醉的人即那些“我們的新野蠻人——成長于一個人類前所未知的、其內部丑陋不堪的世界”，他們急于逃離這個世界（巴茨1932：15）。[[145]](#_145_35)

巴茨的《警告》想象出植根于這片土地的一種新的游吟民族主義，在這里，逃逸的城市人沒有“地方”。徒步者一旦

……邁出一步，越出了保護線，每個人就被身上的城市需求和價值之帶緊緊地捆住了，他們會發覺自己來到了一個充滿詭譎和不確定性的世界，猶如雅典附近的樹林一樣，到處是陌生的。沒有詩人界定的友善的樹林；沒有神靈出沒的智慧之山；沒有寬厚的大海。恐龍綠、明亮、黑暗、蛇魔出沒。他們能面對嗎？當海妖們重操舊業，鷹身女妖的姐妹們，攫掠者出現？當遠足汽船——船首對著太陽——變成一艘稱為億萬年的小船？

森林寂靜。它們可以非常寂靜，當風不知從哪兒的樹梢刮起，穿過松針，豎琴音響掠過樹干，散入大地。沒有鳥歌唱。

（巴茨1923：36，著重號為原文）

約克公爵，未來的國王喬治六世對徒步者的看法就沒有這樣悲觀，更少宿命色彩。1933年5月，

他的一個演講中包括“為徒步者辯護的一句話”。與“很少能欣賞英格蘭之可愛的開車人相比……那些徒步穿越森林，翻過群山，那些在草地上星空下露宿，那些聽到夜鶯在巢里唱歌的人……真正了解英格蘭”。

（轉引自霍特1995：5）[[146]](#_146_35)

那些逃逸的野蠻人本人怎么想呢？倫敦坎伯威爾的一位G.M.布盧克小姐為CHA寫了一篇題為“本能的假日”的獲獎散文。她顯然與某種東西在同聲應和，她寫到那種“強迫性的本能”使她轉身離開

富裕、富得流油的許多南方郡縣……空中的一種氣味、一次日落、一次隨意的交談……會使[強烈的本能]復蘇，新鮮而令人騷動。接著就是……北方，山區和荒野，向我撲來……倫敦變成……磚砌起的丑陋的光禿禿的沙漠……隨后是一種極度的不安，一種對所有城市和整潔的郊區的厭惡，對命運的無奈，此時心靈的平靜已經不復存在。

（《同志之誼》23卷，1931年12月，“假日本能”，2：11—12）

在國家漸漸卷入戰爭的時候，有些人不禁有些歡迎一種想法：那些磚砌起來的丑陋的新城鎮會被炸彈夷為平地。

來吧，友善的炸彈，落在斯勞市

它已經不再適合于人類棲居，

那里已無青青牧草

蜂擁而來吧，死亡！

……攪爛那被稱為城鎮的爛地方……

貝杰曼[[147]](#_147_35)1937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把人們有關城鄉規劃、進入景區和休閑的想法以及對國家公園體系的需要付諸實現。因為在戰爭時期的聯合政府中，對于鄉村狀況的焦慮與進入鄉村的要求迎頭相撞。

## 六 進入/可進入性：私有財產與國家公園

《斯科特報告，1942年》

鄉村是所有人的遺產——這句斷言意味著一個推論：必須讓所有人享有進入鄉村的便利。

轉引自希爾1980：86

《關于人行道和鄉村進入權的報告，1947年》

工業革命把人們連根拔起，越來越遠離古老的土壤，原初的環境蕩然無存，鄉村變得遙不可及，人們與鄉村的親密聯系被剝奪了……從這種都市現狀里產生不出有能耐的男男女女。

轉引自馬希1982：13

正是那些專業人士或半專業人士領導了國家公園運動，而進入權運動則肇始于北部工業城鎮普通的漫游者。有些人認為是由于社會等級的差別，國家公園運動比進入權運動成果更可觀。這一觀點是對現實情形的誤讀。一個是可以在任何荒地上徒步的權利，另一個是控制私人土地用途的權利，比較而言，前者更多地侵占了私人土地排他性的權利。后者作用消極，而隨便在任何荒地上徒步的行為則非常主動。

希爾1980：114

既然25%的財政和大量的[國家公園]控制權屬于地方，國家公園其實只是部分屬于國家；既然它們對休閑業的貢獻有限，又有沖突，它們也只能算是部分意義上的公園。

西蒙斯1975：111

引言

菲利普·科里根和德里克·賽耶斷言，“在許多文獻中，無論是國家機構和活動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內涵，還是文化形式所具有的國家調控的特性與范圍，都未能得到恰當的體現”（科里根和賽耶1985：2）。國家對于休閑文化的調控和國家關于民族性及文化身份的具體化和表達，構成了英國的進入權立法史和國家公園體制的皮殼。國家與保護組織的目標對象相互交扣，融入立法史之中，它們的文化形式特征并不少于它們所要保護的風景。

早期的保護法規，諸如針對風景中建筑物的1882年和1913年《古代遺跡法案》，反映出一種崇古興趣。當美學—生態的興趣得到法律的保護時，建筑物和風景被認為“是一種集體遺產，表達了民族精神的本質……定義出民族的身份認同”（洛厄1989：119）。對于早期保護措施的反對乃是出于一種擔心，即擔心一旦強調公眾利益就會犧牲私有權。當公眾利益通過保護湖區的行動獲得了全國的關注之后，解決這一沖突的辦法就是在私有權的關系構架里，通過國民托管組織這種機構進行協商：

……托管組織產業的不可剝奪性可被視為（也被籌劃為）對財產關系的維護：對“自然美景”和“歷史遺跡”這些由歷史限定的范疇的輝煌運用，證明私有財產是符合全國公眾利益的。

（萊特1985：52）

專為國家公園而出臺的賦權法例再次引起恐懼：私有財產權也許會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削減。事實并非如此。

本章是對導致了國家公園賦權法例產生的議會委員會工作的概述，也是對實際的立法情況的綜覽。本章突出地論述了存在于國家公園之內的各種糾紛與沖突，諸如農業開墾、住宅建設、休閑和自然保護的要求，以及中央政府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與競爭（克勞特1984；迪特1996；希利等1988；霍特1995；湖區國家公園規劃1986；洛厄1988；莫蒙特1983；紐比1987；魯迪格1995；西蒙斯1975；惠特比和奧里恩修1988）。結論部分討論了20世紀90年代期間再次興起進入敞地的要求而起的爭議，以及圍繞私有財產基本特性、土地私有權與公眾權孰重孰輕展開的辯論。

文化建構又稱定義

公用地：在英國，“公用地”（commons），或公用的土地，并非共同財產。歷史上，公用地就是沒有圈用的荒地（山林、沼地、荒野或有草的山地），遠離住宅附近的可耕地、草甸和牧場之外。《默頓法案》（1235年）承認了莊園主對公用地的權利。1925年的《財產法》將城區范疇內的公用地納入公共領域，[[148]](#_148_35)但未賦予公眾進入城市之外公用地的合法權利，盡管事實上公眾一直在使用這類公用地（即“被容忍使用”）。與土地主達成的進入私人土地的協議，或者與莊園主達成的進入公用地的協議，是一種有時附有季節限制條件的“法律上的進入權”（de jure access）。英國公用地莊園制以及敞田的公共使用，盡管被用來建構了“公用地悲劇”的主題，但這主題扭曲得已經面目全非（哈爾丁1977）。由于有嚴格的規定，英國公用地和公管公用的敞地牧場，決不是聽任追求私利的經濟合理化或利益最大化的個體行為擺布的。[[149]](#_149_35)

路權：規則繁多。公眾享有所有公共道路的路權，亦享有指定的便道（供人們步行之用）、馬車道（供人們步行、騎馬和騎自行車之用）和支路（供各種形式的交通之用）的路權（《公路法》1980）。約定路權的地圖由當地教區議會辦公室持有，不過地圖上未標示出來的便道，公眾也可能享有路權。即使沒有法律文字的明示，便道和馬車道的最小寬度還是有一定之規的。比如，就有這樣的規定：穿過田地的便道至少1米寬，馬車道至少2米寬。環繞田地邊緣的便道至少1.5米寬，馬車道3米寬。禁止奶牛進入有便道穿越的田地，菜牛則可進入，但必須有牧人陪伴。《路權法》（1990）制定了具體的時間表，農場主必須按時間表恢復他們犁翻的便道。未作法律規定而只按田主暫時意愿開放的便道，被稱為許可通過的便道。對于這類便道，公眾的路權并非一成不變，可以隨時被取締。

柵門：柵門更加突出了路權的重要性。柵門是界墻和樹籬中公眾可以通過的空當。柵門樣式繁多，包括如下樣式：高雅的富有裝飾性的維多利亞式鐵藝小門，安在村莊林蔭小道的盡頭；幾塊石頭壘就的窄門，僅容瘦小和敏捷的行人側身而過；陡峭的帶扶手的木制活梯；嵌進干壘石墻里的闊大石門洞；電柵欄的斷電絕緣部分（有時窄到只有8英寸，顯然就是威嚇行人不敢由此通過——如果有這種情況，當然可以向教區議會負責人行道事務的官員報告）；還有其他形狀各異的木頭臺階，維修或失修的程度不等。

國家公園：英國的國家公園不像美國的國家公園是一些保留起來的荒野，而是有人居住的風景區，人們依舊在里面進行農耕、林業、采掘業和多種層次的旅游活動。大多數國家公園的大多數土地屬于私人擁有（普爾和普爾1987）。因此，經濟活動和休閑活動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更不用說這些活動與自然保護的目標會有沖突。人們從來沒有認真探討過國家是否需要獲得國家公園土地的所有權，盡管國家公園里大面積的土地已經為各類機構如國民托管組織所持有。

從委員會到法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盛極一時的地形學寫作已在悲悼英國風景（貝內特1993；斯萊特1987）。1940年，聯合政府的勞工部發起了

記錄英國項目……“圖繪英國土地志”（pictorial Domesday），為此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動員大量才藝之士用水彩和水粉保留可能毀于敵人入侵的文明的標志。

（塞繆爾1994）[[150]](#_150_35)

這一項目看似起因于戰時炸彈的毀滅力和外敵入侵的可能性，但實質上更多地是針對內部的敵人：

攝影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無法向我們傳達一處景色的色彩和氛圍，無形的genius loci[場所精神]。正是這種無形的元素易受我們稱之為文明的不可抵擋的蠶食而毀滅：發展規劃、工業增長、水庫和機場建設；[還有]公路……[該項目]則明確地展示我們正在為何而戰，一片蒼翠而令人愉悅的土地、一處風景，它的特性在自由之中成形，它的每一條曲折的小徑和每一棟不規則的建筑都是我們民族性格的一種表達。我們擁有這些彌足紀念的東西，我們正在為此而戰。當我們使它們免遭外敵的兵燹之后，這些畫作的存在可以用來提醒我們，真正的戰斗，也即抵抗所有商業野蠻破壞和麻木漠視的戰斗，卻在時時刻刻進行著。如果我們戰后接著把英國托付給偷工減料的營造商和建筑公司，那么將英國從納粹手中解救出來就沒有多少意義。

（里德；轉引自桑德斯1990：7）

這就是聯合政府城鄉規劃部的戰時任命的文化背景。該部門（MTCP）成立了鄉村土地利用委員會，由英格蘭鄉村保護委員會（CPRE）前副會長斯科特大法官任主席。斯科特領導的委員會力求解開城鄉分離狀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亂麻，試圖協調一些利益沖突，包括鄉村共同體的經濟發展能力與農業、風景區美學意義的保存與保護、進入鄉村和城市蔓延之間的沖突（1955a）。

斯科特報告《鄉村地區的土地使用》于1942年發表。報告聲稱“長期以來英國國家公園的建立備受忽視”，建議在和平時期的“第一年”成立國家公園管理局，決定哪些地區可以成為國家公園，哪些應該成為自然保護區。1944年，一份題為《土地使用的控制》的政府白皮書稱“國家公園的建立”是“戰后重建計劃的一部分”（阿伯拉姆1959：21）。[[151]](#_151_35)

進入權成為爭議的焦點，議案中的國家公園的管理和基金問題也一樣。另一個委員會成立，約翰·道爾任主席。委員會提出就“[國家公園]區域的選擇，控制措施，需要提供的設施、機械、電力和技術，與其他規劃目的以及其他部門的方針和行動的必要協調問題進行聽證”（道爾1945：6）。

1945年，諾曼·伯基特爵士，CPRE的國家公園常務委員會會長兼湖區之友主席，在劍橋大學的“瑞德講壇”（Rede Lecture）上發表演講。伯基特借助華茲華斯的論點，以此演講推動成立國家公園調查委員會。國家公園應該成為

我們風景最美的地區，經過國家的精挑細選而成為國家財產……由國家保護它們的自然美，允許人們，特別是跨地區的徒步者進入，與這些目的相一致而最大程度地服務公眾。

（伯基特1945：19）[[152]](#_152_35)

道爾報告《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于1945年4月，政治大選前三個月發表。這次大選的結果出人意料，最終工黨勝出。[[153]](#_153_35)在報告中，道爾充分探討了國家公園的思想和概念，支持（公眾）進入所有未開墾的土地。國家公園被定義為：

一片位于鄉村、美麗而相對荒野的廣闊地區，在此，為了國家的利益而采取適當的國家決策和行動：a）嚴格保護富有特質的美麗風景；b）充分為公眾提供進入的便利和設施；c）適當保護野生動物、具有建筑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建筑物和場所；d）有效維護既有農業用地。

（道爾1945：6）

劉易斯·希爾肯，剛當選的工黨政府城鄉規劃部部長對道爾報告做出回應，成立了以亞瑟·霍布豪斯為主席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委員會。[[154]](#_154_35)其審議事項之一就是規劃落實國家公園法的機制。霍布豪斯委員會下轄的進入權分委員會（約翰·道爾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建議進入權應該包括所有尚未開墾的土地，無論是山脈、沼地、荒野、山地草場、懸崖、海灘還是海岸”（希爾1980：87）。霍布豪斯委員會報告于1947年發表。這些報告和道爾報告成為1949年的《國家公園和鄉村進入權法》的基礎。

華茲華斯的觀點——某些風景區是“一種國家財產”得到了響應。喬治·特里維廉與希爾肯以及工黨政府的財政大臣休·多爾頓會面，商討相關的保護策略。第二年，多爾頓的財政預算就包括了5千萬英鎊的國家土地基金。這筆基金專門用來補償國內稅收（稅務部門），也就是支付捐贈給國家的土地和住宅的遺產稅（繼承稅）。這類土地和住宅隨后轉交給國民托管組織。后來，由于一樁政治蠢事，多爾頓辭職，特里維廉在給《時報》的一封信中對此表示遺憾，信中還特地以多爾頓政府部門為例，稱贊其對于國家如何免遭“洶涌”的城市化浪潮的關注（卡納戴恩1992）。

這一切背后是姻親與庇護關系的傳統。作為國民托管組織的支持者和漫游者協會主席的多爾頓，其政治后臺是喬治·特里維廉的哥哥——查爾斯·特里維廉爵士；而約翰·道爾，道爾報告的作者，娶了查爾斯爵士的長女波琳·特里維廉。曾任霍布豪斯委員會野生動物分會主席的朱利安·赫胥黎爵士則是特里維廉的遠房堂兄弟。在這個家族里，喬治的女兒瑪麗·特里維廉是華茲華斯的傳記作家。

國家公園和1949年鄉村進入權法

該賦權法例為英格蘭和威爾士國家公園的未來選定以及霍布豪斯委員會提議的各種土地進入權協議和法令作了鋪墊，也廢除了1939年的《山區進入權法》。對于1949年法案出力最多的兩個部門是規劃部和農業部。當劉易斯·希爾肯出任城鄉規劃部部長時，他發現他的新聞發布人是湯姆·斯蒂芬森，RA的積極分子及“二十年前的獨立工黨同仁”（霍特1995：23）。[[155]](#_155_35)然而，土地主的農業游說團遠遠勝過這種“特殊關系”，而漫游運動在約翰·道爾1947年去世后也失去了游說力。

1949年法案實施之后，申請進入權的重擔交給當地政府。這意味著取得進入權需要分片進行和當地政府的配合。[[156]](#_156_35)在RA發動的公眾壓力之下，希爾肯堅決要求中止實施1939年進入權法中將某些非法侵入定罪的條款，該條款沒再實施。1949年的進入權法案仍舊強調進入必須和地方協商。地方的權限很大，對于進入多有限制，因而進入特定地區的政策未能全部執行。開放式進入敞地似乎有悖于以前那套有嚴格限定的路權體系，但評估一下1949年的進入權法所賜予的權利，就會發現其實不然。

首先，有必要解析“權利”一詞所包含的多層含義。權利明顯包含四個與法律權益相關的意義：主張權（根據權利提出要求）、自由權（特權）、權力、豁免權（霍斐德1923；轉引自巴克爾和帕里1996；拉德克利夫—布朗1950）。[[157]](#_157_33)1949年進入權法的第五部分賦予公眾山區的敞地進入權，即在山地自由漫游的權利。實際上這部分保障的權利是進入“進入權協議或法令認可的地方，進入的個人未破壞或損壞任何界墻或柵欄，并能遵守相關的地方法以及本法案[其他部分]的諸多限制條款，則不得被視為非法侵入”（巴克和帕里1996：3，著重號為后加）。換言之，進入權法賦予個人的權利是不被視為非法侵入者的豁免權，而非主張權。這種權利所含有的消極性質再次說明公眾的進入權利“被認為是干擾了既有的私有財產權，其范圍和實施必須給予限定和控制”（巴克和帕里1996：4，著重號為原文）。

根據1949年進入權法成立的國家公園委員會得到授權，給每個公園任命了一個半自治性質的聯合管理局。管理局的一半成員代表當地利益，另一半代表國家利益。一般認為當地代表通常會抵制實施符合國家利益的計劃，因為當地得拿出部分資金支持這些計劃。郡議會的確不愿將“他們的”公園地區的行政控制權交給聯合管理局。戰爭對后方的影響就是很好地磨練了人們“無論好歹都能對付過去”的能力。這種能力也被用到休·多爾頓領導下的國家公園事務之中。1950年多爾頓復職，擔任城鄉規劃部部長。

1951年至1957年間，10所國家公園（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公用地）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山地地區成立。1951年選定的前4個國家公園（達特穆爾高原、湖區、峰區、斯諾登尼亞）成立時間正好趕上英國節（歡慶英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英國節促使《關于英國》系列叢書出版，這個系列包括13本導游冊，正如引言聲稱的那樣，每本都是“探險者手冊”。每個地區的導游冊都以一系列游覽路線圖結尾，據稱這些游覽圖兼容歷史路線與現代路線，借鑒了17世紀的道路圖。導游冊設定的讀者不僅有那些居住在英國的人，而且包括“海外來客”，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和新西蘭人，他們曾經離開英國去輸出自己的技能，現在則回來看看他們剛剛為之戰斗的帝國中心。

達特穆爾、諾森伯蘭郡和彭布羅克郡海岸屬于郡議會委員會管理的單一郡屬國家公園（麥克文和麥克文1987）。選定的第一個國家公園是峰區，橫跨六個郡，一開始就由一個聯合規劃局管轄。選定的第二個國家公園是湖區，當時的湖區包括三個郡的土地，由三個郡議會抽調的人員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經手成立事宜，每個郡議會監控它自己用于公園的費用。[[158]](#_158_33)其余的國家公園則各由一個聯合顧問委員會經管，后者不具有與郡議會對等的規章制定權，只是保持對其“自己”的公園份額的行政管理權。

1949年進入權法包含自然保護和公眾敞地進入權管理這兩個方面。遼闊的自然美景之地被認為適合選做國家公園，它與人口密集地區毗鄰，能為眾多的人口提供露天休閑場地。維護和提升公園的自然美，在某種程度上要與推進公眾對它們的欣賞彼此關聯。國家公園選定幾年后，伯基特就這樣描述湖區國家公園，語調強硬，與羅斯金的觀點大相徑庭：

這不是國家博物館的一個物品，上面寫著“請勿觸摸”；也不是時髦人物和怪杰創造的作品，他們對自然美的神殿崇拜之極，以至于想把它置于普通人無法觸及的地方。

（伯基特1959：34）

呼應了艾迪生委員會報告所推薦的兩級方式，1949年法案為國家自然保護區（NNRs）和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SSSIs）做出安排——“以保護有特別的植物、動物或地質的地點”（洛厄1989：125—126）。自然保護委員會，一個于1949年經由皇家特許成立的研究和顧問機構負責監管這些地區。NNRs并不鼓勵公眾的進入；SSSIs過去和現在一般都屬于不可進入地區。法案還為自然風光絕美之地（AONBs）——即“完全根據風景優美程度選定”的地區提供了保障措施（洛厄1989：125—126）。

對戶外休閑活動空間的需求不斷增加，給國家公園帶來更大的壓力。根據1968年鄉村法，鄉村公園、野餐營地和水上休閑設施紛紛建立起來以便應對公眾的需求。盡管1949年法案已把林地、水路定義為敞地，1968年法案又特別強調了林地和水路的“敞地”性質，因而增加了潛在的可能性——把更多的土地納入進入權協議之中。1968年法案還在國家公園委員會的基礎上創建了鄉村委員會。認識到隱含在1949年法案“保護優先于農業”方針中的內在沖突，1968年法案要求規劃當局“充分考慮農業和林業的需求以及鄉村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利益”（LDNPP 1986：3）。

進一步發展的壓力和國家公園的游客壓力迫使政府在1971年委任了一個檢察委員會，桑福德勛爵擔任主席。[[159]](#_159_33)《桑福德委員會報告》（1974）詳盡描述了著眼于短期效益的功利主義考慮（優先于自然保護）已經造成了什么樣的后果。道路和住宅不斷發展、消耗資源的產業、水庫和汽車旅游不斷增加，這一切得到允許，甚至受到鼓勵，從而給國家公園造成損害。報告聲稱：

反對有悖于公園目的的發展計劃——這種反對必須得到加強，貫徹到底；在美麗尚未遭損害的多數地區，要把這種反對當作一個禁令貫徹下去，除非國家有迫不得已的需要才能破例。

（LDNP計劃1986：4）

政府通過了桑福德報告提出的建議，同時承認有必要解決國家公園所在地缺乏住宅和工作機會的問題。

國家公園取得的成功可以由公園使用率的驚人增長來衡量。中央政府和當地政府都害怕休閑爆炸（布蘭登和柯里1988）。隨著到鄉村休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的環境意識逐漸加強。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英國各種國家環境機構紛紛建立，數量得到了最大的增長（洛厄和古伊德1983）。在這些自愿性質的環境機構里，成員由1970年的不足70萬增至1990年的375萬以上（羅賓遜1992）。20世紀70年代開始，開始對農業在鄉村經濟中的作用進行全面的重新評估，這種評估一開始只是作為辯論進行，到后來成為國家政策（布蘭登和科里1988；哈維和惠特比1988；霍奇1986；魯賓遜1992）。

針對強化農業發展與保護野生動物和風景之間的沖突，1981年的《野生動物和鄉村法》提出將“管理協議”的概念引入農業—環境世界。[[160]](#_160_33)該法案綜合了桑福德報告中的建議——厘清國家公園關涉到農業活動的法定權力、公共路權修改以及國家公園的義務：為游客提供標明需要特別保護的沼澤、荒野和林地的地圖。

1983年，班伯里的保守黨議員托尼·鮑德里向下議院提交了一個特別不合時宜的進入權議案，這個《擴大鄉村進入權議案》只宣讀了一次就遭到否決。該議案提議放權給郡議會，使其有權就農莊主之便而改變設定的人行道，以此而有助于進入更多鄉村地區！反過來，“農莊主應有法定的責任，采取合理的步驟標明穿越他們土地的人行道線路”，他們本來也必須這么做[英國議會記錄1983（61）c.924]。

公民身份的建構

華茲華斯關于湖區是“一種國家財產”的定義引發出這樣的問題：誰值得納入“國家”（第三章）。一系列的改革議案拓寬了（公眾）對“國家”的政治進入權，同時議會則謀求擴大對于“鄉村”的空間進入權（第五章），并且在戰后取得了有限度的勝利（我們現在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人們認為，后工業時代的英國，政治黨派、宗教派別或階級成分這類強勢的身份認同已被個人主義和通過生活方式進行的“自我發明”所取代：

人們現在打發時間的行為越來越多地成為他們自我感覺的反映。我們所說的休閑時間，實際上是他們生活中可以自由支配的關鍵資源之一，所以休閑時間通常很重要，它關涉到人們在自己生活中賦予或發現的意義。

（格羅夫—懷特1996：2）

休閑已經變成物品，而國家將積極的休閑再定義為不再是公民權利的一個元素，而是一個手段的問題。這樣一來：

……進入積極生活不再是所有人的社會目標，而是一種可選消費品，其消費意味著“積極的”公民身份。它進一步意味著與人數不斷增加的“異常”大眾的差別，那些人不愿意或不能夠擁抱這種新的公民身份建構，因此，愈發得不到進入積極生活的權利，進而得不到積極的公民身份。

（拉文斯科洛福特1994：I）

“積極生活”領域內，鄉村休閑在國家的預算圖騰柱上無關緊要。[[161]](#_161_33)然而，從涌進國家公園的游客人數來看，進入權的問題必須列入議程。如果有更多的鄉村地區允許進入，那么人們就不會一窩蜂涌進國家公園里了。實際情況表明：前往國家公園的游客人數多得令人生畏，引起的交通擁堵超乎想象，想想看英國農村出現了洛杉磯高速公路的場景。在湖區隨處可買的一種幽默明信片上，可以看見一條單行道上嚴嚴實實擠滿了小轎車，車流涌向山間。第一輛車后拉著一個拖車，司機對他的同伴說：“還沒有看見別的車！”湖區國家公園占地880平方英里，每年開放期間要接待2000萬游客（斯坦納和布迪厄1995）。峰區國家公園占地將近600平方英里，每年開放期間要接待2200萬游客。60%的英國人很容易抵達峰區公園。1996年，湖區國家公園規劃局就夏季旅游高峰期公園禁車問題率先發起了與“相關利益團體”的討論。這一想法激起了湖區各城鎮的店主強烈的反對——通過和店主交談，我了解到這一傾向。

雖然許多游客從未遠離“蜜罐”（最具吸引力的觀光點），但也有數十萬的人在登山和徒步丘原沼澤。毫不奇怪，對公園里人行道和其他通行地帶的損壞觸目驚心。在湖區，磨損的人行道看起來就像丘原上的大裂縫。在峰區，泥炭地區的排水溝毀損了像金德斯考特這樣景點的外貌。修繕這些損毀耗資巨大。在湖區的一些地方，得用直升飛機把石板運到維修地點。然而，受損嚴重的人行道剛剛穩固一些（也許靠著一系列巨大石階的支撐），又引來更多的游客繼續向上攀登，從而使道路的毀損現象蔓延到更難進入的景區。在峰區，當局嘗試了各種辦法防止交通繁忙的泥炭地區變成泥塘。[[162]](#_162_33)

緩解10個國家公園的客流量壓力的一種方式就是允許公眾進入其他地區。1984年遺產稅法案被認為有助于達到這一目的，凡被財政部認定是“風景遺產”的風景區——也即具有突出的自然風光、歷史意義或科學價值的產業可以減免遺產稅。作為減免的回報，風景遺產的新主人必須允許公眾“合理”進入。該法案沒有具體規定什么是“合理的”公眾進入。對這一法案導致的稅收損失統計不一，有一份資料說1984/1985年到1995/1996年一共損失6500萬英鎊（惠特比1997），而另一份資料則表明1983/1984到1991/1992年一共損失了9000萬英鎊（珀爾曼1992）。

風景遺產的遺產稅減免計劃典型而清楚地說明了土地主與國家之間那種階級為本與階級偏向的關系。土地主沒有義務給予公眾經過風景遺產的路權，而風景遺產也未公開登錄在冊，這樣一來，公眾對于什么地區許可進入不甚了了。顯然，對國家而言，損失的稅收打了水漂兒。

鄉村休閑作為一種替代性的（盡管是還未計成本的）經濟活動而得到提倡。鄉村旅游被視為一種具有“收入彈性”的產品，也就是說，當收入增加時，一個人花在上面的錢會更多（惠特比1997）。然而，鄉村休閑的成本正在發揮作用（沃特金斯1996）。1991年，通過中央財政資助的“鄉村管護計劃”，英國的農業—環境政策引進了準市場方式。根據這一計劃，農民尋求出售被鄉村委員會（CC）認為可以增加風景宜人度的環境產品，來獲得該計劃支付的報酬（利奧德1992，弗雷澤1996）。進入權就成為宜人度或公共產品之一，這些公眾產品“經常是作為其他（可能是私人的）商品的聯帶產品（常常不是有意為之的）”（惠特比1997：3）。換言之，任何通過“開放穿越他們產業的路權”而獲得的收益抵不上農場主種植或畜牧所獲得的收益（惠特比1997：3）。[[163]](#_163_33)到1997年末期，已簽署了超過1200項管護協議，含有可以隨時撤銷的路權許可（庫克和高夫1997）。

從鄉村旅游的實際情況來看，并未收購數據中那么多的進入權。此外，一些新的道路進入權協議草率之極，以至于公眾難以知悉或利用，有些道路甚至被封閉起來。為此，漫游者協會（RA）質疑這個新的私人土地市場中所吹捧的收購是否成功。簽署協議的農場并未列入路權收購目錄，公之于眾，因此公眾對可進入地區的了解不免有限。總之，一項旨在把進入權商品化的公共政策僅僅使私有財產權重新特權化和合法化。

有些人把中央政府資助“管護計劃”農場進入權的政策看作一種默許反對開放性進入權，盡管它聲稱不是那樣。再說，如果靠市場方式，這其實說明了“在我們越來越富裕時，進入權問題將會變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惠特比1997：5）。在此，進入權問題與公民權相遇，而科里根和薩伊爾關注的“國家體制及其活動的深刻的文化內涵，以及文化形式所具有的國家法令的特性和范圍”（本章開篇就已提出）可以在實踐層面上看得出來。

從1985年在艾戴爾進行的一次抗議性徒步開始，其后，RA每年9月都會組織當地的抗議性徒步，以期引起人們關注禁止進入的鄉村地區。這些被宣傳海報稱為“英國禁地日”、“林地散步日”、“英國開放日”以及新近規定的“進入權日”。不管是以什么名目，它們引起了報界和電視臺的關注，當然并非所有報道對RA都是友善的。RA的公然好戰性是個新發現的特點——有些文章就直接把它與1932年集體侵入活動的“共產主義”淵源聯系在一起（法恩戴爾1995），這為作家、卡通畫家和攝影家提供了素材。[[164]](#_164_33)在政府提議最大程度賦予公眾敞地漫游權之后的第二天，卡通畫家就作出了反應（例見《快報》、《衛報》，1998年2月27日）[[165]](#_165_33)。還有漫畫暗示了漫游者提出的進入權議題已變得理所當然——因為風景意象被用來傳達其他的政治信息（例見《獨立報》，1989年9月19日）[[166]](#_166_32)。這一例中實際爭論的問題是：在工黨政府領導下，私有化的公用事業的股票持有者是否會獲取紅利。不管RA的對抗性立場給予卡通漫畫家什么性質的啟發，它還是疏離了協會中一些更保守的成員。

1995年12月，RA發表了咨詢文件，題為《鄉村進入權草案》，尋求（在1947年和1968年法案所定義的）敞地上自由漫游的權利——除了特定條件下暫時禁入，特定條件指的是一年只有12天的狩獵日、異常氣候可能導致的火災等，產羔季和動植物恢復期保護（RA1995）。

按草案定義，敞地包括林地、懸崖、河岸和海灘，將林業委員會的林區納入法定的敞地范疇。其中還包括委員會歷年來出售的多塊林區——公眾進入這些林地的路權一度被取消。草案尋求可以自由漫游的敞地，但并未將播種的農田或人們的花園列入漫游者可以穿越的范疇。然而，反對者試圖把草案的意圖說成另一個樣子，卡通畫家又對此大做文章。

反對者毫不掩飾他們的企圖：通過立法禁止可能發生的進入。1996年11月，鄉村土地主協會（CLA）提出了一個反對議案，名曰“進入權2000”（麥克尼科爾1996）。該議案要求做過程漫長的財產評估，以便能使業主自愿簽約。這樣一來其實就是默認“公眾進入干涉了土地私有權”這一觀念，“進入權2000”把任何進入權的主張權撇在一邊，打起了準市場這張牌。CLA后來公然宣布“不支持立法規定漫游權”（埃塞爾1997n.p.）

英國登山委員會（BMC）介入了爭論，1997年2月發表了自己的“進入權憲章”，與RA的“進入權草案”相比，它要復雜得多。從人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有趣的是，這份“憲章”的注解更像是對前一章提及的1833年公共人行道委員會文告的注解：

（1）攀爬、登山和徒步，如同其他形式的鄉村休閑一樣，具有很大的益處。

（1.3）對于整個社會，這些活動提升了參加者的心智、體力和靈魂健康，幫助促進民族變得更加健康；通過激發冒險精神和自力更生，給更大的共同體帶來更多的福祉，可以減少犯罪，亦能刺激企業發展。

（BMCn.p.，著重號為后加）

“冒險精神”的展現引起國家公園里代際爭端——按照法規，國家公園只許可“安靜的欣賞”，但是越來越多的游人使用高山自行車[[167]](#_167_32)，好多人還使用摩托車、越野車和湖上摩托艇進行運動，因此引起爭端。還有一個多年未能解決的爭端是：在湖區國家公園上空進行低空飛行軍事訓練。

與RA成員和其他各類組織協商了一年之久，“鄉村進入權議案”在1997年由舍伍德郡議員兼RA資深會員帕迪·蒂平向議會提出。第一次宣讀就未通過，正如RA預料的，一個保守黨政府怎么會通過這種議案呢？1997年大選前，三個政黨的領袖人物承諾將進入權法案列入下屆會議的日程，盡管沒有詳盡探討立法該采取什么樣的形式。蒂平在1998年又一次提交了RA進入權議案，這一次趕上工黨執政，然而議案還是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只是一次宣讀了事。

1998年2月，政府發表了一份咨詢文件《英格蘭和威爾士鄉村敞地進入權》。這一文件給予土地主三個月時間選擇是否自愿允許他人進入私有的未開墾的土地——山地、沼澤、荒野和登記入冊的公用地，但不包括RA希望納入的林地、懸崖、河岸和海灘。作為政府的鄉村和風景顧問，鄉村委員會（CC）回應認為“這種尺度的進入權反映出一種意義深遠的文化變化”，而且

有關敞地進入權的法案應該提供三種自由……公眾有徒步漫游探測敞地的自由，其活動范圍不受無謂的限制；私產擁有者和占有者有暫時關閉自己土地的自由，以解土地管理之需，只要合情合理，也就無須事先征得同意；立法機構有限制公眾進入特別容易受侵擾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區和歷史遺跡的自由，以便實施保護。

（CC：1998年6月1日：1）

鄉村委員會意識到需要“教育和說服游客和土地主積極地、建設性地應對這些新安排”，提議應把這種教育納入“全民課目”（CC，1998年6月1日：1），以此更加清楚地展現“國家體制及其活動的深刻的文化內涵”（科里根和薩伊爾1985：2）。

同時，鄉村委員會提出對線性路權實行“更靈活的方式”，一種耗資更少、耗時更少、爭議更少的方式。它的《人行道21》提議可能是一個更劃算的“人行道網絡，能滿足下個世紀需求，而非作為歷史需求的結果”（CC1998年6月12日：1）。這一方案會不會是托尼·鮑德里遭到否決的1983年《擴大鄉村進入權議案》的翻版？1983年的議案要求按照經濟原則取締法規化的路權，以更方便農場主的人行道替代歷史遺留下來的人行道。

《人行道21》是對鄉村規劃的重新審視，挑戰了某些已被認可的觀念。它承認如果按照這種新的鄉村規劃施行起來，將不會有目前那么多鄉村保留下來。[[168]](#_168_32)這是不是意味著矛盾？——因為與此同時，正有越來越多的人試圖進入鄉村；人們一打開英國報紙就會讀到一條新的公路破壞了人們過去為之戰斗并竭力保護的公用地；英國考古委員會迫于現狀而要求把農業補貼同環保掛鉤，以防止農場主獲得“類別許可”（ClassConsents）去深耕中石器、古羅馬和內戰遺址而免受懲罰。

同樣，綠色地帶受到經濟學角度的審視——看看它們是否“幫助或阻礙了可持續性發展，它們對資源（土地、礦藏、水等）的有效利用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它們是否幫助我們理智地思考并做好長期計劃”（CC，1998年9月19日：1，著重號為后加）。所謂“有效性”是依據什么人的角度？在同一份網絡文件中，還提出了“為城鎮創造合適的背景”的建議。所有城鎮應該：

坐落于管理良好的鄉村。發展計劃需要限制城市增長，為城鎮周邊的鄉村制定積極的目標。每個城鎮和大城市應該發展綠色空間項目，這樣，每個人，包括社會之外的群體，都可以進入并且能夠享用他們住家附近的開闊空間。

（CC，1998年9月19日：1，著重號為后加）

這一建議也許不是一種要求社會上受排斥的群體呆在自家地盤，勿去侵入更廣大英國鄉村荒野的方式？不管怎么說，這類群體最受公共交通的制約——公交的匱乏自然會影響他們進入英國風景區。也許鄉村委員會提供的千禧草坪足以使他們呆在家門口怡然自得了。千禧草坪從國家彩票發行署獲得了1千萬英鎊的資助，到2000年，一個慈善信托基金將管理并維護英國大約250個社區的千禧草坪。

支持進入權的人大力呼吁允許公眾進入國家公園內外的敞地，反對的人則抗議城市（也許就是那些來自大城市和城鎮的“沒有教養的游客”）破壞鄉村生活方式，雙方各不相讓。禁止獵狐的提議引起了經濟學意義的爭論。設想一下禁止獵狐的情形吧，馬具商人會失業，獵裝裁縫沒了生意，馬夫和馴狗師無事可做，還要處理掉大批獵犬。[[169]](#_169_32)1997年7月，估計有10萬人結隊示威，抗議一個下議院普通議員議案，該議案禁止帶獵犬獵殺哺乳動物。1998年3月，超過25萬的“鄉民”，由穿著紅外套的獵人率領，來到海德公園參加了鄉村聯盟發動的游行。土地主利益集團的出席使得所謂代表鄉民的“鄉村游行”大打折扣。沒有什么能夠掩蓋這樣一個事實，這次游行目的就是抗議立法禁止獵狐。[[170]](#_170_32)

《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1994）中有些部分是針對破壞狩獵者的。法案第68條規定嚴重的非法侵入就是一種新的犯罪行為，所謂嚴重的侵入指威脅在土地上從事合法活動的人、妨礙或阻斷其活動。但是針對“非法入侵的集會”，法案的第70條和第71條則布下了更大的法網。它們所界定的集會指20人以上的群體企圖聚集在“公眾無權進入或只能有限進入的露天場地”。如此一來，行使了1949年法案所賦予的權利的人，則會違反1994年法案第70條和第71條，受到制裁。[[171]](#_171_32)

從1995年11月發起的“鄉村運動”中可以看出鄉村和城鎮之間的對抗，該組織打出來的標語表明他們要站在“鄉村一邊”來討論各類議題，如休閑進入、農場主的民族意義、農場主作為真正能夠照管鄉村的人所起的作用。[[172]](#_172_32)

農業和休閑之間的沖突的另一個現象是

一個正在發展的趨勢：將大量的鄉村休閑活動限定在官方指定和管理的休閑區域，限定在范圍延伸但受到控制的所謂國家公園里。[盡管這樣會]極大地裨益于戶外休閑……但諷刺的是，它也會有助于使排斥持久化，使公眾無法進入開闊的鄉村地帶，有助于“制止”公眾路權，特別是農耕地區和城市近郊的公眾路權。

（泰勒1997：275）

相反，鄉村委員會認識到鄉村休閑活動的巨大的經濟價值，尤其是休閑散步可以為當地帶來“高達20億英鎊的收入”（阿什克羅夫特1998：2）。一個主要的兩難是鄉村共同體如果不肯接受日趨加重的進入負擔的話，也就得不到旅游業和休閑活動如徒步帶來的經濟利益。

政府徑直打斷雙方（進入權立法議案和反議案）的推拉之舉，于1999年3月頒發了《英格蘭和威爾士鄉村進入權：行動構架》，于1999年7月頒發了咨詢公告《改善英格蘭和威爾士路權》。這些動作表明政府有意通過立法解決鄉村敞地進入權的問題，擴大現有的路權范圍。地方級和國家級的“進入權論壇”建立起來了，所有的利益集團被召集到一起討論出臺《鄉村議案》——這一議案旨在確保公眾進入一定的未開墾的土地上并自由漫步的權利。至于何時將議案拿到議會里討論，政府卻含糊其辭。然而，1999年11月17日女王演講中介紹《鄉村議案》，推進了為進入和自由漫步所進行的漫長斗爭。競爭的利益各方所持的砝碼將決定立法的形式及其在全國和地方（也許是分階段的）的實施。

結語

私有財產的各種關系植根于對土地的控制和進入之中。一旦有人提出在私有土地上建立國家公園，必然會出現緊張局面。即使大量的公用地納入國家公園的范圍，也不一定向所有來訪者開放。事實上，它們從未對所有來訪者開放。吊詭的是，植根于風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義卻孕育了城鄉分野，而美學、農業和休閑的因素則促成了利益集團之間那種并不省心的伙伴關系。協調矛盾重重的需求和要求的努力似乎只是讓這些矛盾進入法律文件，并未解決矛盾本身。也許解決是不可能的，也許解決的成本太高。在市場這種地方，公共產品的問題向來受到冷遇。

不讓進入英國風景區和控制在景區內活動已有漫長的歷史，而且仍在發展過程中。在英國這種人口稠密和高度城市化的國家，敞地是罕見的資源。圍繞資源展開的論戰、國家立法的介入和最終使敞地商品化并不奇怪。英國非政府組織以及政策制定者仍跳不出歷史決定的狹隘休閑觀，“難以把真正的社會意義匹配給休閑”（格羅夫—懷特1996：2）。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從民族志方面探討山地徒步的社會意義，休閑的這一個方面取決于進入權。

關于休閑性徒步：

……英國戶外運動所取得的巨大實效和社會政治意義，是建立在具有地區細微差異的進步主義核心意識形態之上的，贊同這一點并不等于是以輝格黨主義或必勝主義的態度宣稱一種觀念不可逆轉的完滿實現。許多目標繼續使人煩心，得與失通常相互抵消。運動本身中的后退的保守派力量，受強大的妥協傾向支撐，一直在不懈地施加影響，阻礙徒步者、登山者和騎自行車的游客為了自己的利益統一行動起來。在20世紀末期為人行道路權和進入權而抗爭的人們與19世紀20年代的先輩一樣，依然在進行同樣的戰斗。

（泰勒1997：273—274）

如果說同樣的戰役正在進行，那么1999年末的《鄉村議案》則把戰役帶進了一個新的舞臺。

# 第三部分 民族志的風景

你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你的鞋子，適當地關照它們吧。不過每天一刻鐘足矣，因為你的生活還取決于其他東西。

勒內·多馬爾1974：118

《致\_\_\_，祝賀她第一次登上赫爾維林山頂》

你，與山同在一片藍天之下，

登上高峰，從赫爾維林瞭望塔，

凝視美景，

敬畏，興奮，驚訝……

女士！現在飛吧！

阿爾卑斯或安第斯屬于你……

你汲取山之精華，山之偉力

一如當初相見時

古老的赫爾維林使你折腰

江山如此多嬌！

威廉·華茲華斯

我一直考證身份認同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變遷，考證它如何生成于風景之中，并經由風景——特別是與湖區峰區相聯的風景生成。這個導言就是對我分別于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夏天和秋天在湖區山地徒步幾個月的田野工作做個定位。除了最宜徒步的干爽溫和的天氣外，我還在大風雨、雨夾雪、小陣雪、酷熱的高溫等各種天氣條件下徒步和登山。但對于冰天雪地的山地徒步，我則毫無概念。

某種程度上，其實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湖區。一種我稱之為華茲華斯郡，這是一個國民托管組織照看下的水仙花遍地、適宜湖邊漫游的地方，彼得兔和刺猬夫人的古老世界，令人感到舒適：深色木頭裝飾起來的內室，擦光印花布和陶瓷器具閃著微光，傍晚時分的茶點。雖然我知道多蘿茜·華茲華斯和她哥哥做過著名的長途山地徒步，華茲華斯郡現在只是一片低洼地帶，并不是我關注的焦點。我更關注的是另一個湖區：地平線盡頭的山脈，云彩低垂，好像要被山披到身上。除非你進入山區，冒著暴雨艱難跋涉，或者冒著近幾年的酷暑徒步過，你是很難了解山的崎嶇不平——特別是如果你是美國人，更習慣于把山想成一萬三千英尺高而非三千英尺高。

正如我在第五章已經詳盡解釋過的那樣，湖區是一個直徑大約30英里的大致呈環形的穹隆地區，密布著180座高峰。這種緊湊的地形意味著一天之內的徒步中，你攀登的高度總和可能輕易超過三千英尺，盡管全湖區只有4座山峰超過三千英尺的高度。湖區的山峰，高的也好，不怎么高的也好，并不容易攀登。

你去徒步登山，每次都會有所不同，這要看季節、天氣條件、你自己的身體狀況，同樣重要的是，看你的同伴而定。我簡短地說說自己的經歷，也算是付給我所看到的其他人的“表演”的報酬吧。需要澄清的是我不僅僅是在觀看其他人如何面對自身的極限，我自己也在切身感受。在我拿出全部意志力向上攀爬那令人心悸的陡峭的山峰時，或者比這還糟糕的是，頂著狂風——面對當天可能遭遇到的無論什么障礙，沿著結霜的懸崖裂縫一步一步捱下山時，我能感覺得到思緒和恐懼的重量。在這類生理印象的作用之下，自命的民族志學者與其觀察對象——徒步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淡化了。我放棄了“旁觀者”的安全特權，成為這類冒險表演的一個“演員”。我的觀察角度不僅是旁觀者的角度，而且，如果你承認，也是介入者的角度。

不列顛的天氣取決于西部。湖區位于英格蘭西北部高地，在與蘇格蘭的交界以南。西臨愛爾蘭海對湖區天氣狀況作用巨大。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在哈索普山谷第一次進行田野考察時就很快意識到這一點，哈索普山谷位于中部山地高處，年平均降水量為90英寸。前一年的6月份，黃昏也許需要點上受人歡迎的爐火，7月會有使人驚訝的霜降；而在后一年的同期，卻會遇上熾熱的日照和燥風的吹襲。

徒步時天氣瞬息萬變，使得人們格外注意天空的動靜。通常天空非常活躍，煙霧、雨水或密云交織在一起。風暴會迅速襲來，氣溫驟然下降，即使在盛夏季節也是如此。頃刻之間，老天變臉。氣流裹挾著高聳的云團在山丘周圍散開。甚至在天氣看起來不會有變的日子，山谷之間也會陰晴難定——這個山谷可能降下冰雹，不遠處的另一個山谷則可能陽光燦爛。在海拔高度相差2千到3千英尺的變化區間，氣候差別也會很大。如果壞天氣的因素湊在一起，那么就會有滅頂之災了。全年都有徒步者凍死。湖區各路山區救援隊每年花在救援任務上多達2萬個小時（湖區山間救援隊協會1995）。

然而，即使沒有這類極端狀況發生，徒步者一旦停下來歇息，寒冷也會很快透進骨髓——在冷風的作用下，汗水濕透的衣服自動變成為個人量身度造的制冷元件。于是取出背包里的“附加裝備”：羊毛衫，防風夾克，羊毛帽，圍巾和手套。“技術發燒友”蔑視此類裝備，他們更青睞合成纖維制作的“甲胄”，這種紡織物的微纖維能夠把身體流出的汗水導流到織物外層，熱汗揮發掉而無寒冷之虞。在每個歇息處都能聽到人們激烈地爭論它的利弊，最后我投資50美元買了一頂可以排汗的帽子，我不再理解技術恐懼癥者的技術恐懼了。但價格不菲，我可以理解為什么至少有一家制造商的廣告宣傳要說這種纖維織物經過殺菌處理，“可以穿著多日……而身邊還能留下一些朋友”（卡里莫1994）。

如果有一個絕對的理由解釋為什么人們常常選擇在惡劣的環境下，甚至非人的條件下對自己進行體力極限的挑戰，這個理由似乎是挑戰者能夠體驗壯麗多姿的風景：從與連綿的群山互相輝映的變幻莫測云景，到陽光透過高高的雨云層照射到的湖面，再到黑澤明式的薄霧籠罩下的世界，一個無景（non-view）之境。與之相對的另一個極端則是可以領略罕見全景的天氣，我自己就曾經碰到，那些有著30年的湖區徒步經歷的人都沒有看見過。往北70英里之外的格拉斯哥南部白雪皚皚的群山逶迤，居然歷歷可見，向西望去則可以看見更遠處的愛爾蘭山脈。

我“為了研究而做的真正徒步”，第一周是從波羅戴爾開始，一個遠在湖區西部人跡罕至的山谷。這是我第一次冒著大雨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地行走。在蒙蒙細雨中爬上一條小徑，穿過一個廢棄的板巖采石場，左邊是一堵碎石斷壁，右邊是一個開闊的陡坡，一切都使人神經緊張。在大雨中順著同一條小徑爬上爬下，我不禁質疑我的課題選擇。人們會主動選擇這樣做？為了度假？那個星期的后來幾天，我們小組越過綠山墻（Green Gable），來到大風溝（Windy Gap）。我們的領隊剛剛上任幾天，告訴我“在那邊”下山，他得照看掉在后面的人。

我看著他指的那個地方：一個陡峭的碎石坡（巖石表面已經松散）。我真的認為他是在開玩笑。他沒有。這就是“亞倫的碎石路”，一條長達700至800英尺的斜坡，通向斯蒂海德山中小湖。對我的驚嘆“怎么走？”，他的回答是“身體往后靠，腳后跟插進去，走！”就腳跟插進吧，我卻發現每走一步，我身體的重量就帶著我順坡滑落，一滑就是三四英尺遠。我不能說“我”形成了自己的節奏，根本不是，更準確地說是節奏自己奇跡般地形成。在最初猶豫不決的幾步之后，我咧嘴笑著跑了下來。碎石路之后，又是一段陡峭的石徑，我踮著腳尖跑，靴子足夠結實，剛好使我能從一塊石頭跳向另一塊石頭。這是一個全然的“體內”（in-body）體驗，一種毫無恐懼的坦然狀態，我非常清楚身體運動與歷歷在目的地形應和完美，也很清楚自己的心正在觀察并能看到平常的自我何時開始抓奪這體驗，威脅著把我從當下極端平衡的狀態中拋出去。但是，“當下”一直保持著，最后我終于跑到綠草茵茵的斜坡的底部，一下子坐到地上，等著其他緊隨我身后的人。后來，我們跳進冰冷的小湖里暢游。

我已將那第一個星期的經歷視為“開端”，我不得不承認這次經歷讓我對我的靴子——更不用說對我本人產生了錯誤的認識。我不知怎地無比信賴我的靴子——它們知道做什么，它們有自己的眼睛，它們會照顧我。因此，在另一次田野考察時，我要求一個徒步旅行的朋友帶我去“挑戰”斯特瑞丁絕壁（Striding Edge），一條我聽到人們反復談及而我毫不了解的通向赫爾維林的路線。這個朋友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徒步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攀巖者。結果，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緊張艱難的跋涉后，發現斯特瑞丁絕壁是一道陡峭的、鋸齒狀的、刀鋒一樣險峻的山脊，是從赫爾維林（四座超過3千英尺高的山峰之一）東北部山坡的一個盆地邊緣伸出的一支山臂，盆地邊緣的另一支是斯威賴爾絕壁（Swirrel Edge）。紅冰湖位于1800英尺陡峭巖石下的盆地中心。斯特瑞丁絕壁西邊有一條雖不那么險峻，但深逾2300英尺的斜坡通向谷底。

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在強勁的風中搖晃著攀爬那刀鋒般的懸崖，他不得不手膝并用，此時我則不得不離開崖頂走到另一條平行的小路上。我努力振作精神又回到崖頂，但我沒有辦法欣賞風景。我眼角余光能看到的一切都告誡著我算了吧。山脊過去了，順著赫爾維林山肩可以爬向山頂。繞過一些大的雪堆我們來到一個碎石斜坡。有一次我的腳踩上了一塊巖石，石塊一下子滑落，我開始順著冰湖那一側的斜坡下滑。我聽見，好像在遠處，有人在尖叫。是我自己，四肢張開，有些碎石滑過我臉前，我試圖用靴子和手指挖出一個支撐處，終于讓我的靴子找到了。在極度靜默中，剛剛發生的事情和自己現在的處境，讓我體驗到什么叫難以置信。

我的同伴爬下來接我，在我下面30英尺左右的地方，另一個人擺好姿勢準備在我再次下滑時攔住我。我被扶著離開了碎石道，驚魂未定，接著繼續向山頂攀登。在赫爾維林斜坡頂上走了幾步之后，我坐了下來，拒絕移動半步。我不愿意走完通向赫爾維林頂峰的最后幾百碼去欣賞那久負盛名的景色——我能夠想到的就是：“讓愚蠢的山景見鬼去吧！”身上從靴口到臀部青一塊紫一塊，渾身筋疲力盡，我好不容易熬過5個小時，默不作聲地翻越了多里瓦根峰，走下更陡峭的通往戈里斯戴爾小湖的碎石坡，穿過了長長的山谷，甚至在一塊類似太妃糖紙的巖石上摔倒，全身著地，頭部險些撞上一塊大石頭時，我也沒叫出一聲。我幾乎兜了一個大圈——如果第一次滑落時間長一點或是摔了個仰八叉，或是第二次摔得更慘，那么就得召喚帕特戴爾山區救援隊了。該救援隊成立于1964年，由哈索普山谷的詹姆斯·奧吉爾維創建，后者的骨灰已經撒在赫爾維林山頂，這是在我“挑戰”斯特瑞丁絕壁之前的事。

“滑落后”的田野考察實際上成為連連噩夢。即使在環形路徑上簡單行走，也會使我焦慮不堪，而攀登峭壁更是讓我充滿恐懼。過了好一陣子，我才部分恢復了以前的自如和平衡感。這種兩極體驗，即身體的極度興奮和極度恐懼，我是切實地體驗了一番。我能夠理解山地徒步者表達的東西：他們所感受到的成就感、極限挑戰以及他們愿意這么做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們的幫助和鼓勵才使我有些東西值得報告，我在哈索普山谷的工作并沒有提供給我山地徒步的準備，因為那是靠我自己完成的，沒人看見或議論我缺乏經驗。

在哈索普山谷時，我發掘出一段25年前的記憶，那是1960年代初期，17歲的我參加了一個攀巖俱樂部。盡管我不是唯一的女孩，我還是被當作一個另類，因為不是某人的“姑娘”（女朋友）。女性攀巖者幾乎絕無僅有。[[173]](#_173_32)我不太受歡迎，但我堅持到冬天，直到發生了一次災難性冰上滑倒的那天（我買不起合適的靴子），俱樂部管理者打擊了我，他用每個人能聽得見的聲音，明白無誤地隱射我，說他知道漢尼拔想讓大象登上阿爾卑斯山時是什么感覺了。

只有在讀到西蒙·夏馬的《風景與記憶》時我才回憶起我已經忘記的東西——在書中，他解釋了漢尼拔著名的傲慢行為及其對浪漫主義的趣味影響，如“令人愉快的恐懼”和“具有道德意義的登山”（夏馬1996：422）。也許不是巧合，后來的25年里，我都在希臘登山，遠離結冰的環境和英國上層階級。也許我的課題選擇在某種程度上是以更體面的方式跨越阿爾卑斯山。至少這次我的腳上穿著更好的靴子，能夠使我鳥瞰勝景。

## 七 再地化/發現/引述景色

在討論城市和國家的結構化、等級化的世界與建立在平等友愛基礎上的“共同體”（communitas）之間的關系時，現代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提出一系列對立元素，與維吉爾的觀點如出一轍。兩種社會的組織形式從概念到經驗，都是互不兼容的，其結果是兩種社會需要神話和宗教儀式居間調節。通過允許跨越彼此的閾限或看不見的疆界的儀式，一種社會到另一種社會的過渡得以實現。朝圣實際上就是一種過渡形式，朝圣者經常從國家的核心——城市地區移動到鄉村地區（常被視為是本國特定民族的古老故鄉）。通過原始的方式，穿著普通服裝一起旅行，朝圣者之間形成了紐帶，超越了社會疆界。

奧維格1993：326—327

徒步漫游是……一種文化和技藝……一種對自己的國家，最深處和最遙不可及的地方的愛，這種愛……不會枯竭，這種愛……激起人們的忠誠之心、愛慕之情，足可以成為某些人的宗教。

沃德1934—1935；轉引自希爾1980：32

國家公園被人們稱為國家皇冠上的最后一顆珠寶。其心臟地區是“遙遠卻堅如要塞的公用地”，遠離紅塵，人跡罕至。在這兒，所謂的“撒切爾的英國”似乎顯得很渺小；一個更清晰的觀念已經凸顯——這里不是“他們的”英國而是我們的英國。

里德1991：7

我們渴望文明的舒適和便利，但是如果這意味著徹底擯棄與我們依舊歸屬的棲居地的視覺象征的聯系，那么我們可能變得像籠中獅子一樣……只能淪為在籠子里神經質地踱步，因為有些東西根本錯了。……簡言之，探險是一種最基本的生存行為，我們之所以進行探險，是因為受我們本性強烈的驅動……考慮到這一語境，我們把側重于關注湖區的藝術和文學的文化大流派，不是視為登山者或徒步者經驗的平行流或替代品，而是視為同一個東西的重要部分。

阿普爾頓1986：119—122

人天生就需要離開他的洞穴，漫游到二十多英里之外；所有這些科技、不斷被更新潮的東西甩到后面、所有的緊張壓力——不！徒步才是本來需要的，使你接近最本質的東西——我是否受傷，我是否餓了，我想撒尿嗎？這就是我喜歡的原因——你就是你，你的身體和自然環境。

馬丁F.1996

引言

前六章論述了湖區文化建構這將近250年的歷史進程。這些過程涉及進入風景和如何看風景的問題。與公用地問題并行而且深化了公用地進入權問題的，是屬于政治進入權范疇的社會運動。我現在轉向一群人（主要是城里人）熱衷湖區山地徒步的流行現象，對此進行微觀研究。該現象作為一種最近期的表現，映射出早期對這片風景、這片文化地域、這個英格蘭版本的想象、接觸與進入。

我對山地徒步者所做的多點式、場所機動的民族志研究，與英國社區研究的傳統模式并不契合（阿倫斯伯格和金波爾1940；貝爾1994；科恩1985；福克斯1967；弗蘭肯貝格1957，1966；米維特1986；斯特拉森1981；威廉斯1956）。這種研究既非根據靜態的場所，也非根據年周期觀察。親屬關系也不是我的主要關注點。遠不是對“非自愿地方化的‘他者’”（阿帕杜萊1988：16）的研究，而是關于去/地方化（dis/located）的情感共同體的研究。該共同體由年年重返甚至幾十年不斷重返湖區的人們構成，這樣的重返行動顯示的不僅是他們對一個非日常棲居之地的依戀，而且是對這一種社會領域的流動形式的依戀。研究涉及到共同體——特別是徒步者那種臨時聚合而成的共同體的諸種問題：進入、接納和排斥。盡管分屬不同的概念范疇，但進入風景、進入政治以及進入共同體，都各自和共同指向一種進入權政治（politics of access）。

英國社會人類學非常重視“由實地感知地方性（locality）而獲知的‘地方特色’”（科恩1982），但是，我們這里對田野考察地點的重新選擇，卻對上述“地方特色”感有顛覆作用。在此爭論的焦點是：這個高地的地方特色主要是由臨時來到這里的城市訪客感知和體驗出來的，那么此類共同體和地方性就缺乏典型的田野考察點或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純度”，這就觸及了有關學科及其實踐的假設——其中許多慣常方法正在受到越來越多質疑（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我的研究不僅是方興未艾的“多點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研究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有基礎廣泛的民族歷史架構，我的研究還屬于一種從多學科領域進行此類研究的潮流（馬庫斯1995）。

研究人群和研究方法

1990年的家庭普查表明英國有兩千多萬人把散步視為主要的戶外活動。如果把含義不同的散步——從周日下午在當地公園遛狗到整天整周的徒步都計算在內，得出的統計數字確實說明了漫游者協會在當地和全國展開的活動（包括維修人行道和推進進入權）影響的人口遠遠超過該協會會員人數——會員大約有18.5萬。

商業性的休閑徒步的廣告出現在各種會員雜志、吸引徒步者的商業性雜志、英國旅游部門出版的諸如“徒步英國”之類的地圖、各個國家公園發送的月報里，通過各地旅游局和網絡四處開花。這些資源為每年花錢參加英國徒步假日三百多萬天的人們服務。平均壽命的延長和提前退休制為這種休閑活動提供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市場。

從各類印刷資料、電子資料中，我收集到假日徒步組織的地址，從寄給我的小冊子里預約登記，當然是從價格最低的度假項目中挑選我所需要的：每周花費在225英鎊到308英鎊之間（相當于360到493美元）。我收到的一些旅游手冊中，湖區度假每周花費在600英鎊至800英鎊之間（相當于960到1280美元）。這些假日旅行的吃飯標準、住宿標準和團隊大小都不盡相同，但旅行路線卻一樣。這些現象反映了徒步商品化的一個方面。因此下面的討論只是依據假日徒步市場的一個有限的部分的統計。

對此進行的歷史研究和我個人在湖區的前期工作（達比1988）促使我想去了解假日徒步和俱樂部在創造社會網絡和共同體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鑒于歷史上逐出風景和進入風景所涉及的階級對抗的強度，我想知道徒步團體是否可以跨越階級。我注意（研究對象）對于強調環境責任的政治和對于環境衰落的態度、信念和感受——這一興趣源于我以前對歐盟農業環保政策在區域和在本地實施情況的研究。我認為也許能從最基礎的現象開始切入這些論題。在田野考察過程中，團體的動態、性別和種族問題凸顯出來。

我密切觀察的核心群體包括120個人，我與他們一起于1995、1996和1997年在湖區進行了歷時1周、2周和3周的徒步，行程大約400英里。他們沒有一個人生活在湖區。除了6個來自西歐的度假者以外，其余的徒步者全是英國人，實際上他們都是英格蘭人。我們參加了全國性機構如鄉村假日協會（CHA）、漫游者俱樂部（RA）以及私營性質的徒步旅行團組織的（價位較低的）假日徒步。徒步者的姓名都是虛構的，除非經過同意可用真名。

每個團隊一起徒步約一個星期，多數時候，晚上回到固定的住處參加晚間活動。住房風格各異：有佇立于村外的維多利亞式大宅；有位于相對偏遠山谷里的瑞士木屋——在20世紀30年代徒步狂熱時期由一個徒步俱樂部建造；有一所建于20世紀初期的別墅俯瞰巴特米爾湖，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可以飽覽湖區美景；還有改建的谷倉。每周的假日徒步一般周六下午出發，在途中休息一天，徒步者可以去購物、參觀旅游勝地、自己自由散步或休息。在鄉村假日協會轄下的住處，兩三個旅行團隊同時活動。每隊約有20到30人不等，徒步的難度也不等（一日徒步4到6英里，含有一段500到800英尺的登高路程；或一日徒步7至9英里，含有一段2000到2500英尺的登高路程；或一日徒步10到14英里，含有一段2500到3000英尺的登高路程）。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更換團隊，但很少人這樣做。

為了把觀察和定量的偏見最小化，獲取能夠比較的數據，我與來自德文戴爾峰區住地的假日聯盟（HF）徒步者一起徒步，還與考文垂、牛津、科爾文灣（北威爾士）以及肯德爾（湖區）的地區性徒步俱樂部會員一起徒步。像鄉村假日協會一樣，假日聯盟每天提供三種不同難度的徒步方式，晚上徒步者一起活動。納入參照觀察的人群也約有120人。我對兩種人群做了問卷調查（見附錄）來補充我的觀察。問卷發給110人。50份問卷由核心人群的徒步者完成，52份由參照人群徒步者完成。問卷較長，含有56個問題，97%的回答率說明徒步者有興趣充當研究對象。

兩組人群中沒有年輕家庭，年齡在35歲以下的人很少（核心人群里只有12%，參照人群里只有3.8%）。核心人群的徒步者平均年齡是43歲，男性比女性人數略多（52%︰48%）。退休者占20%，其中2%屬于鰥寡之人。參照人群的徒步者平均年齡52歲，男性人數遠遠大于女性（59.6%︰40.4%）。參照人群中的男士曾經幾次對我說他們的妻子已不能像年輕時那樣徒步了，只能參加短途散步或周末的短途旅行。退休者占61.5%，其中13.5%屬于鰥寡之人。如果將獨身、分居、離異和鰥寡列為A類，同居和已婚者列為B類，那么兩組人群中A類雖占少數，但比例可觀——核心人群有44%，參照人群有35%。

對兩組人群的職業（涵蓋專業人士、管理人士、學院人士、白領、藍領和體力勞動者）進行的交叉分析表明二者之間的職業差別不大。兩群人的一個有趣的差別在家庭收入上，不是實際收入（這一點難以確定），而是不回答收入問題的人數：核心人群有8%的人，參照人群則有23.1%的人沒有回答。無論問卷的發放和回收是在團隊內如何進行的，對這一問題很多人都避而不答，有些團隊甚至完全沒人回答。

共有7種收入檔。45%的核心人群成員回答收入在20000到35000英鎊（合32000美元）檔，這一群人的平均收入是17100英鎊（合27360美元）。參照人群收集到的收入數據平均是12627英鎊（合20203美元）。略低的四個收入檔里，兩組非常接近，只有在5000到9000英鎊（合8000至14000美元）這一檔里，參照組是核心組人數的三倍。在最高的三個收入檔里，參照組突然出現“空白”。當性別差異用于分析收入數據時，核心人群的男性徒步者平均收入為17500英鎊（合28000美元）而女性的則為16700英鎊（合26720美元）；參照人群中的男性徒步者平均收入為14500英鎊（合23200美元），女性的為10750英鎊（合17200美元）。

答卷分析表明，收入的差異會影響到“當年”或“平均”的徒步裝備費用：60%的人花費在250英鎊以下（合400美元），20%的人花費在251到500英鎊（合400到800美元）之間，而5%的人花費超過500英鎊（800美元），但歲數較大的徒步者花費要少一些。核心人群比參照人群花在裝備和假日徒步上的錢要多。白領工人和歲數大一些的徒步者更經常地參加有領隊或向導的徒步英格蘭活動。隨著收入的增加，這個頻率降低，退休之后，頻率會重新變高。從民意測驗里可以發現一種出于禮貌的偏向，這是已經得到承認的。也許還有一種未承認的男子漢偏向：白領工人和女性徒步者多參加難度較低的徒步（如沿著騎馬道漫游），男性專業人士多選擇難度更大的徒步（如攀登陡峭的山坡）。

問卷以27個陳述性聲明結束，按照五分制選擇，其中一分為“強烈贊同”，五分為“強烈反對”。對數據進行多變量回歸模型分析，用年齡、收入、性別、婚姻狀況和職業作為解釋性變量。我對散發給他們的三組集合問題尤感興趣。第一組側重在對于強調環境責任的政治的態度、觀念和感受。女性更同意環境應該優先于其他事務的說法；白領工人則不同意這種觀點。既然60%的白領工人是女性，社會經濟位置可以視為其答案的絕對重要因素。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核心人群和參照人群并無什么不同。

面對一組針對人所感知的環境衰落的陳述，白領工人不同意問卷上的基本觀點。其他變量的反應則無很大的差異。就這一問題所做的統計，核心人群和參照人群之間并沒有太大差異。對于一組針對徒步和個人滿足感的陳述的反應則說明了年齡與評價有巨大關聯：歲數大的人能夠在散步中體驗到更多的滿足感。核心人群中有74%屬于被人雇傭或自我雇傭，他們從徒步中所得到的自我滿足感要少些，在這一點上管理人士和學院人士也一樣。

過去與現在

山地徒步作為反復重演的表演性行為，創造了個人的置于時間和地方的過去。通過向新一撥的人們引述的經驗和記憶，多個過去把個人聯系起來——把人和地方密切相聯，鑄造出跨越都市與鄉村、北方與南方等社會地位經濟標記的聯接。對于一些山地徒步者來說，在徒步發揮聯接作用的過程中，他們與歷史的過去（如在第一章到第三章討論的歷史）聯系起來。與湖區特定地方相關的詩歌、文學或藝術構成了再引述和再發現的另一層面。

在一些人眼里，被組織起來和正在組織起來的徒步群體這一事實直接與第四章、第五章已探討的進入權斗爭的歷史形成共鳴。對另一些人而言，進入權斗爭負載著種族和性別的當代社會問題（我將在本章后面部分和下一章里詳盡討論）。在他們看來，進入風景區和山區的持久行為和經歷同時是一種認知探索和一種抵抗策略。

核心人群中很少是第一次參加湖區徒步的。盡管過去在哈索普山谷的研究工作使我對湖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參加這種有組織的山地徒步我卻是新手。核心人群的多數則不是。有些人年復一年被召集到湖區一起徒步旅行。由于居住在國內不同地區，在湖區以外他們彼此難得碰面。多年以來，有些人不僅一起徒步湖區，還一起徒步其他地方，盡管在徒步之外的其他場合他們緣慳一面。有些人早在兒童和少年時期就徒步湖區了，最終選擇退休后來到這兒，把自己重新定位在他們逐漸了解和熱愛的景色中。這少數人出現在含有地區性湖區徒步俱樂部成員的參照人群里。核心人群中的有些人多年來經常單獨參加CHA組織的假日徒步活動，因此也就熟悉了那些參加同樣活動的其他人，在這些歷時一周的徒步過程中他們常常不期而遇。在這些變化參數范圍之內，大多數人屬于“歸來者”。

我自己也是“歸來者”，雖然性質不同，但也可以作為一個觀察對象（哈斯特拉普1987）。我在英格蘭出生長大，卻在美國生活了多年，這意味著我在英格蘭北部地區進行的田野考察模糊了田野與家的等級差異。我處于一種令人尷尬的局內人—局外人位置：我意識到在某種初始的層面，英國風景一直是“故鄉”，而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英格蘭現在對我而言卻是“外國”。這種矛盾對我并非沒有影響，我應該站在不介入的角度觀察那些進入英國風景之中的人們并試圖理解他們，但我不是墻上的蒼蠅，可以不動聲色地觀察。在特定的情形下，我自己對這些人和這個地方的反應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我對于徒步者動態的觀察。

我的研究如果能把所考察的每個問題都分得清清楚楚，那么就結構而論會是令人滿意的，但實際卻是所有問題糾結在一起。通過展示每周徒步中的糾結現象和過程，收集同一現象在不同徒步周的表現，把它的特征整理出來，我努力使我的材料顯現出一種秩序來。但在此之前，我想在世俗性朝圣儀式的架構里分析徒步群體。

世俗性朝圣

無需把世俗性朝圣的觀念變成一刀切的分析模式，強使一切（數據）與之吻合。但我的確想要提出，徒步的模式和過程、象征學創造了一種類似宗教朝圣的世俗性朝圣。湖區徒步路線的密度、徒步者的密度、徒步的最遠范圍、眾多的觀景點、熱門路線的密度，這一切構成了一幅圣地和驛站的世俗版本：縱橫交錯的朝圣路線通向位于邊緣，但具有地形學重要意義的朝圣中心（特納1974）。儀式的三重分類——分離、過渡和交融把個人帶進群體并支配著人和群體在土地上的運動，而徒步群體則是儀式的空間化和現實化（凡·吉納普1960）。地區性徒步俱樂部以貫穿一生的運動帶來添加的維度。

由于角色和活動的碎片化、角色沖突的隔離，以及不再信仰“特殊化儀式……會神秘地影響秘技參入者的安寧”（格拉克曼1962：37），凡·吉納普所討論的那種儀式被認為“與現代城市生活結構不能和諧共存”（格拉克曼1962：36—37）。一個徒步群體實際上打破了一些人謂之的城市生活所引起的隔絕感，同時也成為逃離城市的一種方式。在鄉村環境中一隊人一起徒步一個星期左右，逃離了城市，因而“僻壤與社會不再是對立的概念”（特納1974：203）。

徒步領隊提到徒步群體對孤獨者和情感需求者的幫助和支持，以及通過重建自我的自然基礎而獲得的幫助。不少徒步領隊都有過地區性徒步俱樂部的經歷，他們認為孤獨是許多人參加徒步活動和俱樂部的動力。馬克是一個大型地區性俱樂部主席，也是一個全國性徒步團隊的領隊，他指出，“徒步時的身體鍛煉以及與自然的聯系幫助人們走出個人難題，一個星期的徒步經歷無異于精神的復活”。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也如是總結，在我們看來，顯然他是生活受傷者之一。[[174]](#_174_32)針對“你是否閱讀與你徒步地區有聯系的小說和詩歌”這項調查，他在備注一欄中寫道：

我對……華茲華斯情有獨鐘，在做其他事情時，我經常想到他的詩歌。我認為他的詩有一種治療功能：他理解焦慮，并發現了慰藉心靈的方法。我喜歡他是因為，他把我們心靈與之合拍的自然描寫為具有一種神秘的創造力。

從這層意義上講，徒步群體成為一個具有一定的宗教魔力的場所，存在于“一個特殊的場合，延續一段時間……在兩個世界之間”（凡·吉納普1960：18）。只是在這一個案中，特殊的場合并不是在“兩個世界”之間，而是進入遠在普通的日常結構之外的空間。個人經由此運動而獲得治療，從日益加快城市生活節奏的技術緊迫性所造成的傷害中恢復過來。

像朝圣一樣，徒步就是經歷一種治療和康復過程。（在此我沒有考慮徒步媒介的形式化體系，這種體系顯然更容易看出是儀式化的。）按照凡·吉納普的分類，在特定儀式中，任何階段都可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強調。將徒步周視為一種儀式，那么過渡階段就是延長化的閾限期，在此期間，人們體驗到共同感（communitas）。這是臨界狀態，此時如果儀式是集體性質的，參加者“就體驗到……一種自發生成的人類彼此平等的關系，擺脫了結構屬性”（特納1974：202）。

特納的共同感建構的觀點源自他的朝圣資料，可被定義為反結構，不過“社會結構并沒有消失，而只是大大地簡單化了：屬種關系而非排他關系得到加強”（特納1974：196）。共同感的本質是世界主義的，與建立在地區性的排他主義基礎之上的存在相反，是對“無限的環境、永恒的當下”的體驗（特納1974：238）；在此，一天是另一天的復制，重復傳播著社會聯系。共同感并不是作為與另一群體對立的某種集體性而建構起來的，這里特納也并不關注“共同感的自發行為式表達……如英國酒館（或）……航海游樂的一群乘客”（特納1974：242）。

如果宗教性朝圣位于共同感系譜的一端，英國酒吧生活則位于另一端，也許徒步群體可以被認為是占據了中間點，反映了兩端的特性。似乎在社會中：

當幾乎沒有閾限體驗的結構條件時，逃離或摒棄結構性義務這樣一種社會需要會尋求非宗教形式的文化表達，盡管這些方式可能深深地儀式化了。

（特納1974：260）

在前幾章我們已經說明，進入風景和徒步者俱樂部是文化的表達，是抵制工作紀律的流動性象征行為。共同感的理念強化了徒步群體是一種世俗化朝圣形式這一看法。當你參加宗教朝圣活動，總會要接受你基于職業或知識的社會地位的喪失。領隊的職業和知識使他（或個別情況下，她）顯得特殊而具有權威性，而活動和時空組織方面的巨變（圍繞著一套不同的日常儀式）則拉平了參加者的地位。

如同朝圣一樣，是活動本身（人們熟悉的預期逐漸減少）創造了群體的結構和新的情感結構潛力。與他人一起經歷的體力挑戰產生了一種同志感。群體抵達“山頂”，這一象征性的賦權彌補了在社會地位和權力方面的喪失，正是旅行的過程共時性地和歷時性地鞏固了共同體。

特別路線通向可從特定的有利角度來觀察的關鍵景物。觀察這些關鍵景物或景色需要自覺服從強體力活動所要求的紀律。它們可被視為圣物或象征的對應物，

作為價值和文化公理的記憶術發揮作用……因此一個社會的深層知識從一代傳向另一代[并經常被表演出來]……在“地非地，時非時”背景中（正如威爾士民俗學者和社會學家阿爾文·里茲曾為我描述的凱爾特游吟詩人吟唱的情形）。

（特納1974：239）

現在，那些一度詩意地呈現出來的風景之中的神圣特質在一個世俗環境中重新得到引述，找到新的地點，但它仍然回應了神圣性：如簡所述，“對我而言徒步具有精神性的一面。站在山頂我感到升華，猶如聽到巴赫的音樂。日常的瑣事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另一位女士說她體驗山區的空間和相對寂寞就像是“情感和精神復蘇期”。

說到神圣性的反映，一個黃昏，我們一小群人取道湖邊小徑去酒吧，路上日落景色使我們停下腳步。群山及其在巴特米爾靜謐水面的完美倒影折射出一種火紅的金橙色。我們坐在湖岸的草叢中，靜靜地，望著色彩的絢麗變化，不知道身在何地何時（“地非地，時非時”），我有時眨眨眼以確信我是在確切地記錄這一切。這短暫的瞬間留存在腦海中，看了沃爾特·史密斯的日記描寫在巴特米爾劃船時的生動畫面，又鮮明地回到眼前：

……我們注意到太陽就要落山，使群山染上火紅色彩，因此我們匆忙出發，劃到湖中央，在那兒我們歇息下來，觀賞著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日落。開始是金色，陽光逐漸變成橙色、紅色、紫色，然后蛻變成一種發光的灰色。這種黃昏給你一種“被征服”的感覺。

（史密斯c.1922 n.p.）[[175]](#_175_32)

埃里克的話說的也就是那種“被征服”的感覺：“我不虔誠，但是……”接著他說站在山頂感覺到自己多么卑微。其他人也表達了同樣的感受，感覺自己屬于某種比個人宏大得多的東西，還有人在問卷的備注一欄寫下了這種印象。

一般來說，當一隊人到達山頂，即使已經喘過氣來，幾乎無人交談，他們正在汲取眼前奇景。對話經常可能只是口頭描述展現在我們下面的山脈、山脊或湖泊。引述地名不只是幫助人們按著指南針的指針定向，而且，似乎也將宏偉的風景置于某種控制之中。接著人們會拍攝照片。有時，某個人會單獨坐在一邊，但通常一隊人會呆在一起，沉浸在同道情誼之中，默默無語。

徒步群體提供機會在“劃分出一種特殊現實的時空構架”（米爾勒1955；轉引自道格拉斯1966：78—79）里去體驗共同感。然而，共同感是自下層體驗的，卻又是自上層建構的——體制化已經暗中顛覆它，使其變成市場結構。正是由于這一點，等級的外在標志并沒有被完全磨滅。服裝差別，過去在花錢更多或更少、更奇異或不那么奇異的地方徒步的經歷，以及文化資本的表達，這一切使得在世俗性朝圣中共同感的理想狀態難以實現。盡管如此，在徒步群體中還是能夠體驗到拉平社會地位的機制和同道情誼的自發流露，因為正像在朝圣路上，“閾限情境的重要構成是……輕文化而重自然”（特納1974：252）。在同一地區徒步多年會建構起情節記憶，是一種在心里對蘊含在運動之內的記憶的再體驗。由此產生出一種認同感和對地方的依戀感，一種定位在地方的身份認同感，即使不是地方性的身份認同感。

著裝形象

經由著裝這一媒介，和諧的缺乏被傳達出來。高科技衣著的儀式化展示，標志著一些徒步者對由形象引導的市場經濟所做的實際和比喻意義的投資。非科技衣著的儀式性展示則標志著對資本主義物化休閑活動的抵制。著裝也成為記憶形成的主要場所，引起對過去的徒步經歷和所遭遇的天氣條件的聯想。著裝是一個嚴肅的問題，由此可見山地徒步者和當地人的“道德分界線”（查普曼1993）；而且在生命救援時，會引起不同結果。

由于湖區（正如所有山區一樣）天氣會突然出現極端變化，體溫突降造成的死亡是一年中會隨時碰上的危險。一兩個小時內，一會兒大汗淋漓，隔會兒就得穿上200抓絨夾克或外層防水的羊毛衫抗風，戴上帽子、圍巾和手套，套上防水褲子保暖防風，這類事情司空見慣。相反，在干冷的五月清晨出發，走過薄薄的白雪，行走幾個小時后就得穿上短袖了。體溫驟降引起的死亡事件減少，有些徒步者認為這是因為人們越來越多使用高科技、重量輕、防水的外套，以及汗濕之后依然保暖的纖維——諸如抓絨服裝。

這些質材的衣服具有象征意義，突出了穿著者的地位，含有炫耀性的成分，因而得罪了一些徒步者。寶娜就對我說過：“徒步服裝已成休閑款式——徒步靴子，看起來像徒步靴子，其實沒有用。休閑服裝是財富的標志。”另外一些人雖然欣賞這種衣服的功能，卻悲嘆有時服裝顏色太搶眼，造成顏色污染。有幅漫畫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些態度，畫面上凱西克山區救援隊的兩個隊員穿著高科技夾克，在令人難以睜眼的暴風雪中緊皺眉頭，非常憤怒。回頭指著山上雪中踉蹌而模糊的兩個人影。一個隊員對另一個說，“他們拒絕救援，因為我們的高泰科（Gore-Tex）夾克與他們的犯沖。”

問卷調查中關于高科技服裝的回答表明女性比男性更不贊同這類服裝。一些徒步者有時咄咄逼人地表示要抵制進入這種徒步裝備市場，繼續穿著老式的打補丁的褲子、夾克或舊毛衣。瑪麗恩就說：“我去參觀一個戶外服裝展覽，聽見兩個買主說‘我們還沒開發利用徒步裝備市場呢’。我就想，‘伙計，你們可甭來開發利用我！’我馬上就有了防范心理。”靴子似乎是例外：幾乎每個人都穿著這樣那樣“合適的”徒步靴子。很少看見正兒八經的成年登山者穿著威靈頓膠靴的，只有個把人因為徒步靴子太貴只好穿膠靴登山。

靴子是得到不少儀式化關注的對象：在外徒步一天，一回來就馬上刮掉靴子上的泥土、挖凈鞋底，接著再把靴子放在暖和的靴屋里烘干。皮靴子干后就打上貂皮油、擦光劑或涂上其他防水油或亮光油。早晨出發前再給靴子上油或拋光。有些人特別喜歡把靴子擦得像新栗子那么油亮，并引為自豪。這樣做的多為男性，有些人提到是在部隊上學會了擦靴技巧。同伴常拿這一點開玩笑。

徒步者雜志登滿了評論靴子的文章，據說文章作者穿著靴子走了幾百英里進行性能測試。英國腳的特殊性成為卡爾瑪登山鞋兩頁廣告的主題。整頁版面是一張彩色照片：一只打了水泡的腳后跟吸引眼球。寸把高的印刷體標題是：“多數靴子是歐洲人的尺寸。問題是，英國腳不是。”對頁登著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卡爾瑪我們發現大多數英國人穿的徒步靴子都有問題。這些靴子不合腳。這是因為我們從小就喜歡穿完全合腳的鞋子，讓腳自然伸展。因此我們英國人比歐洲人的腳要寬。不幸的是，多數徒步靴子制造商沒有跟上步伐，制作的是窄腳的歐洲尺寸的靴子。我們摒棄這種窄靴思維，制作我們自己新型的金牌K-SB系列靴子……更寬。專為英國腳制作。

（鄉村徒步1996：38—39）[[176]](#_176_32)

這種反歐洲的刻薄幽默感強調了英國“自然的”優越性。奧麗薇，一位曾在羅馬尼亞孤兒院做志愿者的退休護士，談到自己在歐洲獨自徒步時說，歐洲人把休閑散步視為“特別英國的傳統”。

過去之窗

在介入這一傳統的過程中，有一個變化表現在住宿舒適度方面。在富裕的20世紀80年代，湖區合作假日協會中心在英國各地提供的簡陋客房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受人歡迎，預訂客房的數目開始下降。一項動議為之而起：試圖既維持連續性印象，又不要與合作運動及其連鎖店混為一談。組織更名為鄉村假日協會，形象得到改變——從老式的工人階級“合作”自助組織變為服務范圍更廣的“鄉村”圈，這種語言的轉變其實含有商業化的用意，反映出英國的中產階級化。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CHA（鄉村假日協會）已經成為一個經歷著重大轉型陣痛的組織。某中心的活動經理認為，如果該組織還想繼續做生意，就得完成這種轉型。協會被迫出售一些中心以整合名下資產。在我進行田野考察期間，協會還在繼續關閉另外的中心。同時，該組織忙于改進保留下來的中心，因為現在很少徒步者愿意與人共用走道盡頭的浴室和衛生間，或者同時和五六十個人爭用一個投幣公用電話。

1995年在我開始田野考察時，CHA增設了一個新頭銜——活動經理。這類經理引導徒步活動，常年或夏季住在中心。他們監督帶領徒步的自愿者，并監督組織夜間活動和徒步的主持人。隨著徒步活動的難度加大，徒步領隊也變得更加職業化，以便吸引徒步市場里要求更高、一般也年紀更輕的人群。結果，CHA現在組織的有些假日徒步每日行程16英里，含有5千英尺高度的登山。

CHA也開始調整它的營銷策略。1998年，對開本紙張光滑的彩色手冊取代了有點寒酸的兩色傳單，也登載了CHA的網頁廣告。與此同時，協會與純盈利的假日組織合作，開拓了特別假日活動范疇，將徒步與教授多種業余愛好（如風景繪畫）結合起來。此外，21歲到35歲年齡段的假日活動、家庭假日活動以及專為單親家庭定制的假日活動隆重推出。這些不同于過去的活動反映了20世紀末期品味與社會現實的改變。總之，所有這些很難使我們想到該協會本身是植根于19世紀的“禁酒基督教”（Cold Water Christianity）。

我參加有組織的徒步，第一個星期入住的是CHA的擁有33張床位的瑞士木屋，位于波羅戴爾山谷，此地景色非常優美。從第一個星期的經歷，我看出組織內部延續與變化之間的沖突導致了一種緊張局面。在鄉村假日協會微觀世界里發生的事情反射出全國范圍內進行的爭端。

游客分成兩類：一類為預訂了一周的導游和晚間活動的游客，一類是使用中心一個星期左右進行自助徒步的游客。第一類的主要成員為60多歲，一般顯得不很強健。他們選擇難度較低的徒步。這一群體中只有一對夫婦年輕些、強健些，參加了難度中等的徒步。從問卷答案看，這類人顯然屬于較低收入檔和最低收入檔（1萬—1.5萬英鎊，合1.6萬—2.4萬美元），甚至屬于5千英鎊以下（合8千美元）。他們不愛說話，似乎彼此很少交談。當假日開始的周六下午，隊員互相見面自我介紹時，我的調查引起這群人的詢問諸如：“你是稅務所（國稅局）的嗎？”當時我納悶不解。

只有兩個人年齡在25歲以下：活動經理瑪麗和她的一個朋友，朋友來拜訪她時就參加了該周的徒步活動。她們兩個都沒有參加晚間活動。晚間活動由當周的“男主持”道格拉斯和“女主持”羅斯瑪麗主持。在過去的35年里他們一直是CHA的活動主持，之前他們已是協會會員。晚間活動包括小測驗、競猜游戲和拼字比賽。沒有舉行ceilidh（夜舞會），道格拉斯說是因為人員不夠。凱爾特語“ceilidh”一詞經常用來指英國各種徒步中心晚上舉行的舞會。

男主持和女主持提供了一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可以看到CHA的過去，同道之誼和宗教內涵的歷史。在第一次晚餐上，道格拉斯以歡快的語調宣稱我們每頓進餐不要總是與同一個人相鄰而坐，因為“這兒的每個人都是好伴兒”。接著他做了一個冗長的感恩祈禱。他祈禱的時候，我看到有些人像我一樣顯得吃驚。這些人都是那些沒有預訂徒步導游和晚間活動的人。

通過與道格拉斯的交談我發現，他覺得同道感和共同體已被撇到一邊，而這正是CHA“在過去日子里”突出的特色，取而代之的是近年來入侵的個人主義。他告訴我，直到1991年他還在假日徒步周主持周日晚會，他很遺憾這種習俗正在消逝。他指出總部管理發生了變化，因而政策也就發生了變化。[[177]](#_177_32)

盡管道格拉斯試圖維護CHA的連續性，變化還是在發生。他覺得悲哀的是，出去徒步，男士不再攜帶午餐大籃子；徒步途中的下午茶，女主人不再切割蛋糕傳遞給每個人。他認為那些事情可以幫助女主人確定自己的角色：關照客人的安康。有些習俗如晚餐后一起洗碟子，他認為可以幫助培養在一個群體中的歸屬感。（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已經失去卻仍被牢記的過去，廚房入口處才醒目地貼著一張告示聲明不允許客人進入這個區域。）道格拉斯認為過去與現在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現在是每個徒步者早晨取走已打包的午餐和點心，自己帶著，想吃什么多少隨意。

道格拉斯不允許變化發生的一個領域是：他堅持徒步者不得走在他前面。[[178]](#_178_32)所以我落在他后面一兩步，傾聽他的談話，他遺憾地看到近年來福音派教會的發展奪走了那些本可能成為CHA新會員的年輕人。道格拉斯將福音教會運動的大力納新與CHA缺乏代謝等同起來，這說明了對協會性質的認識——它代表著什么，或更確切地說，在他年輕時代表著什么。這種缺乏年輕人加入的現象在幾個星期里有不同的人提及。其原因被解釋為家庭結構的變化：青少年不再需要與父母住在一起，因此他們再也不參加家庭徒步這樣的活動。這種看法也許能夠說明近年來協會的努力：大力開發年輕人假日、年輕家庭假日，推出富有體力挑戰性質的徒步活動以吸引那些不然有可能把CHA當作“老年人”協會的人群。

那些利用中心作為徒步基地的人在晚上沒有參加大組的活動。他們要么成雙結對，要么獨自徒步，非常了解湖區。他們屬于偏年輕的人群（36—45歲和46—55歲），處于較高或最高收入檔（5萬英鎊以上，合8萬美元以上）。有一對夫妻不只徒步山地而且漫游英國。他們是澳大利亞一對珠寶商夫婦。鮑勃，五十好幾，出生于印度，父母是英國人，在英國公立學校接受教育。杰姬五十出頭，從小移居澳大利亞。他們這次漫游英國的行程包括湖區，就是為了看看“華茲華斯的風景”。他們在學校都學過他的詩歌，覺得如果沒有游覽華茲華斯詩歌中提到的山脈和山谷就等于沒有真正到過英國。他們駕車游覽湖區，只是偶爾參加難度較小的徒步活動。

像杰姬和鮑勃一樣，伊恩和波琳覺得他們漫游進入了某種時間彎道。他們來自中部，是剛退休的商人，帶著相對昂貴的徒步裝備，并且認為這很好，只要“這些裝備用以真正徒步而非商業大街的做秀”。伊恩和波琳對男主持那種過時調調頗有不滿，隨時說出他們的意見。伊恩感到整個英國出了問題，道格拉斯是英國問題的象征。他們還批評CHA的客房陳舊不堪，提到了男主持來自實際上已經消逝的過去，提到了英國制造業搖搖欲墜。英國問題包括一種普遍性的害怕變化的情緒，凡事向后看的方式波及工業、商業和社會政策，領導層缺乏遠見卓識，不愿投入資金及時改善基本設施。

CHA精神的要素之一就是幫助那些本來支付不起度假費用的人。部分贊助和免費假日的基金來自每一個CHA周所獲得的捐助。在我這一周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別一目了然，外在差別表現在服裝、語言和風度方面；內在差別可以從問卷中反映出來。我參加的其他CHA周徒步項目中，沒有哪一個項目像這個集中了如此多的低收入客人。這使我認為我一定是預訂了一個大致留給受資助的徒步者和（或）特邀徒步者的項目呢。這解釋了為什么他們對現場管理保持沉默，不會公開表示喜好或不滿，但會歡迎其他人說出他們的喜好并引起某些改變。這也許能解釋我開始進行調查時所遭遇的質疑——我可能發現的某些事情會使某些人喪失免費或資助的資格。

外出徒步一天以后，這種沉默被芭芭拉打破，她是一個五十出頭的單身女子，是一名小職員。她對我傾訴，說她覺得男主持人“以恩人自居”，而他“極力推行宗教”的行為極大地冒犯了她。芭芭拉非常準確地回顧了她所知道的CHA早期歷史，認為“他們把我們看作應該受教育的工人階級”。針對此事以及男主持施加給群體的權威發發牢騷，她盡管感到痛快，但還是非常留意是否有人偷聽她的談話。芭芭拉的神秘神態以及害怕被偷聽的心態似乎表明，如果被人聽到，她就再沒有機會回到這兒來了。如果她像我一樣自己付費，或像那些不屬于這個群體的人一樣（他們不去參加道格拉斯和羅斯瑪麗主持的晚間活動），她也許會泰然說出自己的怨言。事實是，她使用階級概念來描述等級，把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的階級/分類定位在與道格拉斯及其組織的對立面。她通過這種階級范疇來理解CHA的集體記憶。

導游帶領下的徒步群體中，多數徒步者年齡在六十大幾和七十出頭之間。他們幾十年來參加CHA的徒步。對他們而言，道格拉斯為之悲嘆的業已消逝的習俗是他們從年輕時就了解的CHA的一部分。他們非常欣賞由道格拉斯和羅斯瑪麗主持的晚會，圍繞歷年來收集的游戲而進行。難度不大的徒步、熟悉的游戲為他們回憶個人的過去提供了記憶線索，再次給他們歸屬感。不像芭芭拉，至少從他們說出的話來判斷，大多數客人知道在這個特別領域里運行的社會排序中自己排在何處，也算是過去的CHA的余緒吧。

群體中的群體

根據安排進行一周徒步巡游，猶如組織起來的如畫風景觀景點，在群體中創造出一種共同的空間和時間，給彼此陌生的人們提供了接觸模式。每天重復一樣的程序（灌滿水瓶、午餐打包、擦靴、房前集合、估測天氣、氣喘吁吁上山、贊嘆景色等等），個人間的互惠關系聚合而成“這一群體”。這種特別的“此時此刻”完全不同于有規律的日常生活，疊加在“個人”的感覺之上。他們交換自傳性的細節，逐漸生出一種壓倒其他的集體意識。同時，還有一些不斷變化的逆流，微妙的和不那么微妙的排斥與包容。共同感和爭論并存，有此并不等于無彼。當然，如果我心里曾想到過徒步者共同體是沒有問題的，“其樂融融”的——這些想法，安息吧。

在巴特米爾的第一個星期，有項活動是晚上和白天徒步過程中都在進行的。這就是交流拉丁語短語和詞形變化，給人一種友好的高手炫技的感覺。每個人遙遠或不那么遙遠的教育背景突然暴露在明處。這項活動把群體分成了解拉丁語和不了解拉丁語的兩撥。在潛意識中，知識起著社會定位或分類的作用（布迪厄1984）。那些“拉丁分子”（包括徒步領隊和年齡在二十多歲和六十多歲的人）似乎沒有察覺自己有一個沒說出來的假設，即認為每個人都像他們一樣在學校學過拉丁語。他們沒有發覺這項活動使得群體中一小撥人只好沉默不語。

只有一小撥人沉默，這反倒說明了群體的相對同質性。歸屬感是對文化的體驗（科恩1982）。那些沒有接受過這種特別文化的人，無法顯示自己的文化資本，就不屬于這個群體。沒有文化的人只是埋頭自己徒步，該游戲結束后才能融入群體。

打斷這種和其他格局的是馬丁——群體通過馬丁而凝聚在一起。馬丁是一位退休的專業人士，五十多歲，未婚，據他自己說是一個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他挑起的社會活劇成為徒步周的副主題活動。近距離地生活在一起時，人們的品性和弱點很快暴露。馬丁立刻毫不留情地對他們開火，引起一些激烈的交鋒。[[179]](#_179_30)徒步周快結束時我找到機會問馬丁為什么這樣做，他回答說他的煽動可以使人們凝聚在一起。他是否認為自己為了群體的利益做了自我犧牲？這是不是摻雜了利他主義的自我主義呢？

如果這是社會活劇的第一階段，隨著這個星期的過去我們步入第二階段，“一種危機升級階段”（特納1974：38）。人們可以“注意到碰撞，偶然看見爆竹，但是很可能趕到某個點上——爆竹在你周邊開始爆炸”（麥克唐納1987：121）。馬丁聽我自我介紹是人類學家后，他馬上把人類學的早期歷史與法西斯主義和優生學聯系在一起，提出今天“非洲部落”的騷亂證明了黑人智力本來就比白人低下，這種狀況是由不同的基因造成的。我努力反駁他的觀點，卻遇到這樣的回答：“我不會相信我和叢林中黑兔子的DNA是一樣的。”

不久以后，當我們都在安靜地吃著三明治，欣賞著景色時，馬丁說，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當然應該“與土著人一起吃肉、啃骨頭”。他抓撓著腋窩，嘴里發出呼嚕呼嚕的叫聲，接著又說：“我們是不是應該為你嗚、嗚、嗚一番啊？”我用一種我自己聽起來都非常憤怒的聲音反擊：“哦，但是你本來如此啊！”幾秒鐘的寂靜無聲，坐在馬丁后面的一個人對我眨眼，頃刻間我成為一個局內人。這樣在我周邊爆炸的爆竹似乎觸動了兩個按鍵：對馬丁刺耳的冒犯的厭惡，以及我作為“美國人”的訪客身份。群體中的一些人說過，我作為英格蘭的客人而且還是一個特別對徒步者感興趣的人，他們非常希望我不要把馬丁當作“英國人”或徒步者的代表。

這次事件以后，馬丁不再對我進行言語攻擊，我們還開始了交談。我認為我是馬丁唯一交談而不是講話的對象。馬丁提到原型人類學的田野考察，使我注意到我的田野考察的地點選擇/意識問題，以及某種焦慮：“真正”的田野考察應該發生在“別處”而非“這兒”。

世界上的地方，越有文化的奇異性和地緣政治的爭議性，越能成為恰當的“人類學”田野，而西歐……就不怎么適合做“田野”，許多在人類學系艱難尋找工作的歐洲人就證明了這一點。

（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12）

田野考察是人類學研究的基礎方法，被認為是（無論這觀點是否錯誤）用之于小規模的社會。據說這是人類學界化和監督自己的學科疆界的主要標志（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田野考察/民族志也許并不是人類學家專有的會標（貝爾1994）。對于傳統的田野考察的學科不安全感起因于質疑民族志文本的構建（克利福德和馬庫斯1986）、田野考察中的權力行為（克萊潘扎諾1980）、田野考察點自然化“純度”背后的主觀假設（古普塔和弗格森1997），以及這樣一個事實：

世界各地群體身份的風景——族裔景觀不再是熟悉的人類學研究對象，因為群體不再具有地理意義的緊密性、空間意義的邊界性、歷史意義的自我意識感和文化意義的同質性。

（阿帕杜萊1991：191）

在徒步群體身份認同的風景中，圍繞馬丁上演的社會活劇進入第三階段：“矯正行動”（特納1974：39）。這一周的最后一個夜晚，馬丁已激怒了每個人，實際上，對他的敵對情緒公然地表現為對飲酒“儀式”的違反。這一切只有男性介入，女性只是觀望者。當全體人馬聚集在離住地一英里半遠的酒吧時，被馬丁招惹的一位男士告訴馬丁，他得給每個人買第一輪酒，這是他與他們一起前往酒吧的代價。

在酒吧，男士們雖然臉帶著微笑，卻開始用精當的大實話教訓馬丁。氣氛越來越緊張，令人尷尬。一會兒以后，灌了一肚子奎寧杜松子酒（“不是你們這伙人正在喝的垃圾啤酒”）的馬丁回擊了他所受到的羞辱。他對領隊說，按慣例隊員會湊份子給領隊買個禮物的，但這次卻無人出頭，這下輪到男士們尷尬了。

從那時起，沒有人理睬馬丁了。他顯得很受傷，煩躁不安，不理解人們為什么作弄他。他轉向我解釋，大學時有一個游戲，就是“盡量把某人挑動起來，直到他們按捺不住，‘狼煙’大冒，他們怒火萬丈——那時你就贏了”。在我看來，他未從大學游戲吸取的教訓就是這個游戲顯然只能和氣味相投的人玩。他告訴我他是怎樣艱難地（在我看來是孤獨地）爬上經濟階梯的。“獲勝”成為他游戲的主旨，無論游戲是在何種領域進行。如果說馬丁與這個群體對抗，那么過去似乎是馬丁與這個經濟世界對抗。

接下來的一星期，一種形式更持久的競爭在巴特米爾繼續進行，原因是在大的群體中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小群體。這個小群體被描述為“搖滾狂人”，用通俗的話來說在別人眼里他們非常瘋狂。他們這一群有十來個男人，身體非常健壯，年齡多在三十歲左右，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都會在這個地方重聚。他們的目標是在最短的時間內走完多數景點。人們告訴我，這些搖滾狂人已經成為經理的鐵哥們兒。他總是為他們帶隊，特地為他們安排一周活動，不管其他徒步者如何。我詢問經理和當周領隊是否能與他們同行，很快就得知我的這種企圖不受歡迎，我只能自己單獨徒步。就這樣，我被排除在外——這一事實使我注意到占支配地位的亞群，更清楚而直接地意識到這個本來是學術上的問題。

早、晚餐時，這群搖滾狂人占據最大的桌子，他們互相替自己人占座，這樣無論什么時候來就餐，他們都可以坐在一起。晚餐后聚會客廳，他們幾乎只與自己人交談，他們還一起到酒吧。與主要群體之間有條明顯界限，不過我的這種奇怪的隔離感有所緩和——有個朋友搭救了我。既然只有在早餐、晚餐和晚上我才看到這些人，我的同屋伊麗莎白就成了我的信息渠道。她覺得搖滾狂人群的徒步速度快得難受，但她還能勉強跟上。徒步一天歸來，在進入晚餐前的沉睡之前，伊麗莎白會提供一些搖滾狂人群與不能適應他們徒步速度的隊員之間的爭論動態。

搖滾狂人只顧自己趕路，任由跟不上他們的人掉在后面，不顧什么禮儀。當掉在最后面的人終于趕上來時，他們馬上起身離開吃茶點的休息站；有一次，他們要一個外人“走開”，叫他別再想跟在這個團隊里，然后就把他丟在后面。晚上活動，聽見他們尖刻的取笑，就能知道誰在徒步中不受歡迎。我的同屋告訴我一些細節。這個星期中漸漸地，那些被搖滾狂人群接納的人不再抱怨處境的懸殊之別，而開始拾人牙慧——“他們如果跟不上，就不應該在這兒”。在詳細敘述當天的體力挑戰時，他們就這么說。吃飯時，這些人還是沒能坐上那張占支配地位的亞群的桌子。

搖滾狂人群的組織者叫瓊，是這群人里少數女性之一，35歲，也是他們中年齡最大的。為了參加這種強度的徒步，她全年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參加一個小時的有氧鍛煉，再加一個小時的游泳或打壁球。瓊承認自己具有非常強烈的競爭意識，平時與丈夫一起出去散步時，“如果看見有人在我前面，我就開始快速行走，超過他們。我受不了有人走在我前面”。對于核心群體中的許多徒步者而言，徒步一周的活動之所以能使他們精神振奮，就是因為它能把不確定和懷疑轉化為成就。搖滾狂人群幾乎不懷疑自己的能力，總是自信滿滿。他們似乎通過對風景的掌握而獲得了一種權力感。

一個晚上，我解決了被他們排斥在外的問題。因此我被邀請與他們一起去酒吧。前往酒吧的那一英里半的路程更像是快步奔跑。最后，在原路返回的途中，一個來自曼徹斯特的社工羅伯特（也是搖滾狂人群的一員），以明確的階級術語描述徒步者：“我總認為徒步是一種工人階級的活動，但我發現徒步現在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的活動。依據馬克思主義觀點，我以為這肯定與生產方式的異化相關。”我有點震驚，牢牢地記住了他的話。我很高興那天我沒有喝得太多。他引用E.P.湯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圈地運動和工業革命來詳盡解釋他的看法。最后他以此結束談話：“徒步是一種象征性地收復土地的方式。”

那一周的徒步者中唯一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是喬治，一個七十出頭的倫敦人，職業是印刷工，現在已經退休。喬治不是搖滾狂人群的成員，但每天和這群人一起出去。我得知他總是設法趕上他們。從他完成的問卷中，我獲悉他平時進行慢跑，還參加馬拉松競走比賽。喬治非常安靜，不善交際。晚上他坐在正高談闊論的人群中看書。盡管他很友善，卻很難讓他開口說話。但是有一天他同我交流了幾分鐘，談到了他早年的徒步旅行。他說年輕時沒錢經常到湖區旅行，但是有機會時他會坐火車來這兒，每天散步，每晚住在不同的青年旅社。當談到他多么熱愛徒步——在野外逗留一天，登上山頂欣賞景色時，他的臉色富有生氣，眼睛也變得炯炯有神。接著，就像一扇門關上了，他又埋頭讀書。

最后一晚的告別儀式——最后證明進展相當順利，瓊在科克茅斯（華茲華斯的出生地）一家相當昂貴的素食餐館組織了一頓告別晚餐，餐館距住處有半個多小時的車程。那晚，中心不供應晚餐。這就意味著被搖滾狂人群排除在外者和選擇不參加“聚餐”的人不得不自己做出安排。這頓晚餐并不是一頓回到“正常的”生活之前的同樂宴，人人有份，而是顯示了集體中存在的差別。搖滾狂人群不僅有自己專用的桌子，而且被單獨安排在內間。那些能夠跟上他們的人被當作名譽隊員受到邀請。“因其排斥行為而形成的高等的、內部的和中心的”（斯塔利布拉斯和懷特1986：22—23）人們的笑聲，傳到那些低等的、邊緣化的和外部的人群的耳中。

要求得到位置

觀察過性別引起的各種競爭之后，我特地參加了一個女性徒步團隊。瀏覽各類湖區網頁，我的目光落在一個徒步團隊上，我認出它的名字是個挪威女神。這是專為女性設計的假日徒步團隊。同一群女性一起徒步一周（其中多數人是同性戀者），給我印象至深的是這個群體平和的理性，沒有那種被什么特殊分子或亞群弄出來的隔離線。我們有時在幽美的花園里吃飯，享受精致的烹調，這一切令人難以忘懷。群體內部摩擦較少，包容和排斥因素彼此交織，卻不那么尖銳。當然，情況并非總是如此。

我注意到我的同屋莎拉，處于自我強加的既融入又排斥的復雜狀態，她在群體其他人面前大談與她的“伴侶”一起度假等等，而私下在我們的房間里，她卻說起自己的“丈夫”來。后來我要求她解釋這種用詞上的變化。雖然以前已三四次參加這種假日徒步，但要讓別人知道自己是一個異性戀，她仍覺得不舒服，她還突然生氣地聲稱：“并非所有異性戀關系中女性都處于被支配的地位！”為了融入其中，按她自己認為的那樣，莎拉不得不壓抑自己身份中的一個關鍵要素。這是面對真實或想象出來的同性戀群體壓力而產生的一種反向“衣柜化”（closeting）[[180]](#_180_30)。

從談話和布告欄上的告示中，從我們自己的徒步中（我們并沒有沿著熱門路線或給定的人行道徒步），我發現還有另一種走遍湖區的方式（在英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這種方式不同于CHA、搖滾狂人群和此前我碰見的所有徒步者的方式。在主要為女同性戀服務的徒步團體背后，一系列看不見的路線把女同性戀經營的旅館、客店、茶屋、餐館和酒吧聯接起來。這個不同的隱秘的路線幫助女性在本來由男性作為參加者和領導者而支配的領域（徒步活動）里重新落腳，并幫助建構了定位在風景上的記憶的共同體，從而使那些通常被壓制的人們獲得了特權。

非身份認同的風景

在與來自湖區之友（FLD）、漫游者協會（RA）、假日聯盟（HF）和鄉村假日協會（CHA）以及當地俱樂部的代表們進行的面談和非正式談話中，我們討論了少數民族缺席的問題，每個組織的代表都提到了RA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起的一個全國范圍的項目，名為“讓我們出發”。這一項目肇始于鄉村委員會的“開門行動”實驗（布蘭登和科里1988）。開門這一意象背后的隱含意義當然使人聯想到早期的看門人。研究包括的人群中沒有黑人或亞洲人。除了路上碰到的一個黑人攀巖者和一對年輕的亞洲夫婦徒步者外，我能看到的少數族裔還是在學校隊伍中碰到的，他們有些在峰區攀過巖，有些參加湖區舉行的大型夏令營。

RA的“讓我們出發”項目主要是為了吸引那些“沒有徒步傳統”的人們進入鄉村，但是這個項目沒有產生預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特別是亞洲女性沒有男性親戚陪伴就不出門，而且——如果她們穿上紗麗，更是難于爬過柵欄的梯蹬”（岡寧漢姆1996）。RA的另一個“家庭漫游日”的項目效果略佳。它所設計的短短的2—4英里的散步距離旨在吸引有小孩子的家庭，盡管“過去9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非會員黑人和亞裔家庭參加……但仍只占一個小群體的很小部分。不過，數目在增加”（岡寧漢姆1996）。

我問徒步者同伴，在他們家鄉的徒步俱樂部中是否有黑人或亞裔；而在“我們的”徒步周中一個都沒有，我也問他們對此怎么看。除了能在學校隊伍中見到少數族裔，徒步過程中我沒有碰見一個。遺憾地承認他們家鄉的徒步俱樂部中也沒有少數族裔后，我的同伴還提到了RA發起的運動。至于少數族裔特別在湖區是缺席的，有些人解釋說湖區不是一個有著“他們的”歷史的地方。繼續沿著這一答案追尋下去，我發現這意味著這樣兩件事情之一：他們沒有在英國鄉村徒步的歷史，因為他們在孩提時或年輕時沒有被帶到這兒來；而且（或）他們也沒有把鄉村與早期定居、戰役、文學、藝術和農業聯想起來的歷史。黑人和亞裔被認為是城市居民。

風景被有些人當作“英國性”的堡壘體驗著。對他們來說，風景的作用不僅是暫時逃離社會和經濟變化的避難所，也是擺脫城市化了的英國人口現實的避難所。在回答是否參加過國外的徒步旅行時，人們不由流露出愛國主義。多恩，一個六十多歲的退休男性，活躍在地區RA俱樂部，與當地管理人行道的市政官員交往甚密，從來沒有參加過國外的徒步旅行。他說，“我不會拿英格蘭的四分之一英寸交換其他地方的一英畝，我才不會”。這句話是我在第三章里已經探討過的意識形態的回閃。這種意識形態存在于風景與自然、本土和民族相關之時。這顯示出民族/民族主義如何通過融入風景的文化方式，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形式的歸屬感，歸屬于更宏大的東西——不論是群體還是鄉村（作為民族或風景的鄉村）。

當華茲華斯將湖區稱為“一種國家財產”，在第三、第四、第五章論及的問題是：“誰的國家”？今天，種族掩蓋住了階級，而“誰的國家”的問題已經承載了更寬泛的涉及到人種和種族排斥的含義（吉爾利1987）。這個議題以昭然的視覺形式和文字形式由黑人藝術家英格麗德·波拉德表現出來。她的假日攝影，手工上色之后使人憶起舊明信片或水彩畫，展示了英國風景中的波拉德和其他黑人。照片的文字說明涉及到權力與無權，占用和可能（不可能？）再占用。有張照片的文字使人想到華茲華斯的“我獨自漫游，像一片孤云/……/突然我看到一大片/金色的水仙”，這樣寫道：

好像黑人的體驗只存在于都市環境里。我覺得我喜歡湖區，在此我獨自漫游，我一張黑臉，在白色面孔的海洋里漂蕩。游覽鄉村總是伴隨著一種不安、恐懼的感覺。

（波拉德1984；轉引自金斯曼1995：301）

波拉德的其他文字說明還諷刺性地提到威廉·布萊克的詩歌。波拉德的作品“表達了在英國的黑人集體經驗”（金斯曼1995：306）。這種概括是否合乎情理，我不知道。我的研究對象中沒有黑人，我本來是可以從他們那里獲得不同視角的資料的。不過，正因為我不知道，本身倒可以證明波拉德的體驗是有概括性的。然而，風景可以由少數族裔從經驗的層面上重新解釋、重新認取：

穆斯林女孩在布雷肯山乘坐矮馬拉的車旅行一天，“每個人都回想起她們曾居住過的克什米爾和米爾布爾。小小的村莊、溪流、綠色的田野……有時使你迷失：你感覺像回到家一樣”。

（克斯特爾1991；轉引自丹尼爾斯1993：7）

沉默與特權

無論世俗的或宗教的，在日趨擴大的徒步活動中，日常的問題很快顯而易見。天氣炎熱時，為求舒適，男人脫掉衣服很方便，但對女性來說，哪怕是和一群女性徒步，也不容易這樣做。天氣酷熱時，途中小憩，或者“蕨草地休息”變得尤其重要，由于需要新陳代謝，徒步者會大量飲水。在長著濃密的歐洲蕨叢的地方，一切都沒問題。但是，不是總有歐洲蕨覆蓋著地面，有些季節，找個方便的地方很不方便。[[181]](#_181_30)幾乎是一種隔離和劃界的象征性行為（道格拉斯1970），女性找個地方方便——跑到專門指給女性使用的一堵墻邊或巖石叢里，即使真的能躲開自己那群人里的男性眼光，也會被其他上上下下的登山者看個一清二楚的。

在一個徒步團隊里，有個婦女來了月經，需要經常停下來。她不好意思向領隊（男性）解釋，隊里的許多女性就在她有需要時一起要求小憩。徒步周結束時，男人們說他們從來沒有與膀胱如此虛弱的女性一起徒步過。他們從來不知道真實原因。其他女性提到她們在徒步之前會服用避孕藥以避免這類問題。

甚至埃里克·朗繆爾那本簡明扼要的《登山技巧和領隊藝術》對月經問題也是回避的，不著一字。在一個徒步中心，一位正在接受領導能力訓練的徒步者向我推薦了這本書。他認為這是登山領隊的“圣經”。書中詳盡地討論了男女少年（15—18歲）和成年人（19—50歲）不同的卡路里需求，不同天氣條件下這些需求的變化，以及不同年齡段的精神和體力狀況，但卻沒有提及月經引起的不同需求。（也沒有談到50歲以上的人的需求。）

依據男性設置的能力、耐力和速度標準是另一種“男人的誤測（mismeasurement of man）”（原文如此）。在男女混隊中的女性，即使她們占多數，還是某種程度上的少數派。她們不去設定徒步速度，她們退到群體后面，而男性“自然地”被吸引到前面和領隊一起走，和他一起核對路線等等。（當我們碰到單獨徒步的夫妻時，即使他們不屬于任何有組織的團隊，也總是丈夫走在前面，查看地圖。）男性是地圖查看者、抉擇者、領隊——這種不言而喻的競爭優勢使得很多男女混合團隊中的女性說她們更愿意只與女性一起徒步。這里，她們指的是按照地區結成的女性群體。這樣的群體氣氛“更加放松”，而且“沒什么競爭性”，能使女性“發展自信力”。但是她們還是放棄了參加專門為女性組織的假日徒步的想法，因為覺得這類團隊“實際上”是同性戀團隊，她們在里面不受歡迎。

社會禮儀可能具有性別區分意義，對此局外人看不見，只有在失禮的時候才會注意到。在給一個小群體中的每個人（其中一個是男性）買一輪飲料時，我問各人喝多少。一位女子要半品脫的當地啤酒，其他女子也要同樣多。于是我點了那么多杯半品脫的啤酒，對此那個唯一的男性感到有些不自在了，他主動提出支付半品脫和一品脫之間的差價。顯然，半品脫和男人的酒量是不匹配的。由這件事情我發現，男性總是一品脫一品脫地喝啤酒，即使他們喝了六七品脫后開始要半品脫時，也會小心翼翼地將那半品脫啤酒倒進前面用過的一品脫玻璃杯里。為女性準備的半品脫啤酒裝在不同的玻璃杯子里（女人用弧形玻璃杯喝，而男人用直邊玻璃杯喝），這樣就絕對不會把男性的半品脫與女性的半品脫混淆。的確從很多細小的動作里看出差別的象征（道格拉斯1970）。

退休男性

我遇到的一些男性徒步領隊和徒步者，由于英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緣故，他們在55歲到60歲之間就被迫退休了。盡管生活相對舒適，拿著不錯的退休金，也有適度的金融安全保障，許多人（當然不是全部）對提前退休還是耿耿于懷。盡管他們表達了對關系到退休金的通貨膨脹的憂慮，但是多數人則強調他們需要工作更多是由于個人原因而非經濟原因。所有人都去尋找活動打發他們新近空下來的時間。由于退休前就進行徒步休閑，現在他們就把徒步當成一種值得追求的愛好，一種重新安排時間和構建自我形象的方式。

邁克爾，前航空交通管理員，是這樣認為的：“我過去的工作壓力非常大，而我退休后，每天的壓力變成了決定我該喝黑莓酸奶還是純酸奶！于是我想，是該開始干干領隊的工作了。”一個退休后從事徒步領隊的人，在年輕時就為CHA一類的組織擔任過領隊。許多退休人員都在孩提時期由父母領著參加各類機構（通常是CHA）的休閑徒步旅行。瑪麗恩，我所見到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女性領隊之一，說依據她的經驗，這些退休男性很難適應休閑狀態：

他們仍然想支配，他們有主見——固執己見，有時說服他們做點超出常規的事情，簡直比登天還難。他們是井底之蛙：“這是我的項目，我只走這些線路，我只參加這種晚間活動，我只這樣做，這是我的路。”如果你建議：“如果我們這樣做怎樣？”他們就會很擔心，因為他們以前沒有做過。男人總是這樣。

男性的支配技巧被帶進全國性徒步假日機構以及地區性徒步俱樂部。通過這些俱樂部，他們經常插手地區政治，諸如進入權和規劃的議題——本質上具有爭議性的領域。斯坦，一個提前退休人員，當地徒步俱樂部積極分子，曾經組織活動抵制在過去受到保護的鄉村附近開發房地產。尼戈爾，倫敦一個區議會前首席行政官，也領導過抗議——抗議在鄉村興建大型超市的規劃，這個大型超市會滅絕當地商業街的所有商店，改變當地風景，大大增加周邊地區的汽車和卡車交通流量。他認為像他這樣的人是前局內人，了解“游戲規則”，由“獵場看守人變成了偷獵人”。

有些男性在退休前就為擔任徒步領隊做鋪墊，偶爾會替補意外生病的領隊帶領徒步旅行。有些人則是無意之中當上了領隊。羅賓，海上石油鉆塔工人，參加了西班牙的一個徒步假日，那兒的“領隊糟透了”，結果他們團隊的14個人“結下了真正的交情”。第二年，團隊的多數人出現在英國，共同參加了假日徒步。他們玩得非常痛快，因此繼續一年見面兩三次。由于羅賓是他們中最有經驗的，他就成了領隊。他很喜歡這種經歷，于是開始參加山區徒步領隊訓練項目，計劃退休后成為職業領隊，現在他已經如愿以償。

社會運動和社交活動

在認識到共同感和爭端可以并存的同時，我已建議在世俗性朝圣的架構里考量徒步群體——人在徒步過程中經歷共同感。我將這個觀點放在地區性徒步俱樂部的長時間維度之內細察，俱樂部成員在幾年內或更長的時間內一起徒步旅行。我想了解徒步俱樂部是否成為一個調解空間，在這里，結構性的等級世界被暫時而多次地拋棄，隨之產生的是給人更平等感覺的經驗性共同體。

從這一視角，我們不妨假設一周徒步團隊和全英國境內的地區性徒步俱樂部構成了一個比較隱蔽的網絡里多重和移動的點。這個網絡不僅標出了一種社會運動的“原因”而且還標出了運動的“方式”，盡管這種運動是非政治的，卻具有引起政治改革的能力。當然，徒步運動里的一些特別群體的確“使復雜社會中的一些基本困境的存在公開化了”（梅盧奇1989：222）。把徒步看成是一種社會運動，這一觀點有悖于從社會不滿來解釋一場運動（比如憲章運動）起源的傳統社會運動理論（克蘭德曼斯，科里斯和塔洛1988；梅盧奇1989），但卻符合新社會運動的理論。新運動具有如下全部或部分的標志：為取得信息的權利而斗爭，為參加“運動”而參加運動，參加運動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以及對環保議題的意識（梅盧奇1989）。

從這更廣的層面來看，作為社會活動的徒步涵蓋了公眾與私人、形而上與生活現實的內容。它包含了自我代謝的全國性組織機構以及自然減員的群體——一起徒步的男女會員，他們有時拒絕接納新會員。在這種也可稱為社交活動的社會運動中，行為人進入這樣一個領域，他們制造意義、調解生活危機、建構個人和群體的身份認同。通過當地、地區性和全國性徒步組織創造出人們交流和爭論進入權和規劃問題的公共空間。同時，徒步群體也創造出發生人際關系的私人空間（無論是短暫的還是持久的）。

下面的材料來自我對最非正式的地方俱樂部之一的觀察——我參加了它組織的徒步活動。這個徒步俱樂部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北威爾士的科爾文灣成立，是地方議會的名為“焦點”成人教育計劃的一部分，專為退休人員而設。那時的成員都是60歲以上的女性和65歲以上的男性。由于裁員改變了原有的雇傭模式，五十多歲的男性和女性開始加入俱樂部，年輕一點的退休人員開始發揮主導作用，他們總是要求會員加快徒步速度，延長徒步距離。俱樂部領導就宣稱他要離開地方議會轄下的俱樂部組織，另去創建一個為歲數大一些的退休人員服務的獨立俱樂部。

“遠離焦點”俱樂部——會員就這么稱呼自己。自成立以來，俱樂部按照封閉的方式運作。現在這個俱樂部只剩下約莫二十個人。索尼婭，一位退休的英文教師，解釋說：“沒有新成員能進來。實際上我們就像一個家庭，如果我們中有一個人生病臥床不起，其他人會為他購物。如果你遭遇什么危機情況，你知道總有人來到你身邊為你打氣。”那一年（1996）俱樂部有三個人去世。通常當某人的配偶死去，其他人如退休的會計、律師和房地產經紀人會幫助善后，完成各種官方手續。索尼婭告訴我俱樂部會員會一直共同走下去，“直到最后，直到沒有一個人剩下”。

進行一日徒步活動時，沒有車的會員會搭其他會員的車。到了預定的地點會重新調整，盡量擠坐在一起，節省車輛，然后開車到當天徒步的起點（搭車人給開車人象征性地支付一點錢，按英里計算）。我們換乘別人的車時，發現有會員沒到場，一位名叫蘿絲的女士為此詢問好多遍。蘿絲似乎鬧不明白那些人已經前往都柏林做一日游去了。不過，只要她問，人們總是給她再講一遍那些人去哪里了。

非常高興，我們在徒步開始之前停車喝咖啡吃蛋糕！在茶室，蘿絲又開始要菜單，忘記自己已拿到兩三份了（是她此前要的）。每次她的要求都得到耐心對待。人們和氣地忽略她的古怪行為。有一次她要我記下徒步印象，因為人的記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倒不是因為忘記，一個人會記得很清楚，但是有一會兒記憶很遙遠，然后就消失了。”她說得很對。

所有會員現在都已七十多了，這個“遠離焦點”群體在徒步時勻速前進，即使在那些雖然不陡但卻是上坡的路段也這樣。他們告訴我一個群體的掌故，涉及到與游吟詩元素混合在一起的民族/本土/自然的論題。有次，在一日徒步時，天氣變得惡劣起來，一場傾盆大雨后，全隊人沿著陡峭的田邊小路上行，此時小路泥濘不堪。他們離開小路，改走莊稼地邊。一個農民出現了，說：“你們以為你們在干什么？英格蘭人，我想，你們是從倫敦來的。你們沒看到小路嗎？明明就在那兒，你們卻走到我的地里來了。”“遠離焦點”的一個會員不僅是威爾士人而且會說威爾士語，她是礦工的女兒，她走上前用威爾士語解釋他們是什么人。那個農民，隊員告訴我，“一下在她面前變得服服帖帖，我們都說：‘為了莉娜，感謝上帝！’”

在我們徒步旅行時，很顯然，如同任何家庭一樣，隊員得學會面對各人的缺點。實際上，這是他們不想要新人入會的主要原因。他們感到自己已經太老，無法應付新成員的“怪癖”——他們已經花了太多時間適應彼此。凱瑟琳提到，在這個群體歷史上，只有一次由于性格沖突激化而幾乎導致要求某人離會。有位女士惹了幾年麻煩之后，“男會員們最后果斷地決定”要求她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此人在丈夫去世后搬遷，終于離開了這個群體。

一個男人的嘮叨會惹火一個女人，氣氛緊張起來。但是其他人會將他拉開，與他談話——或更確切地說，是聽他說話。他們給我解釋說大衛前一年失去了妻子，現在“還不能適應”。他唯一的一次表演謝幕是當天徒步結束時，他告訴他車上的乘客說第二個星期不能來接她了，因為他要一個人去布魯日。他說：“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單獨旅行，看看會怎樣。”

我將相機焦點對準“遠離焦點”群體照相，他們當時正在吃午飯，專注地盯著面前的景色，此時我突然感覺像是進入了一個鏡廳！這些人通過徒步的方式已經形成了他們的共同感精神，憑借這種精神他們也跨越了不可知的衰老疆界。

結語

一周徒步中那種沒有標示出來的空間，越出日常生活的常規，置于以前從來沒有聯系的人們之中，包容了爭執和某種接近共同感的東西。當地徒步俱樂部時間不那么緊張，在此情形下，能夠發展起一種支撐性網絡，用以建構社會生活和一種歸屬感。這兒的共同感沒有嵌進朝圣的框架，而是楔進日常生活之中。在兩個被研究群體中，收入被當作階級標識（我謂之的階級即通過教育、職業訓練等獲取的地位差別或文化資本，這些又轉換成經濟資本），徒步群體形成了一種跨越階級的空間。核心群中隨機收集的數據說明隊員收入在5萬英鎊（合8萬美元）到5千—1萬英鎊（合8千—1.6萬美元）之間變動。參照群，也即當地徒步俱樂部的成員，隨機收集的數據反映隊員收入在3.5萬—5萬英鎊（合5.6萬—8萬美元）到低于5千英鎊（合8千美元）之間變動。

參加有組織的群體的山地徒步，可以暫時擺脫獨自度假的孤獨和寂寞；當地徒步旅行俱樂部則幫助計劃全年時間，安排周中和周末徒步活動。他們安排的復活節和圣誕節短途徒步已成為去宗教化的世俗性儀式，還有一些社會事件諸如年度大會都被安排與收獲節晚宴時間重疊——其實也被辦為收獲晚宴。CHA和HF這樣的組織也提供復活節、圣誕節和新年休假活動。人們的經歷表明，這種通過當地徒步群體所做的空間化的時間安排在面對婚變、喪親或重病之后的生活時變得特別重要。正如安吉娜（一位退休的秘書）說的，“部分原因是附近沒有親戚家人，孩子已經搬走，徒步的確可以替代”。對于這種群體替代家庭的特點，RA副會長作了總結：

我有時認為徒步已經取代了教堂。徒步團隊，通常由四十個人左右構成，已然成為“修會”，一個擴大的家庭——人們覺得它很有支持作用。

（岡寧漢姆1996）

在參加山地徒步周時，大汗淋漓地攀上陡峭的山坡，恐懼或不安地小心擇路攀上或走下巖石坡、碎石路，成功后的喜悅，在酷熱中或大雨中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徒步，接受或給予幫助，等待著掉隊者或自己成為掉隊者，讓人等著你——所有這一切或更多的事情都是“以原始方式一起旅行”（見本章開頭奧維格的話）過程的一部分。抵達山頂，有一種共享的成就感。此刻，徒步群體似乎最接近共同感，最接近“平等的兄弟友情”的感覺，雖然沒有人會想到以這種方式表達，女性尤其不會這樣表達。

徒步、登山、天氣變化、相逢、處理當天的困難——人們分享這些正在經歷和已經經歷的，為定位于過去和現在風景的記憶增添了意義層積。每個人都經受了泥濘飛濺上身或渾身大汗淋漓。然而，眾多的身體感受看似一樣，但人與人卻有觀點和性格上的不同，這些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人很快了解。在各種因素交織的狀況下，社會疆界淡化，被跨越（暫時地，或永遠地），或者保持其不可滲透性——各類社會差異標志在近距離下看得分明。語言、口音、衣著、吃飯習慣、理解餐桌上可以講何種笑話或與什么人為伴——所有這一切及其更多的東西是人們不會說出來的分界線，看不見的階級徽記。

在這種流動的社會領域中，一種共同體感得以建構，賦予生活（無論是短暫維系的群體生活，還是屬于或超越了群體的個人生活）另一層附加的意義。在一個星期內，無論什么時候我們來到一處石堆——它或是標出山頂或山脊，或是指向一條無法確認的小路，索尼婭總會彎腰拾起一塊石頭，加在石堆上。我問她為什么這樣做。她回答說，是為了紀念所有以前徒步到此的人們。這種紀念行動類似去察爾瑪（Chalma）朝圣的墨西哥人的做法。朝圣者相信以前的朝圣者變成了石頭，只有抵達原計劃的目的地才能恢復人形，朝圣者有義務朝著圣地方向踢幾塊石頭（特納1974）。

人們把山地徒步當作逃離“那一切”的方式（“那一切”指的是城市生活顯而易見的無情壓力），也把山地徒步經歷視為一種聯系，與更宏大的、超越了庸常個人生活的東西的聯系。盡管不同的人說法不一，在談到山地徒步的動機時，他們經常使用的一個表達就是：努力登上山頂俯瞰全景，能讓人從“不同的視角”或以“更恰當的感覺”來面對個人問題或焦慮。此話的本意有很大的比喻成分，但我覺得表達得很樸實。

我已經提到過人們另一種方式的反應——面對美景，他們的反應都不同程度地表述了：“我不信教，但是……”這里，有意識和下意識反應交織在一起，指向一個潛臺詞“神性內在”。“神性內在”作為一種特性或狀態，可如此定義：

神性內在（immanent）：后期拉丁語immanent，immanens是immanere的現在分詞，意指停留在地方，由拉丁語in+manere構成，意為停留，居住——參見Mansion一詞。

（《韋氏新大學生詞典》）

從詞源學來看，“immanent”含有圣經和贊美詩寓意：“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處”（《約翰福音》14：1），而“我將永遠住在我主的家里”（《詩篇》23：6），這些話首先映入腦海。在這里的意思有居住、存在于其中、在這個世界上、被“安置”在不同地方：被重新安置，重新聯結進來，在其中并與之連通——與自己、與可視的自然世界，由此也與我們只可感覺卻無法理解的“神秘創造力”的不可視世界。

一旦不再“遠離”風景而是成為風景的“一部分”時，就可以獲得一種地方感。那種微妙但絕對重要的不同就是對地方現象學的體驗：自我在這個世界的生命感知（巴索1996；蒂勒伊1994）。換言之，在早期稱為崇高感的體驗，是通過特別的“允許人們跨越閾限或不可見界限的儀式”（見奧維格，本章的開頭）而獲得的。在這個例子里，儀式當然只是埋頭走路爬上山坡抵達山頂。除了感覺心跳和肌肉疼痛之外，自我與無限的環境之間建立了一種短暫的新聯系，此時人們能感受到自己屬于（而非遠離）那個更大整體。閾限就是門檻。正是通過有機印象人們跨過這一門檻，發現自己向一片不同的景色敞開。雖然這一景色空無一人，卻神秘地包括了自我，但非懷有個人焦慮或渴望的自我。

前面已說過，景色受各種天氣條件的影響。盧泰爾堡的微型劇場試圖復制出天氣影響下的風景。他的劇場沒有演員，只有6英尺寬，沒有舞臺帷幕，觀眾更能專注欣賞再現性的風景。撤銷布景畫框，也等于撤銷了觀景人與景色之間原本存在的“距離感”。在山頂，沒有任何參照框架。與幾個觀光者共享的360度全景幾乎勢不可當。自我成為縮小的中心點，各種令人眩暈的印象匯聚于此。微型劇場的視力幻覺顛倒過來：不是讓景色顯得更大，而是人自己縮小了。實際上，風景劇場的空曠和開闊的空間使我們縮小，使作為觀眾的演員縮小，縮小到我們的真實水準——不足為道，無足輕重。規模、永恒和瞬間得到重新落腳，超越我們的把握，卻在景色之中。

## 八 特殊視角

15歲時，我接觸到華茲華斯……下一次去湖區……我看到了地圖上有“綠頂峽谷（Green Head Gill）”字樣，我感到震撼，猶如遭到雷擊一般：這就是《邁克爾》場景中出現過的綠頂峽谷。接下來的一切都讓我驚嘆，我可以真的去到那里，看到那古老的羊欄，當然還有他描述過的赫爾維林，我很想登上赫爾維林！他提到的烏斯湖的小船——我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使他擔憂的山峰什么樣，因此，我那時懷著雙重目的登山——我正在步華茲華斯及其同代人的后塵。以此，我的徒步獲得一種新的意義緯度。

索尼婭·安克斯

徒步仍然是我的最愛，有關徒步的一切都讓我沉醉……徒步過程中，自由自在，與人們相識。我認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徒步提供了空間和自由，登上一座小山，環顧四周360度，視線中別無他物，只有群山和美景。我認為那的確讓人心痛，真真切切讓人心痛，因為景色太美了，那一時刻，美景只屬于我。我不與任何人共享，這是一個自私的角度，真的。

瑪麗恩·卡寧

我一個人徒步時，特別是獨自背包遠足或露營時，安全問題顯得非常微妙——我是指作為女性。因為通常而言……特別是在黃昏降臨，我得找一個地方露營時，對我而言[其他徒步者]實際上代表著威脅。如果我獨自露營，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在哪兒，我露營的地點，挺好玩的是吧。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假如我的腿受傷了，其他徒步者則意味著安全……我非常清楚人像動物一樣需要偽裝起來……這種性別化的經歷，與父權社會和男性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相關，也與女性害怕被襲擊的恐懼有關。好了，這也是進入，不是嗎？

寶娜·戴

引言

對誰說話和為誰說話是田野考察的“雙重口技”（阿帕杜萊1988：16—17）。下文就要試圖減少口技表演者的表演，盡可能原樣展示三個女性的聲音。這是一種有意識的嘗試：使邊緣化的人物進入中心。這三個女性分別是索尼婭·安克斯，1924年出生于利物浦；瑪麗恩·卡寧，1938年出生在斯塔福德郡的布羅姆維奇城堡村（當時的地名）；還有寶娜·戴，1954年出生于倫敦。索尼婭純粹是一個徒步者；瑪麗恩是一個全國性徒步組織的志愿領隊；而寶娜自己則組織女性假日徒步。我與這三個女性的磁帶錄音談話，原文長達200頁。很顯然，我得作出取舍，保留什么，丟掉什么，這充分證明口技表演者不可能扮演不在場角色（如果這還需要證明的話）。

每個女性的主要話題都以自己的生活概括出一個在前面某章已經探討過的主題。這看似巧合的回應，當然不是產生于我有意識的預謀，而是反映了一種幸運的聯系——“民族志學者與他或她遭遇的社會之間在風格、易感性和心情方面的聯系”（阿帕杜萊1988：18）。索尼婭概括復述的主題是湖區的文學性建構。她對那個被建構起來的地方的早年意識對于她的人生軌跡作用頗大。作為有近半個世紀會齡的合作假日協會（CHA）會員，索尼婭口述的感受是對第五章已經講到的該組織歷史的補充。

瑪麗恩在中部地區組織徒步俱樂部，深入全國各地帶領徒步群體，她的經歷簡要復述了“重新住入風景”主題。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類重新住入的行動并非沒有引起緊張的局面和內部的矛盾。進入權是這整個工作的重要主題。寶娜在復述這一主題時加上了性別角度的敘事。寶娜組織的女性假日徒步活動主要是針對同性戀者，因此進入權和歧視這些當前議題成為焦點：女性、同性戀者、黑人或城市人出現在風景區里，都會遭遇抵制、嘲弄或怨恨。

索尼婭·安克斯

索尼婭居住在位于北威爾士的科爾文灣的一個海邊村莊羅斯。她于1980年從彭羅斯學院，一所當地女子寄宿學校退休。在校時她任英語系主任。在我抵達羅斯時，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索尼婭幾十年來都在湖區徒步，年輕時就是CHA的會員。在我們開始第一次錄音談話的幾分鐘內，湖區詩人就被置于英國文化背景和索尼婭的生活之中。

當談到人們與風景的智識關系、精神關系和世俗關系時，你實際上在談論音樂、藝術和詩歌。知道嗎？在湖區，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會產生一種特殊卓越的結合，一種微型文藝復興。要知道，英國有很多很棒的自然詩人，多數是年輕人，嗯——在南部地區有很多——他們是自然詩人，因為他們寫鳥、寫動物，特別喜歡寫樹，這些詩歌背后沒有任何我可以稱之為哲學的東西，只是對春天美麗的繁花愉悅的反應，豪斯曼的“櫻花”等等。有些人喜歡這個，我想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會是這樣，讀這些人的作品，很高興去看看那些地方，坐在河邊聽著夜鶯歌唱或徒步穿過雪松林什么的，但是湖畔詩人不同，因為他們有一種哲學。

他們中的巨匠，他們的華茲華斯，完全不是那種意義上的自然詩人，盡管很不幸，在學校里，每個人都要學“水仙花”（“我獨自漫游，像一片孤云”）或“致一棵白屈菜”，這樣那樣迷人的、富有詩意的細小事物，花啊，樹啊——但毫無疑問，他有泛神論傾向，他的偉大潛藏在《序曲》里，這一點不容置疑（這句話的后面部分是用強調語氣說出來的），潛藏在這個國家產生的一些最偉大的作家所匯聚的智識才華里。因此一個超凡的現象出現在華茲華斯那座位于偏遠山村的小小茅舍，去那兒拜訪他的人都是當時文學界精英中的精英。

柯勒律治不僅創作了《古舟子詠》和《克里斯特貝爾》等等，他還是一位出色的自然詩人，我認為他也是最偉大的學者，那個世紀的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柯勒律治、哈茲利特、雪萊，這些人都曾經在那所房子聚會；考珀，一個次要點的詩人……朗茲、司各特，他們會面、交談、討論生活和哲學、一起到山上徒步。這是異乎尋常的才智之士的聚集，當時的文學界也注意到了，因此當華茲華斯年老時，他的名望已經牢固樹立。就從那時起，你看到那個小小茅舍的傳奇已經成為自然崇拜，或別的什么的某種象征。

今天，你不僅看到了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你還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參觀他的小小茅舍。為什么？……因為格拉斯米爾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景色迷人，而且你還可以買些華而不實的紀念品，你還可以參觀偉大的華茲華斯的墓地，他的作品你沒有讀過，但是你一定知道“水仙花”，而且你回家時會戴上一枚華茲華斯徽章。但是知識分子不是為了這個到這兒的，而是要在茅舍四周走走看看，思索著那個茅舍空間多么有限，生活多么簡樸，體力多么勞累，在物質上他們過著多么糟糕的生活，這是怎樣的悲劇，怎樣的貧窮——他們大多數人就這樣生活，但那么大的榮耀又源自這種生活。

……實際上，利物浦非常靠近湖區，我們那一代人沒有私家車，但是火車和公共汽車總是很方便。人們會去參加一日遠足，總是如此，而且到湖區度假，從我小時候起，湖區就是我們的消夏去處之一……我們住在簡陋的旅館，我們去徒步。我們徒步，我們不攀登高山，但是我們很擅長徒步，我們會環湖走，就是那種可愛的臺地徒步。我想你會說，是一種C級徒步（指的是CHA徒步等級），只不過是距離長些而已，但我們喜歡。

也許在21歲時吧，我發現如果你一個人想參加徒步旅行，CHA是一種很好的度假方式……因此我參加了CHA，他們是些熱誠的人，他們蹬蹬爬到山頂，又蹬蹬下山，他們并不都是文化人。哦，我們那時進行了很長時間，我教英語……如果你不會表演，你就不是一個出色的英國文學老師！現在我的教學非常戲劇化（她笑了）我通過戲劇式的朗讀來教，有時候也和孩子們一起表演，而且，而且那時我非常幸運，有個很聰明的女子當我的助手……我們組成了一個很棒的團隊，因為我們處理事情的方式不同。我講的是六年級（中學的高年級）。如果我們教六年級，她有她喜歡的作家和詩人，而我也有，這樣會給——給你機會去教你最喜歡的東西。如果你不喜歡，你可以一開始就不教，因為女生不會喜歡。這樣我們拓寬了課本所規定的內容。

……后來我有了一個奇妙的想法，因為我們換了一個新校長，他是山區徒步者，他喜歡，嗯，劃獨木舟和沿著繩子滑下山（rappeling，用雙繩一端系于山上，一端系在自己身上，從懸巖陡壁滑下），以及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課外活動……他非常希望教職員們不僅僅是教書，還要參加活動。我指的不是戲劇朗讀組、討論組或辯論隊那類活動，而是某種戶外體力活動，因為這是一個寄宿學校……哦，這時我不再年輕，而且我從來不擅長運動，我也不可能劃獨木舟，或去攀巖。但我認為，噢，我是一個不錯的徒步者。我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徒步者，當然不是現在，我現在速度慢了，年齡更大了，但那時我是一個強壯的徒步者，而且了解我的山區，因此我有了一個奇妙的想法。

我向莫莉恩講了我的想法，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活動。我們正在學習華茲華斯，準備A水平考試（大學入學資格考試），而《序曲》的一部分是要準備的內容。如果我們帶著六年級學生到湖區去度一個周末，我們合計……早晨出發……在那兒真正進行一次與詩歌有關聯的登山？我們會帶他們到綠頂峽谷，攀登海倫峰；我們去費爾菲爾德，或去烏斯湖，我們會沿湖徒步……而且我們要弄清楚哪些是華茲華斯曾經看過的地方，與詩歌聯系起來，到晚上我們……吃過晚餐后就到會議室集中，拿出《序曲》的那一段。我們兩個人一起聯合上課，哦，我讀一部分，然后我來解釋，接著她讀一部分并做解釋，她顯然會有不同想法。我認為，那些女孩上了一些有生以來最好的課，因為這是兩個心靈的聯合，我們是非常好的老師，而且我們對所教的東西很精通。那些女孩非常幸運……我們這樣做了好幾年……是在70年代初期。

現在，我們在這樣做時，我總是在暑假參加CHA為期兩周的假日，我這些年來一直這么做，從而認識了許多人。我不是說結識了什么密友，但是我認識領隊，還有……我認識每年都來參加徒步的一些人。所以，這就像回家一樣。畢竟，我了解徒步，我可以帶隊，有時我的確帶過隊……但不是這個，是友誼，而且是那種，那種再度聚首的興奮，在湖區你不可能對你所做的事情感到厭倦。（索尼婭笑了）我從來沒有厭倦過。

我21歲時加入了CHA，就是說，我當時還在上大學……我開始有了一種到這兒徒步的感覺，真正的徒步。我不記得是不是有人告訴我，讀到過，還是我實際上路過了這個地方，也許是在我度假時看到的，這是一個徒步的理想之地。因此第一次，我一定有些忐忑不安……我想我第一次是坐公共汽車去的，我在“天鵝”（酒館）下車。當時，CHA和HF的宗旨，當然還有青年旅社，是會為——我不太想說是為工人階級——為那些沒有多少錢的人，住在城鎮的人，想有機會游覽鄉村的人提供住宿的，而且當然提供有向導的徒步項目——不是指青年旅社，而是CHA和HF，在那些日子還沒有美國人、德國人……或其他人來這里旅游。這是專給城鎮人的項目，最便宜的度假。

那時一切設施非常基本，但跟過去相比不算什么。……我去CHA的時候……家具非常簡陋。一張床，一把椅子，墻角橫根棍子再掛上布簾，就是衣柜了。有個五斗櫥。床邊沒有燈，我記得。地板上有一塊小地毯，當然房間里沒有洗臉盆……早餐跟現在的差不多，往那一擱，晚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變化……一大碗湯擺在桌上，一個長柄勺，每個人使勁用勺子舀湯。總是水煮土豆，總是水煮土豆，直到有一天人們把“今天的晚餐吃什么？”編成了歌（大聲唱起來）：水煮土豆，水煮土豆！卷心菜，你可以想得到。哦，還有一片牛肉或一片其他什么肉，當然還有格拉斯米爾的傳統菜……大米布丁，換個花樣的晚餐，要么就總是某種厚厚的果餡餅，做得一塌糊涂，要么就是從一個大碗里撈出的某種甜食。然后是娛樂活動，通常是快步舞，跳舞，那種蘇格蘭旋轉舞，大約到了十點差一刻的時候，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為客人沏茶、烘餅干，之后他們會問，有人愿意幫忙洗碗碟嗎？這種形式當然一直延續到最近為止。

還有，有一種很強的基督教氛圍……兩個協會都有（CHA和HF）。是那種，我認為他們具有托馬斯·阿諾德在拉格比所描述的英國人的理想……你知道，健康的心智和強壯的體魄，身體能經受冷水浴，完全沒有不潔的性想法。而你走出去（此時索尼婭用一種“有力的”深沉的男性嗓音說），在山上度過像樣的一天，回來吃一餐簡樸的晚餐，你有同伴，純潔、正直、歡樂……很少人一開始會想到上天鵝酒館喝一杯。因為你知道，這就是關鍵。他們從沒有電視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因為那和共同體沒關系……他們希望你在晚上能參加活動。

在一個周日晚上……晚餐后馬上舉行了一個儀式，一種（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各教派共有的儀式，換句話說就是，讀《圣經》、做做祈禱、唱幾首圣歌，此時總是有人彈奏鋼琴，接著是針對受邀客人的演講。在那之后，就是周日一整天安靜的游戲，比如問答游戲和紙牌游戲。周四是音樂會，你所認識的客人聚集在一起表演，有些人的表演在他們那個時代算是非常出色的了。其他日子的活動與現在一樣……跳舞啊、尋寶啊，或類似活動。在一周徒步結束時，大家都在花園外面集合，一起拍張集體照，非常好。我只留了一張，因為每次都一樣（索尼婭笑了）。

每一天，如果你愿意（現在的確要看領隊的），早餐前可以在休息室禱告，還有每餐都做感恩祈禱。直到，喔（長時間的停頓），10年前？這個，這個確定無疑是基督徒氛圍的……發起人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沒什么，因為——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成為，當然你也可以不參加這類儀式，我是說你可以在整個感恩祈禱過程中只是坐著，不是嗎？現在我注意到，這一切是怎樣消失的，最近6年，有些領隊沒有做感恩祈禱或者什么都沒做，但是有些領隊做了感恩祈禱，還有些領隊為那些希望晨禱和有點周日晚上餐后儀式的人做祈禱。

但是那些露面參加的人還不到10——不到10個，而在過去基本上每個人都參加，當然。而這當然反映了鄉村中宗教信仰越來越缺乏。我認為在許多方面，徒步（長時間停頓）可以與宗教聯系起來。有很多圣歌——如果你外出到山上徒步，回來時唱著“一切美麗光明物”，實際上你是正在祈禱，你覺得多么幸運參加了假日活動，為群山的美、山丘的美、小溪的美，為今天看到的一切，為我們相伴徒步而祈禱，圣歌與這一切非常契合，是不是？

你知道，假日聯盟和CHA……他們的歌曲集和贊美詩集有許多內容，不僅有圣歌，還有沿著主干道和鄉村道路行走時唱的歡快歌曲和集會歌曲……而現在，當然令人非常悲哀，越來越少有年輕人像過去一樣跟著父母一起來徒步了，這就像人們去教堂，因此，很顯然繼續帶孩子參加的父母可以確保群體和組織的延續性。所以他們過去幾年不得不改變徒步路線。那些像我一樣的守舊派，CHA的忠誠分子越來越老，這就是為什么現在他們要組織C類徒步隊，針對那些像我這樣已經攀登過每座山峰，了解每座山的歷史的人。那些人過去是非常強壯的徒步者，而現在不能再徒步登山，但是還熱愛這些山，喜歡呆在這個地方，參加所有的活動，到周邊走走看看。

瑪麗恩·卡寧

瑪麗恩是我參加的HF周中的三個徒步領隊之一。所有這類領隊基本上都是志愿者。晚上她和另一個領隊組織大家跳方塊舞，他們在HF之外的俱樂部也組織這類活動。瑪麗恩還指導每天早餐前的鍛煉課。在談話和信件中，瑪麗恩強調了她與風景的聯系可以追溯至出生于農場的母親。那兒有幾只羊、一群牛、幾頭豬和一些家禽，還有耕地。盡管母親已經離開農場，瑪麗恩成長期間經常拜訪外祖父母和舅舅，他們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過著這種混合經營的農場生活。土地早已經被開發征用，但農舍還在，得按要求維護。她的舅舅和表兄弟們還是農民，因此她在一封信中告訴我，“我與土地的聯系‘流淌在血液里’”。

我與一個群體一起徒步，大約有25年了，也許30年了。我總喜歡走在最前面——實際上在我能當領隊之前，我都想走在前面帶隊，后來我決定我的確得拿個證兒什么的，因此我參加了山地和方向培訓，拿到了所有的證書。接著……我在我工作的地方貼了一個告示說：“我周日去徒步。如果你愿意加入，那么一起來吧。”很快就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漫游俱樂部，由我組織管理。我是委員會，我是財務主管、主席，我擔任一切，因為我不想隸屬于哪一個漫游者俱樂部，我不想有一個委員會，因為他們總是惹麻煩。因此我一個人負責組織整個項目。而且我們……我想大約有45到55個成員，這是一個規模很大的俱樂部……我們經常一個月聚會一次，有時兩個月一次。今年是我們的10周年，我為此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我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徒步，就稱它為“徒步X”吧……全程10個分段，每段10英里，每個想領隊的人抽簽確定哪一個月領隊，從2月份開始，按月進行，到11月份結束，每段領隊要等徒步者集合那天才宣布徒步的終點。這樣，他們總是在上次徒步結束的地方聚集，你看，再開始下一段的徒步，最后回到我們出發之地，辦公室的老指揮部……我現在想也許其他人加入進來，也許會比我做得更好，可以給它更多時間……但是，那是我領隊的開始，真正的領隊。

開始領隊的時候，我一度在中部發電委員會（CGBs）工作……后來CGBs決定私有化，他們合并到發電公司，我就離開了……但是徒步活動還得繼續下去，因此……我們舉辦了一次競賽（看起個什么名字最好），結果“發電機”勝出。這名字，你可以從各個方面去想——你發電，你知道，你也在開發幸福。那兒的同伴太棒了！我們隊里有一個化學博士，還有一個小伙子是倉庫打包的。在我們徒步時，每個人都一樣。其中一個會員最近把我們群體描述為“我的家”。我在想，那是一件好事兒，你知道……而我相信她說的……因為這人參加了我們所有的活動……她陪我參加了我們舉行的一些長距離徒步。她總是抗議說……“噢，我不可能做到，我會讓你們所有人都等我的。”而我知道她所需要的是，她想要你說，“來吧，你做得到”。

我一直喜歡呆在這兒的鄉村，在這里到處游歷。我喜歡小村莊，我喜歡開放的空間，我也喜歡國家公園。因此我，我就從那兒起步了，因為那時我當領隊開始有些名氣。你知道消息傳得很快，接著我當過不同團隊的特邀領隊，人們會打電話要求我帶領他們徒步，我很高興去做，我還做或者做過更多的，不過偶爾我也為國民托管組織當領隊。我們在當地有一個中心，非常大的中心，共有1700個會員。我有時帶領他們的漫游俱樂部。我負責這事兒，一干好幾年，我非常喜歡。

接著我為各種團隊帶隊，就在幾個星期前，我還接到馬爾維恩的一個女士的電話，她正打算帶領她的團隊到昆托克斯徒步，她問我是否愿意領著他們走昆托克斯。我回答說：“是的，很高興，我可以從這兒開車去那兒。”她說：“哦，不，我希望是三天的徒步。”喔，好的。接著她說：“我想在昆托克斯進行兩次徒步，在埃克斯穆爾本地進行一次。”我回答：“好的，行，沒有問題。你的隊員平均年齡多大？”“75歲。”她回說。我問：“噢，那么，他們想要什么樣的徒步里程呢？”她說：“唔，大約一天走10英里。”這是些非常健康的人們，你知道的！

越來越多的團隊要求我去領隊，而這個團隊，我自己的團隊“發電機”，他們想讓我帶隊開展一次假日徒步。我回答說：“好的，就這么定了。”后來我帶領他們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徒步，全程由我負責。回來后我想，哦，還不壞，我真的非常喜歡，我喜歡帶他們看一些東西，還有那種同伴感，我覺得，噢，那非常棒。因此，我那時想到了HF，我向HF申請，我參加測評，測評非常嚴格，讓我夠受的。

他們冬天時候把你拉去，冬天的幾個月，我得在周末上山到位于湖區的科尼斯頓，他們要求你周五下午5點到達那兒。他們要求你不得早到，也不得晚到。5點整。完全一團混亂。我們都在5點到達。那兒有各種各樣的領隊，如果你的名字是卡寧，那么你就到這兒跟這個領隊。這是你的房間，就那兒，我們要求你10分鐘下樓。就像這樣，那就是整個周末的節奏。

在那時，我已53歲了，與其他許多人相比，我是年齡大的。我們，那個晚上出發——10點出去進行夜間帶隊。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在找尋寶路線。我們為第二天的徒步選擇路線，直到凌晨2點我才上床睡覺。他們不斷加壓。選擇這個，做那個！為明天的徒步制定一個時間表。找出最精彩之處，寫下來。第二天早上我6點起床把這個選定，要知道，你還得下樓值日。

每時每刻他們都在挑出你的弱點，指出你的優點。每時每刻，這兒有毛病，那兒有毛病。上帝呀，要知道，我沒有意識到我有這么多毛病。但我還有幾個我不知道的優勢。時時刻刻在進行，你被監督著，不僅受到你個人領隊的監督，還有那些權威人士在監督著你，他們在你周圍記著筆記。你突然意識到，突然，就像被子彈擊中，我感覺會失敗。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好領隊。我從沒有丟下過一個人，我會使用地圖和指南針，我能夠讓在山頂上的人們擺脫困境，無論什么天氣條件下。我可以做好這一切，但是他會不讓我通過，因為我犯了一些愚蠢的錯誤。

在那個周六，我們不得不——我們一組人，4人一組，我們被要求走頭天晚上找出來的那條路，還得領著我們的領隊走一遍，我們輪流充當向導。我們要攀登科尼斯頓附近的維特萊姆山，而在我前面帶隊的小伙子，在我前面有兩個小伙子（因為這一組有3個男性和我），第一個出了差錯，后來他自己解決了問題，但他奇怪怎么沒有人告訴他出了問題。但這就是他們的想法——我是說你得自己擺脫困境，伙計！我可能出錯，但沒有人會告訴我。不管怎樣，他自己解決了問題。

但是，由于他出了錯，我想他使得下一個小伙子失去了勇氣，他帶著我們上山——這是一條我走過的最令人膽戰心驚的小路，我感覺好像一下失控了，當時天氣非常惡劣，雨雪落下，擊打著巖石表面，馬上冰凍起來，因此我們實際上是在冰上行走。我們還沒有合適的爬釘或其他東西。（爬釘是安在靴底的金屬“牙齒”，這些釘子可以扎進冰里形成某種依托。）我們登上這條小路，還有那雨夾雪，我害怕得要死，我的確感覺如此。太可怕了！我有一會凍僵了，我當時想，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在這兒多么害怕。我真的得控制自己，鼓勵自己說：“好的，上到頂部，趕快加油。”我做到了。當我到達山頂，我就像這樣（她伸出手臂顫抖著）。以前或自那以后都再沒有出現那種狀態，從來沒有。

當我們抵達山頂……我的領隊說：“好的，瑪麗恩，你來帶隊。”我說：“老實說，我不會把領隊或客人帶上這兒，爬這個巖石，這種天氣下，我才不會帶他們再往上爬。”我還說：“這時候，我不能接過來領隊，我狀態不佳。”“為什么？”我回答：“哦，因為我剛才爬那段時太害怕了，我失去了勇氣，帶客人登山到那里，我想也沒有想過。”他們就問：“噢，你該怎么做？”我說：“我會現在就帶他們下山。”“好吧，說說路線。”我就說：“就從那兒下！那是最明顯的一條直接下山的路。”他回應說：“那你帶我們下去吧。”噢！好嘞，所以我帶他們下山，到了一個地方，我說：“好的，這是我要帶他們抵達的地方。從這兒走，路就非常非常安全了。”

那時，他倒在地上說：“我失去知覺了，還有呼吸，快處理這個事件。”哦，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打發兩個人去叫救護車，做好我們所在位置的標記，我讓其他人圍著這個人，把他放在一個更安全的位置，等等，處理所有這一切后他說：“好啦，干得不錯。”當時我想，啊，我搞砸了，我前面的多嘴把事情搞砸了。所以我安慰自己，別在意，我并不想真正成為HF的領隊。

在我們向下行走時，他說：“繼續，在你下山時給我們描述一下。”我一邊向下走，一邊指給他們看各種景物。走了4英里之后，我們上了主干道，他走到我身邊說：“如果這算是一種安慰，我要說我會像你那樣去做。”感謝上帝。哇，當然我通過了！我驅車離開科尼斯頓，我想是在周日下午，開了大約5英里遠之后停下。我開進路邊停車站，一頭撲在方向盤上。我想，這是自周五下午以來我第一次如此放松。

（談話轉到領導徒步團隊的經歷。）我上個星期登上布雷肯山，我第一個爬上山頂，因為這個團隊有點慢，他們都很累，我站在山頂等著他們。我第一個看到美景，當時我有那么多思緒，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我并不希望那些人馬上趕上來。要知道，我當時非常自私，是因為我陶醉于眼前美景……而且想，如果他們說“噢，我們不想爬上來了”，我會非常高興。

我喜歡一個人徒步，我的確一個人徒步，那會使我對周邊環境的感受不一樣，完全與我帶一個團隊徒步時的感受不一樣。一個人徒步時，我完全沉浸在鄉村景色里，完完全全迷住了。我觀察著一切，尋找著，關注著我帶團時不會注意到的東西，因為——如果我在帶隊，我會考慮團隊是否舒適，他們會對什么感興趣？你要停下來而且……對大伙兒說，那座小山很特別，那兒有一個鐵器（時代的）要塞，而那兒有一座城堡，后來他們建了另一座城堡，但是我得抱歉地、非常遺憾地說在15世紀的時候被毀掉了，當地人偷走石頭建了自己的房子。他們不想知道。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里他們不想知道。有一天我就問我帶的團隊：“你們對歷史故事感興趣嗎？”“哦，是的，我是說，如果你告訴我，那就是查理國王用來藏身的樹，在他東躲西藏那會兒。你說這個，我是有興趣的，但僅限于此。”他們只想知道那些，那種流言謠傳。

你得評估一下你的團隊，我發現短期的低水平的（徒步），一般是，當然并不總是，老一些的人群，年老的人群參加。他們什么都想知道，因為他們有時間。他們想去考察教堂，想知道教堂的一切，教堂的歷史。或者他們想知道發生的一切，他們想知道這一切是因為他們有時間消化。我的確認為這些年齡大的人，他們是知識的源泉，因為他們這樣做，一直這樣傾聽著，一直在徒步和旅行。

……再看中等水平的團隊，他們嘗試著，他們不完全對付得了高水平的長距離徒步，但是他們不愿意參加低水平的短期徒步，所以，是的，他們總是急急忙忙地行走，他們其實不想知道發生的事情——我們趕緊走完這8英里的路程吧，就這樣，他們并不真想聽你講什么。他們的年齡，屬于這個年齡群，30歲到50歲，他們知道一切，你不需要告訴他們什么……然后是高水平的團隊，長時間徒步，是的，他們也想知道，但是主要還都埋頭走路。他們想知道遠處的山是什么，因為，啊呀，我們也許將來有一天會走到那兒，你知道……那類事情。

還有，許多人，因為他們來度假，他們也許一個月徒步一次，然后他們參加這種每年的假日徒步，每天都要走路，一連走6天。他們很容易疲勞。他們沒意識到徒步會使人筋疲力盡。所以，到了星期二他們實在太累了。他們星期三需要歇息，星期四他們好不容易振作起來……又開始徒步，到星期五他們感覺能適應了。你看，一個星期就這么過來了。你在星期二得對他們非常小心。我發覺他們非常暴躁：“別再說什么，我煩得很，我太累了，我今天真的不想走了，我正強迫自己走。”

……有很多當權者，那些官僚，他們沒有見過我們的世界，他們沒有見過這個世界的美麗。這使我不安。你知道他們可以，輕揮著一支筆，就可以劃掉好多英畝地去蓋房子，想也不想我們如何能另找地方建起這個小住宅區，又不破壞地方的美？當我看著這樣的美景時，我腦海里就涌現了這些事情。

寶娜·戴

寶娜為女性組織徒步假日，最初是為資助自己的研究，當時她正在蘭開斯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選擇這個學校是因為它鄰近湖區。起初寶娜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現在她把自己定義為同性戀女權主義者。她的徒步組織經歷了類似的轉變，現在多數客人是同性戀者。然而，她的廣告手冊寫明歡迎所有女性參加。她既不想“只要女同性戀”被視為“女子徒步團”的潛臺詞，也不想讓異性戀感到她稱之為的“焦慮不安”。她父親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業余登山者。她在徒步和登山中成長，她把“得找到自己的方式”與登山、攀巖、徒步和風景聯系起來。我們的第一卷磁帶錄音談話以我的提問開始：你記得的第一次為徒步而徒步的經歷是什么時候？

哦，那就得說到我父親和他的登山背景等等了。我從那兒開始（長時間停頓），后來有了另一個開始，那是為我自己開始登山，那完全不同，那也許是一種為我自己要求權利或收回權利的開始……那時是在周末被他帶到湖區和威爾士，是的，周末當他去攀巖時，他會帶上媽媽和我。我猜（我那時）也許8歲、9歲或10歲。比較清晰的記憶是與我的學友朱麗婭特去北威爾士度周末……她和我因為自己沿著溪流探險非常激動——真正地追尋小溪的源頭，就是那種從住處出發，你知道，或許我們可以進行自己的探險……而那非常重要，那是一種獨立。

我即將開始——各種不同的聯系都開始發生，我猜想那是開端，過去我與我學校的朋友做的——就是跑到鄉下，外出徒步，半夜里爬出窗子到高地看日出，和類似的事情，你知道，那時我們14歲或，不，也許小一點，12或13歲。是的，所以我認為有兩件事情，一個是他帶我在山區到處轉……還有那些與我的朋友經歷的刺激的冒險。

他非常重視為我買合適的徒步靴子，我穿上靴子的日子總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停頓）是的，因為你知道我是父親的女兒，人們認為我和他就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樣，那就意味著要穿合適的徒步靴子……但是他的文化中有一種東西，他的——他的登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我實際上既受其啟發可能也在反抗或探尋其他方式了。

我那時去阿爾卑斯山和其他地方爬山。是的，那兒總有這類宏大的英雄意象——馬特霍恩峰和其他的山峰……后來我開始改變看法（停頓）后來，嗯……我記得16歲發生的一件事，一個校友和我去多洛米蒂山，他（寶娜的父親）突發奇想要我去登山。他和我參加了一個登山俱樂部（去攀登一座高山），我們自己是登不了的……實際上這個決定很草率，我以前一點經驗都沒有。后來有一個意大利導游決定所有外國人都系在他的繩子上，而我一個意大利單詞都不會……我們到達一個冰川邊緣，我既沒有穿帶爬釘的靴子也沒有破冰斧，而且要知道，我還從來都沒有做過這類事，我爸爸好像在后面幾英里遠。我隨后開始走過陡峭的冰層……我現在明白了，一個人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發現可以怎樣在特別的地面上行走，我完全由那個我一點也不了解的人擺布，我只能努力跟上他。

我感覺我腳滑了，但是我不會說意大利語，因此我沒法說出來，我開始滑倒了。如果他……稱職，他本可以用他的冰斧把我穩住，我也就不會滑得那么遠了。但是他沒這個能力，盡管穿著黃色短襪顯得很神氣，他也開始滑落，最后他用冰斧戳傷了自己的大腿。在我繼續滑落時，他鮮艷的黃色短襪染滿了鮮血，這一景象令人難忘——幸運的是，當時我還不太明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我爸爸在下面以為——下面有一個冰川裂縫——他以為我要落到冰裂縫里。他好像開始從下方的冰川跑過來，他與那個可憐的意大利導游系在一起。我是說一切都糟糕透了。很幸運，在冰裂縫前我的滑落止住了。可怕的是……這整個探險隊，這個俱樂部，一共30個人，都被那個流血的英雄“首領”扯得轉向了，你知道，我爸爸把自己的表還是什么送給那個意大利人，作為補償吧。最后我感到，感到很大的屈辱。我被置于那種處境，我現在都還覺得憤怒。我認為完全是我父親的不負責任，完全是那個領隊的不負責任和無能，我居然把自己交給那個人負責——因為我受的熏陶——他們是“可靠”的人，但是你知道他們不是的，當時非常危險，使我完全再也不敢涉足任何冰上攀登或那類事情，這樣也好。

但是我想，我也許那時沒有意識到，而是后來才感覺到這種東西很多，就是那種英雄式的裝腔作勢或諸如此類的，極端自我的結果……我現在也看到，我在斯特瑞丁絕壁總是感受到這一點，男人帶上他們的女朋友，你知道，對那個女子而言，沒有必要了解她準備做什么或她選擇做什么，而那個小伙子，是出于他的自我感覺——自以為他能夠，你知道，保護某個極端害怕的人，幫助她登上山，這是男人氣概的自我意象，與實際上是否能幫助她樹立自信毫無關系。我想，嗯，我希望我所做的工作，我希望我不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那是……如果是經驗多的某個人帶上某個經驗少的人，那么整個事情的要害就是要注意那個經驗少的人需要什么，并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援助，幫助他們攀登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更遠一點的地方，你知道。如果只是考慮讓有經驗的人展示自己有多棒，我認為這簡直是胡鬧。

我確信男人之間也會如此，但是——也許不是——我想這是性別問題的一種特別形式，不是嗎。噢，我的意思是男人更可能競爭……把一個沒有經驗的女性“帶到”一個她自己感覺不安全的地方，這樣的事情在我看來似乎經常發生。

因此在我看來，有一個階段我非常需要靠我自己攀登上去，弄清楚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特別是我剛開始經營俱樂部時，看到各類徒步團體登山過程中發生的事情，通常會涉及到性別問題，那種態勢保持著，男人拿著地圖，我總是，我總是向通常落在后面的女性打招呼，她開始不敢直視別人的眼睛，因為她落在后面了——要是男人，總是會盯著你看，所以我總是小心避免與男人眼神接觸，而向落在后面的女性打招呼，你知道。

……我自己進行的徒步實際上仍然是屬于我自己的，完全是我自己的。是的。我出于各種理由獨自去徒步。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不愿意落在后面，我也不想走在前面（笑）。我知道在我帶隊時，我的團隊里的女性可能會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對我而言并不成問題，因為我是領隊，意味著我可以走在前面，成為走在前面的和藹可親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又笑了）……作為團隊領隊……很顯然，對走在前面的女性和落在后面的女性，我都會一樣重視或欣賞。我對她們同樣尊重，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處于那種位置，是一個團隊中的徒步者，我想我會以為那個領隊——以為我得做得出色才能讓領隊喜歡我。但作為一個領隊，我知道沒那回事兒，我不會（偏愛誰的），是的，對那些自己解決一切的人，無論在哪兒，我都會尊重。

……（談到“登到山頂”）我得說太有趣了，認為那山頂——那個高度，山的最高點是最重要的點——似乎，不言而喻，接近山頂就是爬上山頂那塊特別的巖石，你知道，當然我們認為如此，因為我們所有的語言充滿了土地的意象。但這是一種特別的想法，不是嗎，認為那兒比別的地方好，但那兒往往有桔子皮、涂鴉、尿臊味（笑），有一些美妙的地方……和植物，是在山坡上的。當然所有這一切都與性別化的意象有關，深深滲透在我們的文化之中。你知道，這是我的論文觀點的一部分。山脈被視為是男性的，而山谷屬于女性，丁尼生說過“下來吧，哦，女士，從那高高的山峰”以及類似的話。為什么女性不能登上山頂？我覺得有女子探險隊攀登尼泊爾安納布爾納峰和其他山峰，真的很棒，你知道，我們有權登上山頂，如果我們想——像男性一樣。但我個人，也許并不特別想登上山頂，你知道的。

這里說到兩個方面，是不是？女性有權進入，你知道，進入男性能夠進入的地方，同時女性有權質疑有些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限制……我記得，去年，有一個兩人團，我們去爬地牢峽谷（Dungeon Gill），非常棒，盡管我多年沒去過了。爬過一段巖壁，我們停下來欣賞花，因為那兒有很多特別的花。接著，這些家伙過來了，絕對經典——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當過兵，但是，啊，一群年輕人由一個年長的家伙領著登山，腳步重重地踏下去，敲打著巖石，實際上他們的登山非常有破壞性，因為他們腳步很笨重，踢飛了石頭和其他東西。他們閃電一般刮過，簡直是對這脆弱的美麗風景的蹂躪，有個家伙還轉過身來說：“總是踩到你們的花，呵呵呵。”這就像，老一套的場景再次出現，非常奇特。呀，呀。（停頓）而，你知道，有一種雙重性，不是嗎？某種程度上，是的。所謂登上山頂其實意味著踐踏花草。

這個事實使我覺得可樂：我居然還在經營這一切，假日徒步啦、周末徒步啦，這些活動的目的都是攀登“大湖區的山脈，從最陡峭的路線”，我真的很喜歡，而不知為什么我又覺得這件事挺逗的，有些諷刺意味在里面……我也不能確定我到底是什么想法，你知道，（是不是）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喔，這是賦予人能力的，絕對的！……我對自己做的事情感覺很好，因為許多女性想這樣做。許多女性都想這樣做——這就很有意思了。因為這種事情就是登山的象征，文化是這么說的。完全正確，女性應該去做那些成為登山象征的事情。你知道，我很高興能夠做到，太棒了。但是就個人而言，我不清楚我對沿著最陡峭的山路登上最高山峰到底是什么想法。所以我覺得，你知道，還好吧，還好吧，我很高興這樣做。

……在開始徒步時，有個女子制作了一幅女性標記的旗幟，你知道，每當我們爬上山頂標志石那里，我們都會舉起那面象征女性的旗幟，一起合個影，這樣做有點可笑，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不經意中，我認為這樣做有些意義，這樣做很棒——我是說我們在這兒，我們站在珠穆朗瑪峰頂，喔，當然我們并沒有真的到過那里（笑），我們都很了不起，我們互相握手，因為我們抵達山頂，還照了相，而那（停頓），我覺得，嗯，（停頓）……我的意思是非常好玩。我這么認為，也許那就是我感覺挺逗的地方——我想我總是有那種感覺。對的，我真的喜歡看到這個，是的。

我詢問寶娜她前面提到的一次假日徒步的情況，也即她為黑人女性組織的徒步。實際上有兩次。后來我與那個女發起者失去了聯系，我失去了聯絡……這是一個散團，許多人實際上是她通過重估意見同伴咨詢團認識的，所以……那是什么？你知道同伴咨詢嗎？不知道啊……那些來參加的女性中很有一些人在黑人女性團體里做了大量工作，涉及到黑人女性的身份認同、（黑人女性）怎么在壓抑自己以及如何擺脫壓制等方面。所以我認為她們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榜樣，對我而言也是，她們很清楚，也有這個意識，知道自己正在逾越安全界限。你知道，她們非常明白到鄉村徒步是，嗯，對于黑人女性來說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她們互相幫助……有一種強烈的團隊感（停頓），而她們所做的（停頓）是很有勇氣的，是一個突破（停頓）。我是說她們很有勇氣，這個團隊（有一種）絕對令人吃驚的氛圍，完全令人震驚，因為，是的，一個被視為很容易的短途徒步……對她們有些人而言，卻是巨大的挑戰，需要極大的勇氣和熱情來完成。

那個發起者本人實際上，你知道，哦，就感受到了在坑坑洼洼的地面和泥濘崎嶇的道路上行走的挑戰，而這并不是她作為一個黑人女性獨有的體驗，這是——我見過有一些來此度假的白人女性以前也沒有到過鄉村，你知道，對她們而言，爬過梯蹬或穿越泥濘路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在倫敦，大街上是不會有這樣的路的。嗯，（停頓）你知道，我的確對此感到敬佩。對她們而言，這個挑戰不亞于其他人進行的長距離的更艱難的徒步，你知道。

所以這是關于，嗯，女性如何感受不同于城市步行的徒步，如何在鄉村面對不熟悉的自然環境，我以為黑人婦女，她們同樣明白沒有物理意義的時間可以失去她們的挑戰——在一個沒有黑人的環境中，在一個似乎提醒她們屬于都市內城而非鄉村的文化中，如何能感受足夠安全。

……多數是非裔加勒比海人，嗯，是的，還有兩個亞洲女性。你看，還有另一種差異，其實我沒看出這種差異（剛開始的時候），然而在非裔加勒比海婦女中也有不同的身份，因為其中有一些是在加勒比成長而最近移民過來的，她們覺得加勒比海就是自己的家園；其他人則是第二代移民，因此她們覺得自己完全是英國人，完全拒絕將任何其他地方看成自己的家園。我是說我曾經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個有身份認同差異的群體。

……當時我的一個想法是——嗯，那次假日徒步活動是因這個女子的發起而組織的，但是我認為這個主意不錯，因為我知道幾乎還沒有黑人女性到我這兒參加假日徒步，而我想也許這是一個開始。我猜我當時還想著，黑人女性中會有一些參加我組織的其他假日活動，接著我考慮了一下。人們說，你知道，在這個國家實在缺乏一個黑人的空間，在這個國家的鄉村地區，沒有專為黑人的中心或此類設施。我想到這個問題，我認為，你知道，我一直是按照混合的方式組織徒步……你知道現在，我已經有過很多經歷，已經建立了自信，我就不想再選擇混合的方式——而想與黑人女性一起做點事情。我為什么要希望黑人女性剛剛克服恐懼，你知道，克服那種不平等、不自信的感覺，就選擇出來與白人女性呆在一起？本來她們可以出來與黑人女性呆在一起的。全部的意義就在這里，我認為那是，（停頓）為什么我們，嗯，（停頓）忙于，啊，我不知道，這有什么意義——為什么不選擇與那些給你自信感、自在感的人一起活動，而是跑去跟與你有沖突的人呆在一起？……我認為，現在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恰恰需要更多的機會去讓人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創造空間，你知道，房子里的物理空間，然后是別處的空間，一種意味著你能進入的空間，人們來到這里進入，真正進入那個空間。所以我認為我說的“創造空間”就是這種可持有空間，她們給這個空間帶來一些東西，是不是？那可能（停頓）是各種各樣的東西，是的。

我曾想，在這個地區，實際上有些地方，不完全是“湖區”，有些我帶客人去的地方是很個人的，你在導游冊里找不到它們。我很喜歡設計一些導游冊上沒有的徒步路線——只是因為我在這個地區生活了很長時間，你知道，有些地方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所以我會認為有些地方有些東西值得一看，帶領一些女性團體到這些地方去，我總是非常開心。但我肯定不會把這些地點寫進導游冊里，弄得人人皆知。我也不想帶男女混合團隊去那兒。理由總是我把這些地方視為我的風景，某種程度上是我的家的一部分……我就這么想的。

是的，有公共風景和私人風景。對的，對。（停頓）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在分享個人的——對我而言，那風景就是個人的，所以我在與人分享屬于我的東西。我認為那是我喜歡的東西，因為這不同于我組織人到國外度假，或者我去我做過一些研究的地方……不同于“正在做的體面的工作”。那些都不同于帶領客人觀賞這樣一處特殊的風景，因為它對我意味著很多的東西。但是在這里面——你度過了各種各樣的徒步周——這些一般都是公眾風景和私人風景的混合？是的，我就是這么想的。我覺得這種描述不錯。是的，我經常有意識地平衡這兩種風景——好的，人們也許想登上這個地區最高的山或最著名的山，他們在書中讀過的山，我也很愿意帶他們去，不過這種徒步的日程通常要匆忙一些。我更想帶他們去那些不怎么有名，但更個人化的地方。……那么你怎樣描述那些風景的特色，它們是哪些風景？它們是些什么類型的風景？各種想象和意象開始涌來。這很正常，是吧？但它的確會使我發出會心的微笑。

寶娜接著談到另一個話題。幾分鐘后我又問她這個問題。噢，那就是我開始感到尷尬的地方，因為我意識到我想到的是溪谷區那些令人驚嘆的河床，那兒非常隱秘，非常僻靜，你知道，令人想到女性最隱秘的部位，特別是，嗯，在那些石灰巖河床，比如（名字抹掉），這是一段溪水干枯的石灰巖峽谷的河床，此處非常神奇，具有不可思議的雕塑感，四周都是令人驚異的石灰巖峭壁，你知道，完全像一個洞穴——這個地方是一種最神奇的子宮形象。被我帶到那兒的一些女性也有同感。是的，當然我會到那兒去了——我對這個地方感覺很親密，我不知道，我想也許是許多東西的混合。

……我提醒寶娜，她曾說過最快的登山實際是慢慢地走。于是，她就講述了下面這段故事。我們停下來歇息，那些小伙子急吼吼地走了過來，旋風一般，真的像旋風一般，走在前面的那個人步伐邁得可真大，后面的人努力掙扎著趕上他，你知道，看他們那樣，走得并不舒服，居然用那種速度爬山。嗯，但這樣也許才不會掉在后面，他們大隊人馬過去了。走在最后的是一個黑人小伙子，渾身大汗。他從我們身邊走過時……他看著我們，我們的視線相遇，我們笑了——是的，我笑了……他說：“我想這就是男式的關系很鐵”（笑）。我們忍不住大笑，后來我們趕上了他們。他們走得太快，最后不得不放慢速度。認出相識的那一刻，真是奇妙啊。太妙了，我們趕上的正是那個黑人小伙子，看起來他能夠保持一點距離，能夠看到正在發生的一切……與團隊的價值觀保持一點距離。

結語

索尼婭·安克斯，一個堅定的保守黨分子，英國天主教徒，對逝去的英國深表遺憾。她悲嘆母親不能與孩子們呆在家里、填表格時“名字”一詞取代了“教名”、女性成為神職人員、工藝學校一夜之間成為綜合性大學而頒發“垃圾學位”、英聯邦解體、英國加入歐盟而失去了自己的主權。索尼婭通過文學與徒步聯系在一起。她所說的文學不僅包含了偉大的作家，而且也涵蓋了關于風景、登山、徒步及國家公園的書籍。這一切的后面隱匿著未曾觸及的真實，對于當代英國人而言，它是一種遙遠的呼喊，來自索尼婭成長并在大半生中所了解的那個世界。

瑪麗恩·卡寧責備規劃者，譴責他們那些風電場、高速公路、建筑工地和開發區，批評他們缺乏城市中心區的規劃。同時，她對英國風景的熱愛并沒有發展到與另一種人聯合的程度——后者更愿意采取軍事斗爭的策略去保護風景。她認為國家公園大范圍的過度使用與對于鄉村的普遍化的掠奪相關——國家公園疆界之外開發在不斷進行，鄉村成為規劃藍圖中的一部分。盡管她看不出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決這一難題，但她堅定不移地認為我們不能沒有廉恥地繼續“偷獵風景”。

在寶娜·戴看來，徒步作為一種進入風景的形式可以在不同層面開展。孩提時期探險溪流河床的經歷以及只與女性分享的私人風景，從不念舊惡層面表明風景對于她的身份建構起著重要的作用，構成了她的認同基礎。我最后一周的田野徒步是與寶娜的團隊一起進行的。炎熱的白日將盡之時，我走在隊伍最后。我們列成縱隊向上攀登一條陡峭的山路時，隊伍向左偏去。在前面，離我很遠的地方，在天空映襯下勾勒出寶娜的輪廓，身體筆直，雙手放在臀部，不慌不忙地向上攀登。

這是一個極其醒目的形象，這個形象中包含了運動與靜止狀態；這是一個自信的形象，似乎圍繞每一個踏在地上的腳步而回轉。寶娜以自己為例示范了幾個月后她跟我講到的“與身體協奏，回到體內發現心跳速度，發現呼吸速度，然后……調慢節奏，漸漸你就會感覺舒服自在……不要管其他人在做什么……一種運動的方式，能夠在每一步踏實體驗生命存在”。在此，徒步成為內心旅程的實踐，是另一種形式的世俗性朝圣。

# 結論 展望/再想象共同體

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不信教，他有一次指出，自然中神靈無所不在這一理念遭受侵蝕使得人們將周圍世界視為沒有靈氣的，無需予以道德的、美學的或倫理學的考慮。這使得他們把自己與自然遠遠隔離開來；當這種有機統一體感覺的喪失與先進的技術相聯系時，貝特森認為：“你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將會與一只雪球到了地獄一樣”。

福勒1985：282—283

……“真正的英格蘭”與其說是指一個界劃出來的地方，不如說是指一個想象出來的存在狀態或道德地點……毫無疑問，文化意義上穩定而統一的英格蘭解體為一個分裂而混合的當代[現實]“此處”就是一個實例，反映出一種真實并正在擴展的現象……因為實有的地方和位置變得更加模糊、更難以確定，文化意義和倫理意義層面上的不同地方之觀念也許會變得更加突出。就在這里，想象的共同體如何與想象的地方相聯系變得清晰可見，被逐出地方的人們簇擁在記憶中的或想象的世界中的家園、地方或共同體，而這個世界似乎越來越在實際生活中拒斥這類牢固的地域化的維系。

古普塔和弗格森1992：10—11

通過打破常規學科邊界，與風景（特別是多少堪稱無人的風景）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和策略相聯系的多維互動——即再現、意義和權力之間的多維互動就有可能成為焦點。特殊風景再現的邊緣以及“邊緣化的內部”因此會變得清晰可見。某種程度上，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允許對透視性凝視的回視，挑戰了所描繪的沉默——這沉默在文化資本和風景死死糾結在一起時曾成了“理所當然”的狀態。這種研究方法追蹤風景的變遷，從作為權力劇場的風景變成作為劇場娛樂的風景，再變成全景風景——那些沒有演員的劇場中，空無一人的景色顯得極為重要。研究接下來追述了無人風景如何在空間上和社會上展示給更廣大的觀眾。

湖區堪稱三者合力而成的一個文化產品：英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如畫風景美學和古代文物研究。地理空間和社會位置相互交叉，通過錯綜復雜的聯系與影響建構了排他性網絡。空間向地方的轉型也形成了道德秩序以及對自然的再魅化，在此，休閑徒步和旅游成為建構和維持身份的表演性模式，一再得到重述。風景如畫美學向文學和非文學領域傳播日趨擴大，由此，湖區的賦值開始進入社會記憶范疇，而就在這個時候，這種再魅化也支持了社會和階級的分化。

互相競爭的國家意識形態定位于土地之中，也在土地上上演。“大英帝國”的政治虛構是一個有用的工具，由此可了解英格蘭的不同版本或愿景以及不同共同體主張“他們的”英格蘭時的行為策略。在新生期的民族—國家中央集權制、文化民族主義與非國教派的他者文化之間擺動，使美學的、認知的和道德的緊張局面與焦慮暴露了出來，而這些遮蓋了階級對抗。湖區進一步融入旅游業的資本主義邏輯體系，美景和對自然的再魅化被消費，被商品化——在這一特定的現象背后是具有連鎖關系的摩擦沖突。

在19世紀公眾為進入風景區和保護英國風景而斗爭的過程中，湖區和峰區成為（角力）的中心。斗爭者內部，盡管各有不同的直接目標，但工人階級活動分子、議會改革者、法律界成員以及學術界人士卷入法律和法律之外的行動漩渦，意在維護或重新獲得進入敞地風景區、公用地和人行道的權利。19世紀和20世紀公眾在法律和法律之外的領域為進入和保護湖區與峰區所進行的斗爭，其特性對于厘清空間上和政治上的排他性地理之間的關聯有著重要意義。進入滿載象征價值的風景區表面上是一種民主化，風景美學的再現、融入和立法化卻是充滿爭議較量的過程，因而這些過程質疑了進入的民主化。

20世紀90年代，有關進入權的激烈爭議復燃，進入權成為撼動私有權觀念的手段，以及國家取締某些群體的空間行為的法案——這說明風景仍然是群體身份的存儲之地，在某些情形下幾乎沒有掩蓋住階級對抗。看似矛盾的是，研究資料表明徒步群體能夠，而且的的確確超越了階級疆界，高級的靴子和威靈頓膠靴偶爾會在同一個社會空間里會合。

加入在特定的風景區徒步的群體，參與他們的徒步活動，我的田野調查使我對研究所考察的內容——身體、想象和地方之間的許多聯系理解更深入了。暫時性的和永久性的徒步群體可被視為世俗朝圣者。通過朝圣，徒步者可能體驗到一種特殊意義的歸屬感。在每日以及終生的走過風景的徒步活動中，徒步者通過徒步群體創造了結構、意義和共同體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警告說，“那種‘世俗性朝圣’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修辭”，而應將其描述為“從遙遠和本來沒有聯系的地點（安德森1991：53—55，著重號為原文）移動到[一個特定的地方]。這是對湖區被研究的群體所做的細描，有些人對那個地方懷有情感上的依戀，他們一連20年、30年、40年甚至40年以上重返舊地。他們的行為反駁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一個聲明——即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所依托或拒絕依托的自由漂浮的狀態之中，一切都是短暫的、一次性的和臨時性的，包括對地方的依戀（烏里1995）。

爭議的中心是碎片化和同質化問題。在美國化、移民、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在歐盟規則強制執行和英國喪失其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情形之下，“英國”文化這一幻覺隨之解體。在過去，本質主義意謂的英國風景庇護傘成為文化精英的暫時避難所。現在，在未被注意的層面，風景的作用大致相同，但庇護的群體更加廣大，跨越階級的鴻溝，但還沒有跨越種族的疆界。甚至在湖區和峰區國家公園這類地區對傳統高地農耕風景的保護，也可看作薄薄面紗之下民族身份認同的浪漫化象征，悲悼著曾經的英格蘭。

徒步活動的商業化色彩越來越濃，它慢慢將湖區的象征性價值據為己用，通過間接的手段將其引進市場，象征性的價值轉化為實有價值。風景融入市場的方式是否會變得更加直接，將來人們是否要花錢買進入權，對于這些，我們還要拭目以待。從英國白人的角度看來，進入權的分層化幾乎還不算一個問題：僅僅徒步者的人數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實際上，湖區現在已經擠滿了徒步者。通過商業化的徒步活動，資本主義已經滲入其他假定是“空曠的”空間，其滲透活動在全球范圍進行著。蘇格蘭高地、愛爾蘭、東歐、尼泊爾、新西蘭和秘魯進入市場，替代了擁擠不堪和質樸不再的湖區和阿爾卑斯山，成為山區徒步者的新選擇。這種風景拜物教化的實質就是人們稱之的“explornography”（探險癖），即現代人為尋求刺激所進行的毫無必要的艱難困苦的探險活動（泰爾尼1998）。

我的研究工作的開始，是在各種圍繞著風景再現的關系二元集之間穿行。研究表明18世紀的英國文化精英分享著想象的共同體，一個由圖繪的、印刷的和實有的無人風景構成的共同體。從這種按照等級組織起來的“賞景”的集合體中浮現出的湖區，成為精英們聚集的新場所。本結論開篇語引用的古普塔和弗格森的觀點，就談到了“真正的英格蘭”作為道德場所和想象的共同體所在地在當今時代的突出地位。湖區擔當起這個神話一般的英格蘭所在地的功能，而對于那些年復一年在此徒步的人們而言，湖區當然不是一個“模糊和難以確定的”地方。

對核心群體的研究表明：與一般意義的共同體構成方式恰好相反，徒步共同體是由“外人”構成的。他們因為各種理由來湖區做漫游式的徒步——縱覽全景、產生有關地方的文學聯想、經歷個人挑戰、體驗寂寞、重新融入自然、與徒步同好相聚……各種理由應有盡有。他們大汗淋漓，有時甚至很粗俗。他們歡快的、悲哀的、粗鄙的和“文雅的”聲音構成的復調音樂在風景之中為自己的定位而競爭著。正如所有朝圣者（世俗的也好，其他性質的也好）逐漸認識到的那樣，盡管是成群結伙的旅行，但沒有一個人可以代你行走。每個人都得找到她或他自己的特定道路，登上或走下丘原和高山。誰帶隊可能非常關鍵，不僅僅是因為安全問題，而是因為徒步的體驗不只是在一段時間走過多遠距離。同樣，從比喻以及實際的角度來看，你的靴子和你的負荷也是徒步經歷的關鍵因素。

本書的開頭一章是以對英國城際鐵路海報上的“英國風景藝術，私有美景”的觀察結尾的，以喻示風景之中由階級和英格蘭構成的雙重混合具象。最近出版的一本關于“非場所”（non-place）的書（奧吉1995）的書封令人想起這張海報。“非場所”被界定為既不和我們建立關系，也沒有歷史，更和我們的身份無關。海報的風景畫面的上帶展示了從火車窗口瞥見的天空景色，而書封上帶則是從登機口的小窗看見的一架停在機場的噴氣飛機；海報的下帶是高速行駛的城際鐵路掠過的耕地景色，而書封的下帶則是覆蓋著“非場所”候機區的綠色地毯的特寫鏡頭。耕地的規則壟線與特寫鏡頭的地毯條紋呼應，一個不能抵達，另一個則是在無意間踏過。

海報藝術和封套藝術充斥著匿名性、界限和圖像定位。無論從火車上還是從飛機上賞景，特別是從3萬英尺的高空往下俯瞰（假如云層散去），你都無法直接感受景色。跟隨一個徒步群體去體驗重新融入自然，是這類日常限制和服從中的間隙。徒步群體允許逾越匿名和邊界的限制——有時逾越的是實體邊界。在徒步群體內部，風景區的景色成為體驗性的現實，而與某個跨越階級界限的社會組織密切相關。這是“或多或少”重新入住了曾是風景繪畫之反映的無人風景區。

新的社會運動的興起，緩沖了現代社會引起的不安定。現代社會的本身特性毀滅了傳統，毀滅了在世上生存和與世界聯系的傳統方式（梅盧奇1989）。從這一視角觀察，數不勝數的地區性徒步群體和在英國兜售出去的每年幾百萬徒步假日可被視為網絡上的點，增加了社會運動和社交活動，超越了民族、社會和文化風景的疆界，打破了個體的孤獨。這種縱橫交錯穿越英國的密集路網通向大自然中的地方，不僅如此，而且沿路的人類運動創造了路網伸及的地方。同樣密集的徒步者網絡，他們共享的經驗、他們創造的記憶和歷史，這一切又創造出了“指向時間的流逝和延續……的低音線（bass line）”（奧吉1995：77），在其中存在著一個地方，可以重建一種社會感——實際上就是重新想象和重新建構共同體。

# 參考書目

Abrams, Harold M.(1959) Britain’s National Parks, London: Country Life Limited.

Abrams, M.H.(gen. ed.)(1968; 1986)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Y: Norton.

Acheson, James M. and Bonnie J. McCay (eds) (1987)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ulture and Ecology of Communal Resource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Addison, Joseph(1712) “Essay on the Pleasure of the Imagination”, Spectator, Nos. 411—421.

Aers, David, Jonathan Cook, David Punter (1981) Romanticism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English Writing 1765—183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llen, B. Sprague(1937) Tides in English Tast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derson, Patrica (1991) The Printed Image & Transform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rews, Malcolm(1989) The Search for Picturesque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Aldershot: Scolar Press.

Appadurai, Arjun (1989) “Introduction: Place and Voic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1:16—20.

Appadurai, Arjun(1991)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ichard G. Fox(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 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Appleton, Jay(1986) “Some thoughts on the geology of the picturesque”,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6) 3:270—291.

Archer, John E. (1989) “Poachers abroad,” in G. E. Mingay (ed), The Unquiet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Archer, John E.(1990) By a Flash and a Scare. Incendiarism, Animal Maiming, and Poaching in East Anglia 1815—187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rsenberg, C. M. and S. K Imball (1940)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Irel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rnold, Matthew ([1869]1994) Samuel Lipman (ed.), Culture and An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shcroft, Peter(1998)“U.K. Day Visits Survey,”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6) 1, Spring issue, n.p.

Atherton, Herbert M. (1974) Political Prints in the Age of Hogarth: A Study of the Id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gé, Marc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 John Howe, London: Verso.

Austen, Jane([1813]1956) Pride and Prejudice, Mark Schorer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ackscheider, Paula R.(1993) Spectacular Politics: Theatrical Power and Mass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iley Peter (1978) Leisure and 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 Recreation and the Contest for Control, 1830—1885,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arker, F.R. and N.D.M. Parry (1996) “Open Access, Rights and Legislation,” in Web Journal of Current Legal Issues (2), www.nd.ac.uk/~nlawwww /1996/issue2/parry2.html

Barnes, Trevor J. and James Duncan (1992)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Barrell, John(1980)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sso, Keith H. (1996) Wisdom Sits in Place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Bate, Jonathan (1991)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Baum, Joan(1994) Mind-Forg’d Manacles: Slavery and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s, NY: Archon Books.

Beard, Geoffrey(1980)“The First Watercolorists” in The Viewfinders: An Exhibition of Lake District Landscapes Exhibition catalogue 31 May—27 July 1980, Kendal, Cumbria: Abbot Hall Art Gallery.

——(1991) Attingham: The First Forty Years 1952—1991, London: The Attingham Trust.

Bell, Michael M.(1994) Childerly: Nature and Morality in a Country Vill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nder, Barbara (1993) “Introduction: Landscape-Meaning and Action,”and “Stonehenge-Contested Landscape” in Bender(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Bennett, Gillian(1993) “Folklore Studies and the English Rural Myth” Rural History (4)1:77—91.

Beresford, M.W.(1961)“Habitation versus improvement: the debate on enclosure by agreement,” in F.J. Fisher(e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honor of R.H.Taw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mingham, Ann(1986) Landscape and Ideology: The English Rustic Tradition 1740—18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System, Order and Abstraction: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Landscape Drawing around 1795,” W.J.T. Mitchell (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rry, Geoffrey and Geoffrey Beard (1980) The Lake District: a Century of Conservation, Edinburgh: John Bartholomew.

Betjeman, John ([1937]1988) “Slough,” in Richard Ellmann and Robert O’Clair(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Poetry, NY: W.W. Norton.

Bewell, Alan(1989) Wordsworth & The Enlightenment: Nature, Man & Society in the Experimental Poet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icknell, Peter(1987) The Picturesque Scenery of the Lake District 1752—1855, Cambridge: private printing.

—— and Robert Woof(1982) The discovery of the Lake District 1750—1810: A context for Wordsworth, Exhibition catalogue 20 May—31 October 1982, Cumbria: Trustees of Dove Cottage.

——and Robert Woof (1983) The Lake District Discovered 1810—1850:The Artists, the Tourists and Wordsworth, Exhibition catalogue 20 May—31 October 1982, Cumbria: Trustees of Dove Cottage.

——(ed.)(1984) The Illustrated Wordsworth’s Guide to the Lakes, NY: Congdon & Weed.

Birkett, Norman, Sir(1945) National Parks and Countrys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cksell, Mark(1982) “Leisure, recreation and environment,”in R.J. Johnson and J.C. Doornkamp(eds), 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Methuen.

Blake, William (1794) “London” from Songs of Experience.

Blunden, Edmond (1935) The Legacy of England, London: Batsford.

Blunden, John and Nigel Curry (eds) (1988) A Future for Our Countryside, Oxford: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Commission.

Boland, Eavan (1995)“Jewels set in blood,” The Observer Review of Books, 13 August 1995:16.

Bourdieu, Paul(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wen, Margarita (1981) Empiricism and geographical thought from Francis Bacon to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wie, Fiona(1993) “Wales from Within: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of Welsh Identity,” in Sharon Macdonald(ed.), Inside European Identities, Oxford: Berg.

Brewer, John(1997)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Y: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2) “Review of Linda Colley, Forging Britons,”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ctober 16, 1992: 5—6.

Britannica Curiosa (1777) 6 vols, London: Fielding & Walker.

British Mountaineering Council (1997) Access Charter, Manchester: BMC.

Broad, John (1990) “The Verneys as enclosing landlords,” in John Chartres and David Hey(eds), English rural society 1500—1800, Essays in honor of Joan Thir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mley, D.W.(ed.)(1992) Making the Commons Work: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Brownlow, Timothy (1983) John Clare and Picturesque Landsca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ydon,Anne(1995) “ Inscriptions of Self; The Construction of Icelandic Landscap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Travel Writings,” Ethnos (60) 3—4: 243—263.

Bunce, Michael(1994) the countryside ideal: Anglo-American images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Burke, Edmund ([1757]1990)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nett, John(1979) Plenty & Want: A social history of diet in England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Scolar Press.

Butler, Marilyn(1982)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Romanticism in England,” in Roy Porter and Mikulás Teich(eds), Romanticism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tlin, R.A. (1979) “The Enclosure of open-fields and extinction of common rights in England, circa 1600—1750: a review,” in H.S.A. Fox and R.A. Butlin(eds),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Special Publication No.10 London: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Butts, Mary (1932) Warning to Hikers, London: Wishart.

Cafritz, Robert C.(1988a) “Netherlandish Reflections of the Venetian Landscape Tradition” in Places of Delight: The Pastoral Landscape, Exhibition catalogue November 6, 1988—January 22, 1989,Washington, D.C.: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1988b)“Classical Revision of the Pastoral Landscape,” in Places of Delight: The Pastoral Landscape, Exhibition catalogue November 6, 1988—January 22, 1989, Washington, D.C.: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 Lawrence Gowing and David Rosand (1988) Places of Delight: The Pastoral Landscape, Exhibition catalogue November 6, 1988—January 22, 1989, Washington, D.C.: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Campbell, M.(1942) 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annadine, David (1992) G.M. 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British History as a ‘new subject’: politics,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in Alexander Grant and Keith Stringer(eds), Uniting the Kingdom? 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antor, Leonard(1987) The Changing English Countryside 1400—1700,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rter, Harold and C. Roy Lewis(1990) An Urban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Edward Arnold.

CHA(1895) Holiday Committee, Minutes, December 30, 1895, January 4 and 5, 1897; February 27, 1897; October 23, 1897. Greater Manchester Public Records Office, unaccessioned material, no catalog number, no box number, no item number.

CHA(1897—1899) Domestic Committee, Minutes, February 1897, 1899.Greater Manchester PRO.

CHA(1898—1899) Executives Committee, Minutes, February 19, 1898;October 8, 1898; March 24, 1899; November 4, 1899. Greater Manchester PRO.

CHA(1899) Lecturers Committee, Minutes, March 24, 1899. Greater Manchester PRO.

CHA(1914—1946) Free Holiday Committee, Minutes, various; November 1945; June 1946. Greater Manchester PRO.

Chadwick, Edwin (1834) evidence given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Drunkenness, Parliamentary Papers, 1834, Volume VIII, question 325.

Chadwick, Owen(1997) “God is in the Detail. And in the Footnotes,” Observer Review, 20 March 1997: 16.

Chapman, Malcolm(1993) “Copeland: Cumbria’s best-kept secret,”in Macdonald, Sharon (ed.), Inside European Identities, Oxford: Berg.

Charlton, D.G. (1984) New Images of the Natural in France: A Study in European Cultural History 175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g, Barbara and Gerald W. Creed(eds)(1997) Knowing your place: r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hierarchy, NY: Routledge.

Clark, Anthony M., edited and prepared for publication by Edgar Peters Bowron(1985) Pompeo Batoni: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his Works,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lark, Kenneth (1949) Landscape into A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eds)(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out, Hugh (1984) A Rural Policy for the EEC?, London: Methuen.

Cohen, Anthony P.(1985)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Tavistock.

Cohen, Anthony P.(1982)“Belonging: the experience of culture,” in Anthony P. Cohen ed. Belonging. Ident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British Rural Cultur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ohen, Bernard S.([1980]1987)“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in An Anth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1987)“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 Towards a Rapprochement,” in An Anth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ley, Linda (1992)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llini, Stefan(1992) “Like Family, Like nation—The national past as seen from Northumbria,” review of David Cannadine(1992), G.M.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ctober 16, 1992, 3—4.

Comment, Bernard (1993) Le XIXesiécle des panoramas, Paris: Adam Biro.

Comradeship, bound collection 1911—1925, Greater Manchester PRO.

Comradeship V, September 1911, “CHA,” 1:3.

Comradeship XVII, March 1914, “Open Seame,” 4:52.

Comradeship IX, October 1915, “Letters,” 1:14.

Comradeship XV, October 1924, “York Group Report,” 5:16.

Comradeship XXIII, December 1931, “Holidays by Instinct,” 2:11—12.

Comradeship XXIII, December 1931, “World Disarmament,” 2:5.

Comradeship XXIV, May 1933, “Letters,” 4:15.

Cook, Dave ([1974]1978) “The Mountaineer and Society,” address given at the 1974 National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 in Ken Wilson(ed.), The Games Climbers Play, 461—472, London: Diadem Books.

Cooke, Richard and Fiona Gough (1997) “Permissive Access to Agricultural Land Provided Through Agri-Environment Schemes: The Current Position in England,” in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5), 4:1—6.

Copper Plate Magazine (1774—1778; 1792—1802) London: G. Kearsly,break in publication then, London: J. Walker.

Corrigan, Philip and Derek Sayer(1985)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osgrove, Denis(1988)“The geometry of landscape: practical and speculative arts in sixteenth-century Venetian land territories,” in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barra Rosco and Simon Nycroft (1996) “Landscape and Identity at Ladybower Reservoir and Rutland Wate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1), 3:534—551.

Coster, Graham(1991) “Another Country,” Guardian Weekend, 1—2 June, 1991: 4—6.

Country Walking (1996) Karrimore K-SB walking boot advertisement, June 1996: 38—39.

Countryside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s, http://www.countryside.gov.uk.

——(1998) Press Release 98/23 New National Framework Needed for Open Access, 1 June 1998.

——(1998) Press Release 98/24 Paths 21—Rights of Way for 21st Century’s Users, 12 June 1998.

——(1998) Press Release 98/38, Eight Propositions for Planning and the Countryside, 19 September 1998.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http://www.sosig.ac.uk/crn/news/

Craig, David (1992)“Coming Home: the Romantic Tradition of Mountain-eering,”in Keith Hanley and Alison Milbank (eds), From Lancaster to the Lakes: the region in literature, Lancaster: Center for North-West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Crapanzano, Vincent(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aton, Michael (1974) Sinews of Empi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Slavery, NY: Anchor Books.

Cunningham, Hugh(1980)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 1780—1880, London: Croom Helm.

Cust, Lionel (1898)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Dilettanti, London: Macmillan & Co.

Daniels, Stephen(1993) Fields of Vision: Landscape Imagery &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Re-Visioning Britain: Mapping and Landscape Painting 1750—1820,” Katharine Baetjer(ed.), Glorious Nature: British Landscape Painting 1750—1850, NY: Hudson Hill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nver Art Museum.

Darby, Wendy(1988) The Hartsop Valley: A Programme for Cultural Landscape Conserv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 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1992) “A Reading of Edward Lange’s Landscapes: Text and Context,” in Long Island Historical Journal (4), 2:185—199.

Darian-Smith, Kate, Liz Gunner and Sarah Nuttall (eds) (1996) text, theory, space, London: Routledge.

Daumal, René, trans. Roger Shattuck(1974) Mount Analogue, London: Penguin.

Ditt, Karl(1996) “Nature Conservation in England and Germany 1900—1970: forerunn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5), 1:1—29.

Dodd, Philip (1986) “Englishness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Robert Colls and Philip Dodd (eds), Englishness: Politics and Culture 1880—1920, London: Croom Helm.

Douglas, Mary (1970) Purity and Danger, Middlesex: Penguin.

Dower, John (1945) National Parks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HMSO.

Duncan, James S. (1989) “The power of place in Kandy, Sri Lanka: 1780—1980,” in John A. Agnew and James S. Duncan(eds), The Power of Place: Bringing together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s, Boston : Unwin Hyman.

Dyos, H.J. and D.A. Reeder (1986) “Slums and Suburbs,” in Pat Thane and Anthony Sutcliffe(eds), Essays in Social History,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pstein, James A.(1994) Radical Expression; Political language, Ritual, and Symbol in England, 179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tchell, Catherine (1997) “Access 2000: Improving Countryside Access,” in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5), 1:1—2.

Evans, Eric(1995) “Englishness and Britishness: National Identities, c.1790—c.1870,” in Alexander Grant and Keith J. Stringer (eds), Uniting the Kingdom? 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Everett, Nigel(1994) The Tory View of Landsca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ul Mellon Center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Eversley, George John Shaw-Lefevre, Lord(1910) Commons, Forests and Footpaths: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during the last Forty-five Years ...,London: Cassell.

Farndale, Nigel (1995) “Back on the warpath—Rambling as to war,” Sunday Telegraph Magazine, 17 September 1995: 12—18.

Fedden, Robin (1974) The National Trust Past & Present, London: Jonathan Cape.

Fernandez, James (1988)“Andalusia on Our Minds: Two Contrasting Places in Spain As Seen in a Vernacular Poetic Duel of the Later 19th Centu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 1:16—20 theme issue: “Place and Voic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Finlay, Nancy and Roberta Waddell(1996) The Roman of the Stone:Lithography,1769—1825, exhibition notes,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iriam and Ira D. Wallach Collection.

Foucault, Michel(1980) Collin Gordon(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22—1977 of Michel Foucault, trans. Colin Gordon, Leo Marshall, John Mepham, Kate Soper, New York:Pantheon Books.

Fox, J.R.(1967):“Tory Island,” in B. Benedict(ed.), Problems of Smaller Territories,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Papers, No.10, London: Athlone Press.

Frankenberg, Ronald (1957) Village on the Border, London: Cohen & West.

——(1966) Communities in Britain, Baltimore: Penguin.

Fraser, Iain(1996) “Quasi-markets and the provision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n 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in European Environment 6: 95—101.

Frykman, Jonas and Orvar Löfgren(1987) Culture Builders: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Middle-Class Life, trans. Alan Crozi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uller, Peter(1985) Images of God: the Consolations of Lost Illusions, London: Chatto & Windus.

Funkel, Alicia(1996) Romantic Stages: Set and Costume Design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Gadian, David(1986)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action in north—west industrial towns, 1830—1850,” in R.J. Morris(ed.) Class, power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British nineteenth-century tow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88) Works and Lives, see especially Chapter 4: “I-Witnessing: Malinowski’s Childre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tleman’s Magazine (1731—1825) London: various publishers.

Gerzina, Gretchen Holbrook(1995) Black London: Life before Emancipa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Gilroy, Paul(1987)‘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nation, London: Hutchinson.

Girouard, Mark (1980) Life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Gluckman, Max(1962) “Les Rites des Passage,” in Max Gluckman (ed.),Essays in the Ritual of Social Rel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oddard, Victoria A., Josep R. Llobera and Cris Shore (1994) The Anthology of Europe: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Conflict, Oxford: Berg.

Goldsmith, Oliver (1773) “The Deserted Village”.

Gonner, E.C.K. (1912)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London: Macmillan.

Grant, Alexander and Keith Stringer(1995) “The enigma of British History,” in Grant and Stringer(eds), Uniting the Kingdom? 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Green, Nicholas (1995) “Looking at the Landscape: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in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eds), The Anth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ove-White, Robin(1996) “A New Culture?” in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4) 3:1—3.

Guha, Ranajit (1987) “Introduction”, in Bernard S. Coh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nningham, Catharine(1996) Assistant Director—Publicity and Develop-ment, Ramblers’ Association, London. Interview, September 13th, 1996.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1992) “Beyond ‘Culture’: Space ,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1), 6—23.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Gupta, Akhil and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din, Garret(1977)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Garrett Hardin and John Baden(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Harley, J.B. (1988)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Denis Cosgrov and Stephen Daniels(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Deconstructing the Map,” in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and G. Walters(1982) “Welsh Orthography and Ordnance Survey Mapping. 1820—1905,” Archaeologia Cambrensis, 121: 120—121.

Harris, John and Gervaise Jackson-Stops(eds)(1984) Britannica Illustrata, Bungy, Suffolk: The Paradigm Press.

Harvey, David and Martin Whitby(1988) “Issues and policies,” in M. Whitby, and J. Ollerenshaw,(eds), Land Use and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Hastrup, Kristen(1987) “Fieldwork among friends: ethnographic exchange within the Northern civilization,” in Anthony Jackson(ed.), Anthropology at Home, ASA Monograph 25,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Hawes, Louis (1982) Presences of Nature: British Landscape 1780—1830,New Haven: 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Hay, Douglas (1975) “Poaching and the Game Laws on Cannock Chase,” in E.P. Thompson et al. (eds), Albion’s Fatal Tree: Crime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Y: Pantheon.

Healey, Pasty, Paul McNamara, Martin Elson and Andrew Doak(1988) Land Use Planning and the Mediation of Urban Change: The British planning system in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arn, Francis(1978),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anc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Working Cla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lsinger, Elizabeth(1994) “Ruskin and the Politics of Viewing; Constructing National Subje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18(2), 125—146.

——(1994)“Turn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ngland,” in W.J.T. Mitchell(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mingway, Andrew (1992) Landscape imagery and urban culture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ee especially Chapter 5: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ll, Christopher(1992)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Middlesex: The Penguin Press.

——(1996) Liberty Against the Law, Middlesex: The Penguin Press.

Hill, Howard (1980) Freedom to Roam: the Struggle for Access to Britain’s Moors and Mountains, Ashbourne, Derbyshire: Moorland Publishing.

Hill, Octavia (1877) Our Common Land, London: Macmillan & Co.

Hippler, Jr.,Walter John (1957) The Beautiful, The Sublime, & The Picturesqu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 Theor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Eric (1995) “ Introduction. Landscape: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irschman, Albert O.(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and George Rudé (1969) Captain Sw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English Agricultural Uprisings of 1830, New York: Pantheon.

Hodge, Ian(1986) Countryside Change: A Review of Research, Lond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Hodgen, Margaret T. (1964)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16th—17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oecker-Drysdale, Susan(1992) Harriet Martineau: First Woman Sociologist, Oxford: Berg.

Hogarth, William(1753) The Analysis of Beauty: Written with a View of Fixing the Fluctuating Ideas of Taste, London.

Hogg, Robert (1974) The Landscape of Cumbria, Exhibition catalog, Carlisle Art Gallery 7 November—7 December, 1974, Carlisle: Charles Thurnam & Sons.

Holt, Ann (1990) A charter for whom? The access provisions of 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1949,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1995) The Origins and Early Days of the Ramblers’ Association,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Horn, Pamela(1980) The Rural World 1780—1850: Social Change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skins, W.G.(1955)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Harmonds- worth: Penguin.

Howkins, Alun (1986) “The Discovery of Rural England,” in R. Colls and P.Dodd(eds), Englishness; Politics and Culture 1880—1920, London: Croom Helm.

Hull, William(1834), The History of the Glove Trade,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Hume, David([1741—1742] 1985)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specially “Of the Delicacy of Taste and Passion,” and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Eugene F. Miller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Hume, David(1751)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London: A. Miller.

Hussey, Christopher(1927) The Picturesque: Studies in a Point of View, London: Putnam.

Hutcheson, Francis(1725)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al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London.

Hutchinson, Horace G.(1914) Life of Sir John Lubbock, Lord Avebur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Hyde, Ralph(1988) Panoramania! The Art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All-Embracing’ View, Exhibition catalog, 3 November 1988—15 January 1989, London: Trefoil Publications and Barbican Art Gallery.

Jackson, J.B.(1980) “Landscape as Theater,” in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Jeans D.N. (1990) “Planning and the Myth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 Rural History (1) 2: 249—264.

Jeffrey, Ian(1983) “Public Problems and Private Experience in British Art and Literature,” in Judy Collins and Nichol Bennet (eds), Landscape in Britain 1850—1950, Exhibition Catalogue, 10 February—17 April 1983, Hayward Gallery.

Jones, Stephen G. (1988) Sport, politics and the working cla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Joppien, Rüdiger(1973) Philippe Jacques de Loutherbourg, R.A., 1740—1812, Exhibition catalogue, 2 June—13 August 1973, London: Greater London Council.

Joyce, Patrick (1994) Democratic Subj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rim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4) insert in “Polartec Action Base Layer” garment packaging.

Keith, W.J.(1980) The Poetry of Na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Kinsman, Phil (1995) “Landscape,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photography of Ingrid Pollard,” Area (27), 4: 300—310.

Kip, Johannes and Leonard Knyff(1708) Nouveau théatre de la Grand Bretagne: ou, Description exacte des palais de la reine, et des maisons les plus considerables des seigneurs & des gentilshommes de la grand Bretagne ..., London: David Mortier.

Klandermans, Bert,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eds)(1988)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1, London: JAI Press.

Knight, Richard Payne ([1805]1972)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aste, Westmead: Gregg International.

Kroeber, Karl(1975) Romantic Landscape Vis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uklick, Henrika(1991) The Savage With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5—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e District Mountain Rescue Team Association(1995) Kendal Cumbria: Stramongate Press.

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 Plan(1986) Kendal, Cumbria: Lake District National Park Authority.

Lakeside Railway Society, Heritage Series of posters reproduced as postcards.

Lee, Anita Armstrong and John Houfe (eds) (1994) A Century of Footpath Preservation, Manchester: Peak and Northern Footpaths Society.

Lee, Donald W.(1976) The Flixton Footpath Battle, Stockport: The Peak and Northern Footpaths Society.

Lees, Susan and Sutti Ortiz (eds) (1992)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rocess, N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ees-Milne, James (1968)“Chatsworyh, Derbyshire”—Ⅳ, Country Life, Vol. CXLIII: 1110—1112.

Lefebure, Molley (1977) Cumbrian Discovery, London:Victor Gollanz.

Leonard, T.A.(n.d., c.1910) CHA: Please Read this! Both New and Old Members Should Know How it Came and What it Stands For, Manchester: The William Morris Press.

Lloyd, Richard(1992), Interview at the Countryside Commission, Cheltenham, August 5, 1992.

Lovell, Nadis (ed.) (1998) Locality and Belonging, London: Routledge.

Lowe, Philip(1988)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rural conservation politics,” in M. Whitby, and J. Ollerenshaw(eds), Land Use and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89) “The rural idyll defended: from preservation to conservation,” in G.E. Mingay (ed.), The Rural Idyll, London: Routledge.

——and Jane Goyder(1983)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Lowenthal, David(1991)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English Landscape,” Rural History 2 (2) 205—330.

——(1994) “European and English Landscapes as National Symbols,” in David Hoosen(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Lowerson, John (1980) “Battles for the Countryside,” in Frank Glover-smith(ed.), Class,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A New View of the 1930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Lucas, John(1990) England and Englishness: Ideas of Nationhood in English Poetry 1688—1900,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Lui, Alan(1989)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Donald, Maryon(1987) “The politics of fieldwork in Brittany,” in Anthony Jackson(ed.), Anthropology at Home, ASA Monograph 25,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MacDonald, Sharon (ed.) (1993) Inside European Identities, Oxford: Berg.

MacEwen, Ann and Malcolm MacEwen(1987) Greenprints for the Countryside?The story of Britain’s national parks, London: Allen & Unwin.

MacNicol, Ian (1996) “Access 2000: The Way Forward,” speech given by Ian MacNicol,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Country Landowners’ Association, November 27, 1996, London: Country Landowners’ Association.

Malone, Caroline(1989) English Heritage Book of Avebury, London: Batsford.

Man (Old Series) (1910—1925)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Manwaring, Elizabeth(1925) Italian Landscap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eorge E.(1995)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95—117.

Marsh, Jan (1982) Back to the Land: the Pastoral Impulse in England, from 1880 to 1914, London: Quarter Books.

Marshall, J.D. and John K.Walton (1981) The Lake counties from 1830 to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rtineau, Harriet(1855) Complete Guide to the English Lakes, London: Whittaker & Co.

Marx, Karl([1852]1972)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tless, David (1993) “One Man’s England: W.G. Hopkins and the English Culture of Landscape,” Rural History (4) 2:187—207.

Matless, David (1995) “The Art of Right Living: landscape and citizenship 1918—1939,” in 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eds),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McCay, Bonnie J. (1992) “Everyone’s Concern, Whose Responsibility?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s,” in Sutti Ortiz and Susan Leeds(eds),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roc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McGann, Jerome J. (1983) The Romantic Ideology: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Gowan, Kris (1996) “Mountain Biking—Perceptual Problem, Passing Fad or Positive Management?”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News (4)1:1—3.

McWilliam, Neal and Alex Potts(1983) “The landscape of recreation: Richard Wilson and his critic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6: 171—175.

Mellor, David, Gill Saunders, and Patrick Wright (1990) Recording Britain: A Pictorial Domesday of Pre-War Britain, London: David & Charl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John Keane and Paul Mier(ed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ewett, Peter G.(1986) “Boundaries and discourse in a Lewis Crofting community,” in Anthony P. Cohen(ed.), Symbolising Boundaries.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British Cultur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iles, Gary B.(1980) Virgil’s Georgics: A New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ller, Simon(1995a) “Urban Dreams and Rural Reality: Land and Landscape in English Culture, 1920—1945”, Rural History(6) 1: 89—102.

——(1995b)“Landscape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English Urban Hegemony and Research Need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8)1: 94—107.

Milner, Douglas (1986) “The Art and Sport of Rock Climbing in the English Lake District,” in The Lake District: A sort of national property. Papers presented to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22 October 1984, Cheltham, Glos.: Countryside Commission and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ilner, Marion(1955) “The Role of Illusion in Symbol Formation,” in M.Klein (ed.),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NY: Basic Books.

Mingay, G.E.(1976) 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Rural War’: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ptain Swing,” in Mingay (ed.), The Unquiet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

Mitchell, J. Clyde(1956) The Kalela Dance, The Rhodes-Livingstone Papers No. 27, Manchester.

Mitchell, Jon P.(1997) “A Bridge Too F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6) 3:405—411.

Mitchell, W.J.T.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One: Imperial Landscape,” in W.J.T. Mitchell(ed.),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nk, Samuel H.(1960) The Sublime: A Study of Critical Theories in XVIII-Century Englan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organ, Prys (1983) “The Hunt for the Welsh Past in the Romantic Period,”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mont, Marc(1983) “The emergence of rural struggl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7) 4: 559—576.

Morris R.J.“Clubs,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in F.M.L.Thompson (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Social Agencies and Institutions, Vol. 3: 395—443.

Murdoch, John(1984) The Discovery of the Lake District: a Northern Arcadia and its Uses, Exhibition catalogue, Winter 1984—Spring 1985,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urdoch, John (1986) “Foregrounds and Focus: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Landscape c.1800,” in The Lake District: a sort of national property. Papers presented to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22 October 1984, Cheltenham, Glos: Countryside Commission and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Newby, Howard(1987) Country Life: A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Engla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Newhall, Beaumont(1964)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man, Gerald (1987)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NY: St. Martin’s Press.

Nicholson, Andrew(ed.)(1991) Lord Byron: The Complete Miscellaneous Pro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cholson, Norman(1955) The Lakers: The Adventures of the First Tourists, London: Robert Hale.

Nicholson, Majorie Hope(1959) 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Infini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orth, Mick(1991) “Ordnance Survey in the Northern Counties,” in William Scammell(ed.) The New Lake Poets, Newcastle-upon-Tyne: Bloodaxe Books.

Olson, Gerald Wayne(ed.)(1990)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Early-Industrial England: The Halévy Thesi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Olwig, K.“Sexual Cosmology: Nation and Landscape at the Conceptual Interstices of Nature and Culture; or What does Landscape Really Mean?” in Barbara Bender (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7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Bryan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 sity Pres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Commons (1837) 37: c.162—164.

Parliamentary Debates, 6th Series, Commons (1983) 61: c.924.

Parmenter, Barbara McKean(1994) Giving Voice to Stones: Place and Identity in Palestinian Literatur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arris, Leslie(1973) Landscape in Britain c.1750—1850, Exhibition catalogue, 20 November 1973—3 February 1974, London: The Tate Gallery.

Payne, Christina(1993) Toil and Plenty: Images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England 1780—189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earlman, Jerry (1992) Give us some ‘Quid’for our Quo!,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Peel, J.D.Y. Herbert Spencer: the evolution of a sociologist, London: Heinemann.

Pepler, G.L. “Forty Years of Planning,”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Textbook, Association for Planning and Regional Reconstruction,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Phillips, J.(1987) “Enough Grousing,” in Shooting Times and Country Magazine, December 3, 1987: 25.

Phythian-Adams, Charles(1991) “Loc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The Quest for the Peoples of England,” Rural History (2) 1:1—23.

Pickard, Tom (1982) Jarrow March,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Pickles, John(1992) “Texts, Hermeneutics and Propaganda Maps,” in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 dge.

Picozzi, N.(1970) “Breeding Performance and Shooting Bags of Red Grouse in Relation to Public Access in the 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 England,”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III: 211—215.

Piggott, Stuart(1950) William Stukeley, An Eighteenth Century Antiqua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ittock, Murray G.H. (1994) Poetry and Jacobite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oore, Duncan and Judy Poore(1987) Protected Landscapes: The United Kingdom Experience, Cheltenham: Countryside Commission

Price, Uvedale (1794) An Essay on the Picturesque, London: J. Robinson.

Prince, Hugh(1988) “Art and agrarian change, 1710—1815,” in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ynn, David(1976) “The Clarion Clubs, Rambling and the Holiday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since the 189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 65—77.

Radcliffe-Brown, A.R. and C.D. Forde,(eds)(1950) 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eburn, Michael(1995) “The Frog Service and Its Source,” in Hilary Young (ed.), The Genius of Wedgwood, Exhibition catalogue,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Ramblers Association(1994) internal document entitled membership questionnaire, and dated September 1994.

——(1995) Draft: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Bill,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1996) Rights of Way-Reporting Problems and a Brief Guide to the Law,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Ravenscroft, Neil(1994) Leisure, Consumerism and Active Citizenship in the UK, Working Paper No. 28, University of Reading: Department of Lan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Reed, Francis (1991) On Common Ground, London:Working Press.

Reed, Michael and Roger Wells (eds) (1990) Class,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1700—1880, London: Frank Cassell.

Rhyne, Charles(1986) “The Drawing of Mountains: Constable’s 1806 Lake District Tour,” in The Lake District: A sort of national property. Papers presented to a symposium held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22 October 1984, Cheltenham, Glos.: Countryside Commission and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Robbins, Keith (1988)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tegration and Divers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obinson, Mike (1992) The Greening of British Party Poli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ogers, Alan(1989) “A planned countryside,” in G.E. Mingay(ed.), The Rural Idyll, London: Routledge.

Rosand, David(1988) “Gioregione, Venice and the Pastoral Vision,” in Places of Delight: The Pastoral Landscape, Exhibition catalogue November 6,1988—January 22, 1989, Washington, D.C.: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Roseberry, William(1989) “Marxism and Culture,” in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Potatoes, Sacks and Enclos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Roseberry and Jay O’Brien(eds), Golden Ages Dark Ag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enfeld, Sybil(1972) “Landscape in English Scene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Kenneth Richards and Peter Thomson(eds),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tage, London: Methuen.

Rosenthal, Michael(1993) “Landscape as High Art,” in Katharine Baetjer(ed.), Glorious Nature: British Landscape Painting 1750—1850, NY: Hudson Hill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nver Art Museum.

Rothman, Bernard(1982) “The day we took Kinder,” in The Countryman (87) 1:102—109.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s (1834) “Answers to Questions Circulated in Rural Districts,” Appendix B.1. Parts I—V Parliamentary Session Papers, vols 30—34.

Rüdig, Wolfgang(1995) “Between Mode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Environmental Radicalism in Britain,” in Bron R. Taylor(ed.), Ecological Resistance Movemen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udwick, Martin J.S. (1985)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Ruskin, John(1876) A protest against the extension of the Railways in the Lake District, Windermere: Somervell.

Russell, Gillian(1995) The Theaters of War: Perform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793—18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ahlins, Peter(1989)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id, Edward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

Sales, Roger (1983) 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80—1830: Pastoral and Politics, London: Hutchinson.

Salveson, Christopher(1965) The Landscape of Memory: A Study of Wordsworth’s Poet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Samuel, Raphael (1989)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4)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Sandby, Paul (1778—1781) The Virtuosis Museum, London: G. Kearsly.

Saunders, Gill(1990) “Introduction,” in David Mellor, Gill Saunders, Patrick Wright Recording Britain: A Pictorial Domesday of Pre-War Britain, published to coincide with an exhibition, Recording Britai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 August—18 November, 1990, London: David & Charl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Schama, Simon (1996) Landscape and Memory, NY: Alfred A. Knopf.

Schneider, Jane(1991) “Spirit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Eric R. Wolf(ed.), Religious Regimes and State-Form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an Ethnolog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chwarzkopf, Jutta(1991) Women in the Chartist Movement,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Lord(1723) Characteristics of Man, Manners, and Opinions, London: J. Darby.

Short, John Rennie(1991) Imagined Country: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Sidaway, Roger (1990) Birds and Walkers: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Disturbance to Birds,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Sider, Gerald(1986) Culture and Clas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mmons, I.G. (1975) Rural Recreation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NY: John Wiley & Sons.

Slater, T.R.(1987) Batsford’s “Face of Britain”: Topographical Writing 1930—1960 and Images of Britai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7,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mall, John(1990)“Geology and landforms,” in Nicholas Stephens (ed.),Natural Landscapes of Britain from the A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Adam ([1776]1985)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ichard F. Teichgraeber (ed.), NY: Modern Library.

Smith, Bernard (1985) European Vision and the South Pacif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Walter Raymond(c.1922) Manuscript diary of a walking tour of the Lake District made in July, probably in 1922.

Solkin, David H.(1992) Painting for Money: The Vision Art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aul Mellon Center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uthall, Humphrey (1996) “Agitate! Agitate! Organize! Organize! Political Travel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politics, 1839—1880,”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1)1:177—193.

Speake, Robert(1993) A Hundred Years of Holidays:1893—1993: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A., Manchester: Countrywide Holidays.

Spencer, Herbert(1855) Railway Morals and Railway Policy,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

——(1904) Autobiography, 2 vols, NY: D. Appleton & Company.

Springhall, John (1977) Youth, Empire and Society: British Youth Movements 1883—1940, London: Croom Helm.

Stallybrass, Peter and Allon White(1986) Transgress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andring, Timothy J. “Watercolor Landscape Sketching During the Popular Picturesque Era in Britain,” in Katharine Baetjer(ed.), Glorious Nature: British Landscape Painting 1750—1850, NY: Hudson Hill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nver Art Museum.

Stanners, David and Philippe Bourdeau (eds) (1995) Europe’s Environment: The Dobris Assessment, Copenhagen: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Stedman Jones, Gareth (1983) Language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Anglo-Marxism, Neo-Marxism and the Discursive Approach to History,”in Was bleibt von marxistischen Perspektiven in der Geschichtsforschung? Göttingen: Max-Planck Institute für Geschichte.

Stephens, Nicholas(ed.) (1990) Natural Landscapes of Britain From the A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cking, Jr., George W.(1987)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tone, Laurence and Jane C. Fawtier Stone (1986)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rathern, Marilyn (1981) Kinship at the Core: An Anthology of Elmdon, Esse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uart, David C. (1979) Georgian Gardens, London: Robert Hale.

Summerson, Sir John(1983) 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Symes, Michael(1991) The English Rococo Garden, Princes Risborough, Buckinghamshire: Shire Publications.

Tashjian, Georgian R., David R. Tashjian, and Brian J. Enright(1990)Richard Rawlinson, A Tercentenary Memorial, Kalamazoo, MI: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New Issues Press.

Tate, W.E. and M.E. Turner(1978) Domesday of Enclosures, Reading: University of Reading Press.

Tate Gallery, London(1996) Exhibition: “Mountain Gloom, Mountain Glory”.

Tayler, Edward William(1961) Nature and Art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Bron Raymond(ed.)(1995) Ecological Resistance Movement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aylor, Harvey(1997) A Claim on the Countrysid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utdoor Movement,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

Thacker, Christopher (1989) England’s Historic Gardens, Dorking, Survey: Templar Publishing.

The London Magazine (1732—1784) London: J. Wilford.

Thomas, Keith(1983)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 History of Modern Sensibility, NY: Pantheon.

Thompson, David and Robert Woof (1986) Derwentwater: The Value of Elysium, An Eighteenth-Century Story, Exhibition catalogue, 8 June—31 October 1986, Grasmere and Wordsworth Museum, Cumbria: Trustees of Dove Cottage.

Thompson, B.L. (1946) The Lake District and the National Trust, Kendal: Titus Wilson.

Thompson D. (1984) The Chartists, London: Temple Smith.

Thompson, E.P.(1966)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Y: Vintage Books.

Tierney, John(1998) “Explornography: The Vicarious thrill of Exploring When There’s Nothing Left to Explore,” lead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26, 1998, 6: 18—23, 33—34, 46—48.

Tilley, Christopher (1994)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Berg: Oxford.

Trevelyan G.M. “Amenities and the State,” in C. Williams-Ellis(ed.), Britain and the Beast, London: J.M. Dent & Sons.

Trevor-Roper, Hugh(1983)“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ueman, A.E.(1971) Geology and Scenery in England and Wal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Trumpener, Katie (1997) Bardic Nationalism: The Romantic Novel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Graham(1996) photograph of child actors in the Young National Trust Theatre’s play Flowers and Slaves at Claydon House, Bucking- hamshire, in The Guardian, April 26, 1966: 8.

Turner, Michael(1980)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t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History, Folkestone: Archon Books.

——(1984) “The Landscape of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Michael Reed(ed.), Discovering Past Landscapes, London: Croom Helm.

Turner, Victor(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nd Edith Turner(1978)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Tylor, Edward B. (1891) Anthropology, NY: D. Appleton & Company.

Urry, James(1993) Before Social Anthropology: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anthropology, Chur, Switzerland: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Urry, John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Van Gennep, Arnold(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trans. Monika B. Vizadom and Gabrielle L. Caffe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an Keuren, David Keith(1982) Human Science in Victorian Britain: Anthropology in Institutional and Disciplinary Formation,1863—1908,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4)“Augustsus Pitt-Rivers, Anthropological Museum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r Victorian Britain,” Victorian Studies 28: 171—189.

Vardi, Liana(1995)“Imagining the Harves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7 April 1995.

Vernon, James (1994) “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Social History 19 (1): 81—98.

Vincent, Joan(1990)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Vitruvius, Pollio, Morris Hicky Morgan trans.(1960) De architecture. Virtruvius: 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NY: Dover.

Wainwright, Martin(1996) “‘Spy’ stiles to log Yorkshire Dales hikers,” Guardian, April 29, 1996: 5.

Wallace, Anne D. (1993) Walking,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vin, James (1978) Leisure and Society 1830—1950, London: Longman.

Watkins, Charles(ed.)(1996) Rights of way: policy, culture and manage- ment, London: Pinter.

Watson, Adam (1991) Critique of report: “Moorland recreation and wildlife in the Peak District” by Penny Anderson, Peak Park Join Planning Board,1990, London: Ramblers’ Association.

Watson J.R. Picturesque Landscape and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London: Hutchinson.

Webster, Mary (1976) Johan Zoffany 1733—1810, Exhibition catalogue, 14 January to 27 March 1977, Londo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Webset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73) Springfield MA: Merriam Webster.

Wells, H.G. Tono-Bungay, NY: The Modern Library.

Welsh, Frank(1989) The Companion Guide to the Lake District, London: Collins.

Wetherell, D. and C. Carr-Gregg(1990) Camilla, a Life, C.H. Wedgwood 1901—1955, Kingston,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Whitby M. and J. Ollerenshaw (eds)(1988) Land Use and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Whitby, Martin (1997) “Countryside Access; a traditional asset but growing fast?” Countryside Recreation Network 5: 4, October 1997, n.p.

Whitney C.R. (1997) “Alpine Thrills Attract an Untiring Visitor: Death,” NY Times, August 17, 1997.

Whymper, Edward ( [1871]1981) Scrambles Amongst the Alps in the Years 1860—1869, Berkeley: Ten Speed Press.

Wiener, Martin J. (1981)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berforce, William([1779]1983) Journey to the Lake District From Cambridge 1779: A Diary, C.E. Wrangham (ed.), London: Oriel Press.

Wilcox, Scott B. (1988) “Unlimiting the Bounds of Painting,” in Ralph Hyde, Panoramania!The Art and Entertainment of the ‘All-Embracing’View, Exhibition catalogue, 3 November 1988—15 January 1989,London: Trefoil Publications and the Barbican Art Gallery.

Williams, Raymond(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1968]1989) “The Idea of a Common Culture,” in Robin Gable (ed.),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Verso.

Williams, W.(1956) The Sociology of an English Village: Gosfort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Williams-Ellis, Clough (1947) On Trust for the Nation, London: Paul Elek.

Wolf, Eric R.(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dbridge, Kenneth(1989) The Stourhead Landscape, London: The National Trust.

Wordie, J.R. (1983) “The Chronology of English Enclosure:1500—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36 (4), 483—305.

Wordsworth, Dorothy([1802]1971) The Journals of Dorothy Wordsworth, Mary Moorma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dsworth, William ([1835]1984) A Guide Through the District of the Lak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Scenery, etc. For the Use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Kendal, Westmorland: Hudson & Nicholson.

Wright, Patrick (1985)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Tru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Verso.

# 附錄

調查問卷

所有的問題按照是/不是或者五項選擇回答。五項選擇范圍由強烈贊成或同意到強烈反對或不同意；由較短時間或距離到較長時間或距離；由從不到總是，逐項遞進。在給出選擇清單的同時，還為“其他”答案和附加評論留出空間。以下是做了簡略處理的問卷。

#### 第一部分 一般統計信息

包括年齡、性別、就業狀態、職業/前職業、家庭收入

#### 第二部分 你是如何開始徒步的？

1.通過家庭、學校的朋友、工作中的朋友、年輕人群體？

2.在什么年紀開始？

3.你開始徒步是不是因為認為徒步可以改善你的健康狀況？

4.你參加其他戶外活動嗎？比如騎自行車、打高爾夫、觀鳥？

5.你參加慈善徒步嗎？

6.你參加競賽性徒步嗎？

7.在多大程度上徒步結下的關系可以發展到徒步之外的社會活動？

8.你安排過與只在徒步過程中認識而沒有在別處相遇的人再一起徒步嗎？

#### 第三部分 著裝

9.你是否買過或被贈送過以下任何專為徒步之用的裝備？（包括9項）

10.你一年花在徒步裝備上的平均費用有多少？

11.當你看見徒步者身著高科技服裝時，你的反應是什么？

12.你同意還是不同意目前的徒步裝備比過去的更精致、更舒適、更昂貴、色彩更豐富、功能更實用？

#### 第四部分 在英國參加領隊或導游帶領下的徒步群體

13.參加的程度？（范圍：從不到總是）

14.參加的頻率？（范圍：一年一次到一月一次以上）

15.參加的時間長度？（范圍：一天到三周以上）

16.你偏愛的徒步難度水平？（范圍：散步到高山陡坡攀爬）

17.一天徒步的平均距離？（范圍：4—8英里到20英里以上）

18.你花在有導游的徒步上的平均費用（包括旅行開支）？

（同一組問題還問到英國之外的有導游的徒步，英國之內的無導游的徒步，英國之外的無導游的徒步。）

#### 第五部分 對英國風景的偏好

19.你更喜歡高地和山區還是低地和海岸線風光？

20.你在不同背景下的徒步是多少？哪個是你的家鄉背景？

（同一組問題還問到英國之外的風景。）

#### 第六部分 風景、閱讀和網絡

21.你閱讀與你徒步地區有關聯的作家所寫的小說或詩歌嗎？如果是，你最近讀的作品是什么？

22.你閱讀你徒步的地區的歷史嗎？如果是，你最近讀的是什么？

23.你閱讀“鄉村”書籍或雜志嗎？如果是，讀過哪些？

24.你通過網絡和其他徒步者聯系嗎？

#### 第七部分 會員組織

25.你參加過任何致力于保護或進入鄉村的組織嗎？

26.你在組織中的活躍度如何？你認為它們的工作效果好嗎？

27.下列的全國徒步、環保或鄉村組織中，你屬于哪一個？（鄉村英國保護委員會、地球之友、國家公園之友、長途徒步協會、國民托管組織、漫游者協會、皇家保護鳥類學會，其他。）

28.你屬于任何地方性自然信托組織、環保協會或人行道協會嗎？

#### 第八部分 一般信息

29.你參加同性的徒步群體嗎？如果是，為什么？你的體驗有何不同？

30.你可參加過任何閱讀地圖或方向定位的培訓課程？如果是，在哪里參加的？

#### 第九部分 對于風景的態度

對下列陳述，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31.投票選舉時，人們應該考慮政黨的環境立場。

32.農莊主應該接受補貼，以便投入環保型的農業措施。

33.對集約農業的補貼應該取消。

34.徒步是我參加過的活動中最富有挑戰性的一項。

35.目前的集約農業對環境有害。

36.環境問題對我很重要。

37.英格蘭的西北部鄉村最“英國”。

38.素食主義是個好主意。

39.我年輕時候蝴蝶種類比現在多。

40.移除農田圍欄邊界可以擴大農田面積，具有經濟意義。

41.我年輕的時候，英國風景更有吸引力。

42.我更喜歡劃成小塊的田野。

43.徒步比我每天的工作更能帶來滿足感。

44.農業效率居于第一位，鄉村的景色外觀居于第二位。

45.大片農田單種一樣莊稼，如油菜，顯得更有吸引力。

46.從我年輕時候以來，風景已有很大改變。

47.風景的變化對于生產更便宜的食物是必需的。

48.鄉村的變化意味著歷史的失落。

49.移除圍籬來擴大農田面積，改變了風景外觀，這一改變是負面的。

50.我年輕時野花種類比現在多。

51.為了下一代我們必須保護風景。

52.英格蘭的西南部鄉村最“英國”。

53.比起我的工作來，徒步具有更大的“康樂”和“成就”感。

54.假如能減少農業對鄉村的破壞性改變，我寧愿花更多的錢買食物。

55.商業林的針葉樹應該與闊葉林套種。

56.科茨沃爾德和南方高地的緩坡是“典型”的英國風景。

# 譯后記

2004年，和北大錢理群先生有過一次電話長談。錢先生興致勃勃介紹了他“認識腳下的土地”的構想和一些研究細節，并希望我能發揮自己的外語所長，引介一些理論文獻。為先生的熱情所感染，我滿口答應。不曾料到的是：這次談話把我這個偏安文學批評一隅的文體研究者引至一個更大的學術領域，從相對自閉的新批評分析模型轉向更為開放的文化研究解釋框架。

此前，我已經收到他的贈書《貴州讀本》，對于先生的學術理念和方法，有了一個比較入微的了解。何謂“閱讀腳下的土地”，錢先生引而不論，卻為我后來的理論跟進預留了空間。當時，全球化話語的渦流席卷中外學界至少有10年之久。阿帕杜萊就宣稱全球化是所有學院人士的焦慮之源。期間，相關議題、不同取向的研究勢頭猛烈，催化并繁衍了一個龐大的學術譜系，產生很少的共識，卻制造出更多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對于“土地”以及與土地一詞聯結在一起的概念，諸如“本土”、“地域”、“地方”的思考，則成為一種對立批評（antithetical criticism），與全球化話語形成參照。

部分受愛德華·薩義德的“對位閱讀”（countrapuntal reading）的啟發，部分受侯世達（Douglas R.Hoftstadter）寫作方式的影響——他在《哥德爾、艾舍爾、巴赫》（Godel，Escher，Bach）一書中，嘗試了一種他稱之為不同尋常的結構：“在對話和章節之間有一種對位”——[[182]](#_182_30)研究生討論課上，我會引導學生細讀一部理論原文經典，同時配備一部與其形成對立批評的著作進行對讀，以期產生“思想對話，觀念碰撞，勢均力敵”的復調敘述的效果。所以，2004年春季，在《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的討論課上，我為哈羅德·布魯姆這本書選定了《貴州讀本》。僅從二書的題目就可以想見它們的對稱、對比乃至對峙的關系——西方/非西方；中心/邊緣；普世性/地方性；精英/草根……也許，最重要的一組關系是：書寫性文本/具象性土地。隨著對讀的深入，我和學生一起發現了許多微妙之處，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我的一個教學計劃：“表面上在談論一個想法，但是實際上以稍稍隱蔽的方式在談論另一個想法”（侯世達語），但并未抵達我的目標：將錢先生“閱讀腳下的土地”這一學術意識發展成一種連貫性和解釋性的體系。

其實，豐富的理論資源已經存在，只等我們適度地挪用，創造性地借用。這就是方興未艾的風景學（landscape studies）、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和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三個業已壯大、貌似獨立的學科，其實與決定性地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走向的人文地理學頗多交錯疊合之處。某種程度上，它們的核心概念、重要術語，乃至研究方法都源自人文地理學，又融入派系紛繁的文化研究之中。簡言之，它們具有一切新興學科的跨越性和模糊性；換言之，它們的疆界隨著新的關注、方法或問題的介入而在不斷移動。在為“閱讀腳下的土地”尋找理論性支撐或解釋性描述的過程中，我逐漸將范圍鎖定在與人文地理學瓜葛甚深、近乎同構的風景學上，試圖以此為基點展開縱深搜索。之所以如此鎖定，是因為在把“閱讀腳下的土地”這個比較感性的表達切換到理論層面時，我注意到美國學者皮爾斯·劉易斯（Peirce F.Lewis）在其《閱讀風景的原則》（AxiomsforReading the Landscape）一文中，提出一個基本原則：“所有的人類風景，不管如何平常的風景，都有著文化意涵，因此，沃茲M.ThielgaardWatts認為我們‘可以閱讀風景，正如我們能夠閱讀書本’。我們人類的風景是我們無意為之，卻可觸知可看見的自傳，反映出我們的趣味、我們的價值、我們的渴望乃至我們的恐懼。”究其知識譜系，這一原則應該是人文地理學泰斗杰克遜（J.B.Jackson，1909—1996）觀點的翻新：“一本豐富而美麗的書總是在我們面前打開，我們必須學會閱讀它。”

我的一個假設是：既然風景（landscape）一詞匯聚和裂變出的同義詞和近義詞，如土地、地方、區域、空間、記憶、權力、棲居、家園、身份、國族等已經成為當代各種社會理論的建構基礎或參照框架，它也應該能夠成為一個理論棱鏡，透過它可以觀察作為一個地方的貴州、作為風景的貴州、作為表述對象的貴州……

基于這樣的動機，我申請了美國費曼基金，在UIUC進修一年。期間，我系統地研讀了大量風景研究專著，并精選了一套叢書。從下列書目就可以看出它們的主旨：《風景與認同》（Landscape andIdentity）、《風景與記憶》（Landscape andMemory）、《尋找如畫的風景》（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風景與權力》（Landscape andPower）、《風景人類學》（TheAnthropology ofLandscape）、《戀地情結》（Topophilia）等等。其中，《風景與認同》、《尋找如畫的風景》兩書，我認為對于貴州具有特別的理論燭照和旅游規劃指導的意義。《風景與認同》重點考察了英國湖區和峰區文化賦值（cultural valorization）、公眾為進入兩大風景區所進行的各種斗爭、徒步團體的身份建構……而《尋找如畫的風景》主攻18世紀下半期的英國風景美學與旅游的互動關系，對于正在急于把自己建造成“公園大省”的貴州頗能提供一些發展思路和前車之鑒。兩書都涉及到如畫美學（the Picturesque）如何改變了人們的風景感知和審美趣味，如何使英國西北部——凱爾特邊區戲劇性地成為英國的阿爾卑斯山區，游客趨之若鶩的絕美之境，浪漫主義的精神圣地。“畫境游”（picturesque tour）得以流行，劇院、繪畫、明信片、雜志、廣告等媒介的作用居功至偉，它們熏陶了，或者說規訓了游客的品味，引導他們拿眼前之景比照他們熟悉的17世紀荷蘭和意大利風景畫作品，從而抬升了峰區、湖區、蘇格蘭高地的文化價值。

考慮到這套叢書的實用價值，我覺得將它們放在貴州出版似乎更能彰顯書地相得。多年前，我在四川外語學院攻讀英美文學碩士學位時，曾在幾個假期，與當過知青、機智老練的大師姐在貴州山區徒步漫游。美好的80年代猶如褪色的黑白底片，時常在我的記憶里顯影：兩個女生，肩背帆布包，攜帶一架海鷗相機（克勞德鏡子的升級版？），日行山間公路，夜宿鄉村旅店，飽覽如畫美景。一路上，我總是把黔東南黔西南奇崛的群山、奔涌的急流、荒涼的原野“誤讀”成司各特筆下的蘇格蘭高地風景，把遠處田坎里身著百褶裙的苗家農婦“誤認”成腰系格子裙的蘇格蘭山民，不時招來滿腹現代派理論的師姐的反諷，惹出她關于“抒情”、“移情”、“矯情”的高談闊論。某次，我指著路旁70度坡地上稀疏瘦矮的玉米對她說：“這可不是麥格瑞戈族人的農田嗎？”曾躬耕于涼山阿壩的師姐狂笑：“玉米不是燕麥。”向來俏皮的師姐還順便幫我復習了一遍約翰遜博士著名的定義：“燕麥是英格蘭人用以喂馬而蘇格蘭人藉以糊口之物。”可惜當時我是余生太早，身處前互聯網時代，無緣得知諸如《戀地情結》（1974）、《發現日常風景》（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1984）這些風景研究的奠基之作，不得預見將有一批包括《尋找如畫的風景》（1989）和《風景與認同》（2000）在內的風景研究力作問世，更未想到20年后自己會從英美文學專業轉入風景研究領域——這個轉向并非由于學術興趣的突變，而是因為研究對象的導接。在閱讀相關文獻時，我感覺一些新銳的話語或觀念，諸如“地方感”、“定位于風景的自我意識”、“想象的共同體”、“深植于風景之中的文化民族主義”、“風景殖民主義”……與其說是領我瞻望學術前沿，不如說是引我“后視”（rearmirror）自己的風景經驗。尤其是閱讀達比的《風景與認同》時，我感覺仿佛有一束強光照亮了幽封在過去之洞穴的記憶，青年時代的即興之舉：原來與師姐在貴州的徒步假期，我們所看所想，我們的爭論……是可以得到風景理論的追認、解釋乃至放大到意味深長的程度。如果真能穿越，我好想回到二十多年前那個夏風拂面的下午，回到貴州威寧洛澤河岸某處。我要援引達比的考證來為我的文化模仿辯護：“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包括法國革命期間和拿破侖戰爭期間，英格蘭與法國之間充滿公開的敵意，這種敵對關系具有周期性發作的特點。在這種背景下，英國人出國休閑旅游并不總是那么容易，可能性或可取性大打折扣。同樣，國內的遠距離旅行也頗為不易或多有限制。但是若有可能，他們會到英格蘭群山起伏的北部鄉村以及北威爾士旅行，這也是英國旅行者能感受到阿爾卑斯山式的震顫（frisson）的最近距離……”。甚至，我要追加一句煽情的話：“我正在感受阿爾卑斯山式的震顫。”更甚至，我要對屢屢帶我繞開收費關卡，翻墻或跨欄溜進景區[[183]](#_183_30)的師姐說：“擱在19世紀的英國湖區，我們這種行為屬于‘非法侵入’。”當然，我也要用達比的觀察來分析自己的誤讀誤認：“古典教育，猶如繪畫知識一樣，使得游客把風景與文學聯想起來，將當地人變成了藝術裝飾。”反思自己的觀景行為是否也是一種偽精英的“凝視”：在我們這兩個來自相對發達的內地的游客眼里，欠發達的貴州苗疆是否猶如18世紀相對落后的凱爾特邊界，只是一個引發審美聯想的對象，至于如畫美景背后的貧窮與衰敗則不在我們的關注之內？追問自己對于貴州的依戀是否屬于達比田野調查的范圍：以象征的方式歸屬一個非出生地的“地方”？

為這個念頭所激動，我致電好友，貴州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張曉松教授，向她介紹我的出版構想。萬里光纜那一頭的她很激動地說，這套叢書交給貴州人民出版社來做，是最佳配置。曉松素來作風雷厲，很快說服貴州人民出版社全盤接下這套非盈利學術著述。然而，版權談判似乎是個復雜的技術活，超出了出版社的想象。雖經曉松鼎力推動一年有余，翻譯授權仍無著落。此時我已回國，開設了一門新課《風景與文學》，為研究生導讀《風景與權力》等原著，指導自己的學生撰寫關乎風景的畢業論文。口譯釋讀原文的時候，難免想起錢先生的囑托，不免慚腆。一日忽發奇想，電話劉東先生，試探柳暗花明的機會。我剛報上幾本書的標題，他就要我速將內容提要E-mail給他。一天之內，劉東先生回話，將叢書悉數納入他的人文與社會系列。我原以為這套叢書與他的一向關注不甚關聯，不曾料到他的新關注已在這個方向久矣。在英美大學里的數次演講中，他已論及風景研究的熱點議題，從中國城市景觀或風景的視角反思全球化的沖擊和“黑暗一面”——而“dark side oflandscape”（風景的黑暗一面）既是John Barrell[[184]](#_184_30)的重要發現，又是W.J.T Mitchell[[185]](#_185_28)辯證地定位風景之本質的基礎。看來，我挑選出來的這些“天書”早在他的視域之內，而且融進他的“觀點”背景之中。

這套叢書移交給已與劉東先生精誠合作多年的譯林出版社后，版權問題迎刃而解。如我所愿，最先談下來的就是《風景與認同》。全書分為三大部分：再現性的、政治性的和民族志的，從三個角度合圍一個學術任務，即以跨學科的方式“探索歷史上的階級關系，追蹤作為文化產物的階級與民族身份透過風景及其進入權發揮作用的種種步驟。”這一任務的設計緣起于作者的敏銳觀察：“人們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義的風景區休閑，以此建構自己的身份。”就方法論而言，本書堪稱跨學科研究的范本；就內容而言，本書不負數位資深書評人的贊語。瑞典學者肯尼思·奧爾維格（Kenneth Olwig）夸獎第一部分對近年的風景研究做了透徹而富有價值的回顧，特別欣賞第三部分，認為最富創新性和挑動性，甚至建議作者改換成“風景、徒步與認同”。對此，我亦有同感。第三部分是“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對于地方的體驗，以及‘使地理經驗得以形成、交流得以進行的那些共享的象征手段’”。這一部分充分展示了達比的研究風格——精確、細膩和敏銳。她特別引入了三位自我意識和身份意識非常清晰的女性徒步者的口述史，揭示她們徒步湖區的經驗與其身份建構的關系。由此我想到：國內的徒步漫游已經形成規模，雜志或網絡上常見驢友各種形式的日志或報告，但對于這一“在路上群體”的田野調查或民族志學的研究，似乎鮮見。顯然，《風景與認同》一書的學術視野對于國內學人，特別是關注地方、環境、旅游等議題的學人頗有啟發作用。書中著力論述的幾個重要方面——風景區的立法史、進入風景與進入政治的沖突或互動、交通運輸體系與景區環境保護的關系、各種利益集團圍繞景區開發和土地使用展開的博弈等等都是值得借鑒的研究課題。我尤其激賞作者對于隱匿在風景里的權力關系精辟的分析，認為有心的學者，是可以順著這一路徑思考國內景區的種種現象的。化用劉東先生的一句妙語，《風景與認同》論及的峰區或湖區的難題，其實也在困擾著當代中國。例如，19世紀初期，暴發的工業家在湖區建造的豪宅，“顏色俗氣，位置扎眼，只是為了搶占風景，不像當地的古舊民居那樣隱入風景，不露痕跡”。類似的現象正在中國一些景區不斷涌現，只不過可能是，工業家的豪宅換成了星級旅游飯店，而許多世代隱入風景的民居要么被拆遷，要么被改造成權力部門欽定的風格……看來，風景的商品化過程先后在英國和中國進行，但結果似乎大相徑庭。早在19世紀，湖區精英或湖區之友就充分調動了自己的文化資本，通過一系列的議案限制進入或開發湖區，從而保護作為英國之象征的湖區生態和如畫美，而我們的文化精英，即使有類似的提議，卻無促使提議落實的權力。此外，我認為第二部分也相當精彩。達比在政治經濟的范疇內探討風景的問題性：“……湖區本來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構出的英國民族認同之地，后來卻成為風景進入權運動的參與者展示階級—文化差異的場所。”她以翔實的資料勾勒出底層反抗急流的源頭、流域與結果：19世紀英國憲章運動如何與工人階級進入鄉村運動結合在一起。工人階級爭得在父輩被迫離開的土地上自由漫步權的同時，也爭得了選舉權。耐人尋味的是：“非法入侵”風景區一度成為政治斗爭的重要方式。

《風景與認同》走的是嚴謹慎密的寫作路線，沒有我所仰慕的以賽亞·伯林和哈羅德·布魯姆的豐沛之美（beauty ofexuberance），但有著我所欽佩的學術專著的品質：論之有據、言之有物、行之甚遠——這也是我向一些博士候選人力薦此書的原因之一。

然而，它跨越人類學—歷史—文學的視角和嚴謹不免拘謹、慎密幾近深密的文體風格，卻對譯者構成一個極大的考驗。為了論之有據，作者旁征博引——從堪與正文媲美的尾注和巨量的參考引文就可以看出：她的常識、學識和見識遠遠超過譯者的傳譯能力。實際上，書中有很多概念或者術語需要向行家求助或求證。譯者曾有幸與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同屋半年有余，耳濡目染，近朱則赤，漂學了一些田野志、口述史等皮毛，因此，翻譯此書，譯者溫習了一些舊課，也補習了不少新知，盡管有校譯《浪漫主義的根源》等書的經歷，但仍不敢肯定本書“所有的文句都沒有翻錯”（劉東語）。實際上，恰好是以前校譯的經歷使得譯者深信翻譯不僅是“遺憾的藝術”，而且是如履薄冰的冒險。一個貌似常見的詞語也許指向的是殊異的概念世界。在尋找詞語意義的過程中，時有不知所云的疑惑、失其所蹤的慌亂和無從定奪的窘迫。

最后，我要特別感謝主編劉東先生和編輯黃穎女士的寬容：他們原諒譯者數次拖延完稿日期；我要再次真誠地感謝余婉卉同學，她代譯者翻譯了最需耐心的索引部分，統一了各類名稱。此外，我要感謝劉碧原和張倩倩兩位同學的救急義舉——是她們將長達幾十頁的參考書目轉換成可編輯的文本。

張箭飛  
 2009年11月于東湖放鷹臺寓所

# 注釋

#### 一 批評視角：視景的階級化/分類

[[1]](#_1_124)“景色”與“景致”是借自劇場的術語。scene原指舞臺背景（《牛津英語詞典》1971）。希臘語skene，拉丁語scaena，法語scène，過去或現在都指“舞臺”。Landscape意指肖像畫、形體畫或舞臺布置的背景或“景致”（《牛津英語詞典》1971）。我們自己“童年的情景”就是借自劇場的比喻（杰克遜1980）。

[[2]](#_2_119)《建筑十書》在中世紀時期不斷被復制，再復制。1486年其第一個印刷版本在羅馬問世（薩姆森1983）。

[[3]](#_3_114)截至1699年的大量意大利語、法語和英語印刷本中有很多實例。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世界劇場：《世界劇場》（拉丁語，1574），《天地劇場》（意大利，1577，1598，1620，1625，1679，1697），《環球劇場》（拉丁語，1606），《世界劇場概述》（法，1587，1632）；各國劇場：《世界新劇場：非洲》（法，1681），《法國……地理劇場》（法，1632），《大英帝國劇場及世界最重要部分略覽》（英，1676），《撒波迪亞戲劇場》（1682），《比利時劇場》（意，1696），《土耳其戲劇場》（意，1683）；城市與建筑劇場：《意大利城市劇場》（1616），《羅馬……建筑與設計新劇場》（意，1665，1699），《巴黎老劇場》（法，1639），《韋萊特里歷史劇場》（意，1644），《博洛尼亞劇場》（1668）；園藝劇場：《農業與田地耕作劇場》（法，1646），《花園劇場》（法，1663），《藥物學劇場》（1675，1681，1686，1696）；蕾絲業、工程、飲食和習俗、烹飪等劇場：《機器與設計……劇場》（1607，1616，1620），《機器和改裝新劇場》（1607，1656），《數學儀器與機械劇場》（1578），《演講、辯論與目錄劇場》（1553），《古代與現代智囊劇場》（1660），《木工藝術劇場》（1664）；最后一類是政府、戰爭和國家與教會關系劇場：《那波利地區政府政治劇場》（1691），《上帝的審判劇》（1597），《猶太教的……背信棄義劇》（1689），《塞文山脈的戰爭劇》（法，1690）。

[[4]](#_4_114)frontispiece也是建筑詞匯，指建筑物的正面或正門。

[[5]](#_5_106)現在已成吉爾伯特—沙利文效應（Gilbert-and-Sullivanesque effect，吉爾伯特和沙利文聯手創作的喜劇諷刺了英國人對社會地位的崇拜。——編注）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圖版12的標題，這是巴德明頓的別墅圖，是“最有權有勢的亨利親王即波弗特公爵、伍斯特的侯爵和伯爵、查普斯特伍·拉格蘭和高爾半島的赫伯特男爵、最高貴的嘉德勛爵士團爵士的別墅之一”。對貴族階級雅致生活的激情遠遠溢出了貴族階級本身，如《紳士雜志》傾八年（1747—1754）之久出版插圖來說明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貴族的全部盾形紋章。

[[6]](#_6_100)9月29日的米迦勒節是英國四個季度結賬日之一，即支付地租，租約開始或結束，地方官員選舉日。

[[7]](#_7_98)在1708年的《新劇場》版本中，出現了四五個農業工人在偌大的田野割曬干草的畫面。1710—1720年的油畫《狄克斯頓莊園，割曬干草》中描繪了23個割草人，及50個左右男女幫工的場景。這幅畫“描寫農業勞動場景，在遠景繪畫類型中絕無僅有。”（普林斯1988：101）

[[8]](#_8_98)《新劇場》的出版歷史難以確定。第一版的出版日期或在1707年，或在1708年。我采用的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埃弗里圖書館查證的那個版本的日期。有時，該集以《大英百科插圖畫》為名出版；更復雜的是，有些版本包括的版畫日期比裝訂日期還要晚，五卷本的版畫裝訂為三卷本等等；版畫的數目出入很大；有些版畫既不是尼弗也不是基普繪制的或雕刻的，而有一些版畫則全由基普一人繪制或雕刻；有些版本還包括后來的城鎮、教堂、大教堂風光和地圖。

[[9]](#_9_94)例如，紐卡斯爾公爵向基普預訂了400幅有關自己莊園的雕版畫，而波弗特公爵夫人也預訂了多幅有關她的莊園的版畫，裝訂成冊贈送他人（哈里斯和杰克遜—斯特普斯1984）。

[[10]](#_10_92)這些人中有公爵、封建領主及皇室成員，執政官員如大使、愛爾蘭總督、樞密顧問官、財政部委員、議會議員，及其他各行業的人員如主教、大主教、劍橋教授、南太平洋和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富裕的城市商人、時尚的建筑師和美學家。

[[11]](#_11_88)到18世紀20年代，英國到羅馬參觀游覽的人都定制了自己的肖像畫，其背景大多是古典建筑的遺址。18世紀50年代，蓬佩奧·巴托尼（1708—1787）成為最受追捧的肖像畫家。無論被畫成奧斯曼土耳其人，還是羅薩畫中的匪徒，或是他們本人，這些英國游客的肖像神態逼真，花費的金錢遠遠低于一幅雷諾茲繪制的類似肖像。有160幅英國游客肖像畫保留了下來，另外還有40幅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人的坐姿肖像畫（克拉克1985）。就數量而言，修業旅行帶回的藝術品多到需要建筑物來陳設和收藏。1725年伯林頓伯爵在奇士威克設計了一棟別墅來擺放他的收藏；1725年厄格蒙特勛爵二世在佩特沃思建造了南廊擺放他的希臘羅馬雕塑收藏；1770年羅伯特·亞當為約克郡的紐比大宅加建了一系列房間，存放威廉·維德爾的希臘羅馬雕塑收藏。約翰·佐法尼（1733—1810）的一幅畫，名為《公園街上的查爾斯·唐尼里圖書館》（1781—1783）展現了唐尼里的部分大理石收藏——它們數量頗多，使得展廳空間顯得擁擠，這些收藏被認為是“當時最好的且最著名的英國古典雕像的收藏”（韋伯斯特1976：72），展示了唐尼里以及游客、收集古文物者和公眾人物的收藏。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受夏洛特女王委托制作的早期畫作《烏菲齊的講壇》（1772—1778）的英國版，令人驚嘆地將繪畫、雕像和英國業余藝術愛好者畫在一起，顯示出佛羅倫薩梅第奇美術館中心的場景，是“修業旅行經歷的藝術巔峰之作”（韋伯斯特1976：60）。在佐法尼的《公園街》畫中出現的男子與巴托尼的資助人們在一起。

[[12]](#_12_86)英國賣場都充斥著意大利風景畫：“被認為是杜蓋繪制的300幅風景”在1711年至1759年間出售（安德魯斯1989：28）。

[[13]](#_13_84)克勞德·熱萊，被稱為洛林，1600—1682；尼古拉斯·普桑，1594—1665；加斯帕爾·杜蓋，1615—1675。杜蓋是尼古拉斯·普桑的妹夫，他在后者的畫室工作并沿用了其姓。當18世紀提到普桑時，很可能是指杜蓋（安德魯斯1989）。

[[14]](#_14_80)18世紀和19世紀頒布了五千多個圈地條款，其中在1750年至1830年間頒布了85%。在此期間，有兩個圈地密集階段：1760年代至1770年代，以及1790年代至1800年代。這兩個階段頒布的圈地條款占去總數的80%（特納1984）。

[[15]](#_15_80)圈地的社會經濟后果的個案研究，一個圈地跨越200年歷史的地產家族在18世紀50年代建造新古典主義鄉村別墅和風景林園，最終鞏固了它的地位，可參閱約翰·布羅德（1990）寫的《圈地造就沃尼家族》。

[[16]](#_16_80)鄉村娛樂包括獵狐。在圍有馬可以躍過的樹籬的較大場地，獵狐迅速代替了早期的獵鹿——獵鹿需要更大的空間，騎馬逐鹿往往穿越多處林地（吉魯阿爾1980；斯通和斯通1986）。承租的農民，由于土地充當了狩獵的通道，常常遭受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在如畫林園的環形路上散步或駕車也是一項高雅的娛樂，正如業余的戲劇演出一樣。

[[17]](#_17_74)在英國英語中，corn指小麥。

[[18]](#_18_72)盧泰爾堡也出版了英國風景的地形學著作：《大不列顛的如畫風景》（1801），《英格蘭的如畫風光和浪漫景致》（1850）。

[[19]](#_19_73)尼弗1699年所作的查茲沃思的鳥瞰畫（里茲—米爾恩1968）在基普和尼弗的《新劇場》（1708）中刊載，查茲沃思的透視畫在《銅版雜志》的第一輯中出現。

[[20]](#_20_71)盧泰爾堡后來負責考文特花園上演的啞劇《奧麥：或環游世界》的布景和道具。1785年，1786年，后來又在1788年，庫克船長的太平洋航行版畫，奧麥由胡阿希尼島出發訪問倫敦之行的插圖，作為啞劇的舞臺背景和布景再版。考文特花園的1799年“航海劇”也以表現出地質奇觀的寫實布景而著稱。

[[21]](#_21_72)全景監獄（panopticon），是邊沁設想的一棟環形建筑，看守在中心瞭望臺上可以看到每所囚室里的囚犯。——編注

[[22]](#_22_72)所考證的這些出版物的全稱和日期為：《銅版雜志，或如畫風景月刊，包含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崇高而有趣的景色，由著名的藝術家參照第一批大師的油畫和繪畫制作》，1774年8月到1778年6月發行，隨即停刊，接著在1792年2月到1797年7月再度發行；《鑒賞家博物館，含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圖景》，1778—1781；《不列顛珍品，或大不列顛島嶼最出色的自然、藝術珍品之描畫……包括貴族和紳士的主要別墅》，1777年，六卷本。

[[23]](#_23_72)1818年小查爾斯·圣巴伯將1731年到1818年在《紳士雜志》上發表的版畫和木刻做了一個描述性目錄和索引，于1821年出版。全面觀察這本雜志的插圖世界（盡管需要很多時間），再徹底審視那些交錯的內容范疇，我們可以看出早期古文物研究者對神秘與尋常、異國與本土的事物的透視性凝視，并發現此中已經預示出專業化之前的民族志、人類學甚至社會學的一些要素（斯托京1987；烏里1933；范庫倫1982），因為赫伯特·斯賓塞1873年出版的系列《描述社會學》（Descriptive Sociology）就是一個類似五花八門事實的匯集（皮爾1971）。的確，后來從事民族志與人類學研究的人都在非專業的周刊上發表作品，如《19世紀》、《威斯敏斯特評論》及《雙周評論》（庫克里克1991），以回應公眾對民間傳說和考古學的新興趣（烏里1993）。

[[24]](#_24_70)一例就是費爾伯里格豪宅的新種植園的插圖，該豪宅的建造“遵循了《給有地產紳士的提示》的作者肯特先生的原則，通過明智的圍籬和耕種，大大改善了鄰近荒地的面貌，提高了其價值”（《銅版雜志》的附文（1792—1794）第1集，1—25彩圖×L）。

[[25]](#_25_68)Constable（1776—1837），英國風景畫家。——編注

[[26]](#_26_68)“私有美景”和“私人別墅”及“世界上最出色的展覽”都與劇場產生共鳴，用以提醒我們劇場風景的象征，和更早引用的“包廂、正廳后排座和最高的樓座這些社會編碼的等級”（拉塞爾1995）。

#### 二 文化風景

[[27]](#_27_64)由于此處及后面的段落中的所有引文都源于同一篇文章，我僅在此標明引文所引用的頁碼范圍。

[[28]](#_28_64)Hadrian’s Wall，古羅馬長城，由哈德良皇帝在大約公元122—126年修建。——編注

[[29]](#_29_64)對古典主義的反撥在17世紀出現，伴隨著印度織品和中國漆器、瓷器與壁紙的引進，其裝飾元素取決于不規則和不對稱的特性。從這一角度來看，這些（東方）器物的廣泛流行孕育了對“遙遠的時代和地方的”興趣，包括對凱爾特和挪威文學的興趣，因而“東方主義為浪漫主義鋪平了道路”（艾倫1937：256）。

[[30]](#_30_64)霍勒斯·沃波爾真切地體驗了山區的“粗蠻”，當時他的叭兒狗（恰好名為“托利”，英文意為保皇黨）小跑著追隨主人的輕便馬車（車上配備了挑夫）攀登塞尼峰時，一只狼突然把它抓起（夏馬1996：447—448）。

[[31]](#_31_60)倫敦考古學會1717年成立，蘇格蘭考古學會1718年建立。

[[32]](#_32_58)2英寸代表1英里——以此為比例繪制地圖。高地勘測旨在擴展1715年蘇格蘭起義之后韋德將軍建設的道路系統（皮格特1976）。

[[33]](#_33_58)《紳士雜志》在18世紀50年代開始刊登大尺幅的英格蘭和蘇格蘭鄉村道路折頁地圖。第一波收費公路體系擴張正好趕上雜志刊登大量的風景、古代遺物和廢墟雕版畫。

[[34]](#_34_56)這些品種的馬有達利·阿拉伯、伯利·土耳其和戈德芬·柏布。經過繁育產生出紳士們的狩獵馬，克利夫蘭灣及約克郡公共馬車的馬（皮格特1976）。新品種的涌入一定程度上使斯塔布斯（Stubbs）的馬畫和版畫數量猛增，表明經濟潛能的發揮得益于市場上新產品的出現。

[[35]](#_35_54)Hannibal（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將軍，曾率軍穿越阿爾卑斯山并在特拉梅西諾湖擊潰羅馬軍隊。——編注

[[36]](#_36_54)因為用這種鏡子看到的風景效果像法國畫家克勞德·洛蘭的畫。——編注

[[37]](#_37_54)湖面也可以當作反射范圍更廣的鏡子。在風和日麗的白天，湖面完美的倒影仍然令人驚嘆，產生出一種奇異而暈眩的效果。在給這種景色拍照以后你會經歷幾秒鐘的停頓，搞不清“你的”定格的戰利品哪邊朝上才對。

[[38]](#_38_51)幸存的6張德文特湖的全景畫現存于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據說為業余畫家克里斯多夫·麥克爾（1747—1827）所畫。索西（“湖畔詩人”之一）曾見過一幅二十多英尺長的德文特湖全景，1777年由托馬斯·赫恩繪制。這幅畫最初打算用于裝飾喬治·博蒙特爵士的環形宴會廳，但這間屋子沒有建起來，因此畫的草圖也就遺失了（托馬森和沃夫1986）。這可能是一個先例，遠遠早于保羅·桑德比接受奈杰爾·格雷斯里勛爵委托繪制全景畫（見第一章）。

[[39]](#_39_49)這事跡中最著名的藝術家是查爾斯·高夫，他1805年4月在赫爾維利恩山的斯韋勒爾崖摔死。他的尸骨在7月份被發現，他的狗不僅幸存下來，還與剛產下的狗仔一起守護在他身邊。查爾斯·高夫極可能是因為死亡而比活著的時候更有名，因為他的悲慘結局和狗的忠誠給華茲華斯和瓦爾特·司各特的詩歌提供了憂郁的素材。阿姆貝爾薩德的赫伯特·貝爾1891年拍攝的一張照片顯示，在緊靠赫爾維利恩山頂處建起了一個紀念高夫的石冢（霍格1974：27）。這是實踐中的定位：從“空間”里創造出“地方”。

[[40]](#_40_49)吉爾平的游記被翻譯成法語和德語，里面有許多繪畫、地圖草稿和全景畫，涉及到很廣的區域，但具有地形學意義的精確性。他的插圖幾乎成為克勞德和普桑的原版再現（比克奈爾和沃夫1982）。他的標題毫無新意：《瓦依河和威爾士南部其他幾個地區的觀測……主要與如畫美相關》（1782）；《主要與如畫美相關的觀測……特別是山區、坎伯蘭郡和威斯特摩蘭湖區》（1786，2冊）；《大不列顛、尤其是蘇格蘭高地幾個地區……主要與如畫美相關的觀測》（1789，2冊）；《漢普郡新森林地區……森林景色及其他林地景色（主要與如畫風景相關）的觀測》（1791，2冊），《如畫風景旅行的……三篇隨筆，兼論風景速寫》（1792）；《隨筆二篇……關于畫稿》（1804）；《北威爾士的幾個地區……觀測，與如畫美相關》（1809）。實際上指南書籍太多，人們開始將其編為選集。

[[41]](#_41_49)觀景點環線上已經約定俗成的情感—想象反應，實際上是世俗的潛意識在發揮作用，與14幅耶穌受難圖組成的連環油畫和版畫“十字架苦路”也有些相似之處。同樣是以旅行的方式喚起強烈的情感。每個景點要求游客沉入特別的思考之中，不管是對如畫風景，還是對宗教的思考，面對不變的“他者”（無論是上帝還是自然），會想到人類的偶然性和易變性。威廉·華茲華斯本人與他的神圣的湖區，“大地與天空混合的圣潔”，呼應了世俗性朝拜的這一元素。

[[42]](#_42_43)布德沃斯以“漫游者”筆名為《紳士雜志》撰寫鄉村題材的文章（比克奈爾和沃夫1982）。

#### 三 民族風景

[[43]](#_43_43)這首詩采用了劉守蘭的翻譯。參見《英美名詩解讀》第121—126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略有改動。——譯者注

[[44]](#_44_41)當高雅藝術擺脫了宮廷的保護，贏得獨立之后，倫敦吸引了大批意大利、法國、波蘭、瑞典、德國和荷蘭作曲家、音樂家和藝術家。倫敦及其周邊地區奢侈品產業發展迅速，主要因為胡格諾教徒的涌入，他們盡管被禁止離開法國，還是追隨因南特法令的廢除而遭到驅逐的牧師來到倫敦。在此之前，胡格諾教徒盤根錯節的家族壟斷了路易十四王朝的裝飾藝術行業。高雅藝術和奢侈品的市場擴展到貴族階層之外。有“品味”的人，以及“中產階級”的上層，擁有可任意支配的收入來滿足他們的趣味。

[[45]](#_45_41)形容密切配合的短語“hand-in-glove”（戴手套的手）引發一系列聯想，追問下去，就會發現雖然所有的社團和協會盡力促進國內生產，英國培養起來的品味和風雅卻不青睞英國貨。最初作為手工產品受到禁止奢侈法令的遏制，結果手套成為18世紀“文雅”社會的一個標志。手套的走私貿易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大不列顛藝術、商業、制造業鼓勵協會（1754年成立）提議頒發金獎表彰“頂級”手套的生產，以抵制從合法或其他渠道進口的法國貨。說到文化模仿，手套最終在布爾喬亞社會普遍流行。英格蘭西部手套生產中心尤韋爾，在19世紀30年代前每年生產30萬打手套（但幾乎全部用的是外國皮革），盡管還要從法國每年合法進口超過150萬雙手套。19世紀20年代末期，當新發明的法國機器替代了手工生產，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手套工業就崩潰了，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些手套生產中心的教區窮人也日益增多起來。這種社會經濟的“進步”有很多詳細的例證，遭到強烈的譴責（赫爾1834）。毫不奇怪，亨利·文森特，憲章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發現在手套生產中心赫里福郡萊德伯里，幾乎每座房子都是“貧窮悲慘的情景”（《西方辯護者周刊》1839；轉引自索思霍爾1996：182），組織運動的時機已經成熟。

[[46]](#_46_39)通過前一個注釋提到的社團諸如藝術協會，藝術、科學和商業結為聯盟。金獎章頒發給各行各業，從繪畫到雕塑（擺脫了法國在裝飾藝術方面的主導地位），再到染料實驗（這樣，英國生產的布就無需船運到國外染色）。大量類似的協會在18世紀中后期不斷涌現。盡管在貿易和商業圈里成立，這些協會通常還有來自顯貴階層的會員，這樣就能具有如下優勢：“融合社會各類有地位、有影響的階層，帶來各類互惠關系和良好效果的前景”（科利1992：93）。柯勒律治就在《孤獨的恐懼》中列舉出自我服務的“法庭、委員會、公共機構/協會、社團……一個相互奉承的利益俱樂部”。這類制造商社團和協會還有助于分攤資本主義引起的風險，如價格的波動和政府財政政策的改變（莫里斯1990）。

[[47]](#_47_39)實用藝術也提供了現金，用來以更大規模表達社會優雅，亨利·霍爾二世就是一例，參見第一章，第27頁。

[[48]](#_48_39)例如，超過20萬人，“其中多數是窮人，一些是殘廢，全都接受訓練參與施暴”（科利1992：101），在七年戰爭（1756—1763）后復員。

[[49]](#_49_39)斯蒂爾的《閑談者》在1709—1711年間每周發行3次。后來由艾迪生和斯蒂爾主辦的《旁觀者》日報接替，該報一便士一份，在1711—1714年發行。艾迪生聲稱每天有3000份的銷售量，而每一份多達20名讀者。該報在英國傳播甚廣，進入私人住宅、辯論社團和俱樂部，遠至蘇門答臘的新英格蘭和東印度公司的辦公室。《旁觀者》的文章也在學校課本、指導手冊和散文集中被引用（布魯爾1997）。

[[50]](#_50_39)如畫風景美學的商品化進一步推動了高度私有化和個人化的風景體驗，同時吸引了大批人加盟這一美學共同體。新的平版印刷技術使插圖更加逼真地表現出水彩效果（芬萊和韋德爾1996），大量素描和水彩風景畫指南手冊出版，相應地也帶來了藝術用品的商業化（斯坦德林1993）。除了向印刷品和繪畫流通圖書館提供藏品外，藝術商店還供應旅游用具，諸如可敬的詹姆斯·普倫普特所攜帶的那些裝備。

[[51]](#_51_39)約西安·韋奇伍德的952件奶油色正餐和餐后甜點瓷器是在1773—1774年間為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1729—1796）制作的，表明如畫風景實際上已轉換成了器物，商品化了。每一件陶器上都繪制了不同視角的英國風景：公園、花園和古代遺址。這著名的“青蛙餐具”（因每件餐具邊緣裝飾以青蛙而得名）“是第一個將具名的地形景色用于瓷器上”（楊格1995：16）。已有的版畫也與新近受托創作的繪畫一起用于瓷器。在運往俄國之前，餐具先在韋奇伍德的倫敦貨棧展出，上面的裝飾還沒有完成。這樣，可以使“那些本人莊園還沒有畫在餐具上的有權勢的顧客提供繪畫用于復制”（雷伯恩1995：147）。由于展覽大受歡迎，《銅版雜志》1774年創刊，隨后《鑒賞家博物館》在1778年創刊，“特別提及了女皇的創意，以喚醒英國人不要忽略自己的國家”（安德魯斯1989：35）。

[[52]](#_52_39)雖然柯勒律治最后成為堅定的英國國教徒，當他初次遇見騷塞和華茲華斯時還是一個狂熱的非國教派。只是因為托馬斯和約西安·韋奇伍德（陶瓷廠主、貴格派信徒約西安·韋奇伍德的兩個兒子）給了他一筆年金后，才說服他沒有擔當唯一神教教長一職。

[[53]](#_53_39)如第四章將要探討的，反奴隸制運動的象征比喻和能量都會用來為英國勞苦大眾服務。

[[54]](#_54_39)有些政治版畫承載反諾曼的英格蘭的信息，畫上顯示出英國貴族和政府大臣（除皮特外）已被法國文化的象征所包圍（家庭教師、舞蹈教師、奢侈品等），而且正在幫助和支持法國對大不列顛的掠奪、肢解和毀滅。

[[55]](#_55_39)英國北方鄉村的坎伯蘭郡和威斯特摩蘭郡是有趣的棱鏡，通過它們可以看見舊有身份認同的模糊性走向結束。來自蘇格蘭的邊界劫掠是已在這些郡存在多個世紀的半固定特性，與之并存的是反劫掠和征服蘇格蘭的企圖。結果，邊界兵役成為農場承租人履行的義務。由于蘇格蘭王朝1603年與英格蘭和威爾士聯合，邊界戰事被認為暫告停止。依據這一假設，人們爭論到，在這個地區，邊界兵役實際上鞏固了有利于承租人的土地租賃制，因此詹姆斯一世試圖用假定的“和平”作為一次機會，將北方王室的領地重新賜給土地貴族，按新條款加倍收取租金及罰款。這樣，許多土地貴族躍躍欲試，想取消租戶的常規的低額租金，打破他們承襲已久的承租方式，以更高的租金出租。這個問題1621年在肯德爾（威斯特摩蘭郡）上演的一出戲劇中得到反映，該劇被當局認為具有煽動性。也許是的。它引起人們的一次請愿，向國王及議會要求保護租戶慣常的承租權利，說這種權利不應該依據邊界兵役而定。結果反而促使星法院對請愿者實施懲罰。劇中，一個傻子對另一個傻子評論了建造在舞臺下方一點的地獄，據說地獄里羊被用來喂養烏鴉。

烏鴉嗎，不，你錯了，那是虛偽的地主發出嘎嘎聲，那些羊是可憐的人，權利被那些狡猾的家伙剝奪，他們任意處置我們租賃人，我們已失去古老的自由，他們蹂躪我們，把我們剝得只剩下骨頭。

（加內特1621；轉引自坎貝爾1942）

雖然花了二十多年，承租人還是贏得了這場官司，確保了代代相承的權利。這些不僅構成了不絕如縷的對抗的素材，也是這個地區成為“古老的英國美德”寶庫的神話之所在。

[[56]](#_56_39)盧泰爾堡的素描《英國獅子和法國公雞》（再版于科利1992：2），回溯到1797年，當時他因為在劇場的工作而大獲成功，名聲鵲起。這幅素描戲劇性地捕捉到了盎格魯—法國之間仇恨的精髓。一頭肌肉發達的獅子，張開大嘴咆哮著，爪子張開，用一只前爪按住了一只骨瘦如柴、眼睛凸出的小公雞，后者似乎絆倒在一組風笛上。獅子的另一只前爪，高高揚起，看起來要把公雞置于死地。背景中是一艘觸礁船只，碎片亂飛，而在獅子鬃毛上方，洶涌的波濤已經變成海神波塞冬及其隨從。

[[57]](#_57_39)Hengist and Horsa，傳說中于公元五世紀率軍征服英格蘭的日爾曼首領。——編注

[[58]](#_58_39)1750年，第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教席在劍橋設立，由此可見深遠的歷史延續性的交織。該教席的基金得之于文物研究者理查德·羅林森博士的遺贈。遺產的收入來自羅林森在湖區的家族財產，即亨利五世因羅林森祖輩在阿金庫爾戰役中抗擊法軍有功而賞賜的地產（塔什基恩，塔什基恩和恩萊特1990）。約翰·羅斯金在其抨擊鐵路入侵湖區的文章中，也引用這段厚重的歷史，將在湖區田野勞作的男子的強壯和美德比作那些人，“在阿金庫爾與亨利五世并肩作戰，與他的騎士們并無二致”（羅斯金1876：7）。

[[59]](#_59_39)對大自然的美學反應的轉變并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崇古主義者對凱爾特的贊頌也非空穴來風。這一轉變歸結于更廣范圍的知識研究——從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1750）和盧梭的《論人類的不平等》（1753）就可以看出：“在不再總是由創世紀原義文本主導的語境之內探求人的起源：原始社會的特性、語言與文學的開端、自然法的存在和制度的最初發展”（皮格特1976：73）。換言之，歸結于人類學研究的根源。

[[60]](#_60_39)在最早幾十年的《人》（Man，舊系列）中涉及到的資料讓人強烈地聯想到18世紀的這個方面。這些期刊充斥著書評，如《蘇格蘭高地和島嶼的迷信》（1900，1：901）；凱爾特民俗簡評，包括莪相作品（1901，63—64：79）；配圖文章如《一些蘇格蘭人物線條畫，約翰·格雷牧師畫、里弗斯和海登博士命名》；愛爾蘭奇石論（1901，1：12—13）或英格蘭鉆孔石護身符論（1093，8：17—20）。這些專業化雜志說明民族志和人類學肇始于非專業化的古董家的研究（庫克里克1991；斯托京1987；烏里1993；范庫倫1982）。

[[61]](#_61_39)不再可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一系列狗不期然地闖入尾注的敘事。首先是霍勒斯·沃波爾的叭兒狗托利，在沃波爾和托馬斯·格雷翻越阿爾卑斯山時被狼掠走（第二章，注3）；然后是不幸的畫家查爾斯·高夫忠誠的母狗，當主人滾下赫爾維林山后幾個月一直守候在尸體身邊（第二章，注10）；以及現在施奈德復述的一只中世紀法國靈狗堤，圣吉納福（Guinefort）的微觀歷史，這只狗的故事或多或少與未被圣化和未受崇拜的18世紀威爾士獵犬杰勒特相映成趣。杰勒特殺狼的能力（托利的報復？）是編造出來的，葬狗的石冢清楚不過地是為如畫風景的游客建造的。這兩只狗出現在一首詩中，當時非常著名：

約瑟夫·哈頓配上了埃里·文的曲子，幾年之內，這個故事改頭換面，回到只說威爾士語的斯諾登尼亞居民中間。這生動地說明神話創造的復雜過程。這類神話有助于漸漸讓威爾士人欣賞他們賴以生存的嚴峻的風景。

（摩根1983：87）

[[62]](#_62_39)這類專注于如畫風景題材的油畫、繪畫、版畫和書本，參見展覽目錄《最美麗的島嶼：英國風景欣賞1775—1850》（1989），耶魯中心英國藝術展。

[[63]](#_63_39)同樣，帝國的英國身份的興起使得其他民族身份類別如埃及人或印度人不再要求政治獨立（薩義德1979）。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同樣的模式被推行：宰制之后就是霸權。

[[64]](#_64_39)政治與文化總在相互交織。全民抵抗法國入侵的問題延續了幾代；不僅限于短暫的某一階段。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體現于對“不列顛人”的號召中（科利1992），就社會層面而言，貫穿整個18世紀，“大部分人都服過役，如果沒有直接參戰，就是作為士兵和水手的親戚間接參戰”（羅素1995）。戰爭不僅反映在經濟方面，也反映在文化方面，英法之間的系列戰爭在詩歌、小說、戲劇、版畫和抨擊文章中得到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同樣的情形（羅賓斯1988）。

[[65]](#_65_39)這也與20世紀最后幾年的情形類似，超越民族國家的歐洲聯盟的建構引發了復興區域性和本地身份的運動（戈達德、利奧伯拉和肖爾1994；麥克唐納1993）。當英國身份開始讓位于更大的歐洲身份時，響起了權力下放到地方的呼聲，正如我在后面章節將要探討的，英國風景再一次成為民族身份情感的所在地。

[[66]](#_66_39)格雷的《游吟詩人》（1757）以最后一個幸存的威爾士游吟詩人為主題，后者不愿被英國人抓捕，手拿豎琴，跳下山谷而死。這種“詩人與國家權力的沖突……很快成為威爾士詩歌音樂比賽年會（復興游吟詩的聚會）上的詩歌和隨筆的主題”，后來被借用于推進馬扎爾民族文學（摩根1983）。盧泰爾堡和保羅·桑德比兩人都依據格雷的詩歌創作了油畫。配樂的《游吟詩人》是20世紀50年代我在學校學習的一首多愁善感的歌曲的主題！直到現在我才明白為什么“游吟詩人大衛”自己要跳下“白巖石”。當時對于一個孩童來說，這是一個謎。

[[67]](#_67_39)面對同一種風景，不同的職業群體腦海中浮現的是不同的認知地圖（弗萊克曼和洛夫格倫1987）；占有同樣風景、使用不同語言的群體也各自描繪出自己的認知地圖。寫到格溫內思郡操威爾士語言的人：

威爾士這個角落的經濟和政治歷史已經使英國人、操著非威爾士語之人、說威爾士語的當地人的區分永遠存在。當愛德華一世在13世紀打敗最后的半獨立的格溫內思貴族們時，他建立了一個城堡和英國定居點的網絡以便牢牢地控制威爾士。波瑪里斯、康維、哈萊奇和克里克奇，這些在游客中非常受歡迎的愛德華式城堡城鎮，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國化的中心，許多操威爾士語的人故意視而不見。……德根維和多勒維德蘭的威爾士貴族們的城堡、傳奇英雄的墳墓和其他與著名的威爾士男女聯系在一起的地方（它們很少出現在旅游線路圖上），遠非英國統治的象征，這些地方對威爾士人來說才是富有意義的風景。

（鮑伊1993：181）

如果把專為18世紀英國游客而發明和美化的特有風景的傳奇拿來看看，人們不免想知道它們與威爾士語人群的隱秘風景有多少相像之處。

[[68]](#_68_39)所謂的莪相作品是根據愛爾蘭歌謠偽造出來的（后者隨后被當作“真品”的低劣反映而忽略）。它成為揭示高地格子呢短裙古老習俗的“原始資料”。小格子裙實際上是在1720年左右由一位英國貴格派工業家設計的，改造了寬松的傳統衣服樣式，這樣穿著可以使蘇格蘭鑄造工人安全自如地快速工作。且不探討格子呢短裙和緊身格子呢絨褲涉及的階級議題，只需指出：當格子呢短裙成為反英情緒的象征時，它就遭到禁止，因為莪相的幫助使它帶有古老的傳統。一個例外是1745年后英國化的高地軍團軍裝，就采用了格子短裙（特里弗—羅珀1983）。

耐人尋味的是，從人類學角度而言，19世紀高地軍團被派到南非，高地的小短裙進入了卡勒拉舞蹈，成為部落“自我”之間、以及部落“自我”與殖民“他者”之間的區分方式（米切爾1956）。當米切爾研究卡勒拉舞蹈之時，短格子裙不再是舞蹈比賽的著裝，只是他的一個調查對象逝去的童年的記憶。那個時期缺乏對國內杜撰傳統的歷史研究墊底，所以就沒有什么特別的東西值得米切爾注意的了。如今在建構抵制身份過程中，格子呢短裙是個加倍強化的意象。

[[69]](#_69_39)在音樂術語中，burden指合唱或重唱的副歌或疊句（反復出現的主題）。第一次愛爾蘭凱爾特復興的高峰期，1792年的貝爾法斯特豎琴家節日同樣重申了文化與政治的民族主義的副歌。節日期間，文化復興與天主教解放的要求聯系起來，而勝利紀念晚餐則成為對巴士底獄攻陷周年的祝賀（特林佩納1997：10）。

[[70]](#_70_39)然而，甚至在英國語言范圍，也存在著形式化的抵制。反對者以及該世紀后期出現的激進分子出版了“英語俚語和方言”字典（巴特勒1988：47）。

[[71]](#_71_39)斯蒂芬·戈頓是我1987年結識的一位湖區居民（達比1988），他在丘原高處的一所房子居住了許多年，這兒曾是他父母的避暑別墅。年已七十的他堅持說當地的方言。在廚房的餐桌邊同我一起翻閱19世紀40—50年代陸地測繪地圖，或一起出外散步，他會經常指出一些錯誤：地圖上的一個山肩或卵石山坡的名字實際上應該屬于山脊，或者相反；一個當地的名字即使出現在“恰當的位置”，如何已被糟蹋了一番；有些地名在地圖上根本沒有出現。對他而言，保留當地的知識——真正的記憶——而不是地圖和地圖繪制者的官方世界所強加的替代性知識，是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他堅持使用本地方言和有特色的本地詞語。與本地出生的人們交談時，他的發音有明顯的變化，他使用一些本地詞語，那是在同我和別的像他自己一樣的外來者（不出生在該地區的人們）交談時不會用的。

[[72]](#_72_39)瓊·鮑姆（1994）分析了引起柯勒律治和華茲華斯關注的這些邊緣人，揭示這些人身上所隱含的被奴役的現象。

[[73]](#_73_39)華茲華斯的《湖區指南》經常使用如畫風景語言，但更經常在散文詩領域書寫，有時候沒有明確說明就借用了多蘿茜·華茲華斯的寫作。《指南》起初是作為約瑟夫·威爾金森的《坎伯蘭郡、威斯特摩蘭郡和蘭開夏郡景色選集》（1810）的序言匿名發表的。后來被重印，名為《英格蘭北部湖區的地形描述》，附錄在華茲華斯的十四行詩集《達頓河》（1820）后面。接著，1822年又以《英格蘭北部湖區風景描述》為題單獨發表。《描述》在19世紀50年代得到多次擴充，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繼續再版（比克奈爾1984）。

[[74]](#_74_39)可敬的查爾斯·漢密爾頓在1738年至1773年間持有佩因斯希爾的租賃權，在此期間，他設法通過貸款（有些從霍爾的銀行）籌措他的200英畝景觀建設項目的資金，結果導致自己的破產（薩克爾1989）。該項目包括一個凝灰巖結構的石窟島嶼、一處隱士居、一座有意做舊的“荒廢的”修道院，以及一所存放真正古代文物的“荒廢的”羅馬風格凱旋門建筑。

[[75]](#_75_39)制作平板玻璃的技術革新允許生產巨幅的長方形玻璃，如1704年用來建造倫敦肯辛頓宮的柑橘溫室的玻璃。然而，是1845年取消玻璃課稅才使得非貴族們也可以擁有繪畫窗戶。

#### 四 進入權政治

[[76]](#_76_39)馮·毛雷爾（Von Maurer，1790—1872）是德國法學家和歷史學家，其研究重點是作為早期德國社會單位的馬克（Mark）；弗雷德里克·西博姆（Frederic Seebohm，1833—1912）是英國鄉村農業和經濟歷史學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撰寫的比較歷史法學著作如《古代法律》（1861），對現代英國社會人類學頗具影響。通過對習俗和法律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他發現在這一過程中，“歐洲個人所有制的現代模式是由擴大領導者的權力、犧牲鄉村共同體的公用地發展而來的”（斯托京1987：126）。盡管視角不同，正是習俗與法律的討論與進入風景的問題息息相關。

[[77]](#_77_39)到了14世紀，人們穿越鄉村旅行時需要出示官方的“通行信函”，而學生（被認為是乞丐之流）如果被發現在鄉村漫游，可能會有牢獄之災。普通旅行者，特別是步行者被看成形跡可疑，是可能的犯罪分子，而獨自在鄉村行走的女子還要加上性“游蕩”的嫌疑。即使朝圣者也需要當局的信件，而仆人或勞工離開教區時需要攜帶證件，表明他們可以“自由地”到別處找工作（華萊士1993；威廉斯1973）。

[[78]](#_78_39)掘地派（Diggers）一詞指一宗教支派，他們要求開墾公用地上的荒地，“使得本屬于公眾的土地歸還給個人”（希爾1992：144）。平等派（Levellers）一詞源于反圈地的暴動分子，他們要拆除或“鏟平”圈地的圍籬（湯普森1966）。

[[79]](#_79_39)制造業城鎮的爆炸般發展部分依賴于早期奴隸貿易的資本積累。“在1701年至1810年間，英格蘭從西非輸入了200萬個奴隸，其中三分之二是由奴隸貿易三巨頭裝船運輸的”（沃爾夫1982：198）。取決于誰在進行該貿易，奴隸與用來“購買”奴隸的貨物的價值比從4︰1到6︰1。1620年和1807年間，據估計奴隸貿易的盈利大約是1200萬英鎊，“也許其中半數都是在1750年至1790年間積累起來的”（克拉頓1974；轉引自沃爾夫1982：198）。一個英國重商主義者在為奴隸貿易辯護時寫道：“它是一切原則的原則，一切基礎的基礎，是驅動每個輪子運轉的機器的主發條。”（波斯爾思韋特，原引文見于克拉頓1974：120；轉引自沃爾夫1982：198）通過商人和銀行家（如霍爾家族，見第一章，第27頁）幾代人的資本積累，奴隸貿易幫助英格蘭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在商業資本主義制度內積累的財富給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必需的啟動資金。

到18世紀中期，利物浦由于鄰近工業化的中部地區，取代了布里斯托爾，成為英國主要的奴隸貿易港口（沃爾夫1982）。的確，伯明翰“因其棉紡工業不僅成為三角貿易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成為運往非洲的槍械的制造中心”（鮑姆1994：43）。難怪，柯勒律治在那兒宣揚反奴隸制時會受到冷遇。懷特黑文（Whitehaven，這個地名完全是個諷刺）成為專對牙買加的貿易港，而從牙買加每年輸出四船奴隸。同時，經由這個坎伯蘭郡港口之一，從國外運來的黑孩子被悄悄地運到湖區（鮑姆1994）。這個港口也是英格蘭最繁華的煤運港口之一。一些家族如勞瑟家族（Lowthers）同時經營這兩種貿易。

[[80]](#_80_37)英國社會歷史學界近期的爭論涉及到“語言學轉向”（喬伊斯1994；帕姆1990；斯特德曼·瓊斯1997；弗農1994）。這一轉向遠離“‘主導性的社會關系’之類前話語范圍的‘經驗’而形成的正統思想史”（弗農1994：84），轉向關注人們如何通過所知的文化敘事而生成意義，如“進步”或“自由”。在語言學轉向的范疇里，社會（包括階級的概念）是一個話語性的建構，而非生產模式的物質性結果。

[[81]](#_81_37)奧海姆：英格蘭西北部的一個自治市，位于曼徹斯特的東北。它是制造工業中心，并有紡織工業。——譯者注

[[82]](#_82_37)盡管普雷斯頓這類城鎮具有遠見——普雷斯頓在1834年封閉了沼澤地卻仍保留了公眾的進入權（坎寧安1980），但是旨在為工人階級家庭提供可以進行“理性”娛樂的公共空間的公園運動，卻趕不上城市敞地的消失速度。奧克塔維亞·希爾，風景保護運動的主要人物，也是城市住房改革的領導人物，她把休閑空間的需求列入住房改革計劃之中。到了19世紀70年代，開放給倫敦貧窮工人的空間極度匱乏，這一問題導致城市的一些墓地的墓碑被清除，空出來的地面上布置上了花壇、草坪和人行道。為了爭取更多清理墓地的資助，獲得更多的敞地，她描述了居瑞巷周邊地區的生存環境，她的描述其實就是華茲華斯的《怪物議會》和布萊克那些痛苦面容的散文表達（希爾1877：108）。對倫敦的一些貧窮工人而言，死后入土為安是一種不可得到的奢侈。

[[83]](#_83_37)在1857年，共有五百多份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請愿書，組織者說有100萬人簽名，在倫敦由“毛毯抗議者”提交給攝政王。請愿活動由曼徹斯特織布工開始，毛毯抗議者（blanketeers，之所以這么稱呼是因為他們背上披著毛毯），計劃穿越中部地區，沿途不斷接納那些不滿現狀的激進工人。12000名壯士組成的“公民軍隊”離開曼徹斯特不久就被武裝部隊解散（愛浦斯坦1994；湯普森1966）。

在1906年，207名失業者由賈羅出發步行300英里到倫敦，向議會遞交一份11572人簽名的請愿書。像毛毯抗議者一樣，他們把墊毯席卷起來，纏在身上，因為途中也要在野外露宿。他們希望已在賈羅持續了15年之久的近75%的失業率能有所下降。最后在海德公園舉行了一次集會，沿途收集到9萬人簽名的請愿書一起呈遞給議會（皮卡德1982）。倫敦20世紀后期的游行包括80年代末期的人頭稅游行及1998年10萬人抗議禁止狩獵提案的游行。這兩次游行都以海德公園集會和向議會提交請愿書結尾。

[[84]](#_84_37)本世紀末，“對更具公開挑釁性的工人階級斗爭形式的恐懼在中產階級中被放大”，這一現實促使自愿性質的軍事化休閑機構的成立。在嚴格的中產階級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的男孩和青少年接受額外的軍事訓練。基督少年軍在那時甚至被稱為“少年公民軍隊”（斯普林霍爾1977：14—17）。

[[85]](#_85_37)聚會的一個目的是請愿廢除1815年的《谷物法》及其修正案（1846年最終取締）。谷物法禁止進口國外小麥，直到英國小麥價格漲到80先令1夸特（8蒲式耳）。按著那個時代人的看法（柯貝特1830、《1836年農業蕭條委員會報告》、《1846年濟貧法專員特別助理的農業領域婦女和兒童雇傭問題報告》；轉引自伯內特1979），谷物價格居高不下，底層階級吃不起面包，只能退回到吃土豆的膳食水平，以盡可能低的工資茍活著。土豆成為退化的象征，令人想到愛爾蘭人悲慘的生活狀況（湯普森1966）。

[[86]](#_86_37)亨斯萊特沼澤是1877年舉行的一個相同規模的抗議活動所在地，抗議在沼澤地修建鐵路的計劃。該抗議活動由約翰·德·摩根領導，他是一位致力于保護公用地的活動家。他所領導的“激進的民粹主義運動，植根于一種把憲章派時代與新興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連接起來的傳統”（泰勒1997：134）。

[[87]](#_87_36)1788年，英國駐澳大利亞艦隊艦長將悉尼海灣附近發現的高嶺土（白黏土）送了一些給約瑟夫·班克斯爵士，后者是英國皇家學會會長（惠瑟萊爾和卡爾—格萊戈1990）。班克斯又把白黏土送給他的朋友約西安·韋奇伍德。韋奇伍德用黏土塑捏了一個圓章，上面飾有希臘人物，刻著銘文“在和平的影響下希望之光促進藝術和勞動”。這個物質象征代表藝術、科學和商業在機構上聯合起來，更好地促進了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它與彼得盧圓章完全對立。當這兩個圓章與反奴隸制的圓章并置在一起時，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對國外奴隸制和國內工資奴隸制所起到的支撐性作用。的確，透過這兩種資本主義分化社會的方式，人們可以看出澳大利亞囚犯殖民地的究竟，殖民地接受被判流放的工人階級激進分子，不管他們是雅各賓派自由黨人，還是搗毀機器的織布工，還是組織工會的農業工人，或是偷獵者（阿徹1989；愛浦斯坦1994；海伊1975；湯普森1966）。正是在巡查澳大利亞第一個英國人定居點時，發現了用于塑捏“希望”圓章的白黏土。

[[88]](#_88_38)埃德蒙·基恩（1789？—1833），英國演員，以扮演莎劇中偉大的悲劇角色著稱。——譯者注

[[89]](#_89_37)帕碼街：英格蘭倫敦上流社會的一條街，以詹姆斯宮殿的遺址和許多私人俱樂部聞名。——譯者注

[[90]](#_90_37)燈心草儀式是格拉斯米爾教堂吸引游客的一個看點，華茲華斯就安葬于此。在行進的樂隊帶領下，孩子們手持燈心草和鮮花裝飾的籃子和十字架，參加儀式的人們穿街走巷游行，到處是扶老攜幼的家庭、朋友和游客，他們目睹盛況，拍照留念。感謝自然的美麗和富裕的禮拜在裝飾著鮮花、撒滿燈心草的教堂舉行。

[[91]](#_91_37)盧伯克實際上只購買了廢墟的一部分（馬隆1989）。在數易其主后，埃夫伯里最終聚攏為一份地產，1943年捐贈給國民托管組織，當時公眾呼吁募集資金由托管組織保護這塊地產。

[[92]](#_92_37)巨石陣有爭議的政治性風景詳見本德爾1993。

[[93]](#_93_37)150年之后，峰區和北方人行道協會（吸納了成立于19世紀90年代的曼徹斯特古人行道保護協會）仍然在反對關閉弗里克斯頓人行道。

[[94]](#_94_37)奧海姆外的公用沼澤地“消失于8個棉紡廠和236棟房子之下”（里德1991：17）。在城鎮里，甚至“環繞著花園的高高柵欄都用木板封住，為了防止卑賤的工人享受到園內的綠意或芳香”（坎寧安1980：82—83；轉引自泰勒1841）。

[[95]](#_95_36)spirits of capitalism，這里，作者用了雙關語：spirit既有“精神”之意，又指“烈酒、酒精”。——譯者注

[[96]](#_96_36)圣神降臨周徒步活動在降臨周期間舉行，通常是復活節后的第7個星期日開始。

[[97]](#_97_36)瑟米爾是一個大型土木工程項目的所在地，該工程將湖泊改造成一個巨大的水庫，通過跨越鄉村的輸水管道把水輸送到曼徹斯特。有關這一工程的爭議在下一章探討。

[[98]](#_98_36)仿佛是與大批量生產初期相稱的規模經濟效益，參加遠足的兒童和成年人的數量相當可觀。配置了多個引擎的火車能夠拉動57節車廂，火車的運載量說明了“在1842年9月，2364名主日學校的學員和老師離開本城去遠足”，“3千名兒童在1846年從伯明翰旅行到切爾滕納姆；那一年還有接近這個數目的孩子從麥克爾斯菲爾德抵達斯托克波特……1846年不少于6125人的父母、孩子和老師乘坐火車從諾里奇來到雅茅斯……還有5千名工人階級的子弟和3千名觀景人前往海邊……”（沃爾文1978：19，50—52）。

[[99]](#_99_36)感謝格里·博斯韋爾給我這一啟示。

[[100]](#_100_36)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一些假日徒步中心周日還不允許打牌。成員們開始質疑紙牌游戲與中心許可的網球類運動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志之誼》第24期，1933年5月，“書信”，4：15）。

[[101]](#_101_36)狩獵法，為了管理或保存獵物而制定的法則，比如規定哪個季節中可以使用的捕獵方式及可能獵取的動物數量。——譯者注

[[102]](#_102_36)狩獵法被指責為違憲性的壓迫。獵物資產一定程度上是根據100鎊的年進項（獲之于具有永久產權的地產）推算的——許多富裕的農場主都達不到這一條。有些種類的獵物只屬于其“擁有者”，即使獵物誤入他人土地；一些狩獵權完全與土地所有權沒有關系，即使獵物在他人土地上生活和繁衍，依然可以行使狩獵權。的確，常常是狩獵權比選舉權更排他，狩獵權凌駕在公眾的公用地使用權之上（海伊1975）。

[[103]](#_103_36)1797年夏季，當多蘿茜·華茲華斯和威廉·華茲華斯與科勒律治一起沿著薩默塞特海邊徒步時，他們被懷疑是法國革命同情者，為入侵英國進行間諜活動（鮑姆1994）。

[[104]](#_104_36)19世紀初期引進，趕獵是由獵人助手趕出獵物，驅使它跑向成排獵槍那邊。

[[105]](#_105_36)鐵路網在英國增長迅速：1835年鐵軌長達417英里，1845年增到3277英里，到1850年增至13411英里，1885年則達到30843英里（沃爾夫1978）。遠距離旅行當時比較復雜，因為時間是一個相當本地化的事情。各地鄉村時間的不同造成鐵路公司時間表的混亂。1880年議會最后通過法案使英國時間標準化（羅賓斯1988）。在這些久已廢棄的鐵路線還存在的地方，路基和被棄用的鐵軌成為野花繽紛的生態樂園，到處是蝴蝶和昆蟲。正如在美國，伴隨從鐵軌到小路運動的推進，一些被遺棄的鐵路路基已經改為人行道和自行車道。例如，峰區的蒂辛頓路正是以前的阿什本—巴克斯頓鐵路線。從蒂辛頓路上看到的景色非常壯觀，因為鐵路并未破壞風景的整體感，而是架設在高高的路基上，可以慢慢欣賞城際鐵路沿途那種英國鄉村“一等美景”。

[[106]](#_106_36)沃德的相關興趣是城市“幼童的死亡，對純牛奶的需求和兒童牛奶倉儲的需求”（普里恩1976：69），就這個話題他發表了許多文章。不久鐵路系統就會滿足這類需求，但也正是鐵路為造成城市悲慘現狀的制度提供了支持。

[[107]](#_107_36)一些機構如CHA把活動與禮拜結合起來，以此解決周日漫游問題。青年基督教協會—曼徹斯特漫游俱樂部組織進行70英里的徒步，周六下午開始，周日黃昏結束，而隸屬于蘇格蘭YMCA的長老會俱樂部只在周六下午漫游（希爾1980）。

[[108]](#_108_36)徒步者仍然被看成是松雞的威脅。一份為漫游者協會準備的報告（沃森1991）直接批評了一份峰區聯合規劃委員會的報告，后者認為休閑活動侵擾了野生動物。有些科學文章也談到徒步者在鄉村的休閑活動影響了鳥類，在一篇評論這類作品的文章中，作者駁斥徒步者侵擾了紅松雞的繁育這一觀點，認為這是轉移公眾視線的伎倆（菲利普斯1987；轉引自西達威1990：16）。

[[109]](#_109_36)指像用熏制成紅色的鯡魚吸引獵犬離開道路。——編注

[[110]](#_110_36)《路權法》規定，一條道路只要能確定被公眾基于正當權利不間斷地使用了20年（不包括由私人許可使用的情況），就視為公用道路。——編注

#### 五 進入湖區

[[111]](#_111_36)馬蒂諾為異見者論壇《每月文庫》寫文章討論宗教和教育問題（霍克爾—德里斯戴爾1992）。她還撰寫有關“當前議題”的通俗小說，如《暴徒們》（1829）、《濟貧法和窮人》（1833—1834）和《森林和狩獵故事》（1845）。在華茲華斯的十四行詩《致杜桑·盧維杜爾》的啟發下，馬蒂諾在《此時此人》（1841）中頌揚了這位帶領海地人民抗議法國統治的領袖。

[[112]](#_112_36)例如，位于波尼斯的皇家飯店列舉的贊助者中有“已故的太后、薩克森國王、普魯士君主及俄國君士坦丁大公”。其他廣告還包括藝術用品商店、有關觀花植物和泥灰沼澤的博物學指南、旅游地圖、湖區景色畫集及當地的藝術展覽。

[[113]](#_113_36)下面這個故事也許是虛構的，但它能被編造出來也很有趣。在《曼徹斯特衛報》同一版上，記載了華茲華斯在去勞瑟城堡吃晚飯的路上，移開了一個阻攔通向田野的人行道的路障。地主約翰·華萊士爵士也參加了同一個晚宴，威脅要鞭打那個拆除路障的人。據傳，華茲華斯當時站起來說：“是我拆毀了你的墻，約翰爵士，這堵墻違背了古老的路權，而且我還會這么做的。我是托利黨，但是如果我背上的鞭痕很深的話，你還會發現我是輝格黨。”（《曼徹斯特衛報》1887；轉引自希爾1980：40）

[[114]](#_114_36)這是一種風景保護戲法，100年后殼牌石油公司也用這種伎倆達到目的。

[[115]](#_115_36)英國湖區協會（ELDA）贊同霍尼斯特隘口議案，因為它會為游客開辟一片隔離出來的區域。ELDA創立于1877年，創建者是“旅館經營者和店主，他們做廣告并開發該地區，在這期間，該協會與湖區廣告協會一道宣傳這片地區”（湯普森1946：34；貝利和比爾德1980）。ELDA也致力于人行道保護和公眾的進入權。

[[116]](#_116_36)不到10%的成員是坎伯蘭人，超過25%的人居住在倫敦及其周邊諸郡，另外25%來自蘭開夏郡，大多數來自曼徹斯特周邊。有一些工業家，35位劍橋和牛津的學者，十來位美國人（主要是東海岸的學者），18位卡爾特修道院導師，加上其他來自伊頓、哈羅、溫徹斯特的老師，還有拉格比和阿平厄姆的校長，都是學會成員（馬歇爾和沃爾頓1981：214）。

[[117]](#_117_36)19世紀稍后時期人類學家創建的專為工人階級服務的博物館，充滿了“慢慢地，慢慢地”氣息：

人類學家認為這些階級使用具體感性的語言推理，頗能反映人類物種中那些更原始的成員的特點……博物館的設計體現出社會等級秩序的空間性關聯，記錄了進化過程……他們會觀察到，每一種人工制品的樣本，按其發展順序排列，都是緩慢發展變化的。因此，觀看博物館展品的行為傳授了一個清晰的政治教訓：有責任的公民不會要求突飛猛進的變化，而會意識到社會進化是漸進的。

（庫克里克1991：108；借用范庫倫1984）

[[118]](#_118_36)Blackpool，英格蘭西北部的一個海濱城市，是當時工人階級的著名度假去處。——編注

[[119]](#_119_36)有的漫游俱樂部直接產生于成人教育，包括中部地區漫游者協會，1894年由伯明翰和中部成人教育學院的實習教師發起。許多博物學協會則依據自己特定的興趣進行每周漫游，而另一些組織將漫游活動與自己的核心關注內容聯系在一起，如男人聚會和愛丁堡衛斯理西區文學協會進行的夏日周六漫游（希爾1980；泰勒1997）。

[[120]](#_120_34)羅斯金的寫作，無論是討論漫游俱樂部及成人教育計劃的演講，還是把漫游納入進步教育的大綱，成為一種媒介，把自然與宗教聯系起來（泰勒1997）。

[[121]](#_121_34)19世紀中期，科恩完全被描述成是一個極端貧困的地區，居民中近25%的人靠教區救濟生活。難怪它會成為憲章運動的大本營（加德恩1986）。

[[122]](#_122_34)倫敦技術學院由青年基督教學院（YCI）發展而成，后者由昆廷·霍格在1864—1865年冬天創立（他還開設了一個“貧困男童免費學校”，后被教育部的義務教育學校取代）。YCI提供技術教育及有組織的體育活動。學校發展較快，1882年，倫敦技術學院成立，校址就在霍格買下來的原皇家技術學院。1886年，技術學院成為一個日間學校，開設職業、商業和工業課程。此時，該校還組織學員的國內外旅游，并提供住宿。

[[123]](#_123_34)作為諾丁漢公理會學院的負責人，佩頓教過T.A.倫納德，是CHA的第一任主席（斯匹克1993：35）。

[[124]](#_124_34)詹姆斯·馬蒂諾是玄學派學會的成員，該學會是一個引起眾多爭議的俱樂部，19世紀60年代末期成立，歷時約10年。其中包括羅馬天主教紅衣主教曼寧、不可知論者托馬斯·赫胥黎。約翰·盧伯克爵士也是其成員，而赫伯特·斯賓塞則謝絕入會。觀點的交流一點也沒有解放詹姆斯的理念。1872年，他就進化論問題發文批駁赫胥黎和斯賓塞的立場。他還嚴厲斥責他姐姐的著作，因為她的著作顯露了不可知論（霍克—德里斯戴爾1992；斯賓塞1904）。

[[125]](#_125_34)Caedmon，英國最早的詩人。——編注

[[126]](#_126_34)1897年5月舉行了14個貧民假日活動，同年9月舉行了23次，每一個假日活動持續10天或11天。在免費參加者的提名過程中出現了濫權行為。一個令人側目的事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某位皮格特先生向每個被提名者索取7先令，他把5先令“捐”給CHA，剩下的據為己有。幾年后，皮格特先生的伎倆才被發現，于是宣布以后不再接納他的提名。

[[127]](#_127_34)英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時不時出現在俱樂部報告中，無意或有意地使徒步活動具有教育意義。一份論約克郡CHA團隊重組的報告中寫道：

該團隊游歷過著名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鄉村，戈爾忒森林。在斯坦福德橋為他們提供了茶水，在古意盎然的約克郡東區這個地方，800年前哈羅德國王曾力挫蠻勇的古挪威人，他就是從這兒出發，前往黑斯廷斯，戰死于征服者威廉之手。漫游持續兩周，直到5月底。

（《同志之誼》15卷，1924年10月，“約克團隊報告”，5：16）

[[128]](#_128_34)插圖作者的簽名看不清，可能是H.M.洛克。

[[129]](#_129_34)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CHA把在英國的房產提供給英國紅十字會，用作療養院或陸軍醫院或海軍醫院。CHA在迪南的房產則被法國政府用作陸軍附屬醫院。

[[130]](#_130_34)boxing day，圣誕節的次日，傳統上要送禮物給雇員。——編注

[[131]](#_131_34)萊斯利·史蒂芬斯1879年建立了以倫敦為大本營的周日徒步俱樂部，他也是早期公用地學協會的秘書。倫敦《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慶祝徒步旅行俱樂部成立50周年。文章回憶了徒步者被獵場看守人視為非法入侵時，會一起背誦：“在此提請您注意我們不會，我們任何人都不會，聲稱擁有任何進入這片土地的路權或其他通行權，因此我們給您這枚先令以作修繕之用。”文章繼續寫道，“這一做法效果奇佳，獵場看守人只能讓步”（《時報》，1930年1月18日；轉引自希爾1980：18）。

[[132]](#_132_34)展覽和專題討論會（1984）舉行的同年，英國政府批準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公約。在1985/1986年，將湖區國家公園（LDNP）納入世界遺產項目的議案被提交，但被否決。

[[133]](#_133_34)在1914—1918年大戰后，人們建議開辟公共空間用作戰爭紀念。國民托管組織收到了三塊湖區風景地：威廉·海穆爾爵士夫人捐贈的波羅戴爾城堡峭壁、勒克菲爾德爵士捐贈的斯可斐峰、山地和攀巖俱樂部提供的大蓋布爾和大恩德山。1925年，抹大拉學院校長和華茲華斯最后一個在世的孫子一起購買了斯可斐另外的地區，將所有3千英尺以上的土地捐作斯可斐峰戰爭紀念館的附加部分（湯普森1946）。這些敞地的寂靜以及遠景和景色，與令人精神崩潰的戰地噪音和狹長的戰壕視野形成截然不同的對照，許多人如西格弗里德·W.黑爾福德就喪生于戰壕之中。

[[134]](#_134_34)分期付款（hire purchase）開始廣泛流行。所謂的HP，意味著首付很少的款項購買一個大件消費物品，以后每星期繼續支付，幾年后才支付完畢。盡管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分期付款已經進入工人階級生活的中心體系”，“其應用在1918年到1938年間翻了兩番，也許三分之二的大批量生產的物品就是這樣售出的，任何一個時期，分期付款式的銷售都能吸納大約5千萬英鎊的資金”（沃爾夫1978：109，139）。

[[135]](#_135_34)做這種徒步旅行的時期，沃特·雷蒙德·史密斯住在德文郡的彼得弗德，他在那兒充當鋼琴調音師。盡管這群人認為史密斯大概14歲就離開了學校，他的描寫記敘有一種詩意，表明他作為衛理公會傳教者的兒子成長的家庭背景，也說明了他上過德文茲文法學校。

[[136]](#_136_34)婦女過去只享有有限的選舉權：她們得超過30歲。隨著戰爭的爆發，要求婦女參政權的激進派人士停止了斗爭行動，與非激進派爭取參政權的人士團結起來投入戰爭之中。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賽特（1847—1929）和亨利·福賽特提出將政治的和空間的進入權合成一個議題，前者是主張擴大參政權的領袖，后者是公用地、敞地和人行道保護學會的成員。

[[137]](#_137_34)《建筑雜志》的言論頗能令人回憶起羅斯金的憤怒，它鼓吹“要花些時間教育這些周末跑到鄉村大肆騷擾的暴發戶們，野餐之后帶走垃圾”；而《鄉村生活》報道說“這些城里人思維猶如農奴。正像突然被解放的農奴一樣，行事沒有教養，對鄉村亦無責任感”（轉引自瓊斯1990：259）。

[[138]](#_138_34)CPRE由各種利益集團構成：鄉紳協會、中部土地主協會、土地經紀人協會和測量員協會，代表著主要的土地主及其服務行業。英國皇家建筑學院和國家住房及城鄉規劃學會也在關注著已經建構的美學（以及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國民托管組織和古建筑保護協會給既有的美學抱角石添加上自己的紋飾。使用者利益集團包括公用地和人行道保護協會、皇家汽車俱樂部以及汽車協會。“地方的”投入是通過婦女協會全國聯盟體現出來的，而地方政府則由郡縣議會協會和鄉村地區議會協會代表。

[[139]](#_139_34)被指定允許公眾進入的土地稱為“地區的”，而被指定用于科學觀察的土地稱為“國家的”。仿佛需要進入景區的公眾（即沒有自己土地的社會成員）不構成“國家”。這類似于羅斯金按照階級區劃的博物館兩級體制，這個劃分與他的風景觀相聯系。在每種情形下，湖區都被劃為專屬于“國家”的產業。

[[140]](#_140_34)與1907年夏天曼徹斯特漫游者俱樂部的男士“整夜徒步”之后拍攝的一張照片相比，湖區之友成立大會的照片顯示出驚人的差異。在前面的照片中，人們西裝革履，背心、衣領、領帶齊全（希爾1980：29）。這是一種文化模仿，1907年的工人階級仍然在模仿“衣著講究的上流人”。他們整夜徒步難道真的穿著三件套西裝嗎？戴上領帶就是為了照相嗎？到1934年，一個RA代表可以穿著休閑樣式的服裝，與“上流人”區別開來，而這又反映出那些上流人刻意為之的照相與他拉開的社會距離。這是文化模仿的激進化。

[[141]](#_141_34)與一群婦女徒步一個星期，到了終點，當我們坐下吃晚飯時，簡·斯薇特（Jane Sweet，曾經是森林生活知識團的一個成員）說要給我、我的項目一樣東西。她接著唱了一首歌，嗓音與她的名字一樣甜美。她后來告訴我那首歌就是尤恩·麥科爾的“曼徹斯特漫游者”。當時我真希望帶著錄音機，但是如果要求她等一會兒之類，就會毀掉當時的美妙瞬間。第二天上午，我們分手之前，她把歌詞講給我聽，這里我抄錄了部分歌詞。

[[142]](#_142_34)例如，賈羅的失業者“去進行了真正的長途徒步。對他們多數人而言，徒步走到紐卡斯爾是小菜一碟……他們在路上走了很長時間”（皮卡德的采訪1982：48）。這樣的經歷為他們1936年徒步300英里走到倫敦打下了底子。

[[143]](#_143_34)《開闊路》中的詩歌按主題分類，順應季節和生命周期以及平凡的“旅行”節奏。冬天、春天、夏天和秋天的詩歌與出行、遇見“戀人”、旅伴友誼交相呼應，最后一部分命名為“少許哲學”。

[[144]](#_144_34)Chanctonbury Ring，英格蘭南部高地的一處古跡，以鐵器時代土堡及周遭古樹而著名。——編注

[[145]](#_145_34)是青年旅社協會（YHA）照顧了出逃的城市“野蠻人”，因為一晚1先令的收費使得“一個星期只掙30或40先令低報酬的職員和體力勞動者”負擔得起一周的度假（洛厄1989：123）。YHA于1931年成立；到1939年已經擁有30個旅館和8.3萬個成員。

[[146]](#_146_34)霍特沒有說明約克公爵講話的出處，他的講話在哪兒舉行？對象是誰？在何種情形下？從更大的語境來看（這里沒有復述），似乎他的講話在1936年有關體育鍛煉的議會辯論中被引用。這可能與公爵的“男孩夏令營”有關。在其他地方還寫到夏令營每年的照片顯示了“[公爵的]……公立學校的助手[與]……同齡男孩們之間在社會地位和體格上強烈的對比，[后者]與公立學校的同齡人相比，身高要矮四五英寸，門牙稀疏，[而且]一般看起來要大十歲”（洛厄森1980：270）。霍特可能把公爵關于上層階級的“徒步者”的話挪用到工人階級徒步者身上，而且前提條件是下議院議員本人如實引用了公爵的早期演講。

[[147]](#_147_34)Betjeman（1906—1984），英國詩人，其贊美英國鄉村的作品常有懷舊情緒，如詩集《幾朵晚菊》。——譯者注

#### 六 進入/可進入性：私有財產與國家公園

[[148]](#_148_34)市區被定義為某郡的小一點的城鎮。大一點的城鎮及城市是自治市，即一個郡內的行政“島嶼”（佩普勒1950）。

[[149]](#_149_34)公用地往往要么被妖魔化（是經濟困境之源，對其補救措施就是私有化），要么被浪漫化（在公用地工作的每個人享受社會和諧和生態平衡）。公共產業并不一定等同于完全開放進入的敞地；公用地通常會被高度管理和規范。中心問題——對各類公用地的研究突顯出來的問題是：“什么人進入什么地方，什么時間進入”（艾奇遜和麥凱1987；布羅姆里1992；利茲和奧提茲1992；泰勒1995）。

[[150]](#_150_34)如同全景圖提供的虛擬旅行一樣，《記錄英國》在鄉村巡回展出，試圖減少組織者稱之為的“不必要的”假日火車旅行和汽油使用。“不列顛”一詞是一個誤稱，因為它只涵蓋了英格蘭和威爾士，甚至對威爾士的描述也很不充分。另一個計劃涉及到蘇格蘭。該計劃依靠基金來自美國的朝圣信托社（Pilgrim Trust）資助得以實施（梅勒，桑德斯和萊特1990）。喬治·特里維廉也說服朝圣信托社向國民托管組織捐款購買產業和土地（卡納戴恩1992）。他聽從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德海倫·羅溫薩建議，幫助組織了阿丁漢暑期學校，以示回報。由國民托管組織主辦，特里維廉督導教程，1952年一隊美國收藏家和學者游覽了托管組織轄下和私人擁有的18世紀鄉村別墅，特許他們參觀業主的收藏、建筑和環境。

[[151]](#_151_34)艾布拉姆斯編輯的有關國家公園的文集非常有趣，揭示了姻親關系與機構之間的聯系。在出版該文集時，艾布拉姆斯是國家公園委員會秘書；該書題獻詞是“謹紀念約翰·道爾和H.H.西蒙茲”。

約翰·道爾（1899—1947）是參加規劃的建筑師，曾經是CPRE的國家公園常務委員會的名譽草案秘書。因病退伍之后，他擔任了工程和規劃部以及城鄉規劃部的戰時文職人員，從事國家公園規劃的核心工作。他還為YHA（青年旅社協會）設計了湖區旅社，是國家露營部的建筑師。

西蒙茲牧師（1885—1958）曾經是CPRE的國家公園常務委員會草案秘書，湖區之友副會長，湖區規劃局的成員，漫游者協會副會長，默西塞德郡青年旅社協會副會長。

[[152]](#_152_34)伯基特演講結尾大量引用華茲華斯的《序曲》，但沒有說明出自華茲華斯，由此可以看出他所針對的聽眾是些什么人。他認為聽眾應該知道，這種假設保持到演講出版。

[[153]](#_153_34)“平房皮垢”的報復在印度聽到——突然傳來的歡呼聲傳到英國軍官建立在山上、遠離士兵營房的平房，原來歡呼聲是因溫斯頓·丘吉爾落選、工黨當選的新聞而起（個人交流，瓊·文森特）。

[[154]](#_154_34)1923—1924年間當過一陣韋爾斯的議員之后，自1925年起，霍布豪斯（1886—1965）成為薩默塞特郡議會成員，1940年起任議會主席。1946年他擔任郡議會協會主席。郡議會不愿意將公園規劃權力讓給聯合規劃局，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也將放棄中央政府撥給公園的基金。由于他有郡議會協會的背景，人們認為霍布豪斯能夠就這一問題進行協商。

[[155]](#_155_34)在慶祝這個使進入權唾手可得的法案時，1949年還目睹了斯蒂芬森和S.P.B.梅斯合編的《可愛的不列顛：圖文描述英國鄉村的美麗和趣味》的出版。

[[156]](#_156_34)當地政府被授權商討進入權協議，但它們很少動用這種權威：“下議院環境委員會（1995）只報告了48項有關國家公園的協議”（惠特比1997）。直到1958年，峰區成立國家公園7年之后才簽署了《峰區金德斯考特進入權協議》，這一協議使得公眾可以縱覽峰區全景，此時距公眾被允許登上倫敦里士滿山縱覽全景已過去了58年（見第四章）。為不同階級的賞景人而設置的景色保護在時間上也有不同。

[[157]](#_157_32)戰爭時期人們目睹了通過研究法律和混亂來“尋求秩序”。霍斐德是眾多學者之一，研究比較法學或歷史法學，其中一些工作可以納入人類學范疇（文森特1990）。

[[158]](#_158_32)只有在1974年當地政府重組之后，湖區特別規劃局—國家公園管理局（LDNP）才取代了郡議會規劃局。該公園完全位于新設的坎布里亞郡，包括四個區議會的一部分。LDNP中的大部分公用地屬于前湖區市區，1925年《財產法》確保公眾可以進入LDNP范圍內的許多山地和山區。不同于其他國家公園，LDNP的41.3%的土地是公眾擁有的（普爾和普爾1987）。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公眾可以進入所有區域而無任何限制。

[[159]](#_159_32)任職期間，桑福德爵士，約翰·西里爾·埃德蒙森牧師（1920年出生），擔任住房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務官，也是環境部的政務次官。他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從事地區規劃和環境教育，還為鄉村假日協會充當顧問——那也就是改了名的合作假日協會（CHA，由T.E.倫納德牧師創建）。1979年至1990年桑福德還擔任了青年旅社協會副會長。

[[160]](#_160_32)在英國運作了一段時間的管理協議，付錢給農場主讓他們不要做破壞環境之事。其實在許多情況下如果不是農業部補貼誘人去做，他們壓根不會做那些事的。

[[161]](#_161_32)奇怪的是，陸地測量局最近頒布的光盤“大不列顛互動地圖集”，按1英寸比10英里的比例，及1英寸比4英里（加上放大功能）勾畫全國，居然沒有顯示人行道。

[[162]](#_162_32)包括用泡沫墊支撐的木制通道。不幸的是，泡沫墊的邊緣很快開始斷裂。1996年建成的約克郡溪谷國家公園海岸到海岸步行道使用了另一種方式。紅外線“漫游者計數器”安裝在柵欄上來監控人行道使用狀況。一旦游客超出人行道的容量和環境容忍度，計數器就指示散步者轉向生態環境不那么脆弱的路線（瓦因萊特1996）。

[[163]](#_163_32)購買新的路權許可是一回事，但付錢給農場主去要他們生產公共產品——也即讓人進入傳統路權覆蓋的地區，卻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傳統路權恰恰應是法定路權。一些農場主認為由于給予公眾路權（傳統而確定的路權也好，新的許可的路權也好），他們遭受了經濟損失，因此他們要求先要拿到補貼。經濟損失的產生可能是因為柵欄門敞開，牲口就四處晃悠，毀壞莊稼，農民就得花時間把牲口趕到一起；行人不按人行道走路，踩壞莊稼；還有解開繩子的狗騷擾家禽。

[[164]](#_164_32)漫畫勾畫了進入權與階級、隱私、政黨及宗教的關系。杰克的一幅漫畫，1991年9月30日在《標準晚報》上發表，展示了三個持槍的土地主站在他們的一處氣度不凡的鄉村別墅外。一幅“嚴禁非法侵入”的告示牌邊是漫游者的尸體，手拿著陸地測量局的地圖，身體如同松雞或野雞一般攤開在地。畫中文字是“還不算糟，伙計，畢竟這只是我們第一次獵殺漫游者！”公用通道有時被蓋上了違法建筑。這種行為促使了如下漫畫的問世，漫游者要求穿過餐廳或浴室（通常豐滿的女性還在浴缸里），因為他們發現了可以穿過該住宅的路權。另一些漫畫借用主禱文：“寬恕我們的侵犯吧，正如我們寬恕他人對我們的侵犯”。還有漫畫以漫游者入侵為題，描述他們被農民射殺、處死或關押起來做人質。20世紀30年代的一幅插圖最近作為明信片重新發行。插圖顯示出漫游者在踢打、用拳猛擊，并掐住獵場看守人的脖子，其文字說明為“甚至小小的斯蒂平福德漫游者協會也不乏流氓特性”。漫畫惡搞了一張攝于1932年，反映金德斯考特公眾入侵事件的照片，照片在《謝菲爾德每日電報》上發表（后來翻印，希爾1980），畫面上漫游者正彎腰幫助一個腳踝扭傷的獵場看守人。

[[165]](#_165_32)畫中土地主為對抗漫游權而給地產插上“化學武器試驗區”的牌子（Charles Griffin，《快報》），或是組織“鄉村游行”（Steve Bell，《衛報》）。——編注

[[166]](#_166_31)畫中漫游者協會成員試圖進入一塊標著“私有化，禁止入內”的土地（Nicholas Garland，《獨立報》）。——編注

[[167]](#_167_31)很奇怪的一個觀點是：不同于“美國荒無人煙的原野”（山地自行車運動就在那里興起），英國風景區“特別不適合這類運動”（麥克加文1996：2；著重號為后加）。也是這個作者把在國家公園進行山地自行車運動的爭議看成人與人之間的“感知問題”，因為它的證據僅來自一些逸聞。但是，他也承認存在破壞地面和侵害了野生動物的問題。我自己曾與一群人正在湖區徒步，忽然幾個山地摩托手闖了進來，我們只好離開那條陡峭的山路。有輛車想加大油門快速躍過一個大石頭，結果出了故障，發動機熄火了。當意識到車手將不得不扛著這輛車走路時，我們這幫人不由歡呼起來。

[[168]](#_168_31)據說，可以“從所有開發活動里獲得環保的最終收益……盡管（鄉村）可能萎縮，但質量的提高會彌補數量方面的損失”（CC，1998年9月19日：1）。

[[169]](#_169_31)20世紀末期反狩獵運動變得更加激烈。當國民托管組織很不情愿地禁止在其管轄的所有產業內獵殺牡鹿時，運動推向高潮。如果在過去，獵狐是一種鄉村權力和占有的儀式，那么在當代背景下，它卻有一種懷舊和失去占有的意味。在湖區只能徒步跟著獵狗去追逐獵物——也許，這種傳統中仍然保留著一種更民主化的當地文化的成分。由于地形原因，沒有穿著紅色獵服騎馬疾馳的獵人。如果你想帶著湖區獵犬打獵，你就得準備翻山越嶺。偶爾我也會碰上湖區狩獵，但從未見誰逮住過狐貍。

[[170]](#_170_31)一個星期后，該議案沒有能夠加進法律條款之中，因為反對者提出了好幾百個修訂案，進行冗長的演講，占用了規定的辯論時間。現在能在英國城區看見狐貍出沒，也許是因為狐貍與鄉村聯盟玩起了游戲，移居到城鎮里去了。

[[171]](#_171_31)這里還關系到兩代之間的使用問題。群眾性的戶外旅游者節日處于官方界定的鄉村休閑之外。這類節日確實證明了受到忽視的一代人的休閑偏好，他們的活動現在被視為犯罪。為進入權設定的種種清規戒律只給特權者特權，宣揚了他們的立場。旅游者節日是心懷不滿的大眾集會的另一個例證。

[[172]](#_172_31)一次推介“鄉村運動”的全國廣告宣傳中，使用的海報是大幅藝術圖像與相反廣告詞的結合。一幅約克郡溪谷圖畫配上這樣的文字：“當你試圖解救巴西雨林時，英國鄉村正在消失”；一只特大的手捧著一只死去的小小的哺乳動物，題頭文字是“殺手是一名男性，白領工人，也許四十大幾，在一個工業城鎮生活工作”；一個圍著皮圍裙的男子畫像上寫的是“喬治·羅伯茨，頭號劊子手和熱愛動物者”。這些圖像傳達出的信息是，有五百萬左右的人們在英國鄉村生活和工作，卻對鄉村事務沒有發言權，即便他們“最有資格管理鄉村事務”。鄉村運動想要“開始重建城鎮與鄉村之間曾經存在過的那種理解”。

第三部分 民族志的風景

[[173]](#_173_31)在1974年主題為“登山者和社會”的全國登山大會上，有人以某種程度的自滿的措辭，評價說在“具有健康異性交往的放縱特點的當代登山共同體里”，有比過去“多得多的女孩”參加。接著，演講者換一種不同的措辭，繼續說道：“女性還沒有按自己的方式來登山……但是現在有很多女子被定義為登山者，而不僅僅是‘某某的姑娘’。”（庫克1974）這種現象能引起評論，表明女性登山者是多么罕見。

#### 七 再地化/發現/引述景色

[[174]](#_174_31)我發現這個年輕人非常令人憂心。很顯然，他處于生活的崖邊。我非常不安，需要團隊中的某人讓我相信這個人至少暫時置于一群人中間，打破了他顯然處于的孤獨狀態。我不禁認為他是越出了那些界限之外的。我很高興地看到那個星期我們的領隊吉爾夫對他多么友好。

[[175]](#_175_31)這非常類似于赫伯特·斯賓塞的一段文字，描寫他1861年在蘇格蘭莫爾海峽目睹的日落景色和印象：

那個黃昏，云層和天空奇妙的色彩，如此絢麗奪目，本身就令人難忘，又倒映在海峽的水面。同時，沿著莫爾山脈的海峽兩岸被落日照亮……在我的經歷中，還沒有什么堪與這種飛揚的情感相比。這是有史以來我體驗過的最強烈的快樂感受。

（斯賓塞1904（II）：78）

在此，我們也同樣感受到（過去了150年）自我與現象世界的距離已被定位在風景之中的體驗所打破。

[[176]](#_176_31)有趣的是，這個英國高科技服裝廣告的挖苦性語氣與美國對手的風格不同——曼哈頓一家艾諾斯運動商店的整版廣告，畫面巨大，文字如下：

繼續

當英雄

加速

出色的設備

技術完美的服裝

專家建議

（《紐約時報》，1996年11月17日：28）

[[177]](#_177_31)正如我后來經歷的，CHA徒步領隊們還是會為那些有興趣的人主持周日晚會，當然它們并沒有被禁止。我無法解釋為什么這位男士感覺他不再能進行這樣的服務。

[[178]](#_178_31)對此有不同的排列方式。有些領隊的確介意他的隊員走在前面，但多數情況下，如果有人比其他人走得快，領隊會告訴他們在什么地方停下來等候。有些領隊會清楚表明隊員全部到場后才開始休息，大家再一起出發。另一方面，有些人堅持要和領隊一起走在前面，不允許其他人“替代他們的位置”。這時不時地會弄出點可笑的狀況，因為如果有人占了那個位置，就會被擠到路外面去。其他領隊會在隊伍前后走動或走在最后，以免有人遇到麻煩。在那時，他們會要走到前面的隊員在某一指定地點停下，等著后面的人趕上，“重新集合”。通常會指派某人擔任“趕獵狗的人”，確保無人掉隊迷路。

[[179]](#_179_29)這些構成了這出活劇的第一階段，“規范的模式管理下的社會關系[被一個人]破壞，這個人總是在（或自認為在）代表其他人員行動，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特納1974：38）。正是這種利他主義特性區分了象征性的違規與犯罪，后者總是有某種利己主義的成分（特納1974）。

[[180]](#_180_29)衣柜化：意指同性戀者畏懼社會壓力而隱匿自己的性取向。反之，出柜（come out of closet）則是公開承認自己的性取向。——譯者注

[[181]](#_181_29)紐約的一個女性朋友參加過艱苦的荒野長途徒步，她給我展示了一個塑料用具，（顯而易見）女性用它可以站著小心翼翼地排尿。這個奇妙的漏斗裝置是特為人們在原始荒野地使用的。在那兒，你要帶走你帶進來的所有東西，包括身體排泄物。這個“設備”的另一部分應該是盛尿的塑料袋。我謝絕了她讓我帶上這個的提議——即使不連塑料袋。在一次徒步時我向女士們描述了這個器具，引起了一陣歡鬧，結果大伙兒覺得需要再到歐洲蕨地里休息休息。

譯后記

[[182]](#_182_29)此書雖然是一部關于數理邏輯、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科普巨著，但我認為稱其為偉大的文學作品更加名副其實。

[[183]](#_183_29)80年代中期，貴州許多風景如畫的鄉村地區還未被開發成收費景區，而一些知名景區也未建造后來那種防范甚嚴的圍墻、圍欄。

[[184]](#_184_29)The DarkSide ofthe Landscape:The RuralPoor in EnglishPainting 1730—1840一書的作者

[[185]](#_185_27)Landscape andPower一書的編輯者。